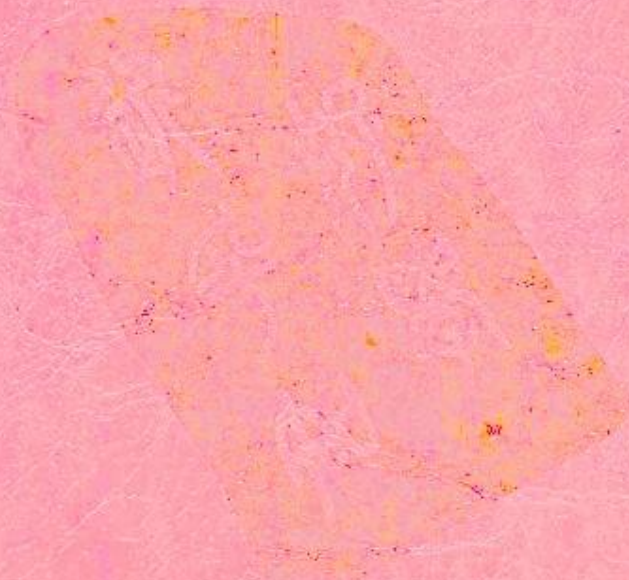


彭述之選集

第一卷



彭述之選集

第一卷



出版說明

這部選集的著者彭述之，從一九二〇年參加共產主義運動時起，到現在已經有六十多年了。在這期間內，中國發生了許多震動世界的大事變，首先是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革命。當時，本書著者以中共中央執行委員兼宣傳部長身份，成爲革命的領導者之一。在以後的半個多世紀內，他一直堅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從事革命工作。在這麼悠長的歲月裡，他寫了大量的著作，評析過各個時期發生的重大事件，提出自己的見解和主張。這些著作既是歷史的記錄，也是歷史的見證。著者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去剖析事變，因而又對馬克思主義作出闡釋和發揮。

選集第一卷是二十年代的作品，主要是評論中國第二次革命的各種問題。爲此，我們選輯入著者當時在公開刊物上發表過的許多文章，和他對中共中央領導的批評意見；並加入他在1974年爲《托洛茨基論中國》一書寫的導言，和八十一位原中共黨員聯署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彭氏是這份文件的三位起草人之一），後者作爲本卷的附錄。這些有關當時的革命問題的著作，對研究中國近代史都具有珍貴的價值。

此外，還收入了彭氏的伴侶陳碧蘭爲他所寫的一篇紀念文章，作爲本書的代序，此文敘述了彭氏的生平，希望會有助於讀者對他的了解。

各文一般都按照寫作的時間順序編排，祇有極少的例外，爲的是方便讀者閱讀而略作調動。

由於各種條件的限制，出版技術上的一些錯漏、缺點會是難免的，希望讀者加以原諒，並提供意見，以便將來改正。

目 錄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九年)

出版者說明

回顧我和彭述之的歲月(代序).....	陳 碧 蘭	1-33
《彭述之選集》日文版導言--(一九七七年九月二日).....		34-39
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是怎樣形成的?.....		40-49
(一九六四年四月).....		
中國共產黨及中國第二次革命簡史.....		50-113
——為托洛茨基《論中國》寫的導言.....		
(一九七四年四月廿六日).....		
(一) 中共初期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傾向.....		51
(二) 中共被迫轉向孟雪維主義.....		55
(三) 中共向左轉——轉向工人階級.....		65
(四) 革命的興起——中共與共產國際的衝突.....		68
(五) 在共產國際的「國共合作」政策下，中共陷進了死巷.....		74
(六) 從蔣介石到汪精衛.....		81
(七) 從極右的機會主義跳到極左的冒險主義.....		91
(1)南昌暴動.....		91
(2)兩湖秋收暴動.....		92
(3)海陸豐的蘇維埃運動.....		93
(4)廣州暴動.....		94

(V) 托洛茨基對中國問題的貢獻.....	95
(1)在帝國主義壓迫下·各階級反對帝國主義革命的態度.....	95
(2)關於共產黨的獨立問題.....	96
(3)關於蘇維埃問題.....	98
(4)革命失敗後的策略問題.....	101
(5)關於中國革命的性質問題.....	104
(6)關於中日戰爭的政策問題.....	108
結束語.....	112
義和團運動與帝國主義 (一九二四年九月七日).....	114—127
江浙戰爭之世界政局的背景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七日).....	128—130
江浙戰爭與國民黨 (一九二四年九月廿四日).....	131—135
辛亥革命的原因與結果 (一九二四年十月八日).....	136—144
英國工人政府的命運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五日).....	145—147
廣東商團事變之根本原因及其對中國國民革命.....	
所與之教訓 (一九二四年十月廿二日).....	148—155
請看麥唐納爾之革命方法 (一九二四年十月廿三日).....	156
評反革命的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 (一九二四年十月).....	157—164
十月革命與列寧主義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七日).....	165—166
帝國主義戰爭的「休戰紀念」到了.....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167—170
目前政局與工人階級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日).....	171—173
段祺瑞執政與不平等條約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日).....	174—176
誰是中國國民革命的領導者(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177—193
係中山先生之態度問題 (一九二五年一月七日).....	194—196

二七年鬥爭之意義與教訓	197-201
(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	
上海總工會被封與上海工人今後的責任	
(一九二五年十月五日)	202-204
我們的北伐觀	205-218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日)	
北伐的歷史根源	206
前此北伐失敗之原因	209
各方面對北伐之認識	212
北伐前途——決定北伐勝利的條件	215
列寧主義是否不適合於中國的所謂「國情」?	219-226
(一九二七年一月廿一日)	
怎樣答覆英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	227-233
(一九二七年四月)	
目前革命右傾的危險	234-242
(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	
南北妥協問題	243-249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	
讀了蔣介石二月二十一日之講演以後	250-257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	
評中共中央的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路線	258-287
——在支部幹事會和中央省委區委各代表參加的	
聯席會議上的發言(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二日)	
第一次發言:	263

第二次發言：	265
中東路問題	265
機會主義派問題	268
反對派問題	279
革命性質問題	284
第三次發言：	285
評中共第六次大會及其決議案	288-304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一) 批評「六大」之必要	288
(二) 從「五大」到「六大」	290
(三) 六次大會怎樣解決了問題？	295
(四) 六次大會與共產國際的領導	300

附 錄：

我們的政治意見書	陳獨秀等八十一人	305-335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一) 中國過去革命失敗的原因——國際機會主義的領導		305
(二) 黨的現狀與危機——機會主義、盲動主義與官僚主義		313
(三) 國際機會主義的根源與蘇聯危機		321
(四) 國際無產階級運動的兩條路線的鬥爭		329
(五) 我們的態度與建議		333

回顧我和彭述之的歲月（代序）*

陳碧蘭

這裏我不想在這篇短文中為彭述之作傳記，而只是試圖將我從一九二五年認識他的時候起，迄至今日整整四十年中，他的思想，他在中國共產黨中的作用與活動，以及三十六年來他在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中的作用和艱苦鬥爭的情形，作一個輪廓性的敘述。

我認識彭述之是在一九二五年秋，但我認識他的思想早在認識他本人之前。當一九二四年末，我還在莫斯科東方共產大學學習時，就從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嚮導》週刊和理論雜誌《新青年》上讀到他的文章。他的第一篇題為《帝國主義和義和團運動》（發表於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出版的《嚮導》週刊上），有系統地分析和闡述了從鴉片戰爭以來，即從英帝國主義以大砲轟破了中國的萬里長城後（一八四〇—一四二年鴉片戰爭），中國如何逐漸成為國際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詳細地引證了各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軍事、經濟、政治和文化侵略的歷史事實。由此給義和團運動確定了一個觀念：「它是中國農民群眾受了帝國主義過分壓迫而起的一種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運動。」因而駁斥了近代史家所謂「拳匪之亂」和一般人稱之為「野蠻排外」等污蔑的傳統

* 本文為紀念彭述之七十歲生日而寫，初發表於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日及十一月廿三日的《洲際通訊》。

觀念。這不但在中國共產黨內對義和團確定了一個正確的觀念，而且在社會上，尤其在文化界掀起了一個風浪，那些有名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和教授們（如北京大學名教授胡適之等），都高聲叫喊：「這是推翻了中國歷史的傳統觀念，這是翻案了！」

其次，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誰是中國國民革命之領導者》一文（發表於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的《新青年》雜誌上），自一九二三年初，共產國際認定中國革命是各階級的民族民主革命，因而指令中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政策後，在黨內便發生了那一個階級是這個革命的領導者的問題。因為依照國際的指示，顯然暗示着代表無產階級的共產黨不能單獨擔負領導國民革命的使命，因而必須加入國民黨，同國民黨合作。當時共產黨的領導層，在接受了國際訓令之後，便改變了原有的無產階級立場，發生了一種極右的傾向。例如毛澤東在他的《北京政變與商人》一文中（發表於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一日出版的嚮導報上），他曾公然號召天津和北京的商人（即資產階級）「一齊起來和上海的商人採取一致的革命行動，商人的團結越廣，聲勢越大，領導全國國民的力量也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重點為我所加）這明顯地認為資產階級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隨後，陳獨秀寫了一篇題為《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的文章（發表於一九二三年十二月的《前鋒》月刊第二號）。在此文中，他從中國各階級的分析 and 力量的對比中，所得出的結論是：只有資產階級才能領導國民革命。因一方面，這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同時，工人階級的數量和知識還不夠領導這個革命。這種思想在黨內引起了很多同志的混亂和迷惑。因而彭述之便針對着陳獨秀的文章，寫了《誰是中國國民革命之領導者》。他雖沒有提到陳獨秀

的名字，但實際上是批評他的觀點的。①

彭述之在這篇文章中，把中國各階級的經濟基礎和利益，從銀行、商業、工業資產階級，一直到工人、農民、手工業者，以及一般的小資產階級，按照它們的經濟基礎和利益加以詳細的分析，從分析中指出：中國的資產階級，包括工業資產階級，都是直接或間接依靠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因而絕不能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而領導國民革命。而且由於害怕站在他們背後的無產階級，不可避免地是反動的。因此，他得出的結論說：

「我們分析了以上各種階級……我們現在可以斷定，在物質的基礎上，在革命的覺悟上，在世界革命的環境上，以及中國各階級的利益和意識的趨向上，中國的國民革命，只有中國的工人階級配作領導者，也只有它能作領導者。」

彭述之於一九二〇年秋加入共產黨，一九二一年春到莫斯科東方共產大學學習，并被選為中國共產黨旅莫支部的書記，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七月他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回國時為止。據同志們說，他在旅莫支部作過很好的貢獻，曾經為他們作過關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許多報告，同他們討論各種問題，因而同志們對他很尊重。當我在那裏時，繼任的書記為羅亦農（他於一九二五年春回國，不久即任上海區委書記，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死於蔣介石之手）。那時同志約近百人，有些是從法國和德國轉到那裏的，但多半是從中國派去的。我們除了正式上課外，晚上或星期日常舉行演講會或討論會。當我們討論了彭述之的《帝國主義和義和團運動》和《誰是國民革命之領導者》這兩篇長文之後，大家都一致推崇和同意他的意見。因此，在一九二五年初歡送李大釗②回國的晚會上，主席劉伯堅（後為馮玉祥政治部主任，亦

被蔣槍斃）的致詞中，他微微地帶着驕傲的神情說：「我們這裡已經回去了一枝筆，那就是彭述之同志，相信現在李大釗同志回去，對我們黨定有重大的貢獻」。「一枝筆」這幾個字在我的腦中刻下了一個深刻的印象（因我對這方面有興趣）。這也就是我在本文開始時所說的：我認識彭述之的思想早在認識他本人之前的真實情形。

彭述之自一九二四年夏回國後，除了在《嚮導》報和《新青年》上寫文章外，並參加上海地方的實際工作。當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四次大會，他被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常務委員會（即政治局）的委員，並主編黨機關報《嚮導》和理論雜誌《新青年》。當我於一九二五年秋到上海後，參加上海全體女同志會議時，經過中央婦女部的負責者向警予的簡單介紹，我才知道準備在這個會議上作政治報告的便是我在莫斯科時曾經讀過他的許多文章的彭述之同志。他的態度沉靜而嚴肅，但對同志很熱誠，這便是我初次對他的印象。

① 據述之後來告訴我，當他這篇文章寫好之後，即將原稿交給陳獨秀看，希望和他取得一致的意見。結果，陳獨秀在新青年同一期上作了一篇題為《二十七年以來國民運動的教訓》。在這文章中，表明他已放棄了以前的意見，而接受了無產階級領導國民革命的觀點。

② 李大釗為中共創始者之一，他因參加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而留在莫斯科研究。於一九二七年四月為北洋軍閥張作霖所絞殺。

在第二次革命時期

當時中常委爲五人即：陳獨秀、彭述之、瞿秋白、蔡和森和張國燾，但實際上經常只有三人，蔡去莫斯科，張經常不在上海，陳獨秀經常在中央辦事處和各地來的同志接頭（述之也常去），瞿秋白由於俄文較好，經常同國際代表接觸，同時他不喜歡參加上海區委（包括江蘇、浙江、安徽三省在內）地方性的會議，也不喜歡和同志們接觸。因而參加上海區委會議的就只有彭述之。他不但代表中央常務委員出席上海區委的各種會議，而且還經常出席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中央常務委員會。

由於彭述之經常參加上海區委常務委員會的會議（我亦其中委員之一）以及其他的各種幹部會議，我和他接近的機會很多；同時，因文字工作的關係，我常到他的住所去，因他是中央宣傳部的主任，我所主編的《中國婦女》（黨中央辦的）有些重要的文章，政治的或理論的，我都要拿去給他看或者經過他修改。這樣，我和他接近的機會也就更多，經過一個相當的時期，雙方相互了解，我們便決定生活在一起。

在一九二五——二六年初，由於五卅運動所掀起的普遍全國的反帝國主義和軍閥運動，廣大的群眾、工人、農民、學生、婦女以及一般的小資產階級分子，都捲入於革命的浪潮中。因而，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運動，以驚人的速度在全國的範圍內蓬勃地生長着。單以上海來說，在每一次事件發生後，如反奉戰爭，反對日本出兵滿洲和北京「三一八」慘案等，都會舉行十萬人以上的龐大的市民大會與遊行示威，以及街頭演講，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的侵略與壓迫。恰在憤怒與激昂的情緒之下舉行了規模宏大的對北京「三一八」慘案的市民大會與遊行示威之後，一九二六

年三月二十日蔣介石在廣州發動政變的消息傳到上海，這是國共合作以來代表資產階級的蔣介石所發出打擊共產黨的第一個信號。這個事變，有如晴天霹靂一般震撼着整個共產黨。從中央到上海區委乃至每一個共產黨員，都感到震驚、憤怒和疑慮。區委常委會嚴肅地討論了這一政變之後，次日便召集活動分子會議，到會者百餘人，都盤坐在地板上，傾聽中央代表彭述之報告廣州政變的情形和中央的意見。報告完畢，群情憤慨，一致認為這次政變已經清楚地表明了資產階級的反動行爲，我們共產黨也應該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來重新考慮國共合作問題，以便確定本黨的工作方向，並要求中央迅速採取辦法以對付蔣介石。

中央委員會經過慎重的考慮，決定聯合國民黨左派及其武裝力量，並擴充共產黨員葉挺所指揮的隊伍和武裝一部分工農，準備以實力反攻蔣介石。因此，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尾，中央決定彭述之以中央特派員的資格到廣東去組織特別委員會，同鮑羅庭商討如何對付蔣介石三月二十日政變的具體辦法，並表達中央的意見（我亦同去，因區委派我協助參加第三次全國勞動代表大會的上海工會代表團的工作）。由於彭述之所代表的中央反蔣的意見，以及他臨時提出的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由國共的黨內合作改爲黨外合作的意見與鮑羅庭所代表的共產國際繼續國共合作，支持蔣介石的政策完全不同，在彭述之與鮑羅庭之間便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和鬥爭。結果彭述之處於孤立地位。

鮑羅庭是一個典型的善於詭辯詞令和玩弄手腕的官僚，他佩戴着十月革命和共產國際的威望，擁有大量的物質（軍火與金錢），這便更加強了他在國民黨中和南方共產黨裏的權威。因而廣東整個省委（那時周恩來即該省委的委員之一）及其他中央委員如譚平山、張國燾等都遵從了他的意見。這樣，我們黨中央的

反蔣政策，便被鮑羅庭轉變成爲擁蔣的政策；彭述之所提出的退出國民黨的主張，被鮑羅庭轉變爲接受蔣介石的「黨務整理案」，更進一步地把共產黨變成國民黨的附屬物了！因該案公然規定：共產黨不得批評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不得當國民黨中央黨部部長；在各地方黨委員會，共產黨員不得超過委員三分之一；共產黨中央應將所有加入國民黨的共黨名單交國民黨中央黨部保存。像這種對共產黨無異於一副枷鎖的「黨務整理案」是預先得到鮑羅庭的同意的。當然，鮑羅庭對蔣介石採取這種可耻的投降政策，也是由於共產國際的指示。

鮑羅庭爲了要順利執行他所代表的共產國際，即斯大林的政策，便對廣東省委書記陳延年說：「假如彭述之不離開廣州，我不能進行任何工作。」陳延年在他的授意之下，立即寫信給上海中央總書記陳獨秀（他的父親），要求儘速把彭述之調回上海。這是彭述之第一次受到國際代表的一次痛苦經歷。

當彭述之於一九二六年六月初從廣州回到上海後，中共中央雖然被迫接受了國際對蔣介石的投降政策，但活生生的事實表明：蔣介石利用鮑羅庭的支持，他在廣東便順利地建立了他的軍事獨裁，把持了一切黨政、軍事的大權，並自任總司令準備北伐。在這種嚴重的局勢威脅之下，中共中央感到黨必須修正這個妥協投降的路綫。因此，於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央委員會召開了擴大會議，陳獨秀和彭述之提出了以國民黨外之兩黨合作代替國民黨內之合作的決議，試圖擺脫國民黨的束縛而實行共產黨獨立領導工農群衆的革命方針。這個決議雖沒有正式被會議通過，但大多數同意把它呈給國際要求考慮，結果遭到了拒絕。因而中共中央只有服從共產國際的命令而繼續執行它的機會主義政策了。依照這個政策的邏輯，共產黨必須以全力動員工農群衆，支持蔣介

石領導的北伐，但限制工人不要過份侵犯資本家的利益；農民不要過早侵犯地主的地產；不要在國民黨軍隊中進行共產主義的宣傳和組織，尤其不要組織工農兵蘇維埃，準備自己的政權，因為這一切都會破壞國共合作的政策，都是超過「國民革命的階段」的「極左冒險」。這樣，就把中國革命一步一步地引導走向毀滅的死巷中去了。

但彭述之始終覺得把中國革命限制於「國民革命的階段」，限制於「國共合作的範圍」是不合乎十月革命的歷史經驗的。因此，他在一九二七初寫了一篇題為《列寧主義是否適合於中國的所謂國情》一文（載於一九二七年一月廿一日的《嚮導》上）。在該文中，他除了駁斥那些認為中國的國情與俄國不同，列寧主義不適宜於中國的謬論外，他詳細地分析中國社會經濟階級關係及其在國際的地位，認為同俄國十月革命前的情形相類似，因而中國革命應當沿着俄國革命的路綫走，列寧主義是完全可以適用於中國的。他承認「中國目前的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但這個革命絕不限於民族民主，必然很快的轉向社會主義革命的方向來。」所以他提出了「永續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的口號，他的結論是：

「最後要明白國民革命並不是中國最後的革命階段，國民革命只是到社會主義革命之路，人類最後的真正解放只有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只有建立人類共產制度的社會。列寧主義的極終理想，便是要領導全人類由各種被壓迫的社會到共產主義的社會。所以我們應了解「永續革命」的意義，要從國民革命走到無產階級革命。」（着重點為我所加）

隨後，彭述之又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出版的《嚮導》週刊

上寫了一篇題爲《目前革命右傾的危險》。他在這篇文章中，首先指出：「中國革命全部局面已很明顯地表現出來，一方面革命勢力，特別是革命軍和工農群衆的勢力異常發展，革命的潮流愈加普遍而深入，……但另一方面……在革命隊伍中發生了一種妥協甚至反動的傾向……已公開地或秘密地企圖與敵人妥協，反對革命民衆的利益」。「這是目前革命中極危險的現象，足以毀壞全部革命而有餘」。他在這裏所指的「妥協甚至反動的傾向」，是蔣介石所代表的資產階級的反動傾向。他說：現時國民黨內所謂穩健派便完全表現其資產階級的傾向，他們「…已經看見工人農民起來不僅爲一般革命的利益鬥爭，而且爲自己的階級利益鬥爭，已經看見帝國主義和軍閥向他們表示讓步，如是便想停止革命的進行」，實行聯合一切買辦官僚、地主豪紳和革命的敵人，帝國主義和軍閥妥協，轉過來打擊工農群衆。因此，他強調指出：「中國革命應該創造一個革命的民主政制，而絕不應該創造個人軍事獨裁（蔣介石）……目前革命已經很迫切地需要一個革命的民主獨裁政治」廣大的工人和農民小資產階級直接參加政權和支配政權的民主政治，爲工農小資產階級謀利益的政治，打擊一切反革命派並對一切反革命派施行獨裁的政治。」（重點爲我所加）

彭述之上面所指出的這些意見是在上海工人武裝暴動（一九二七年三月廿一日）勝利兩個星期以前提出的，也就是蔣介石四月十二日在上海發動政變大肆屠殺革命群衆五個星期之前提出的。雖然他的「革命民主獨裁政制」還不能算是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專政，但顯然是排除了資產階級於革命政權之外，而是一個工農政府的公式，這和共產國際堅持工農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四個階級聯盟」，準備建立工農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聯合政府的政策，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彭述之在他的《讀了蔣介石二

月廿一日的演講以後》（載於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的《嚮導》上），盡量暴露了蔣介石的全部反工農、反共產黨和蘇俄的反革命思想和行爲。他嚴重地指出：「中國將來的鬥爭便是這種革命勢力與反革命勢力（蔣所代表的）的決死戰」。（重點及括弧內五字爲我所加）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彭述之早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五日的嚮導上發表了一篇《上海總工會被封與上海工人今後的責任》。他在此文中說：

「要想達到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只有中國工人起來奮鬥，起來作領導才有可能。上海是…俄羅斯的彼德格勒，俄羅斯的二月革命以及十月革命都是彼德格勒的工人爲領導」。最後，他並預言：

「上海數十萬工人，在五卅運動中，在上海總工會指導之下，已經學到了許多經驗，許多革命的初步方法，將來再進一步就要走上武裝暴動的道路…就要學彼德格勒工人的榜樣，由二月革命而至十月革命。」（重點爲我所加）

彭述之的預言是實現了！上海的工人爲了響應北伐於一九二七年三月廿一日舉行了武裝暴動，翌日便奪取了上海租界以外的整個市區，成立了武裝糾察隊二千餘人，維持治安與秩序，工人大批地湧進工會和共產黨，呈現一幅新興無產階級政權的景象。假如當時的共產黨沒有共產國際的干涉，按照他們自己的思想（如彭述之在前面所表示的），根據俄國十月革命的教訓和他們親身所經歷的經驗，領導上海工人群眾進一步地聯合北伐軍隊中同情工人的軍隊（當時在上海北伐軍隊中同情共產黨的佔絕大多數），向反革命的蔣介石作堅決的進攻，組織工農兵蘇維埃政權，對反革命資產階級施行獨裁。那麼，上海的工人是有可能執行彼德格勒工人的歷史任務的。

但異常之不幸，中國共產黨由於被迫遵守共產國際必須同蔣

介石合作的機會主義政策，因而恰好共產黨領導工人群眾武裝暴動勝利之後，他們在政治上却完全解除了武裝，束手無策；只好按照共產國際所劃定的圖式，同資產階級一起組織上海的「臨時政府」。某些參加這個政府的資產階級分子則用盡怠工和破壞的手段，使得它陷於完全癱瘓，等待蔣介石的處置。在這種情形下，共產黨人不能採取有利於工人階級的任何措施。這樣，共產黨和工人群眾的手足都被共產國際的政策綑綁起來，等待蔣介石的任意擺佈！當蔣介石把鎮壓革命的一切陰謀佈置就緒之後，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的清晨，發動了他的第二次政變，流血的慘劇便在上海開演了！這便是斯大林頑強地命令中國共產黨必須按照國共合作政策，同蔣介石合作，拚命幫助他北伐的結果：無數的共產黨人和工人群眾倒臥於血泊中，革命的果實落於蔣介石的懷抱中了！！

斯大林對於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在廣州的政變既沒有任何警覺仍舊繼續國共合作政策，支持蔣介石，因而釀成了上海四月十二日的大流血，但這次的流血還沒有沖醒他的腦袋，獲得任何教訓，只是把以前的「國共合作」改為「同國民黨左派的合作」；把以前寄託於蔣介石的希望，轉移於汪精衛吧了。中國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便是在斯大林這種政策的轉移之下召開的（一九二七年四月末至五月初），因而這次大會的一切決議，還是和以前一樣抑制農民的土地要求和工人的生活改善，尤其反對武裝工農，唯恐妨礙與國民黨左派合作。因斯大林認為「武漢是革命的中心」，而汪精衛的國民黨政府自會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和改善工人的生活，這便替汪精衛所領導的所謂「國民黨左派」對七月十五日「清共」鋪平了道路！

恰在中共第五次大會前後，托洛茨基提出了共產黨必須退出

國民黨，保存自己的完全獨立，組織工、農、兵蘇維埃來準備代替汪精衛的國民政府。但托洛茨基所提出的關於中國革命問題具有決定性的意見，都被斯大林封鎖起來，不讓中國共產黨人知道，因恐他們根據他們親身經歷的經驗，把托洛茨基的意見與斯大林意見比較一下，可能選擇前者，那就會根本推翻斯大林對中共革命機會主義的領導，可能把革命推上勝利的道路。這反過來會掘毀斯大林在蘇共的壟斷地位，這是代表蘇聯官僚特權反動利益的斯大林絕對不能容許的，因而中國第二次革命便成爲保存蘇聯官僚特權利益的犧牲品！

此外，值得指出的，就是瞿秋白在第五次代表大會前私自先到武漢刊印了一個名爲《中國革命爭論問題》的小冊子（這小冊子事先不讓中常委知道）。它的內容，除了關於上海暴動的時間問題和暴動勝利後上海臨時政府的人選問題的爭論外，主要是攻擊彭述之的基本思想，即前面所敘述的彭述之所主張的「永續革命」的思想。那時瞿秋白從某些國際代表那裏嗅到了斯大林正在激烈地反對托洛茨基的一切主張，尤其反對他的《不斷革命論》。因此，瞿秋白在他的小冊子中引證了彭述之的「永續革命」這句話後，他說：「彭述之把托洛茨基主義複寫到中國來了。」實際上，彭述之當時還不知道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他只是依照自己所了解的馬克思曾經指出過的不斷革命的觀點，俄國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教訓，以及他當時在中國革命的進程中親身經歷的經驗，從而得出中國革命是「永續革命」的結論。瞿秋白把托洛茨基主義的帽子扣在彭述之的頭上，顯然是企圖以此摧毀他，並博取斯大林的眷寵。同時這個小冊子雖然以攻擊彭述之爲名，但實際上暗中也是攻擊陳獨秀的。他想以此作爲一枝鋒利的箭而一射雙雕：把彭述之排除於領導機關之外；把陳獨秀的總書記職撤

除，好讓自己起而代之，爲了要達到這個目的，他同時進行小組組織，拉攏幹部，運動和聯絡國際代表。由於絕大多數幹部的反對，尤其是國際主席代表路易對瞿秋白這種陰謀詭計的行爲加以干涉，陳獨秀才得以仍舊被選爲總書記，但彭述之是被排除於新的中央常務委員會之外了。

在第五次大會後的一段時期內（約從五月初至六月末），彭述之仍舊留在武漢，他一方面寫小冊子，名爲《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替所謂工農「過火」行爲解釋和辯護。同時，他經常和陳獨秀接觸，談論當時愈來愈惡劣的局勢。有時我也在座，看到他們極感困惱。因他們從痛苦的經驗中，已深深感到共產國際對於蔣介石所採取的政策已完全破產，對於當時支持汪精衛的政策更由事實證明正在日漸走向絕路。尤其是陳獨秀，由於他處於黨的總書記地位，不得不執行莫斯科的政策。但在執行這種機會主義政策的過程中，他親自看到汪精衛的「國民黨左派政府」，越來越袒護反革命的軍人，打擊工農群眾運動，排斥共產黨。因此，他最後一次提出共產黨退出汪精衛的國民黨，從事獨立領導工農革命運動。但最後又遭到國際的反對。從而他便陷於消沉態度；不久他便辭職了（由瞿秋白代理）。差不多同時，汪精衛發動了政變，這便是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的「清共」，中國第二次革命從此便悲慘地失敗了！

在汪精衛實行「清共」的前夕，彭述之被派到北方區去擔任書記，當他在北方正從事調整北京、天津及各地方黨部組織，實施防衛政策，重新設法接近工農群眾時，却接到上海以瞿秋白爲首的中央政治局的命令，叫北京和天津舉行武裝暴動。因自汪精衛「清共」後，共產國際便從極右的機會主義跳躍到極左的盲動主義政策；同時，召開中共中央的「八七會議」（即一九二七年

八月七日的會議），爲了卸脫國際領導中國革命失敗的責任，便把陳獨秀當作代罪羔羊，瞿秋白正式作了總書記，俯首貼耳的執行國際盲動主義政策。不管客觀的局勢如何，就命令賀龍、葉挺的軍隊於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舉行南昌暴動，隨即發動了湖北、湖南的秋收暴動……等。彭述之對於共產國際在武漢革命失敗之後，反而訓令中共到處舉行武裝暴動的政策，認爲不但不合乎馬克思主義，而且離開了常識。他雖然無法干預這種反常和荒謬的政策，但他和北方區委的委員商議：決定採取「拖延政策」。因爲他們十分清楚地看到：當時的天津和北京，在反動軍閥的嚴厲統治之下，根本沒有群眾的組織和運動，除了命令少數黨員人工地製造暴動，徒然犧牲幹部和黨員外，絕無任何結果。因此，他們只好藉口暴動的條件不成熟，需要時間準備，以此拖延下去。但瞿秋白的中央認爲彭述之領導的北方區委有意抵抗國際的暴動政策，撤銷了他的書記，派蔡和森去建立北方局瘋狂地進行「暴動準備」。但暴動尚未開始，北京六十多個幹部一同被捕和槍決了！這便是共產國際的暴動政策在華北試驗的唯一後果！！

彭述之被撤職後，從北方調回上海時，正值廣州暴動失敗之後（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舉行的），也就是斯大林的盲動主義政策在中國完全破產之後。上海的情形異常恐怖，差不多每天都有同志被捕和被槍決。黨在當時由於革命失敗，主要的財政來源只有依靠共產國際支持，而斯大林操縱的國際便更加利用財政來控制中國共產黨，支持那些俯首貼耳的領袖和幹部；而這些受國際眷寵的官僚們，尤其是瞿秋白也就利用國際的物質來控制其他的領袖和幹部。凡是表示馴服的，都可在物質方面獲得優厚的待遇，而較少危險；假如誰對當時的盲動主義政策表示懷疑，或對瞿秋白的官僚措施懷抱不滿，那就會遭到極難堪的待遇，最後

則停止其工作和生活費，這對於那些以革命為職業的幹部是一個致命的威脅。因他們一向把黨當作生命寄託之所，全心全意為黨工作，把社會關係和朋友都拋棄了，甚至連家屬關係也斷絕了，因而得不到任何的援助。同時，在白色恐怖的情況之下，凡是在革命運動中曾經積極活動的知名共產黨人，絕不能到社會上去找職業，即是譯書和投稿都要化名，這又反過來加強了官僚機關利用物質來控制幹部的力量。

在上殺的情形下，彭述之所受到的待遇當然更為難堪和險惡（我和半歲的女兒也在內）。他當時還是中央委員，但瞿秋白把持的中央並不派他任何工作，甚至中央委員會所召開的會議，也不讓他參加，盡可能地把他孤立起來，惟恐他的反冒險主義和反官僚主義的思想影响其他幹部。不久，即連對我們極微薄的生活費也停止了，述之只好化名靠譯書維持生活。

自我們從天津回到上海後，彭述之又得以重新會晤陳獨秀，從他得悉汪精衛反共後黨內發生的一切情形，並得知他於一九二七年八月和九月間曾二次寫信給黨中央，批評盲動主義的暴動政策。因此，彭和陳的政治意見不約而同地達到一致。他們對當時的中共中央，也就是對國際的冒險主義政策採取批評和反對的態度。當然，瞿秋白的中央把這種情形報告了莫斯科。因此，在一九二八年七月莫斯科召開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前，斯大林和布哈林聯名打電報給陳獨秀和彭述之（此電報還是周恩來親自送到陳獨秀的家裏的），邀請他們去莫斯科參加國際大會，企圖「說服」他們，否則便「扣留」他們，免使他們在中共內部發生影响。但他們對於共產國際已經失去信心和希望，而且了解它的用意，因而毅然決然地謝絕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邀請。

在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中

一九二九年春，彭述之同幾個從莫斯科回來的學生作了一次長談，得悉蘇聯共產黨內部托洛茨基領導的左派反對派和斯大林派鬥爭的經過情形，以及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問題所發表的許多意見。同時，他們把托洛茨基關於中國問題的兩個重要文件送給彭述之，即：《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和《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題》。

當彭述之研究了托的文件後，他立即確定了他的態度，準備在中共黨內進行為托洛茨基所領導的反對派路線而鬥爭。他之所以如此迅速地接受托的思想決不是偶然的。一方面，由於他對馬克思和列寧主義的理解，以及他對於中國革命所形成的一些正確觀念，如前面所引敘的；另一方面，他在革命過程中親身經歷的失敗經驗，尤其是革命失敗後盲動主義政策所造成的悲慘教訓，所以當他看到托洛茨基精確地批評斯大林和布哈林，領導中國革命慘敗的機會主義路線和革命失敗後所採取的盲動主義政策，特別是他提出了以國民會議的總口號的防禦政策來代替當時黨陷於無出路的冒險政策時，他深深感到托洛茨基的意見，是完全正確的。而且有許多意見已經被血淋淋的事實證明是正確的預言。因此，他第二天便將托的文件送給陳獨秀研究。次日，陳獨秀來我們家裏，他說托洛茨基對於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批評是完全正確的，尤其是他所提出的以國民會議口號為中心的防禦政策來代替盲動主義的政策，更合乎目前客觀局勢的實際需要。因此，陳獨秀和彭述之便進一步地討論如何在黨內進行左派反對派的計劃，準備集合所有不滿黨的盲動主義的幹部，來討論這兩個文件的意見，並積極進行組織左派反對派。

同時，陳獨秀和彭述之各自寫信給中央，要求在黨內發動全體黨員討論過去革命失敗的教訓和當前的政策，並要求把托洛次基所寫的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文件全部公佈出來，作為黨員討論的參考。

我們在黨內進行左派反對派的工作很順利，不到兩個月，就團結了四、五十個幹部，正式通過接受托的立場，選出了臨時領導機關三人委員會（陳獨秀、彭述之、尹寬），將所有的成員編成小組，經常集會討論各種問題及在黨內的活動等等。隨即出版一個刊物，名為《無產者》，並將托著關於中國問題的一些重要文件集成專書出版。

由於我們在黨內外的積極活動，以及陳獨秀和彭述之寫給黨中央信中意見的傳播，當時在黨內引起了極大的震動，使許多幹部發生了劇烈的動搖。因此，黨的領導機關在國際的指使之下，迫不及待地把我一批一批地開除出黨，首先是開除陳獨秀和彭述之，隨即輪到尹寬、鄭超麟和我及其他幹部。這些開除的消息，都公佈於黨的機關報《紅旗》上。但這種開除，並沒有穩定黨員的動搖，寧可說是更加劇了黨內的震動。因此，接着又有一批幹部加入我們反對派的隊伍。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當我們公開發表《左派反對派宣言》*時，已有八十一個幹部簽名，這可說是中國共產黨史上托洛茨基主義與斯大林主義破天荒和最大的一次鬥爭和分裂。它不僅在中國共產黨內興起了巨大的震撼，而且也引起了中國社會和世界各國共產黨的注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留在黨內的老幹部，由於他們親身經歷了革命失敗和盲動主義的破產，以及官僚主義任意壓制的種種痛苦，而這時看到以

* 即《我們的政治意見書》編者。

陳獨秀和彭述之爲首的大批幹部，曾經同他們一道在革命運動中堅苦戰鬥過的老夥伴，現在站立起來拿着托洛茨基的政綱，勇敢而堅決地向黨的領導機關進行鬥爭了。他們撫今思昔，對於這種反對派的運動不勝同情，因而黨的領導機關稱這一大批老幹部爲「調和派」，意即指他們在黨的路綫與陳獨秀派主張之間的調和（當時劉少奇也屬於調和派，因此將他送往莫斯科）。據完全擁護國際路綫的陳紹禹（後來改名爲王明）說：「當時的調和派曾主張：那些因反對六次大會路綫被開除的托陳取消派，陳獨秀和彭述之應請回到黨的領導機關中來。」（見陳紹禹著《爲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175頁）。從他的這幾句話中，便可證明陳獨秀和彭述之等所發動的左派反對派運動在黨內影響之巨大了。

但正當陳獨秀和彭述之領導的左派反對派運動震撼着整個黨，影響了大多數的老幹部時，從莫斯科回來的一些學生，也組織了好幾個托派的組織，各自出版小刊物，它們除了互相爭吵外，便是攻擊陳獨秀和彭述之，說他們要替過去機會主義政策負責，這就意味着只有他們因沒有參加過革命失敗政策的年輕分子才配作托派。這就給黨的斯大林主義領導機關利用，大肆攻擊陳獨秀和彭述之，使那些調和派的幹部感到左派反對派的意見分歧和混亂，因而對於托洛茨基的思想也就冷淡下去了。這對於正在開始的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是一個很大的打擊，當托洛茨基知道了這種情形，因而他在一九三一年初向中國左派反對派各組織建議：謀取統一。結果於一九三一年五月召開了統一會議，中國各派左派反對派的小組織才統一起來，名爲「中國共產主義同盟」。

但恰當統一會議後，由於一個叛徒的告密，一大批領導幹部被捕了。彭述之和我連同四歲的女兒僅在捕探到來幾小時之前匆

忙地脫逃出來，但我們家裏的全部東西、書籍和文件，包括衣物和傢具等，都被捕房沒收了。這就給我們往後的多年生活，增加了無限的痛苦和麻煩。陳獨秀這次沒有被捕，只因叛徒不知道他的住址。最可怕的，是那些叛徒們和國民黨的特務一起，經常在公園、遊戲場所、大公司門口和重要的馬路口廝守着獵獲共產黨人。假如誰遇到這種叛徒，他便把你的肩膀一拍，說：「老朋友！」那些跟隨着的便衣偵探便圍攏來把手鐐扣在你的手上，帶到附近等待着的黑色囚車上，那麼死神便會來照顧你了！

我們反對派雖然由於一批幹部被捕而遭受了挫折，有的同志因此而消沉，甚至有的離開了，但不久客觀的局勢來了一個新的轉變，那便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帝國主義大肆侵犯東三省，以及一九三二年一月廿八日進攻上海，引起的反日運動和反對國民黨政府不抵抗主義。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在這個反日和反國民黨的群眾運動中，第一次出版了公開周刊《熱潮》鼓動群眾武裝起來抗日。我們的這種鼓動和宣傳，在學生和工人群眾中發生了相當的影響，特別在黨內的下層幹部中獲得了廣大的回聲。

當時正是王明在莫斯科支持之下，排除了李立三和瞿秋白，奪取了黨的領導機關。他在政治上對「九一八」事變的群眾反日運動，以及隨後對十九路軍（國民黨左派領導的軍隊）自動抗日的行動都採取了荒唐的教派主義立場，在黨報《紅旗》上宣傳紅軍抗日，而不號召群眾武裝抗日和支持十九路軍抗日的行動；在組織方面，把以何孟雄為首的大批的積極幹部（即「調和派」）排除於組織之外，讓他們因得不到黨的經濟援助而犧牲（他們二十餘人在一間小旅館集會被捕一起槍決）；有的離開了黨。因而黨在當時呈現一種解體的狀態，這便替我們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擴展開闢了新的園地。

在這個時期，黨內許多下層幹部，看了我們的《熱潮》發表的抗日主張和對黨的斯大林主義政策的批評以及托的文件，都自動的找托派負責人，經過述之多次和他們討論後，便加入了托派，他們帶來了幾十個重要的產業支部，如郵政、電力、紗廠。這些支部所包含的人數佔上海的共產黨員半數以上。因而左派反對派在上海的工人運動中取得了領導的地位，領導了好幾次重要的罷工，並得到了相當的勝利。

在同一時期內，除上海外，北京、武漢、南京以及華南的廣東、香港等地的托派運動，都有新的發展。

同時，在社會主義的思想文化方面，我們托派也作出了很有價值的貢獻，首先是述之受一個左傾出版公司委託主編一個名為《動力》的學術雜誌，以托洛茨基的觀點解釋中國社會的性質和其他的哲學政治問題等，發生了相當的影響。隨後這個雜誌改名為《讀書雜誌》，由另一人主編，但述之介紹了一批托派分子在該雜誌上寫稿，繼續討論中國社會性質和批評斯大林派斷言中國社會為封建經濟佔優勢的思想，這便掀起了關於中國社會性質和一些革命理論問題的論戰，廣泛地反映了托派思想與斯派思想的分歧。在這次論戰中，托派的觀點是佔着上風的。因而托派思想在一般左傾的分子中發生了很大的影響。此外，述之又介紹了一批托派分子翻譯關於社會科學、哲學、馬克思和列寧的某些著作以及托洛茨基的自傳（前一部分）等，在一些左傾的書店出版，當時大多數左傾的書店都圍繞於我們的周圍。

但從我們私人生活方面說，由於述之將全部的時間和精力都消耗在運動上，以致把維持生活的唯一手段——譯書的工作經常停頓下來，同時我也不能到社會上去找職業，因而我們的生活便陷於狼狽不堪的境地。我常常到米店去賒米，經常踏當舖的門檻

。有時述之因整天和同志們談話或開會，只是買一個沒有夾心的小麪包來充飢；深夜回來時因身上沒有錢買電車票，往往從很遠的地方步行回來。這樣的生活延長了好幾年。

正當我們的運動已經獲得如上的成果，而且正在向前邁進時，在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陳獨秀和彭述之等十餘人一同被捕了！這對於我們的運動幾乎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尤其是在精神方面，同志們都陷於異常痛苦和頹喪的深淵。隨後不久，跟踵而來的災禍又降臨了，從黨裏轉過來的那些重要幹部全都被捕了，因而差不多所有的工人支部都和組織脫了節。於是我們在上海的工人基礎完結了！剩下來的知識份子的大多數，不是自動離開另謀生活出路，便是陷於痛苦消沉的狀態，只有極少數的幹部來維持殘局。因此，中國的托派運動，在往後的數年中，完全陷於孤立和停滯的狀態之中。

自陳獨秀和彭述之等被捕後，全國各大報都登載他們的消息，尤其當他們被一列專車戒備森嚴地從上海送往南京的軍法處的消息傳出後，許多名人（如前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孫中山遺孀宋慶齡及其他一些著名教授等）紛紛打電報給蔣介石及其政府，要求將陳彭等送往司法機關公開審判，因恐軍事法庭將他們秘密處死。結果，他們被移交南京地方法院準備公開審判，他們的審訊，差不多經過了兩年，各大報經常刊載關於他們的消息。

國民黨政府以「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控告陳獨秀和彭述之，因而他們各自寫了一個辯訴狀，並聘請了幾位律師。彭述之在他的辯訴狀中，除了指責國民黨政府對日帝國主義的侵略採取不抵抗政策是「真正危害民國」，以及它對人民任意壓迫，剝奪人民應享的民主和自由的權利外，並宣稱「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挽救中國免危亡」。在公開審判的那一天（這是國民黨政府所捕共產黨

人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公開審判），審判廳裏擠滿了人，國民黨的統治者如陳立夫等則在幕後竊聽。彭述之在他爲自己辯護的演辭中，勇敢地毫無顧忌地攻擊了國民黨的對內對外政策，宣傳他所信仰的共產主義思想。因此，國民黨的統治者如陳立夫之流，特別仇恨他。在第一審中，陳獨秀和彭述之被判徒刑十三年，其他的人五年。經過上訴後，陳彭的徒刑減爲八年。（事實上因中日戰爭監獄被炸毀，只有整整五年）送往南京模範監獄。

彭述之在監獄的整整五年中，由於「生活的安定」，他把監房當作「研究室」，他閱讀了無數本有價值的書籍，從馬、恩、列、托的著作乃至歷史（中國史和西方史），哲學自然科學和文學等著作無不研讀。因他一向對於各種學問都感興趣，甚至研究基督教和佛教的起源及其中所包含的社會思想。因此，他在五年監獄中的生活，完全是閱讀和研究學術的生活，但在監獄的第二年，由於蘇聯問題和無產階級專政與民主的問題，彭述之同陳獨秀之間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關於這些問題述之曾寫了一些文件），以致他們多年來親密合作和私人最好的友誼破裂了；差不多同時，同他一起被捕的弟弟彭道之（從莫斯科留學回來的托派最積極的幹部之一）又病逝於獄中（因無錢醫治）。這兩件事給了他精神上以沉重的打擊（從他當時寫給我的信中表現出來）。幸而他的性格堅強，冷靜而又具有極大的耐心，能夠忍受一切痛苦。他除了把全副精神寄託於研究工作，以消除痛苦外，從我和他的經常通信中也獲得了一些安慰。

在述之被監禁整整五年的悠長歲月中，就我個人來說，飽受了「伴侶生離」的痛苦和生活上的重壓（我要養育兩個孩子）；抵抗了各種各式的威脅和誘惑。但最感痛苦的便是政治方面的孤

立，無論我參加任何左派的團體或政治學術的研究會議，所碰到的全是斯大林主義者和他們的同情者，很少有一個托派。他們始而對我採取同情和友好的態度，甚至在職業方面幫助我，企圖爭取我。但當他們派人公開同我談判，向我建議重新回到黨裏面去，我坦白地表明我的政治立場而拒絕他們的建議後，他們在一切群眾活動的場所就把我封鎖起來了。

當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帝國主義進攻中國時，以大批飛機轟炸南京，模範監獄亦被炸毀，有一顆炸彈落在彭述之所住的監房側面，他幾乎畢命，失去知覺好久才清醒過來。由於監獄被毀，監獄當局得到司法部的允許，將所有的政治犯釋放。陳獨秀和其他幾個同志都釋放了，但陳立夫主張把彭述之留下（因彭的辯訴狀和審判時的演說最激烈地攻擊國民黨當時的對內對外政策），準備送到安徽的監獄去，實際上是準備把他秘密處死。但監獄長認為：既已釋放同他一起被捕的陳獨秀等，只留下彭述之一人太不合理，於是他立即請示司法院長。結果彭述之在陳獨秀等出獄數日之後，才被釋放出來。但當他從南京到上海的途中，火車又被日機轟炸，他又幾乎炸死，爬到稻田里躺下，然後再設法轉乘火車到上海。

彭述之回到上海時，正值全國抗日運動高潮時期，但留在上海的托派還不到一打人。雖然名義上還保存一個組織，但同各地方星散的托派沒有聯系。述之爲了適應當前抗日運動的潮流，重新整理組織，召集曾經留在上海和從監獄出來的幾個幹部的臨時會議，通過抗日戰爭的決議案，主張以全力支持國民黨的武裝抗日，但在政治上批評它的反動政策，並選出了臨時的中央領導機關，秘密出版《鬥爭》機關報。在一個相當的時期，把各地方的小組組織聯系起來了。由於客觀局勢有利於群眾運動，托洛茨基主

義的影響，在上海、北京、廣東、廣西和浙江等地逐漸擴展起來，組織日有發展，因而我們的運動又開始復興起來了。但當我們的運動正在開始復興時，發生了兩件極重要的事件：

第一，斯大林黨公然在它的報紙上造謠說陳獨秀和彭述之領取日帝國主義的金錢爲它服務，從此稱托派爲「托派漢奸」；隨後，斯大林黨在上海所控制的四家日報同日登載消息，說彭述之和剛被國民黨特務暗殺的大漢奸李國傑是密友，企圖唆使國民黨的特務或它自己的特務以漢奸的名義暗殺彭述之，經過法律的控訴，才迫使斯大林黨的報紙申明所載消息並非事實。

第二，陳獨秀主張無條件地支持蔣介石領導的抗戰，因而反對我們的機關報在政治上批評國民黨，這便在我們的組織內部引起了嚴重的糾紛。彭述之不得不批評陳獨秀的立場，因而使他們之間的關係完全破裂，這對於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是一個巨大的損失！

不管斯大林黨的造謠污蔑和陳獨秀的錯誤主張，彭述之和從監獄釋放出來的幹部如劉家良、王凡西……以及留在上海的少數幹部合作，還是把運動推向前進，特別是在一九三九年八月，我們又出版了一個公開刊物，名爲《動向》，銷行頗廣。在批評國民黨的消極抗戰政策和斯大林的「德蘇協定」等重大問題上，在一部分工人知識分子中發生了相當的影響。

同時，由於彭述之得到幾位同情者大量財政上的幫助，我們自己出版了托洛茨基的巨著：《俄國革命史》、《背叛了的革命》以及其他的小冊子；同時，由書店公開出版了莫斯科審判案和彭述之寫的關於中國抗戰、西班牙革命失敗、和奧國革命失敗等幾個小冊子。托洛茨基的著作和那些小冊子，在知識份子、學生和前進的工人中，發生了廣泛的影響，因而我們的運動又向前跨

進了一步。

但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美在太平洋的戰爭行將爆發前，中國托派內部發生了最嚴重的鬥爭。一方面，陳獨秀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民主集團反對軸心國的戰爭，因而主張在英、法等民主國家內放棄「失敗主義」政策，同時，他看到莫斯科審判案的悲劇，和斯大林同希特勒簽訂「德蘇協定」，認為蘇聯已不是工人國家，不值得無條件地支持它。另一方面，王凡西認為如果日美戰爭爆發，中國勢必捲入這個帝國主義的戰爭中，那時中國的抗日戰爭一定變質，因而主張對國民黨領導的抗戰採取「失敗主義」。這兩種極右和極左的傾向，尤其是後一種傾向，在我們組織內引起了很大的混亂。因而彭述之寫了《對兩條路線的鬥爭》的長文，抨擊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和王凡西的極左黨派主義的危險性，保衛了托洛次基主義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中國抗日戰爭（即今日美戰爭爆發後）的基本立場。經過一個時期的內部普遍的討論，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於一九四一年八月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彭述之所提出的決議案。結果，沒有任何人支持陳獨秀的立場，贊成王凡西的也只有幾個人。

自這次會議後，陳獨秀的思想完全同托洛次基主義破裂了！他在一九四二年五月病逝於四川。至於王凡西所領導的少數派不但仍舊堅持它在政治上的教派主義，而且在組織上完全是夏克曼的中文翻版。他破壞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獨立出版對外刊物，在日美戰爭爆發後不久，他便帶着幾個人從「共產主義同盟」分裂出去了。其結果，恰如托洛次基曾經預言夏克曼派的命運一樣，是「瘦死」了。今天，只有一個人支持他。

當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美戰爭爆發後，日軍進佔上海租界，這便給了中國托洛次基運動最沉重的打擊，首先是把我們駐

在上海的領導機關和各地方組織的聯繫截斷了，跟着而來的是許多幹部的被捕。彭述之在一個同志的住所正當那個同志被捕時，他趁着暗淡光綫的掩護，輕輕地從日警和捕探身旁溜走，爬上樓頂，冒着生命的危險越牆脫逃出來。其他的活動分子，由於生活的艱難和敵人的追逐，不得不離開上海。這樣，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中心——上海的組織和群眾的關係幾乎解體了。從此，便投進了日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極端恐怖和生活異常艱苦的時期。

雖然在如此恐怖的情形之下，彭述之除了集合少數青年同志進行教育外，他還在上海兩個大學化名當教授，講授中國史、西洋歷史和哲學，雖然他不能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但他巧妙地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去講授，影响了一些左傾的學生，他們當中有些人在下課後便圍繞着他要求到我們家裏來，希望從他學到更多的知識，這樣一批一批的男女青年往我們家裏跑，不管他們是斯大林黨分子或同情者，我們都一樣熱情接待和他們討論各種問題。同志們認為我們這樣「開放門戶」，在當時是異常之危險的，但我們却吸住了他們，影响了一批青年加入托派，其中有些是從斯大林黨方面轉變過來的，這便替未來的運動奠定了一個新的基礎。差不多同時，我們又結識了幾個有知識和左傾的商人，由於相互來往，便變成我們私人最好的朋友進而成為同情者。他們往後在財政方面給了我們的運動，特別在出版方面以巨大的幫助。

當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日本在美國原子彈轟炸廣島後，表示最後投降，中日戰爭連同世界大戰同時結束，蔣介石的反動政府，在各方面的巨大壓力之下，迫不得已稍微放鬆它的專橫壓迫的魔手，這便給了戰後中國的群眾以某種限度的民主自由的活動餘地。我們立即抓住這個機會，開始活躍起來。首先準備出版

公開刊物，進行廣泛的宣傳和鼓動。

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托洛茨基主義的兩個公開刊物誕生了，一是彭述之主編的理論和政治性的月刊《求真》，它是和平後最引人注意的雜誌，在理論和政治上宣傳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想；另一個是我所主編的《青年與婦女》，隨後不久，改名為《新聲》，變成為政治性的托派機關報，一直出到我們離開上海為止（一九四八年末）。由於這兩個刊物散佈於全國各大城市，因而在知識分子、學生和青年工人中發生了廣大的影響；同時，把所有被戰爭截斷了的組織和個別分子都聯繫起來了。因此，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不但恢復了已經失去的力量，而且迅速地生長起來，在上海和香港等城市某些產業工人和許多大學的學生中，重新建立它的基地。此外，我們盡力教育青年幹部，除訓練班外，每星期舉行討論會，經常到會的同志和同情者在百人以上，這種討論會繼續了兩年半，吸收了許多職業青年，包括工人和知識分子到我們的運動裏來。彭述之是這些訓練班和討論會的主要講演者和指導者，他常常因趕寫雜誌的文章而睡眠不足，但白天里總是整天參加各種會議或訓練班和討論會等，表現了他稀有的精力。

由於我們運動迅速的發展，中共同盟於一九四八年八月舉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已有代表三百五十成員的代表參加。在這次大會上通過了新的綱領，並將中共同盟改為「中國革命共產黨」。但正當我們的運動繼續向前邁進時，客觀的局勢發生了劇烈的變化，這便是中共對蔣介石的反攻不斷勝利，中共解放軍於一九四八年末已達到揚子江北岸，迫近南京和上海。在這種局勢下，中國革命共產黨，召開了緊急會議，根據蘇聯對付托洛茨基主義者的經驗和教訓，採取了緊急的措施，所有成員一致建議並決定我們的政治局必須遷移至香港，上海成立一個臨時委員會，

負責與各地方的組織聯絡，並隨時予以指示，同時決定所有的黨員和團員都設法加入中共及其青年團或各種工人和農民群眾的組織，在政治上支持中共一切進步的措施。其中有些為中共所熟知的幹部則離開上海，而其他地方的則轉到上海相互調換。一切安排妥當之後，中央政治局的成員彭述之、劉家良和我於一九四八年末從上海到了香港。

流 亡

我們到香港後，即重新建立印刷機關，恢復黨報。此外便是幫助香港地方的組織整頓組織和教育工作，並準備出版托著的：《斯大林傳》和伊羅生（ISACS）的《中國革命的悲劇》（此書已出版），但香港政府早已注視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活動。因托派在香港的工人群眾中曾領導了好幾次罷工，這是香港政府最討厭的，因而常有同志被捕和驅逐出境。自中國革命共產黨的領導機關移到香港後，香港政府已獲得情報，因而更加注視我們的活動。首先是破獲了我們的印刷機關，兩個同志被捕並驅逐出境。隨後，又查到我們接收歐美托洛茨基主義的刊物和文件的兩個地址，因而逮捕了那兩個地址的收件人（他們都是同情者），根據這個線索，又嚴厲搜尋托洛茨基主義者，結果，被捕者達十餘人，絕大多數被驅逐出境。隨後，我們的住所亦被搜查，由於事先逃開，述之和我才沒有被捕，但逃到一個朋友家裏住了兩天，又被密探發覺，我們立即遷到另一朋友家裏，但我們遷移後不久，住過的朋友家裏又被搜查並追問我們，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已弄得無法在香港繼續居留。同志們認為我們的政治局必須離開香港，尤其是述之已被香港當局視為獵獲的目標。因此，述之和我們一家人以及劉家良，在朋友的大力幫助之下，得以離開香港。

而赴越南。

在一九五〇年一月末，我們一家人和劉一同踏上了越南的國土。除劉外，我們和女兒都找到教職，生活可以維持，但過了幾個月，意外的災禍又降臨了，就是當時越南托派的兩個領袖（葉內和越南劉）被一個參加托派組織的越盟分子引誘到越盟軍隊所控制的區域中去，說是和那裏的一個托派參謀長舉行會議，商討展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和軍事問題。中國同志劉家良由於越南同志的要求也一同去。會議開完後，便把他們逮捕起來，劉不久死於獄中。至於越南同志的命運，當我們離開越南時，據說還活着，但往後就杳無消息了。自這件事發生後，不但越南托派的組織完全趨於瓦解，劉家良同志被犧牲了，就是述之的安全也受到嚴重的威脅，因越盟已知道他在西貢，隨時都有被暗算的可能。香港的同志和其他的朋友聽到劉家良被犧牲的消息後，立即向我們提出警告；同時積極籌款，建議我們應儘速離開越南，當一切手續辦妥之後，我們便開始向歐洲流亡了。

自述之和我們一同來到歐洲後，雖然經歷了困苦與艱難，貧窮和疾病，然而從另一方面說，是富有意義的。因述之一到歐洲便參加了國際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他有可能更具體地了解世界局勢的動態，尤其重要的是他能夠更具體地了解我們整個運動的情形，因而他在過去將近十五年中，對於托洛茨基主義運動曾作了某些貢獻。首先，他對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第三次革命勝利，它在國際上的影響和它取得勝利的各種原因以及它初期的演變，都作了詳細的分析和闡述。他認定：這個革命是「變態的革命」。它推翻了資產階級的蔣介石政權，實行了某些革命的措施，如取得民族獨立和土地改革……，這無疑地是一個革命，但它的政權是一種官僚主義的專政，中國的遠景，將和東歐各國相類似，

將會走向「變態的工人國家」的道路（見一九五一年向第四國際世界大會作的《關於中國局勢的報告》）；其次，當一九五八年中國共產黨瘋狂地進行人民公社運動，在世界各國某些激進分子中，引起了混亂和幻想時，彭述之根據恩格斯、列寧和托洛茨基關於農業集體化的原則，以及蘇聯和東歐各國農業集體化的經驗，尤其根據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因而他指出：用命令強迫農民加入人民公社會引起農民的反感，其結果一定產生農業的後退（見《對擁護公社意見的批評和我們的態度》1960年1月出版）；隨後某些極少數的托洛茨基主義者，把中共及其政權加以理想化，認為它們可以和列寧時代布爾塞維克黨及其政權相比擬時，彭述之根據理論和事實駁斥了他們，證明中共仍舊是一個斯大林主義的黨，它的政權是官僚主義的專政。因而，中國和蘇聯及東歐各國一樣，政治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見一九六〇年 月寫的《關於中共及其政權的性質——政治革命還是民主改良？》）；此外，在反巴布洛（BABLO）的親斯大林主義的思想和白恩斯（BERNS）主義，極左教派主義的鬥爭中，他也作了相當的貢獻。（見《評巴布洛主義》和《希利帶領社會主義勞工聯盟往那裏去？》以上提及各文已分別編入本選集第三第四卷中——編者）

最後，彭述之對於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重新統一，也盡了他所能夠作到的努力。自一九五三年末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分裂後不久，他就主張重新統一。爲了這個目的，他寫了不少的文件和信件爲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必須重新統一辯護，並在「國際委員會」會議上同堅決反對統一的白恩斯孤軍苦鬥了幾年。因而，當他親眼看到一九六三年六月統一大會實現了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重新統一時，他說：「這是我來歐洲十餘年來最興奮的一件事。」

回顧與前瞻

彭述之已整整七十歲了，他覺得他能夠活到今天，已是異常之僥倖而滿意。因自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失敗後，同他一起並肩奮鬥的整代戰士，差不多都犧牲於蔣介石的屠刀之下了！！

自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直到今日的整整三十八年的悠長歲月中，彭述之的生活經常陷於貧窮、驚險、恐怖與逃亡的狀態之中！從國民黨的追逐、逮捕和監禁，斯大林黨的造謠、污衊乃至企圖迫害；以及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恐怖、追逐和迫害，曾有數次都是在千鈞一髮的死亡綫上逃脫出來的。他活像一個扮演驚險影片的主角。假如單從這一點來說，他是一個「幸運兒」！

彭述之自一九二〇年加入共產黨後，他便準備將他的全部時間和精力連同他的生命貢獻於革命，因而自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的卅八年中，雖然經歷了驚險和迫害，遭受了不斷的沉重打擊和挫折，忍受了人生難於忍受的艱苦和磨難，人生最寶貴的青春和壯年時代，完全消耗於上述的這種生活狀態之中，但他從未惋惜過，從未因此而頹喪消沉。因他深深懂得：真理與現實生活的矛盾。凡是為崇高的理想而奮鬥的人，在真理還沒有獲得最後勝利之前，他們的命運總是坎坷的。因此，每當他遭到任何打擊和痛苦時，他總是抱着這種「宿命觀」的態度，總是以極大的耐心和鐵一般的意志去面對着它。他知道，「一個人越是缺少擔負痛苦的勇氣，痛苦壓在心頭越是沉重」（莎士比亞語）。因為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必須從痛苦中去磨鍊自己的德性，鍛鍊自己的意志。只有這樣，才能平衡自己的精神，才不致為痛苦所壓倒，而卒至減輕痛苦。

當然，任何具有優良的德性和堅強意志的革命者，假如沒有

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是經不起大事變的考驗，抵抗不住不斷挫折所帶來的痛苦的壓力的。就中國來說，有許多原來意志堅強和本質優良的革命者，但由於缺乏馬克思主義的深刻理解，在東方式的那種稀有的恐怖和殘酷的迫害之下，在事變不斷地打擊和生活經常困苦的情形之下，便逐漸消沉下去了。因此，述之常對同志們說：「必須不斷地研究馬克思主義來提高自己，這不僅對領導革命運動絕對需要，即抵抗反革命壓迫所給予的痛苦，也是最有效的武器。」由於彭述之不斷地研究馬、恩、列、托的思想和世界革命運動的經驗與教訓，和他本身所具有的性格配合起來，他便變成爲革命的樂觀主義者。他堅決地相信，繼承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托洛茨基主義一定完成世界革命的任務，把人類從現時資本主義制度的剝削和壓迫，以及從毀滅全人類的核子戰爭的威脅之下解脫出來；把障礙世界革命的「制動機」——斯大林主義放進歷史的博物館里去。

自斯大林的繼承者赫魯曉夫在一九五六年聯共第二十次大會的秘密報告中，把斯大林的一部分罪惡，就是以前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義者所不斷指責的那些罪惡暴露出來後，尤其是在一九六一年聯共第廿二次大會上，斯大林的罪惡，更公開地被揭露出來後，斯大林的那種最卑鄙和醜惡的自我榮耀，人工製造的歷史榮譽以及一切光榮的標誌，如銅像和紀念物等，都被他的繼承者摧毀了，即連他的屍體也從列寧墓旁搬走了。所有這些便足夠證明托洛次基和托洛茨基主義者暴露斯大林罪惡的一部分，已經由他的繼承者證實了。

跟隨着蘇共第二十次大會對斯大林個人獨裁罪惡暴露而來的波蘭和匈牙利工人階級和革命分子，反斯大林主義官僚獨裁的革命，以及中蘇衝突所產生的斯大林主義磐石(MONOLITHISM)

的破碎和全世界斯大林黨的分崩離析，所有這些都進一步地證明了托洛茨基主義者對於斯大林主義的衰落和滅亡的分析和預測的正確。因而更加強了彭述之和全世界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的信心。

最後，我堅決地相信：自一九五六年蘇共第二十次大會上，由斯大林的繼承者在蘇聯群眾的壓力之下，清算斯大林的罪惡時起，人類已經開始走向一個歷史的轉捩點，已經開始轉向托洛茨基主義所代表的真理這一方向了。這個真理的種子，已播散於整個星球，它正孕育在時間的胚胎內，隨着時間的進展，它會發育生長，我們準備着來做歷史的產婆吧！

我同彭述之生活在一起已整整四十年，我對於他的思想的演變，追求真理的熱誠，信仰馬克思、列寧和托洛茨基主義的堅定；他在中國共產黨裏的作用與活動，以及卅六年來，他在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中所經歷的異常堅苦的鬥爭情形，他的性格和做人的態度，我相信，我是最了解他的一個人。因而寫了這篇文章作為對他七十歲生日的一個禮物，以表示我對他的敬意和祝賀！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

《彭述之選集》日文版導言

(一九七七年九月二日)

這個選集所收入的文章，除「帝國主義與義和團運動」和「論五四運動之劃時代的意義」外，其他各文都是論述中國共產黨成立（1921）後三個歷史時期的事變：（一）中國第二次革命的準備及其經歷時期（1924~27），（二）中國革命失敗後的反動時期（1927~1949），（三）中國第三次革命時期，即中共取得政權，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至毛澤東逝世的這一時期。

中國近代歷史的轉折點，以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為其界標。在這以前，是帝國主義不斷侵略中國，使它逐步陷入半殖民地的地位，因而迫使它進行了民族民主的解放鬥爭，義和團運動就是顯著的例子。「帝國主義與義和團運動」一文，便是給了這個運動發生的客觀原因以詳細的論述。「論五四運動之劃時代的意義」，則是分析中國民族民主運動的思想演化。即從十九世紀後期輸入西方的民族民主主義的思想，最後匯集成為「五四運動」，並在這個運動中，由民主主義的思潮開始轉進了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方向，因而產生了中國共產黨，替往後的中國歷史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

但這個選集，因為篇幅所限，收入我在第一和第二時期寫的文章極少，但亦可以代表我對中國革命問題的基本觀點。例如「十月革命與列寧主義」一文的結論說：「列寧主義是我們的武器

* 本文是著者為中嶋嶺雄編譯、日本新評論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彭述之選集》（日文版）而寫的。

，十月革命是我們的大道」，這就替中國革命指出了它的理論基礎和行動方向。「誰是國民革命之領導者？」更具體地指出了中國的「國民革命，只有工人階級配作領導者，也只有它能作領導者」，並引證列寧的話作為結論：「無產階級的積極責任是推動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底而為其領袖，要無產階級抓住民主的小資產階級，尤其是農民，只有在這種條件下才有勝利的可能。」

但斯大林所控制的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所採取的政策，恰恰和上面所指出的相反，它以孟塞維主義代替了列寧主義，以承認國民黨的資產階級領導代替了無產階級領導，因而導致了1927年革命的悲慘失敗。在這方面，我在「不斷革命論與落後國家」一文的「不斷革命論在中國第二次革命中的考驗」一章中，作了扼要的分析 and 總結，可以彌補這個選集沒有較多收入我在第二次革命中所寫的文章的缺點。此外，陳碧蘭寫的「彭述之的思想及其在中國共產黨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中的活動」一文內，引證了我在第二次革命時期所寫的許多文章的摘要，亦可作參考。

「批評第六次大會及其決議案」，是批判共產國際在中國第二次革命失敗後採取冒險主義的政策，即企圖在農村進行武裝鬥爭，推翻國民黨政府，奪取政權的盲動主義政策。我分析此種盲動冒險政策，必然造成災禍，後來事變的發展，證明我的分析和批判是正確的。因為中共在革命失敗後執行共產國際的冒險主義政策達十年之久（1928-1937），最後還是向國民黨「求和」，聲明接受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取消「蘇維埃」，放棄土地革命，改組「紅軍」成為蔣介石指揮的部隊（所謂第八路軍），以此謀求第二次「國共合作」。但結果，在抗日戰爭中及戰後，中共仍然遭到蔣介石的不斷攻擊。例如，1941年中共的新四軍被攻擊，軍長葉挺被俘，政治主任項英遭戰死；1947年4月延安被奪取；同年六月二十五日，蔣介石下令逮捕毛澤東；七月四日，蔣正式公佈「戡亂動員令」。這才迫使中共，為了生存，不得不

進行反攻，避免了重蹈第二次革命的覆轍。

在中共踏上政權這一時期內，這個選集所收入我寫的文章較多，其中有三篇需要略加解釋：

第一篇是「中國局勢的報告」。這是根據我在第四國際第三次世界大會（1951年8月）上的口頭報告所寫成的。當時全世界的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內部，對中共單靠農民武裝隊伍戰勝了代表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權，表示十分驚異。因而對這個勝利的理由，中共及其政權的性質，以及它的遠景，都發生了嚴重的分歧意見。其中最突出而難於解釋的是：依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現代資本主義佔支配地位的社會裏（包括落後國家），城市是支配農村的，因而現代落後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必須由城市的階級，即無產階級領導城鄉的勞苦群眾，特別是農民群眾，舉行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建立自己的專政，才能解決民族民主的任務，由此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有如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所昭示的。但中共自1927年革命失敗後，即脫離了城市和工人階級，專門在農村組織游擊隊伍，進行鬥爭，這怎麼能夠推翻以城市工商業為基礎、擁有大量現代武器、並為強大的美帝國主義所支持的蔣介石政府而取得政權呢？這個問題，不但很難用馬克思主義來解釋，而且在現代革命歷史上亦找不到任何先例。為了解答這個爭論的難題，我在我的報告中用了大量的篇幅來解釋，指出中共這次對蔣介石的勝利，主要是由於日帝國主義的侵略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糾結在一起所造成的諸條件，例如，蔣政權的完全腐化和自動崩解，美帝國主義最後放棄了援助蔣介石，中共力量在抗日戰爭中的生長和蘇聯佔領東北後對中共的援助，沒有這些條件的配合，中共對蔣的勝利是不可想像的。

第二篇是「中國第三次革命及其前途」，這是1954年秋，應瑞士蘇黎世出版的《社會評論報》的邀約而寫的。該報主編請

我寫一篇關於第三次中國革命的綜合性文章，所以這篇文章對中共取得勝利的諸原因，以及對它在頭五年的對內對外政策，作了較有系統的分析 and 評論，最後指出中共將循着東歐各國的道路，走向變態的工人國家。因而中國必須經過工農群眾的政治革命，推翻官僚獨裁，才能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政制，走上社會主義建設的康莊大道。中國最近事變的發展，如1976年4月5日的北京天安門廣場十萬群眾的大示威，搗毀警車，焚燒軍營，並宣言：「我們信仰馬列主義，

讓那些閹割馬列主義的秀才們

見鬼去吧！

爲了真正的馬列主義，

我們不怕拋頭洒血……」

這便是行將到來的政治革命的預告！

第三篇是「對擁護人民公社的各種意見的批評和我們的態度」。由於毛澤東1958年8月獨自發動了人民公社運動，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和各種不同的看法，這便在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內部掀起了激烈的爭論，特別在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內的爭論是最爲嚴重。因爲該黨的一部份重要領袖堅決擁護人民公社，因而該黨的領導要求我對這個重大問題表示意見。所以這篇文章牽涉的問題極爲廣泛而複雜。如農業大生產的優越性與農民自願參加集體化的問題、公共食堂、兒童公育與婦女解放問題等，都在人民公社問題的爭論中表現了出來。我對這些問題，不得不從理論和事實上給予擁護人民公社的人們以嚴肅的批判。因而這篇文章帶有濃厚的辯論性質。並指出毛澤東的人民公社運動必然要引起廣大農民的憤懣，造成農業的減產。公共食堂和兒童公育，在中國經濟和文化的低度條件下，絕不可能實現，因而婦女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即從家庭奴役解放出來）。後來事變的發展恰好證明了這個預測。

此外，值得特別指出的是：人民公社運動的失敗，大大地打擊了毛澤東的威望及其在中共內的獨裁地位，這就迫使他不得不「退居第二線」，讓劉少奇以國家主席的名義當權（1959年8月中共中央廬山會議的決定）。這是第一次在中共內部形成了劉少奇、鄧小平派和毛澤東、林彪派的對立，因而發生了不可調和的鬥爭。以後的「文化大革命」即直接導源於此。

在文化革命運動中，毛利用林彪指揮的軍隊和他自己下令組織的「紅衛兵」摧毀了劉鄧派。但跟隨而來的是毛與林的生死鬥爭，因後者在文化革命運動中大大地擴張了他在黨、政府和軍隊中的勢力，形成了他自己的派系。這就又一次威脅到毛的個人獨裁。結果是毛發動了整肅林彪運動，徹底摧毀了林派，但那時毛在黨、政、軍中已陷於孤立的僵局，爲了打開這個僵局，毛不得不拉攏周恩來（因他在黨、政、軍中擁有強大的潛勢力），並向被整肅的領袖和幹部讓步，恢復他們的職位（如鄧小平、譚震林等）。這是中共第十次大會（1973年8月）的結果。但那些恢復職位的領袖和幹部都圍繞在周恩來的周圍，在毛的眼中，這個以周鄧爲首的派系，同以前的劉鄧派一樣，又在威脅他的個人獨裁。於是一個新的運動，整肅周鄧的運動（名之爲「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運動），又在地平線上升起來了。

當攻擊周鄧派的運動（1974年）發生不久，周恩來逝世了（1975年1月），毛澤東利用周死的機會，迫不及待地罷免了鄧小平的一切職位，任命了華國鋒爲黨的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以爲這樣可以保證他的個人獨裁及其派系的持續存在。可是，歷史來了一個大諷刺：當毛死後（1976年9月）不到一個月，他的嫡派，包括他的遺孀江青，一手提拔起來的張春橋、王洪文和姚文元，於一夜之間（十月六日夜）竟被他親自任命的繼承人華國鋒下令逮捕了！於是，毛澤東所遺留下來的「威望」和「思想」變成了華國鋒派整肅「四人幫」的工具和繼續控制人民的羅網，使

中國陷於共黨官僚的專政與工農群眾要求解放的繼續鬥爭之中。

前面所敘述的中共內部一系列的鬥爭和整肅，都可以在本選集的幾篇文章中（「五四運動與文化革命」，「天安門事件的意義」和「四人幫被整肅的背後」等）找到它們的邏輯發展的線索。

「毛澤東的政治生涯」是分析毛的思想和行爲的具體演化，同時也具體地反映了中共在第二次革命失敗後完全斯大林主義化五十年來所發生的重大事變。這不僅給了毛的思想和行爲一個總結，也給了中共二十八年的統治一個素描，希望讀者由此看出毛的思想行爲和中共統治的真實面貌。

最後，我要向主持本書的編譯和安排在日本出版的中嶋嶺雄先生特別致謝。

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是怎樣形成的？

這是我1920年參加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回憶的第一部份；寫於1964年4月。——作者按

自從「五四運動」爆發後，所謂「新思想」的飛速傳播和蓬勃發展，在急進的知識份子和學生青年中已產生了一種廣泛的社會主義的思想潮流。那時，在北京、天津、上海、廣州、杭州、武漢和長沙成都等大城市成立了許多小團體，有些團體出版了一個小刊物，或圍繞於一個刊物的周圍。這些團體都一般地熱心探求和討論各種“新思想”，包括各種各式的社會主義思想。這就在客觀上替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開闢了新的園地。

但另一方面，這種社會主義思想潮流的本身是模糊的、膚淺的、無定型的，並且是十分混亂的，往往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和各種社會主義的、特別是和無政府主義的思想混淆在一起。例如在思想上居於領導地位的《新青年》，它是最初較有系統和認真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的。但在它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所登載的文章中，便包含了三種顯然不同的傾向：顧兆熊的《馬克思主義學說》是重複着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修正主義者的觀點；黃凌霜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批評》則抄襲了無政府主義的爛調；只

*

本文是著者於一九二〇年參加上海共產主義及小組的回憶的第一部份，寫於一九六四年四月。

有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才一般正確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像這樣把代表三種不同傾向的文章登載於同一《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中，而不加以任何按語或批評，這就不可免地在讀者中引起混亂。至於那些新成立的小團體內部，思想混亂的情形更爲厲害。差不多每個團體都包含許多不同的思想傾向，從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到馬克思主義。例如當時的「少年中國學會」是帶有全國性的最大的一個集團，它的內部便包含了三種最明顯的矛盾傾向：如李大釗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王光圻代表的無政府主義以及曾琦代表的國家主義。要使當時各刊物上所發表的關於社會主義的混亂思想和各團體內部所包含的互相抵觸的思想傾向加以澄清，引導向馬克思主義的河床，成立共產黨，假如沒有外來強有力的推動，依照各種傾向的自動分化和重新結合，便必須經過相當長期的思想鬥爭才能達到。

這裏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在1919年的“五四”以前，中國不會有過馬克思主義的任何組織^①和出版物，因而沒有馬克思主義的任何傳統，只存在過無政府主義的小組織，出版了一些刊物，宣傳無政府主義。例如，二十世紀初，李石曾和吳稚暉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紀》，宣傳普魯東的無政府主義，但它在中國的影響極微。1909年劉思復在廣州組織“晦鳴學舍”，1913年出版《民聲》，宣傳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由於劉的艱苦奮鬥（他死於1915年），他的運動在當時某些青年中發生了相當的影響，這種影響，甚至在“五四”後還獲得某種回聲。這或者可以說，無政府主義在“五四”以前已有它的“傳統”。不錯，辛亥革命後，江亢虎曾一度組織“中國社會黨”。但這個黨不僅與馬克思

主義無關，甚至連一般的社會主義氣味也很少。且不到一年即被袁世凱解散，從此便煙消雲散了②。上面所說的這種情形表明中國和西方先進國家是完全不同的。

在歐美先進國家中，不但有長期的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以及馬克思主義和各種社會主義，特別是和無政府主義的鬥爭（如在第一國際時期），而且早已存在了統一於第二國際的各國社會民主黨或工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那些社會民主黨內部又發生了左派運動，團結於青麥華德的國際左派中。因而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那些社會民主黨，在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強大影響之下，立刻發生了激劇的分化。同情或傾向於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左派集團或個別份子，在很短的期間內便自動團結起來成立了共產黨或共產主義的團體。

若拿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運動和西方先進的德、法、英相比，要落後七十年（從1848年《共產黨宣言》發表時算起），即同落後的俄國比較也遲了三十五年（從1883年普列漢諾夫等成立“勞動解放社”時起）。可是，在十月革命後第三年，中國亦開始成立了共產主義的組織，比之西方先進的德法等國成立共產黨不過落後一、二年，這怎樣解釋呢？

主要的原因是：列寧和托洛茨基所領導的共產國際異常積極地和有計劃地在東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建立共產黨。他們認定這些國家的，特別是中國和印度的民族民主解放運動，對於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具有極其重大的作用。因而力圖在這些國家建立共產黨來直接推動和領導民族民主的解放鬥爭，以此不斷地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所以當1919年3月共產國際成立後，隨即成立了“東方部”，並特別設立一個“遠東局”駐於伊爾庫茨

克（IRKUTSK），以便就近推動遠東的共產主義運動，並派遣專員至各國和抱有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團體或個人接觸和聯繫，促其發起組織共產黨。中國便是在這種催促之下開始進行共產主義的組織的。

李大釗曾經告訴我以下的故事：「當1919年末，有一個俄國人名叫哈哈諾夫金（HOHONOV KY）^③共產黨員（經過北大俄文教授柏烈偉的介紹）到北京大學訪問我，見面時便說：“李大釗同志，你好！”我沒有等待這位客人說明來意，即聲明說：“我還夠不上稱爲你們的同志哪”。客人搶着說：“我們早已知道你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因爲你寫了不少介紹馬克思主義思想和贊揚布爾塞維克主義勝利的文章，你已經是我們的同志”。」跟着，哈哈諾夫金便說明，他這次特地來訪問李大釗是受了共產國際的委託，希望和他商討在中國進行組織共產黨。因爲他既已公開發表文章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贊揚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勝利，那就必須組織一個黨來實現它。李大釗聽了哈哈諾夫金的話，當時即表同意。但他告訴後者：「此事關係異常重大，我一個人不能作主，必須和陳獨秀商議，徵求他的意見，只有陳獨秀起而發起組織共產黨，事情才能夠順利地進行。我準備立刻寫信給他，俟得到他的回信後，再同你商談」。不久，李大釗收到陳獨秀的回信，表示贊成組織共產黨。李即以此轉告哈哈諾夫金。於是，他帶着陳獨秀和李大釗同意在中國組織共產黨的消息回到莫斯科去了。

陳獨秀，由於他在“五四”前的新文化運動中所起的領導作用，以及他對於北京軍閥政府對外賣國政策的激烈抨擊，早已被該政府視爲最危險的敵人。再加上“五四”事件發生後，他在

主編的《每周評論》上所發表的言論，極力為學生群眾運動辯護，並鼓勵他們繼續奮鬥，因而被北京政府逮捕（1919年6月中）。但由於他當時在全國人民中，特別在知識份子和學生青年中享有最高的聲望，北京政府在各方面的援救和全國輿論的強大壓力之下，迫不得已釋放了他。但禁止他離開北京，以便監視他的活動。後來由於李大釗設計，和他化裝秘密地逃出北京，他才得以自由去上海（1919年秋）。④

陳獨秀經過這次被捕和監禁，他的思想更為急進和確定。在“五四”以前，他雖然已對俄國的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表示同情（他在他主編的《新青年》上登載李大釗贊揚十月革命勝利和布爾塞維克主義的文章，以及出版《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就是明證）。但他本人對於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還沒有公開發表過任何意見的文章。自他從北京逃到上海後，在他繼續出版的《新青年》七卷一號（1919年12月）便特別發表了《新青年宣言》公開表示反對資本主義而以社會主義改造社會的主張。例如說：“我們相信世界上的軍國主義和金力主義已經造成了無窮的罪惡，現在是應該拋棄的了”，這裏所謂“金力主義”即資本主義，“拋棄”資本主義即是主張社會主義。宣言在描述了“理想的新社會”，即社會主義的社會後，接着宣稱：“我們主張的是民衆運動，社會改造，和過去及現存各派政黨絕對斷絕關係”。這裏表明，為了進行社會主義的社會改造，必須和現在的各派政黨斷絕關係。這同時也就暗示，要進行“民衆運動”，“改造社會”，便必須另組新黨。在實際上，陳獨秀自他到上海後，即和當時上海一些傾向社會主義的份子接觸，把其中最急進的一部份集合於他的周圍。這便是他後來建立共產主義小組的基本成員。陳獨

秀對於社會主義的立場的確定及其在上海的活動情形，李大釗當然知道得十分清楚。所以他告訴哈哈諾夫金，要組織共產黨，只有陳獨秀起來發動，事情才能夠順利地進行。

共產國際東方部得到哈哈諾夫金的報告後，於1920年春派遣格利哥理·魏金斯基（GREGORY VOITINSKII）前來中國。魏金斯基在十月革命前曾流亡加拿大，革命後回到俄國，加入布爾塞維克黨。他有一個時期在西伯利亞活動。後來被派在共產國際東方部工作。和魏金斯基同來的，除他的妻子外，還有楊明齋。楊曾僑居俄國多年，十月革命後加入了俄國共產黨。他回國的主要任務是替魏金斯基作翻譯，並擔任後者和中國人方面的聯絡工作。

魏金斯基夫婦和楊明齋於1920年春先到北京，和李大釗交換了一些關於組織共產黨的初步意見後，由李介紹他們到上海會晤陳獨秀。陳在那時對於組織共產黨一事當然毫無經驗。因他在這時以前從未參加過任何革命的組織。在辛亥革命前後，他雖然從事過革命活動，却未曾加入孫中山所領導的同盟會，或以後的國民黨。但在共產國際代表魏金斯基協助之下，陳獨秀於1920年5月，即五四運動的一周年，在上海成立了第一個中國共產主義的小組織，這便給中國共產黨的形成創造了條件。

最初參加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共七人，除陳獨秀本人外，便是戴季陶、陳望道、李漢俊、沈玄盧、施存統（後來改名為施復亮）和余秀松。但這個小組的成員是很不穩定的。首先是戴季陶退出組織。戴在當時曾被認為對於馬克思主義最有研究的一人。因為他在他主編的《星期評論》上發表了許多關於社會主義和歐美及日本勞動運動的文章，並在《建設》雜誌上發表了他翻譯的考

茨基的《資本論解釋》全文。但他的思想的實質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因為在他所發表的有關社會主義的文章中都主張階級合作，反對階級鬥爭。據陳獨秀後來告訴我：戴季陶參加了共產主義小組的成立會後不久，即去見孫中山，報告他加入共產主義團體的消息，當面遭到後者的嚴厲訓斥，指責他的行為是對國民黨的背叛。於是他第二天便急忙去見陳獨秀，聲明退出共產主義的組織，從此以後，戴季陶便逐漸地變成馬克思主義的不可調和的敵人，國民黨的“反共理論家”，“孫中山主義的忠實解釋者”，蔣介石反革命思想的靈魂。當1949年中共的解放軍進攻南京時，戴季陶從那裏逃到廣州，而以自殺結束了他的“反共思想”。戴所串演的這種悲喜劇，或者可以說是中國資產階級的歷史命運的一種反映。

陳望道原為浙江第一師範學校教師，五四運動後會積極地提倡“新思想”，在《浙江新潮》等刊物上發表文章贊揚社會主義，並翻譯了《共產黨宣言》的全文（1920年4月出版）。因而影響了一批學生，施存統和余秀松便是受了他的直接影響的學生。但他在共產主義運動內也沒有多久，到1921年6月共產黨成立會後不久便離開了。此後成為自由主義的大學教授。直至1949年毛踏上政權時，他才轉而“親共”，因而得以充當上海復旦大學的校長和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以至於今。李漢俊曾留學日本「帝國大學」，在那裏閱讀過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五四運動後，他在《星期評論》發表文章，宣揚社會主義，尤其是他在介紹三個國際（第一國際、第二國際和共產國際）的歷史一文中，頗為扼要地解釋了馬克思主義和機會主義的鬥爭，故在當時被認為對社會主義較有研究的人物。但在1923年，他因為反對

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亦脫離了運動。兩年以後，他又自動地加入了他曾經反對的那個國民黨，且於1927年革命失敗後，被國民黨的軍閥把他當作“共產黨”槍斃了。沈玄盧原為浙江的著名紳士，辛亥革命後作過浙江省議會議長，五四運動後他在《星期評論》上發表文章，鼓吹社會主義。但他是一個性情異常激動的人。他之加入共產主義運動，並不是由於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而是憑着一時的感情衝動。所以到1925年他因私人的細故（即他的兒媳楊之華和瞿秋白戀愛）而脫離了共產黨，並轉到當時最反動的國民黨右派——西山會議派，後來為蔣介石所暗殺（因蔣和他有私人仇隙）。施存統在1927年革命失敗後亦脫離了黨，當中共取得政權後，他以「民主人士」的資格參加了新政權（當過工業部部長）。余秀松於1925年末去莫斯科孫中山大學學習。因他和陳紹禹（後改名王明）的小組織發生激烈的衝突，起初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後來被「派到」新疆，給陳紹禹的人暗殺了。

但不管中國共產主義第一個小組的成員有如上的重大變化，絕大多數離開了運動，但這個小組當時在陳獨秀的領導和推動之下，尤其是因為隨後參加的李達、邵力子^⑤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的積極活動，它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初期，在中共形成的過程中，作了最有價值的貢獻（當時出版的《勞動界》《新青年》和《共產主義者》三個刊物的內容就表現了此種貢獻），起了最積極的作用。它那時像一塊磁石，把分散在各地傾向共產主義的份子吸引到它的周圍。因而在一年以後，即1921年7月得以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為中國第二次革命準備了一架發動機。

中國共產黨及中國第二次革命簡史*

——爲《托洛茨基論中國》寫的導言

(一九七四年四月廿六日)

當摩納出版社決定出版《托洛茨基論中國》的新文集時，該社的編輯之一，列士·伊文思寫信給我，說這部書比1932年的《中國革命問題》將增加大批文章，要求我替《托洛茨基論中國》寫篇導言，並將預定增加的文章的一些副本，連同目錄表寄給我參考。我高興地接受了這個任務。因爲我可以乘這個機會，提供一些未曾發表的有關中國第二次革命的歷史事實，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的思想演變的事實，以便讀者更能具體地瞭解《托洛茨基論中國》所作出的巨大貢獻。

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問題的貢獻，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僅次於他和列寧對俄國革命的貢獻。中國第二次革命，雖然由於斯大林的機會主義領導失敗了，但托洛茨基在這次革命進程中，對於革命的理論、戰略和策略各方面所提供的意見，都被歷史的記錄證明完全正確。從這方面說，《托洛茨基論中國》從反面補充了、甚至豐富了俄國十月革命的教訓，因爲在第二次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差不多和俄國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一樣，是兩條不可調和的路綫，即托洛茨基所代表的布爾什維克路綫和斯大林所代表的孟什維克路綫的鬥爭。所不同者，在俄國革命中，布爾什維克路綫佔上風，因而引致十月的勝利；孟什維克路綫則在斯大林篡奪的蘇聯官僚機關的保護之下，以致使中國革命歸於慘敗。但這個慘敗的教訓，對於中國，對於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乃至對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其重大的意義，並不下於俄國革命成

* 本文是著者爲美國摩納出版社出版的《托洛茨基論中國》而寫。

功的意義。正如托洛茨基所說的：

「研究中國革命，對於每個共產主義者和每個前進的工人都是最重要和最迫切的。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如不研究中國革命的基本事件、動力和戰略規律，在任何國家都不可能認真談到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鬥爭。正如不懂得甚麼是夜，便不可能懂得甚麼是日。同樣，如沒有冬天的經驗，便不可能懂得夏天。同樣，如不研究中國災禍的規律，便不可能瞭解十月革命的規律和意義。」（見《必須作一部中國第二次革命史》，着重點為引者所加）

我對上面托洛茨基指出「研究中國革命」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只須加一句話：「如不認真地研究《托洛茨基論中國》，便不可能瞭解『中國災禍的規律』。」

（一）中共初期的布爾什維主義傾向

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問題有系統地發表意見，開始於 1926 年 8 月 30 日寫給卡爾·拉狄克的信中，雖然早在 1923 年，他已表示「堅決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以及 1926 年春「又一次正式建議共產黨立刻退出國民黨」（見托洛茨基 1930 年 12 月 10 日寫給麥·夏克曼的信），但不曾留下他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和主張共產黨退出國民黨的正式文件。因而在 1926 年 8 月 30 日以前，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的意見，特別是關於中國共產黨對共產國際的政策反應，人們不能從他《論中國》一書中找到論證和評判。爲了補救這個缺陷，我覺得把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誕生以後所發生的重要事件，給以扼要的闡述是必要的。因爲這樣，可以幫助讀者更具體地和更深入地去瞭解托洛茨基在《論中國》中所作的巨大貢獻。

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是在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下的共產國際派到中國的第一個代表（格利哥里·魏金斯基）的協助下，於一九二〇年五月成立於上海。這個共產主義組織成立後，便面對着三個迫切的任務：如何徵集和培養共產主義的幹部，怎樣着手組織工會，以及對外宣傳共產主義思想。在西方，共產黨差不多是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的或工人黨的分化，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衝激下成立的。中國的情形完全不同，不但沒有馬克思主義運動的思想傳統，甚至沒有現代產業工會的存在，一切都得從頭作起。所以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兩個月後，即於7月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並準備派送青年共產主義者到莫斯科去學習。它於8月出版《勞動界》週刊，在工人中宣傳共產主義思想，並由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團員在工人中活動，開始組織工會，9月把著名的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月刊轉變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機關報，公開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報導蘇俄的實況。11月，它又出版了秘密的《共產主義者》月刊，介紹布爾什維克的思想 and 革命經驗及各國共產主義運動，刊載托洛茨基寫的共產國際成立宣言和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的報告等；另一方面，《新青年》和《共產主義者》以很多篇幅抨擊無政府主義思想（因當時無政府主義思想在急進青年中極為流行）和第二國際的階級合作的機會主義，宣傳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這便替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確定了一些基本原則。由於上海的共產主義小組的這種最積極的活動，從1920年10月起，先後在北京、武漢、長沙、廣州和濟南等地成立了共產主義的小組。這便替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大會奠定了基礎。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成立大會，由於陳獨秀未能出席，只是通過布爾什維克黨制的章程，在政治方面沒有作出確定的決議。但

這個新黨的一般傾向是朝着以無產階級為基礎的布爾什維克的方向走的。所以在那次大會後，中共即成立了「勞動組合書記部」，有計劃地在各大工業城市、礦山和鐵路進行工人運動，組織工會，領導工人鬥爭，在1921-22年，中共領導了一系列的罷工鬥爭，獲得了相當勝利。因而勞動組合書記部號召全國工人組織，於1922年5月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到會的代表代表二十三萬有組織的工人。這表明在短短的一年中，中共已成為中國工人階級運動的核心，取得了工人運動的領導地位。

同時，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領導，得到共產國際代表魏金斯基的協助（魏金斯基當時很謹慎地把俄國布爾什維主義的傳統和列寧對於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概念介紹給了中共），於1922年春製訂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戰略路線，這條路線正式發表於1922年7月召開的中共第二次大會的宣言中，這個宣言的要點如下：

「無產階級去幫助民主革命，不是無產階級降服資產階級的意義，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長生命和養成無產階級的真實力量的必要步驟。……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黨。它的目的是要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建立工農專政的政治，剷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中國共產黨為工人和貧農的目前利益計，引導工人們幫助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使工人和貧農與小資產階級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陣綫。」這個聯合陣綫的目標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立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實行自治，成為民主自治邦；以及製定工人、農民、婦女的法律等等。（共七條）

宣言最後指出：

「上面的七條是對於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都有利的，是解放他們脫出現下壓迫的必要條件。我們一定要為解放我們自己，共同來奮鬥！工人和貧農必定要環繞在中國共產黨旗幟之下再和小資產階級聯合着來奮鬥。」「但是工人們在這個民主主義聯合戰綫裏，不致為小資產階級的附着物，同時又能為自己的階級利益奮鬥。那麼，工人們要組織在共產黨和工會裏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工人們時常要記得他們是一個獨立的階級，訓練自己的組織力和戰鬥力，準備與貧農聯合組織蘇維埃，達到完全的解放。

「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現在它向中國工人和貧農高聲喊叫道：趕快聚集到共產黨的旗幟之下來奮鬥呀！同時，向中國全體被壓迫的民衆高聲叫喊道：來和聚集在中國共產黨旗幟下的工人和貧農共同奮鬥呀！並高聲叫喊道：一齊來和全世界的革命伙伴們，並肩前進呀！只有『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被壓迫的民族的聯合』，是解放全世界的途徑。」（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一冊 75-76頁）

我在上面盡可能摘引了中共第二次大會的宣言的原文，因為這個宣言是中共成立後，第一次為中國革命製訂的綱領性的文件，它明確地指出，工人們必須「時常記得他們是一個獨立的階級」，「準備與貧農組織蘇維埃。」這正是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1920年7月）所提出的「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的基本路綫，這個「提綱」說：

「共產國際只是在這個條件下，即當一切落後國家中未來的無產階級政黨（不僅名義上是共產黨）的份子組織起來，並且認織到同本國資產階級民主運動作鬥爭這些特別任務

的時候，才應當援助殖民地和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性的民族運動；共產國際應當同殖民地和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臨時的聯盟，但是不要同他們混為一體，甚至當無產階級運動還處在萌芽狀態時，也絕對要保持這一運動的獨立性。」（列寧全集中文版 31 卷 129 頁）

剛在中共第二次大會閉幕後，中共中央委員會又發表了「對時局的宣言」。在這個宣言中，除了分析全國政治局勢，說明反對軍閥和帝國主義的聯合陣綫之必要外，最後宣稱：

「共產黨建議召開一個由國民黨的革命份子和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參加的會議，討論創立反對封建式的軍閥和封建制度的殘餘的聯合陣綫。沿着這個廣大的聯合陣綫的鬥爭，是將中國人民從雙重枷梏——從外國列強和本國軍閥的枷梏解放出來的戰爭。這是迫切需要和不可避免的戰爭。」（引自布蘭特、斯瓦爾茲和弗爾貝克著的《中國共產主義文件史》63 頁）

中共號召「國民黨的革命份子和革命社會主義者」創立「聯合陣綫」正是根據列寧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所指示的「和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臨時的聯盟」的路綫，在中國民主革命中的具體運用。這樣，中共可以保持它的「工人階級的獨立」，和發展他們的戰鬥力量，以「準備與貧農聯合組織蘇維埃，達到完全的解放。」這便是中共初期為民族民主革命所定下的基本方針。

（二）中共被迫轉向孟什維主義

當中國共產黨在它的第二次全國會議製定關於中國革命的方針後，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運動的政策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這便是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MARING，他的本名為 SNEEV-LIET）帶來的訓令。

馬林於1922年8月初到達上海，和孫中山會談之後，立即要求中共中央召開特別會議，討論共產國際的訓令。在那次會議上，馬林提出國際的指示：中國共產黨黨員個別地加入國民黨，以此謀求國共合作，推進國民革命運動。當時出席中央委員會會議的委員們都表示反對，其主要理由是：國民黨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黨，共產黨則代表無產階級，絕不應加入它，以混亂階級的組織，妨碍共產黨的獨立政策。^{*}但馬林提出了中共是否遵守

^{*} 赫拉德·伊羅生在他的《中國革命的悲劇》中，關於中共加入國民黨的問題，曾有這樣的一段話：「陳（獨秀）說，所有的中央委員都反對馬林，說甚至在那時，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相信，這樣的步驟會混亂階級組織和妨碍我們的獨立政策！但這是事後寫的。」（《中國革命的悲劇》英文第二版第59頁）事實上，中共在它的第二次全國代表會議上所決定的政策完全是「獨立的政策」，如前面所敘述的，馬林帶來的「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政策，顯然和中共既定的政策相反，所以當時「中央委員會的委員」都表示反對。

至於伊羅生說：「一九二二年陳曾寫道：『和革命的資產階級合作，是中國無產階級目前必由之路』」。（同上第59頁）但伊羅生所引的上面一句話，絕不是寫於一九二二年，而是包含在陳獨秀所發表的《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一文中（見一九二三年四月廿五出版的《嚮導》），那時陳獨秀已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正式決議，因而放棄了原來的立場，向極右轉變。這裏值得特別指出的：伊羅生的《中國革命的悲劇》對於第二次革命的一般過程給了有價值的描敘，但對於中共內部的生活，它的領導層的思想的分歧，特別是它對於共產國際政策的反應，伊羅生沒有一句話提及，好像中共只是機械地執行了共產國際的政策，而沒有任何不同意見似的，這便是伊羅生的書的最大缺陷，這也是我在本文所以詳細地 述共產國際的領導，與中共思想演變的關係的理由之一。

國際的紀律問題，在這種「紀律」的威脅之下，中共中央勉強地接受了國際的訓令，但附帶一個條件，即：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問題，須交全體黨員討論後，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作最後決定。

在討論加入國民黨問題的當中，各地方支部曾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尤其是從事工人運動的幹部反對最為強烈。即以陳獨秀說，當他於1922年末到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時，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還表示懷疑，因而引起了共產國際領導層的特別注意，認為陳所代表的意見是一種「左派幼稚病」。拉狄克甚至出而公開批評說中共的任務在於「把工人們引導到與客觀上革命的資產階級份子的合理關係之中」。(見上引《中國共產主義文件史》第59頁)

正由於中共基層黨員和幹部對加入國民黨表示反對或懷疑，特別是陳獨秀在出席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時對此表示懷疑，所以共產國際主席季洛維也夫於1923年1月初，將中共加入國民黨的問題，正式提出於蘇共中央政治局討論，討論的結果，除托洛茨基一人反對外，其他的成員，如斯大林、季洛維也夫、布哈林等都一致贊成，季洛維也夫根據這次蘇共中央政治局的決定，寫成決議案，這便是1923年1月12日共產國際對中共加入國民黨所通過的正式文件，這個文件的原文如下：

「國民黨是現時中國唯一強大的民族革命組織，它以自由民主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以及一部分學生和工人為依據，因為中國獨立的工人運動尚屬薄弱，因為中國目前的中心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及其在華代理人——軍閥，尤其因為解決民族革命問題直接有利於工人階級，而現時工人階級又尚未充分變成完全獨立的社會力量，所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

爲：年輕的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實行合作是必要的。」（見華崗的《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第二卷310—311頁）共產國際確認「國民黨是現時中國唯一強大的民族革命組織」，因而命令「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加入「自由民主資產階級」爲主體的「國民黨」，即把無產階級的黨放在資產階級黨的控制之下，爲它欺騙群眾的附屬工具。無須解釋，這與布爾什維克對「自由民主資產階級」的傳統立場和列寧的《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綱領草案》的基本觀念完全相反，是一條最壞的孟什維主義路線，中國第二次革命的悲劇即導源於此。

在蘇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共加入國民黨後，斯大林立即派遣越飛（ODOLPH JOFFE）以蘇聯政府代表的身份，到上海和孫中山直接談判中共加入國民黨，謀取黨內合作，以及蘇聯援助國民黨的實際辦法等。會談結果，於1923年1月26日發表了《孫中山與越飛宣言》。這個宣言的第一項是：

「孫逸仙博士以爲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意，且以爲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統一之成功與國家完全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並確告孫博士，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熱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爲依賴也」（見王健民著《中國共產黨史稿》第一卷第97頁）。

孫斷言「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這是露骨地表示了他所代表的資產階級的立場。蘇聯政府的代表越飛竟公然完全同意此項見解，並答允蘇聯「援助」孫去完成「民國的統一」和「民族完全獨立」。這樣，給中共留下來的唯一任務，只有跟在蘇聯政策的背後去支持國民黨完成「國家

統一」和「民族獨立」而已。這是1923年1月12日共產國際通過的決議案的具體化，無須說，這是根據斯大林的指示作成的。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收到了1923年1月12日共產國際的正式決議，又看到同年1月26日《孫逸仙和越飛的聯合宣言》之後，於1923年6月舉行中共第三次全國會議，代表共產國際出席這次會議的又是馬林，雖然會議上發生了頗為激烈的爭論，但由於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的巨大權威，絕大多數代表通過了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決議，並發表了宣言，這個宣言的要點如下：

「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更應該立在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不幸中國國民黨有兩個錯誤的觀念：(一)希望外國援助中國革命，……(二)集中全力於軍事行動，忽視了對於民衆的宣傳」。

「我們希望社會上革命份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國國民黨，使國民革命運動得以加速實現，同時希望中國國民黨斷然拋棄依賴外力及專力軍事兩個舊觀念，十分注意對於民衆的宣傳，勿失去一個宣傳的機會，以造成國民幸福之真正中心勢力，以樹立國民革命之真正領袖地位。」(同上王健民「手稿」第一卷83頁，着重點為引者所加)

如果將中共這次大會的宣言和它1922年7月第二次大會的宣言加以對照，便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們的內容完全相反，它已由原來的布爾什維主義傾向轉到孟什維主義的泥坑中去了，而且比之俄國的孟什維克更為可耻，因為後者至少還在組織上保持它的獨立，不曾加入當時俄國資產階級的立憲民主黨。而中共則加入了代表資產階級的國民黨，並「希望社會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國國民黨」。像這樣驚人的轉變，其根源何在呢？在於：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領導的轉變與墮落。這裏只須指出一個事

實就夠明白了：自列寧1922年5月臥病後，斯大林立即拉攏季洛維也夫和加米也夫，在蘇共中央政治局內成立了小組織（所謂TRIUMVIRATE），其主要目標在排斥托洛茨基（害怕他在列寧死後繼承後者的領導地位），對外政策則盡力謀求與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合作，這便是1922年8月（列寧病後不到三個月）共產國際命令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根源。

自中共第三次全國大會通過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後，在思想和行動兩方面，中共都發生了激劇的變化。

就思想方面說，中共的一些領袖們，爲了替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尋找「理論的」辯護，便盡量渲染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及其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作用。首先起而進行這種工作的是毛澤東。

毛爲第三次大會新選的中委之一，剛在大會閉幕後，他即在黨的機關報《嚮導周刊》上，發表題名爲《北京政變與商人》，該文的要點如下：

「中國現在的政治問題，……是簡單一個國民革命問題；用國民的力量打倒軍閥，並打倒和軍閥狼狽爲奸的外國帝國主義，……這個革命是國民全體的任務，全國國民中的商人、工人、農民、學生、教職員都同樣應該挺身出來擔負一部份革命的工作，但因歷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實的指示，商人（即資產階級——彭）在國民革命中應該擔負的工作較之其他國民應該擔負的工作，尤爲迫切而重要。我們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國政治，是軍閥外力互相勾結箝制全國國民二重壓迫的政治，全國國民，在這二重壓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但是很敏銳很迫切地感覺這種痛苦的還是以商人爲最。」

因爲「商人在國民革命中應擔負的工作，較之其他國民應該擔負的工作，尤爲迫切而重要」，毛根據這種分析得出結論說：

「上海的商人起來了，而且行動了，我們希望天津北京兩地的商人齊起來，和上海的商人取一致革命行動。商人團結越廣、聲勢越壯，領導全國國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見1923年7月11日出版的《嚮導》重點是我所加）。

毛上面的結論，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託於「商人」（資產階級）「領導全國國民（即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力量」，無須解釋，這是一種最卑下的孟什維主義的立場。

陳獨秀接到共產國際1923年1月12日正式通過中共加入國民黨的決議後，差不多同時，由於1923年2月7日所發生的「二七慘案」，北方鐵路工人運動遭到極沉重的打擊，他便開始改變了他原來的反對與資產階級聯合的立場，首先在嚮導周報上發表題為《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的文章。在該文中，除指出：「和革命資產階級合作，是中國無產階級目前必由之路」（如伊羅生所指出的）。隨後，他在1923年12月出版的《前鋒》月刊發表「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在該文中，他有系統地分析了各階級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地位和作用，認為資產階級在各方面都處於優勢，而工人階級既數量不大，而又貧窮，缺乏知識，不可能領導國民革命，何況國民革命的性質又是資產階級的。所以，工人階級必須與資產階級合作，才能完成反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國民革命。

陳獨秀強調工人階級既數量不大，而又貧窮，缺乏知識，以此說明「工人階級不能領導革命，必須與資產階級合作，才能完成……國民革命。」這與毛澤東強調「商人」最能「敏銳迫切感覺痛苦」，因而能夠「領導全國國民的力量」，加速「革命的成功」，是同一孟什維克思想的兩種表現。

另一新選出的中央委員瞿秋白，於1923年12月，即在國民黨改組的前夕，寫了題為《國民黨改造與中國革命運動》（發表於1923年12月19日出版的《嚮導》）。他在該文中對國民黨及其改組作了如下的評價和期望：

「辛亥（1911年）革命造成中華民國的是國民黨，歷年以來任勞任怨，為平民爭權利，反對北洋軍閥的，也只有國民黨，……(1)從此平民的政治運動與軍事的革命行動並進；(2)從此組織群眾的民主式的真正政黨，肅清腐敗分子；(3)從此實行嚴格的紀律，作全國有組織有系統的運動，處處時時代表平民而反對軍閥和列強。」

瞿對國民黨的「革命功績」和它行將改組的「遠大前途」，作了如上的推崇和期望之後，他最後大聲疾呼：

「全國的平民啊！……聯合起來……趕緊組織國民黨，集中我們的政治勢力……現在的國民黨，便是我們集中勢力、運用勢力的中心。我們若要脫離列強和軍閥的壓迫，自己建設真正的平民共和國，真正的獨立國家……必定第一步先要組織平民的政黨——我們自己的國民黨……必須我們自己參加，商人（即資產階級——彭）農民、工人、學生、教育界，凡是平民都應當為我們的將……而奮鬥……快加入國民黨罷！」

（着重點為引者所加）

瞿秋白上面對國民黨的無比推崇和稀奇幻想，除了將毛澤東和陳獨秀對資產階級的推崇和幻想加以具體化和實踐外，還表現了他自己特有的小資產階級的卑賤心理和投機幻想，但瞿對國民黨所表示的基本立場，並不是他個人的，而是當時中共領導的共同傾向，瞿的文章在黨的機關報上公開發表便是明證。

既然國民黨「是我們平民自己的」黨，「現在國民黨是集中

勢力，運用勢力的中心」，通過這個「中心」能夠「脫離列強（即帝國主義——彭）和軍閥的壓迫」，「建設真正的平民共和國」，其邏輯的結論便是「一切工作歸國民黨」，事實正是如此！

自第三次大會後，中共中央即命令一切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加入國民黨，動員一切幹部去改組國民黨或重新組織國民黨，參加國民黨黨部的各種工作。例如，中央常務委員兼組織部書記的毛澤東，便把全部時間放在上海國民黨執行部的宣傳工作上，而完全放棄了自己黨的組織工作。另一中央委員譚平山，則專為國民黨的中央組織部服務。其他各省市，如湖南、湖北、四川、北京和天津等的幹部都用全力重新組織國民黨，直接擔任該黨的工作。最突出的是：以前專門負責工人運動的重要幹部，如李立三、項英、鄧中夏等都離開了原來的工作崗位，到國民黨進行「改組」工作去了。於是共產黨的組織工作停頓了，工人運動被放棄了，甚至連領導工人運動的「勞動組合書記部」也無形取消了！

另一方面，蘇聯共產黨於1923年秋派遣鮑羅庭（MIKHAIL BORODIN）到廣州，擔任孫中山的顧問，幫助國民黨實行改組。鮑羅庭將蘇聯共產黨的黨制介紹給了國民黨，企圖把國民黨組織成爲「集中勢力，運用勢力的中心」，「實行嚴格的紀律」的黨。他並替國民黨起草政治綱領，以改良主義的抽象辭句，如「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等裝飾着代表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的反動實質。於是，國民黨在1924年1月召開了第一次改組大會，通過了鮑羅庭起草的政綱和他建議的黨制。大會並選舉了共黨的領導份子爲中央委員（李大釗、譚平山、林伯渠）和候補中央委員（瞿秋白、毛澤東、張國燾等）。這樣，原來十分腐敗和渙散的國民黨，在蘇共代表鮑羅庭的幫助，和中共黨員的充實之下，便裝璜得面貌一新，而變成瞿秋白所期望的「我們平民自己的黨」了！

1924年春，蘇聯又派加倫將軍（GALEN 原名VASSILY BLUCHER）到廣州，任國民黨的軍事顧問，帶着大批軍事專家和武器，幫助國民黨改組軍隊，並把蘇聯紅軍的政治委員制介紹給了國民黨的軍隊，他首先幫助蔣介石建立黃埔軍校，訓練軍事幹部，準備建立新軍。這便是蔣後來發展的基礎。於是，國民黨不但在政治上已被「武裝」起來，而且在軍事方面也重新武裝了。

但國民黨的老幹部認為「聯合蘇俄，容納共黨」的政策，有害於國民黨，他們宣稱：「自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其所宣傳打倒英、美、法、日等帝國主義，其作用係在破壞國民黨在國際之好感，……打倒軍閥，係打破國民黨與國內各實力派（即各派軍閥）之合作，其計劃係在消滅國民黨」（見當時張繼等的《護黨宣言》）。孫中山對他的老幹部作了如下的解釋和安撫：

「中國的革命從來不受外國列強的歡迎。他們常常幫助我們的反對者（指軍閥），企圖摧毀我們的黨，同情只能希望來自俄國人。幫助我們的不是陳獨秀，而是俄國人。假使俄國人要和中國合作，那她一定是和我們的黨合作，而不是和陳獨秀合作。陳如不服從我們的黨，他會被排除的。」

（《中國共產主義文件史》73頁）

孫中山前面的解釋十分明顯：他所需要的是俄國的「同情」，即蘇俄的實際援助（軍火與金錢），至於陳獨秀的共產黨可以隨時排除的。這便給了蔣介石和汪精衛後來清除共黨的一個預示。

孫爲了緩和自己黨內的反對派，並企圖進一步控制共黨，他於1924年8月召開了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全體會議，除重申容納共黨外，則提議共產國際給中央的一切決議和訓令須交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審查。出席這次會議的瞿秋白對孫的提議表示同意，僅申明須向中共中央請示。

(三) 中共向左轉——轉向工人階級

當我於1924年8月從莫斯科回到上海時，蔡和森（中共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兼黨的機關報响導主編），把孫中山要求共產國際給中共的決議和訓令須交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審查一事告訴我，並徵求我的意見。我問他：「中央是否已接受孫的要求？」蔡說：「中央正在考慮中。」我堅決表示，「中央必須拒絕孫的要求，否則，我們的黨便成了國民黨的附屬品」。蔡和陳獨秀（當時留在上海的中常委僅陳蔡兩人）商議的結果是：急電瞿秋白，令其拒絕孫中山的提議。^{*}這是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態度的轉捩點。

隨後，我正式向中央常務委員會提出三項建議：(1)對國民黨的政策和行動必須採取批評態度；(2)重新整頓各地方黨組織，儘速從莫斯科東方勞動共產主義大學調回同志，擔任各地方的黨組織和工人運動的工作；(3)成立工人運動委員會，計劃和領導全國的工人運動。這三項建議，均為中常委所採納，並即時指定李立三、項英、李啓漢和我成立工人運動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立即在滬西小沙渡創辦工人夜校和工人俱樂部。這便替來年二月日本紗廠的大罷工準備了基礎。

^{*} 瞿收到中央電報令其拒絕孫的「提議」，極為反感，因此，他不願回上海，躲在廣州跟鮑羅庭作翻譯，直到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大會後才回來。他認為中央拒絕孫的「提議」是錯誤的。他尤其認為中央拒絕孫的「提議」，是受了彭述之的影響，所以他後來說：「當時（1924年8月）彭述之雖非中央委員，然而已坐在中央了」（見瞿著「中國革命之爭論問題」一六五頁）。這就是說，「彭述之雖非中央委員」，「已坐在中央」主張「拒絕孫的提議」了。

乘着十月革命第七周年的紀念，我寫了題名為《十月革命與列寧主義》一文（發表於1924年11月7日出版的《响導周刊》），在闡述了十月革命的偉大成就之後，我指出：「列寧主義是我們的武器，十月革命是我們的大道。我們來練習我們的武器——列寧主義，我們來走向我們的大道——十月革命」，這就是說，中國的國民革命，將依照列寧主義的政策追隨着十月革命的道路，不斷地走向社會主義的革命。差不多同時，對於國民革命由那一個階級來領導的問題，我和陳獨秀作了一次嚴肅的討論，在討論中，陳雖然還在維持他的資產階級領導國民革命的觀點，但他的態度已趨緩和。恰在此時，中共中央指定我主編《新青年》季刊（黨的理論雜誌）。我計劃出版《國民革命專號》（預定於1924年12月出版），除了選擇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通過的關於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決議案和列寧的演說外，我寫了一篇題為《誰是國民革命之領導者》。我並將該文原稿交給陳獨秀，請他看過後，寫一篇同類性質的文章，意思是，他如不同意我的觀點，他可以批評我的文章，進行公開討論。

我的文章，實際上是針對陳獨秀的《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一文寫的。在分析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物質利益及其相互關係之後，我指出，資產階級，由於它和本國軍閥及外國帝國主義之間的依存關係，絕不可能領導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國民革命，而且由於對無產階級的恐懼，資產階級不可避免地要變成反動的。我得出的結論是：

「在分析了各階級的關係之後，我們現在可以斷定，在物質的基礎上，在革命的覺悟上，在世界革命的環境上，以及中國各社會階級的利益和趨勢上，只有工人階級配作領導者，也只有它能作領導者」（見1924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

國民革命專號》第3—14頁，重點爲引者所加)。

陳獨秀寫了題名爲《二十七年以來國民運動所得教訓》，他在該文中寫出的結論是：「只有無產階級是最不妥協的階級……」[「只有它領導才能夠達到國民革命之真正目的——勝利」(着重點爲引者所加的)。這表明了他已放棄資產階級領導國民革命的觀點。於是，對於那一個階級來領導國民革命這個基本原則的問題，我們已達到了一致的立場。

中國共產黨於1925年1月舉行了第四次全國大會，特別把無產階級領導革命的觀念寫進決議案中。並製訂了恢復和發展全國工人運動的計劃，首先是召開全國鐵路總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以此恢復北方的鐵路工人運動，並準備召集第二次全國勞動代表大會，統一全國的工人運動。如果把中共第四次大會和它的第三次大會加以對照，便可明白地看出：在第三次大會的宣言中，中共公開承認代表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爲「國民革命的領導」，「一切工作歸國民黨」，從而完全放棄了工人運動。這次大會則正式決議無產階級是國民革命的領袖，將一切工作集中於發展工人運動，這便標誌了中共又轉到布爾什維維主義的方向，替中國第二次革命準備了條件。

第二次全國鐵路總工會的會議，於1925年2月7日(即1923年2月7日的慘殺的第二周年紀念日)舉行於河南鄭州(第一次會議被封閉的地點)，出席會議的代表四十五人，代表十二條鐵路的分工會。會議通過了工人的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利的決議，這對於往後鐵路工人的鬥爭起了鉅大的推動作用。

差不多和鐵路總工會開會同時，上海的日本紗廠發生了大罷工，捲入這次罷工潮的達七萬餘人。這是在滬西「工人俱樂部」的指導下發動和推進的。這次罷工得到了很大的勝利，除了增加

工資，改善工作條件，便是合法成立工會的權利。這是上海工人運動史上的第一次大成就。

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於1925年「五一節」召開於廣州，出席代表二百八十一人，代表一百六十六個工會，會員共五十七萬人。這次大會除了通過有關工人的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利的決議外，便是特別指出，工人階級必須參加民族民主的解放鬥爭，並成爲這一鬥爭的領導力量。於是，工人階級領導國民革命的思想，經過全國勞動大會的決議開始傳播到工人群眾中去了。

正在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開完後，上海日本紗廠的工人又舉行了第二次罷工。這是日本資本家實行反攻報復所激起的。他們首先禁止工會活動，跟着即用流血鎮壓手段，於五月十五日打死工人領袖顧正紅。這便立刻激起了學生和工人群眾的抗議，遊行示威，街頭演講反對帝國主義。這種反帝運動在五月三十日達到了高潮，數千學生和工人群集於南京路老關捕房（即南京路警察局），要求釋放被捕的示威者，英國巡捕即舉槍射擊，當場死傷者數十人。這就是震動全中國的「五卅慘案」，由此開啓了第二次中國革命的序幕。（托洛茨基在《論中國》這本書中的第一篇文章《莫斯科精神》就是反應了「五卅慘案」這個大事變的。）

(四)革命的興起——中共與共產國際政策的衝突

五卅事件的爆發，立刻激起了全上海的學生、工人和商人的罷課、罷工和罷市，形成了「全民」反帝國主義的怒潮。在這個怒潮當中，中國共產黨動員了全體黨員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領導學生組成上海學生聯合會；同時以日本紗廠工會爲基礎，不到一星期成立了上海總工會。這個總工會便是往後領導上海工人運動的總指揮部。

在上海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強大影响下，各大城市，如南京、武漢和北京等的學生、工人和一般市民亦群起響應。罷課、罷工、示威遊行，形成了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洪流。最後是廣州學生和全體工人群眾，為抗議英帝國主義在上海的屠殺，於六月二十三日舉行示威遊行。當遊行隊伍沿着沙基路進行，接近帝國主義的租界沙面時，英法軍警即以機關槍向遊行群眾掃射，當場死者五十七人，受傷者一百一十七人，這便是著名的「沙基慘案」。

香港工人階級看到英國帝國主義在廣州的屠殺行爲，立即舉行總罷工，並撤離香港到廣州，和廣州工人成立了「省港罷工委員會」，成為華南反帝國主義的堡壘，實行封鎖香港，這便給英帝國主義以最沉重的打擊。

當資產階級親眼看到上海、香港及廣州的工人，在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中，表現了無比英勇、犧牲精神和領導力量時，尤其是看到共產黨人在工人運動中起着領導作用時，他們大起恐慌，急圖和帝國主義者妥協，停止運動。首先是代表大資產階級的上海總商會公然出而修改「工、商（中小商人）學聯合會」對帝國主義所提出的條件，繼則下令商人停止罷市，最後則使用各種陰謀手段，破壞罷工。資產階級從經驗中深刻感到，他們和工人階級的利害衝突，遠超過了和帝國主義的衝突，於是，資產階級反對工人的鬥爭，被提到了第一位。這種情勢反映到代表資產階級的國民黨中，便形成了反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鬥爭。國民黨的思想領袖，戴季陶，於1925年7月發表的《孫文主義的基礎》強調「民族利益和統一」，反對階級鬥爭，特別是反對共產黨所領導的工人階級的鬥爭。這便無誤地反映了資產階級的意識和願望。隨着戴季陶《孫文主義的基礎》的發表，蔣介石立刻組織「孫文主義學會」，起初在黃埔軍校和他直接指揮的軍隊，隨後

遍及各地，專以反共爲能事。

上海的資產階級看到國民黨的領袖「理論家」戴季陶公開反對階級鬥爭，反對共產黨，於是更積極聯合當地軍閥，實行鎮壓政策，於1925年9月20日封閉了上海總工會，希圖以此消滅工人階級的鬥爭。但上海總工會並未因爲被封閉而停止工人運動，它不過從公開的領導轉到地下的領導而已。

我爲上海總工會被封，寫了題名爲《上海總工會被封與上海工人今後的責任》一文（刊在1925年10月5日出版的《嚮導》上），根據工人階級在五卅運動中所起的領導作用我在該文中指出：

「我們曾屢次說過，要想把中國民族從帝國主義及其工具——封建軍閥的枷鎖下解放出來，換句話說，要想達到國民革命的成功，只有中國的工人階級起來奮鬥，起來作領導，才有可能。

「上海是中國最大工業區，有如俄羅斯的彼得格勒，俄羅斯的二月革命，以至十月革命，都是在彼得格勒工人領導下進行的。」我最後的結論是：

「上海數十萬工人在此次五卅運動中，在上海總工會指導之下，已經學到了許多的經驗，許多革命的初步方法。將來再進一步，就要走上武裝暴動的道路，走上武裝革命的道路，就要學彼得格勒工人的榜樣，由二月革命而至十月革命的。」（着重點爲引者所加）

我這裏只需指出一點，我上面根據五卅運動的經驗，指出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的決定作用及其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前景，和共產國際的政策是根本相反的。

陳獨秀在五卅運動中，親自看到工人階級所扮演的領導角色，他深刻地感到共產黨必須以工人階級爲基礎，因而他在《嚮導

周報》上公開號召工人加入共產黨。這便是從根本改變了瞿秋白號召工人和商人學生等加入「我們的平民的國民黨」的宣傳。

當陳獨秀批評戴季陶的《孫文主義的基礎》時（見陳《給戴季陶的一封信》登載於1925年9月11日出版的《嚮導》），雖然有力地駁斥了後者的反階級鬥爭的論據，但由於「國共合作」政策的束縛，他不能公開批評孫中山的反階級鬥爭的反動思想，同時，看到孫文主義學會的一份子，夥同國民黨右派，到處進行反共活動，……這一切使得他相信，共產黨留在國民黨內，只有束縛自己領導群眾的獨立政策。因此，他在1925年10月舉行的中共中央全會上正式提出了共產黨退出國民黨，改為黨外合作的建議。但國際代表認為，中共當前的迫切任務在於：乘着國民黨行將召開的第二次大會，推動整個國民黨的左傾，以期順利地領導正在興起的國民革命運動。陳獨秀主張退出國民黨的建議就這樣地被否決了！這是中共和共產國際對「國共合作」政策公開發生衝突的第一次。

國民黨第二次全國大會於1926年1月召開於廣州。大會發表了空洞的把革命進行到底的宣言。「左派領袖」汪精衛在他的演說中，裝腔作勢地表示了他對革命事業與共產黨合作的忠誠。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選舉中增加了大批國民黨左派分子和共產黨人，排除了一些右派分子，蔣介石則以「左派領導」的資格，第一次被選為中央委員。新選的中央黨部、組織部和農民部的部長均為共產黨人。其他的，如宣傳部、工人部、青年部、婦女部等的秘書長亦屬於共產黨。毛澤東便是以汪精衛為部長的宣傳部的主要秘書。這樣一來，「整個國民黨」是「左傾」了，共產黨人在國民黨中央黨部佔據了「領導地位」。可是，不到兩個月，這個「左傾的國民黨」，在輕輕的一擊之下便塌台了！這一擊就是

蔣介石1926年3月20日的政變。

蔣介石反共的「3·20政變」，完全是在他所指使的孫文主義學會分子有計劃地陰謀策動的。所以，政變的當日即逮捕了在他直接控制的軍隊中作政治工作的共產黨員五十餘人，同時解除了省港罷工委員會糾察隊和蘇俄顧問團衛隊的武裝，趕走了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成立了他個人的軍事獨裁。

中共中央面對着這個突如其來的襲擊，希望從莫斯科得到指導來決定對蔣的政策。但等了三個星期，還沒有任何消息（因斯大林正陷於驚慌錯亂，在觀望事變的發展），於是只好自行決定對付蔣的政策。這個政策的要點是：聯合國民黨左派及其軍事力量以對抗蔣介石，擴充共產黨員葉挺所率領的一團軍隊（近三千人）；盡量武裝工農，以為革命的基本力量，並指派我去廣州組織特別委員會（特委包括中委譚平山、張國燾和廣東省委陳延年、周恩來、張太雷），和國際代表鮑羅廷商討對付蔣的具體辦法。

我於1925年4月末抵達廣州，鮑羅廷亦同時從蘇聯帶着斯大林的訓令回到那裏。我立即召集特別委員會會議，邀請鮑羅廷出席。當我報告中共中央對蔣的決議後，鮑羅廷強調「當前局勢異常危險」，以此為理由拒絕討論中共中央的決議。當我提出共產黨黨員退出國民黨改為黨外合作時，鮑羅廷又借口「退出國民黨的問題，必須徵詢國民黨左派的同意」。總而言之，鮑羅廷根據斯大林的訓令，不管蔣介石在三月政變所造成的後果如何嚴重，「國共合作」的政策必須繼續維持。他公然建議，中共必須接受三月政變所形成的現狀，即：承認蔣的軍事獨裁，接受他的「黨務整理案」*，幫助他領導北伐。他安慰同志們說：「將來北伐的進展，會對於我們有利的」。鮑羅廷的建議，除我一人反

對外，特委的成員都表示贊同。於是，中共中央對抗蔣介石的政策被鮑羅庭轉變為對蔣的投降政策。這便替他的下一次政變鋪平了道路。這是導致中國第二次革命走向失敗道路的轉折點。

對共產國際這種可耻的投降政策，陳獨秀和我都感到局勢十分危險，但又無法公開反對，我們於無可如何之中，只有召開中央委員會全會來討論，試圖挽回危局。中委會全體會議舉行於1926年7月中旬，正當蔣介石就職北伐軍總司令，宣佈動員北伐後一星期，情勢顯得更為緊張而嚴重。陳獨秀和我向全會提出了一個建議案：「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改為黨外合作，與國民黨左派建立聯合陣綫」，我們並聲明，只有脫離國民黨的束縛，共產黨才有可能實行領導工農群眾的獨立政策。以瞿秋白為首的多數中央委員，在國際代表的壓力之下，不敢接受我們的建議，但同意將我們的建議呈交共產國際去考慮。共產國際不但拒絕考慮，布哈林反而在真理報發表文章，公開指責中共退出國民黨的主張，同蘇共反對派主張退出英俄委員會，是同樣的錯誤。但托洛茨基後來說「我們必須承認中國共產黨中央六月全體會議的決議是絕對正確的，它要求黨退出國民黨，經過國民黨左派與國民黨締結同盟」。(見1927年4月3日托洛茨基寫的「中國革命的階級關係」)*

* 蔣介石的「整理黨務案」的基本點是：共產黨人不得批評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共產黨人不得擔任國民黨的中央黨部的部長職位；各地方黨委員會的委員，共產黨人不得佔有三分之一，中共須將其加入了國民黨的黨員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的名單，交給國民黨中央黨部保存。

* 托洛茨基所指的「中共中央六月全會的決議」，就是中共中央七月全會同意呈交共產國際去考慮的陳獨秀和彭述之起草的那個建議。

(五) 在共產國際的「國共合作」政策下， 中共陷進了死巷

陳獨秀和彭述之所提出的「共產黨退出國民黨，改爲黨外合作，與國民黨左派建立聯合陣綫」——這一「無條件正確的」建議既被共產國際最後否決，從此以後，中共就只能在「國共合作」政策這條繩索的束縛下行動，這便是1926年7月到1927年3月這一革命潮流高漲時期中共所遭遇的困擾和矛盾情形。

在這種情形下，中共既被剝奪了批評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幻想和蔣介石的反革命行爲，更不容許提出土地革命號召農民奪取土地的鬥爭，以及組織工農兵蘇維埃，團結兵士到革命的隊伍來。因爲這一切都是違反共產國際所規定的「國共合作」政策的。共產國際交給中共去做的只是「以全力動員工農群眾支援北伐軍作戰」。

中國共產黨確實以全力動員了工農群眾支援北伐軍反對北洋軍閥的戰爭，動員了一切黨員和青年團員在各戰綫上宣傳反對北方軍閥，鼓勵北伐軍作戰，並領導了工人和農民組織各種各式的別動隊伍，擔任偵察、間諜和响導，在敵軍後方破壞一切交通（如鐵路、電綫和船舶等），當敵軍潰退時解除他們的武裝等等。在國民革命軍中，有幾打共產黨員擔任連長、營長和團長的軍職，他們都不顧生死，英勇作戰，他們當中有幾個在戰鬥中犧牲了。所以不到四個月（1926年7月到1926年10月），沒有經過多少嚴重的戰鬥，西路北伐軍（經過湖南）即達到長江沿岸，佔領了中國中部的工商業中心——武漢。蔣介石直接指揮的中路軍，亦於1926年11月佔領了江西省會南昌，東路軍經過福建省，於1927年2月佔領了浙江省會杭州。所有這些

飛速的驚人的勝利，都是在共產黨人動員廣大工農群眾的積極支援和一部份共產黨員直接參加戰鬥的英勇犧牲之下取得的。

當工農群眾動員起來幫助北伐軍作戰時，尤其當戰爭獲得勝利時，他們自然地迅速組織了自己的工會和農民協會。單以湖南說，在短短的幾個月中（即到1927年3月），組織起來的農民協會已包括四百餘萬會員。湖南總工會屬下的會員五十餘萬人。當1926年10月北伐軍佔領武漢後，三十餘萬工人，在共產黨人的協助之下迅速地成立了湖北總工會，湖北的農民運動亦飛速的發展。差不多同時，上海的工人階級，在北伐軍勝利的鼓舞之下，從1926年末起，即由經濟的罷工轉為政治的罷工與遊行示威，並開始準備武裝暴動。另一方面，漢口和九江的工人群眾，於1927年1月初自發地奪取了英帝國主義控制的這兩個城市的租界，總而言之，自北伐軍進抵長江流域後，湖南湖北的工農群眾運動，如有怒潮澎湃，把整個社會生活翻騰起來了。工人們由改善生活及工作條件的罷工走到了侵犯私有財產制的邊緣，並直接奪取了帝國主義的租界。農民們，尤其是湖南的農民，由減租減息的鬥爭，直接轉到了驅逐地主豪紳、圍佔土地的革命行動。多數的農民協會，在事實上成了鄉村的統治機關。這表明革命的進潮已達到了新的高點。

但代表反革命的蔣介石，也以同樣的速度進行其反革命活動。一方面，他回過頭來鎮壓那些曾經支援北伐軍作戰因而取得勝利的工農群眾，封閉工會，禁止農民協會，謀殺工農的領袖，他甚至解散同情工農運動的國民黨左派的省黨部（如在江西省），另行組織他自己的國民黨；另一方面，他和日帝國主義卵翼的奉系軍閥進行談判，試圖建立「反赤聯合戰綫」。在上海，蔣介石的黨徒結合一切反動政客（如黃郛、郭泰祺等）和流氓頭子（如黃

金榮、杜月笙等），通過他們和上海租界帝國主義實行勾結，陰謀策劃對付工人群眾和共產黨，這種情勢，到1927年3月初已表明得有如水晶一樣明澈。所以我寫了《目前革命右傾的危險》一文（發表於1927年3月6日出版的《响導》），描述了當時這種十分危險的局勢。該文首先指出：

「中國革命的全部局面已很明顯地表現出來：一方面，革命勢力，特別是革命軍和工農群眾的勢力特別發展，革命的潮流愈加普遍而深入了，從廣大的城市到荒僻的鄉村，都充滿了革命的空氣和革命的鬥爭」。「但另一方面，却發生了一種革命右傾的現象，即在革命的隊伍中發生了一種妥協，甚至反動的傾向。這種妥協和反動的傾向……已公開地或秘密地企圖與敵人妥協，反對民衆的利益，反對真正爲民衆利益而鬥爭的革命者。總而言之，這種妥協，甚至反動的傾向，企圖終止革命的進行。企圖毀壞革命已達到的成績，……這是目前革命中極危險的現象，足以毀壞全部革命而有餘。」（着重點爲引者所加）

除了上面所指出的一般局勢的嚴重危險外，我並具體地揭露了國民黨內蔣介石所代表的「溫和派」的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傾向（當時北方的奉系軍閥和帝國主義都稱蔣派爲國民黨中的「溫和派」和「穩健派」）：

現時國民黨內的所謂穩健派，便完全表現其資產階級的傾向，他們已經看到工人農民起來不僅是爲一般的革命利益鬥爭，而且爲自己階級的利益鬥爭。他們已經看見敵人帝國主義軍閥向他們表示讓步。於是便想停止革命的進行，企圖抑制急進的革命分子，抑制工農的利益。」（着重點爲引者所加）

蔣介石集團既已團結一切反革命勢力，積極準備打擊工農群眾和

共產黨，而且事實上已在江西和安徽許多地方鎮壓工農和共產黨人。面對着這種異常危急的局勢，中國共產黨應當採取什麼對策呢？除了實行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建立革命的專政外，沒有其他的道路，中共那時已正在上海準備武裝暴動，對這方面，因其有關機密，我不能提出公開討論。但對於暴動勝利後應該成立的新政權，我作了如下的建議：

「中國革命應當創立一個革命的民主制，而絕不應造成個人的軍事獨裁。……目前革命已經很迫切地需要一個革命的民主獨裁政治，廣大的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直接參加政權、支配政權的民主政治，打擊一切反革命派，並對一切反革命派施行獨裁的政治。」（着重點為引者所加）

我上面對當時革命危機的分析，是集中揭露國民黨內蔣介石集團所代表的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傾向和圖謀，我在1927年3月18日又發表了《讀蔣介石二月二十一日之演講以後》（刊載於1927年3月18日的《响導》）。在這篇文章中，我更具體地揭露了蔣的反革命行為的事實，包括他的「三月二十日政變」，他個人的軍事獨裁，他團結一切反動勢力與帝國主義勾結，以及鎮壓工農群眾運動和迫害共產黨人等。最後提出了如下的嚴重警告：「中國將來的鬥爭，便是這種革命勢力與反革命勢力的決死戰。」我所提出的革命民主專政，主要的目標是在對蔣所代表的資產階級的專政，因而把資產階級排除於這個新政權之外。

但共產國際對當時中國革命局勢的看法如何呢？它對蔣介石所領導的北伐軍及其廣州國民政府怎樣估計？這裡只須從斯大林在共產國際第七次執委全會上（舉行於1926年11月至12月）的演說（題名為「中國革命的前途」）中摘引兩段話來看一下就夠明白了。

斯大林提到蔣介石領導的北伐軍時宣稱：「廣東軍隊的推進就是對帝國主義的打擊，對其中國走狗的打擊，就是一般地給中國一切革命分子特別是給工人以集會自由、罷工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中國革命軍隊的特點和極重要的意義就在這裏。」（見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八卷三二五頁）事實上，蔣介石直接指揮的北伐軍一開始就嚴厲地限制集會和出版的自由，特別是禁止工人罷工。他領導的「軍隊的推進」，絕不是「對帝國主義的打擊」，而是爭取和帝國主義妥協的有利地位。

當斯大林談到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時，更是強調：「問題不僅在於廣東政權（未來全中國革命政權的萌芽）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而首先在於這個政權是並且不會不是反帝國主義的政權，這個政權的每一進展都是對世界帝國主義的打擊，因而也是有利於世界革命運動的打擊。」（同上三二七頁）斯大林上面所說的恰好和事實相反。「廣東政府是未來全中國反革命政權的萌芽」，「這個政權的每一進展都是對世界革命的打擊。因而也是有利於世界帝國主義的鼓舞」。

共產國際第七次執委全會對中國革命所採取的政策，便是根據斯大林對蔣介石的北伐軍及其國民政府所表示的態度而製訂的。所以這次全會邀請了蔣的私人代表邵力子參加，承認了他的國民黨為「同情黨」，決定了中共參加他的國民政府，以此保證蔣所領導的北伐軍能夠徹底摧毀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代理人——軍閥，完成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在這種「完滿的計劃」下，中共當然談不到對蔣介石的任何反革命行爲和陰謀採取有效的抵抗，更不用說準備自己的實力來推倒他了。中國共產黨就這樣一步一步地陷進了死巷而不能自拔。

所以當中共於1927年3月21日領導上海工人武裝起義

，摧毀了北方軍閥的統治，佔領了上海市（除租界外），組織了工人武裝糾察隊維持治安，但不能成立一個以工人階級為中心的革命政權，實行對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專政，特別是抵抗和摧毀蔣介石匪幫的陰謀政變。因為這樣做將破壞「國共合作」，將阻礙「四個階級的聯合」陣綫，特別將妨害蔣介石領導的北伐事業。雖然中共奪取了上海，得到了全體工人階級和絕大部份下層小資產階級的支持以及一部份士兵的同情，但為了遵守共產國際訂下的「四個階級的聯合政府」的政策，不得不和資產階級成立上海臨時政府。「被選」參加臨時政府的資產階級的代表們，在蔣介石的指示之下，以怠工抵制的手段，使得臨時政府完全陷於癱瘓而一無所為，以等待蔣介石的下一行動——政變。

中共在這種情勢下，陷於異常狼狽和進退維谷的絕境。那時留在上海的中央常務委員只有陳獨秀和我，因瞿秋白（中央常委之一）在工人暴動勝利三四天後，沒有得中央常委會的許可，即跑到武漢去了。*陳獨秀和我曾數度商討如何打破這個陷於死巷的僵局，我們一致認為：除大量武裝工人和聯合國民革命軍中同

* 瞿秋白私自去武漢，其目的在組織小組排除我和陳獨秀，攫取黨的領導權。因他一貫擁護共產國際的政策，特別是擁護斯大林的革命階段論，反對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他那時寫了一個小冊子，名為《中國革命之爭論問題》，專門攻擊我，特別攻擊我的不斷革命的思想，因為我在紀念列寧逝世第三週年，寫了題名為《列寧主義是否適合於中國的國情》（刊登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廿一日的《响導》上），在該文中，我分析了中國的社會經濟和階級關係與俄國十月革命前的情形大致相同，列寧主義可以完全適用於中國，因此我提出了不斷革命的口號，指出：中國革命將由國民革命直接發展到無產階級革命。瞿指責這是「托洛茨基主義的複寫」，以討好斯大林。

情工人的軍隊，實行以武力摧毀蔣介石的陰謀政變計劃（那時蔣的政變計劃已路人皆知，只有莫斯科還在否認），沒有其他的出路。但我們這個武裝反蔣的計劃却碰到了一個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關係的根本問題——紀律問題，因為這樣做，便等於根本違反共產國際第七次執委全會，對蔣介石及其國民黨的政策，也就是等於和共產國際決裂。在這個問題上，陳獨秀表示十分猶豫，我當時亦不敢堅決主張。因此，我們請上海區委書記羅亦農和當時指揮上海武裝暴動的周恩來商討這一難題。他們完全同意我們的意見：除了實行武力反蔣外，沒有別的出路。但他們和陳獨秀一樣，認為違背國際的政策是行不通的。在這種極端矛盾的情況下，陳獨秀請我去武漢，和那裏的國際代表及多數中委商討這個武力反蔣的嚴重問題，再作最後決定。

我於1927年3月底離開上海到南京，因為那裏駐扎着國民革命軍的第二軍和第六軍，這兩個軍隊在當時還站在國民黨左派方面反對蔣介石，這兩軍的政治部主任都是共產黨員，還有大批共產黨員在這兩軍中擔任政治和軍事工作。所以我到南京後立即召集所有在第二和第六軍中擔任政治和軍事工作的幹部，以及俄國顧問，舉行緊急會議。我報告了蔣介石正在準備反共政變和中共中央主張以武力反蔣的計劃。討論的結果，大家一致贊成中央的主張，尤其是俄國顧問，根據當時駐扎在上海、南京和無錫等地的軍隊的分析，認為以軍事力量對付蔣介石，可以得到勝利，因而他們要求我代表中央下令實行反蔣的軍事行動。我告訴他們，實行武力反蔣，和莫斯科對蔣的政策大相抵觸，為此，中央派我到武漢去和那裏的國際代表及中央委員商討這一問題，他們催我盡快去武漢，他們等候回音。

因為在南京耽擱了幾天，我於1927年4月11日才抵達武漢，

但第二天（4月12日），蔣介石的政變已在上海發動了！成千的工人戰士和共產黨人倒臥在血泊中，工人的組織，（工會）被摧毀了，共產黨人成了反動派獵獲的對象，整個上海和東南部的工業區都落在蔣的魔掌中去了。這便是斯大林的國共合作政策，他的無條件地支援蔣指揮北伐，他對蔣的一切反革命行爲的掩飾和辯護，以及對蔣的美麗前景——打倒帝國主義及其在華的代理人軍閥，完成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的最後報酬！

（六）從蔣介石到汪精衛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大會是在蔣介石政變兩星期後舉行的（1927年4月27日至5月初），照理應當把蔣的政變提到第一項議事日程上，給它以徹底的檢討，從中得出教訓，以便重新確定中共往後的政治方針，但共產國際的首席代表魯易（M. N. ROY）對大會的第一個報告，根本沒有提到蔣的政變，只是抽象地強調「國民黨內部的階級分化，已加強了它的左派和共產黨的聯結。大資產階級的脫離已容許國民黨轉變為工業無產階級，農民和小資階級的革命聯合。（加上資產階級某些層份）……中國革命將在這個聯合的基礎上繼續發展，但還不認為是無產階級唯一的領導。參加這次開幕會議的國民黨領袖們已經宣佈他們準備增強和共產黨的聯合」（見伊羅生的「中國革命悲劇」英文本第二版218頁）。如果將魯易的抽象詞句翻譯成具體的語言，就是：蔣介石的反共政變「已加強了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之間的聯結」。這樣「四個階級聯盟」仍舊，只須排除蔣所代表的一部份大資產階級；「國共合作」仍舊，只須排除蔣所代表的「國民黨右派」，而代之以汪精衛所代表的「國民黨左派」，這便是共產國際代表在蔣介石四月十二政變後，給中共第五次大會所定下

的基本方針。

我在五次大會所作的演說，乃是集中分析蔣的第一次政變（1926年3月20日）和他的第二次政變（4月12日）之間的聯繫，我指出：後一政變乃是前一政變的邏輯發展的結果。因我們的黨對蔣的第一次政變採取了極端妥協的政策，不但沒有對他採取任何抵抗行動，反而承認了他在政變後建立的個人軍事獨裁，接受了他的「整理黨務案」，並以全力支援他領導北伐，對他在北伐過程中的一切反革命行爲又盡量容忍，因而不曾採取任何有效的辦法防阻他的新政變。最後，我要求大會對蔣的政變進行徹底的討論，務必得出必須的教訓。當我的講話完結後，在休息當中，魯易向我個人說：「你對事變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但他對我要求大會討論蔣的政變却完全表示沉默。原來他已接到了共產國際的訓令及斯大林1927年4月21日在真理報上發表的「中國革命問題」的提綱。這個提綱談到過去時期的路綫時宣稱：「過去所採取的路綫是唯一正確的路綫」。既然「過去所採取的路綫是唯一正確的路綫」，當然不能容許討論過去路綫的錯誤，特別不容許討論過去錯誤路綫所造成的蔣介石的政變了。

斯大林根據過去那條「唯一正確的路綫」，作了如下的發揮

：

「蔣介石的政變表明從此以後在中國南部將有兩個陣營，兩個政府，兩個軍隊，兩個中心：武漢的革命中心和南京的反革命中心。」

「這就是說，武漢的革命的國民黨既然與軍閥制度和帝國主義作堅決鬥爭，事實上將逐漸變成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機關。」「左派和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密切合作的政策在現階段上具有特殊的力量和特殊的意義。這種合作反映

出國民黨外漸漸形成的工農聯盟，沒有這種合作，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九卷二〇三至二〇四頁，着重點爲引者所加）。

魯易的報告，特別是斯大林的提綱（如前面所指的）給中共第五次大會畫了一個圈子，因而大會所討論的問題都局限於這個圈子內，即：如何「加強國民黨左派與共產黨之間的聯結」，怎樣推進「武漢革命國民黨在事實上轉變爲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及如何鞏固「武漢的革命中心」，爲要達成這些任務，共產黨當然不可能有自己的獨立立場，一切都必須適應國民黨左派的意向。例如，對當時最最迫切而嚴重的土地問題，五次大會的決議便完全遷就了國民黨左派汪精衛的主張：「不沒收小地主和革命軍官的土地。這就等於實際上放棄了土地改革，因爲當時的「革命軍官」都是大小地主出身，或和大地主有親屬關係的。

爲要「鞏固武漢的革命中心」，五次大會正式批准派兩個共產黨員（譚平山和蘇兆徵）加入武漢的國民黨政府，擔任農業部和勞工部的部長，他們名義上是保護工農利益，實際上却是抑制工農的革命行動，即制止「國民黨左派」所宣傳的「工農過火行爲」，這便替反革命的進攻鋪平了道路。

當第五次大會舉行的一星期和大會閉幕後的兩星期，正是湖南湖北的工農群眾革命運動達到最高點的時期。同時也是反革命勢力積極準備鎮壓革命群眾運動的時候。當時武漢和長沙的工人群眾，因爲貨幣貶值，物價飛漲，生活已不堪痛苦，再加上許多工廠和商店的關閉造成了大批失業者，這就更使工人和店員無法忍受，因而他們要求接收那些關閉的工廠和商店自行營業。農民，尤其是湖南的農民，在許多地區自動驅逐地主，奪取土地；成

立「鄉民委員會」（農民蘇維埃的雛形），處理鄉政；組織武裝隊伍，直接同地主豪紳的武裝進行戰鬥。這表明工農群眾的革命運動已達到一個最危急的關頭，迫切地需要一個統一工農群眾的組織形式才能前進，這樣的「組織形式」只能是蘇維埃。另一方面，在北伐軍進行軍事活動的過程中，曾經受到工農群眾的援助和影響的士兵群眾，在反動軍官們的管制下，無法與工農群眾發生有組織的聯繫，要達成這種聯繫，也只有蘇維埃。

當時湖南湖北的工會已有一百萬以上的會員。湖南農民協會的會員近一千萬，湖北農民協會的會員亦達三百萬，這是一個巨大的有組織的群眾力量。假如中共依照當時托洛茨基的建議（詳見後面），憑藉這個龐大的群眾組織力量，號召組織工農兵蘇維埃，形成一個革命組織的中心，由蘇維埃武裝工農，實行土地革命，把土地分配給農民和革命兵士，不但可以把兩湖一切城鄉的貧苦群眾集合於蘇維埃的周圍，而且可以立刻瓦解反動軍官們的基礎，並間接地動搖蔣介石的軍隊。這樣，革命的發展將從根摧毀反革命的勢力，沿着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前進。

但異常不幸，在斯大林的「在國民黨內左派和共產黨密切地合作的政策」之下，中共不但沒有組織蘇維埃（因為這是斯大林所絕對禁止的），發動土地革命，甚至沒有向工農群眾提出警告和準備自衛的手段，如擴大工人的糾察隊，農民的武裝自衛隊，預防反革命勢力的襲擊等。那時中共的領導，却把全部希望寄託於國民黨左派的領袖汪精衛，謀求同他「密切合作」，懇求他改善工人生活，施行土地改革，而自己則盡力抑制「工農過火行爲」，如禁止工人店員接收關閉的工廠和商店，自行營業，以及農民自動奪取地主的土地等，為的是避免妨害和「國民黨左派的合作」，刺激「革命軍官」走向反動。這樣，一方面，癱瘓了工農

群眾的革命行動，另一方面，則給了那些軍官們以準備反革命進攻的充份時間。結果是夏斗寅 1927 年 5 月 17 日在湖北實行了反革命的叛亂。在夏的叛亂後第四日，許克祥（唐生智的部下）在湖南省城長沙舉行了反革命政變（這是蔣介石的四月政變的發展）。雖然，夏斗寅的叛亂被共產黨員葉挺指揮的軍隊摧毀了，但許克祥的政變，沒有遭到任何抵抗即佔領了湖南省城長沙。從此，湖南工農群眾的組織（工會和農民協會）便陷於被各個擊破的絕境中。

但中共領導對於許克祥的反革命政變採取甚麼政策呢？它的政策和以前對蔣介石的上海政變一樣，要求武漢國民黨政府派遣軍隊去懲罰許克祥，而武漢政府則請許克祥的上司唐生智去長沙調查、斟酌情形處理。唐到長沙「調查」後給武漢國民政府的報告是：「我已發現工農運動在他們的領袖的錯誤領導下，已不受管束，且造成危害人民的恐怖局面……湖南駐軍遂起而自衛……雖然許克祥的行爲乃激於正義感，但他逾越法紀的範圍，他應受記過薄懲，但他應該仍留軍職。」許克祥「應該仍留軍職」，這就是說，讓他把已經發動的反革命政變進行到底，直到摧毀一切工農群眾的組織——工會和農民協會，剷除一切共產黨人。在往後的幾個月中，許克祥確是完成了這個反革命的任務。於是，原來是華中革命力量最雄厚的湖南，從此便成爲最頑強的反革命的堡壘了。

許克祥在長沙的反革命政變後第二天（5 月 23 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召開於莫斯科，照理，這次全會必須根據長沙事變，檢討中國革命的局勢，作出必須的結論的。但這次全會對許的政變，完全同以前對蔣介石的上海政變一樣，盡力把它隱瞞起來。所以斯大林在 5 月 24 日全會上的演說中，沒有

一個字提到許克祥的反革命政變，他所着重的是攻擊托洛茨基反對派號召建立蘇維埃的主張，他說：

「反對派是否懂得現時在中國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就是造成蘇維埃和武漢政府這兩重政權，而且必不可免要提出推翻武漢政府的口號呢？」「假如中國沒有像左派國民黨這樣一個很受歡迎的革命民主組織，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是，既然有了這樣一個特殊的革命組織，適合於中國條件的特點，並已證明自己適合於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進一步發展，那末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剛剛開始，還沒有勝利，而且不會很快勝利的現在，就把這個費了多年時間才成立起來的組織加以破壞，未免太愚蠢太無知了」。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九卷272和274頁）

上面的一段話，除了暴露斯大林對當時已經反動的國民黨左派的「愚蠢」幻想外，更表明他頑固地反對建立蘇維埃的反動思想，因為他害怕蘇維埃會引到「提出推翻武漢政府的口號」哩！

那麼，斯大林對於「武漢政府」的評價究竟如何呢？下面就是他的評價：

「既然中國正經歷着土地革命，既然土地革命的勝利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是無產階級和農民革命專政的勝利，既然南京是國內反革命的中心，而武漢是中國革命運動的中心，那末，在保證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國民黨黨內和國民黨黨外的領導作用的條件下，必須支持武漢國民黨，共產黨人必須參加武漢國民黨及其革命政府。」「現在的武漢政府是不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的機關呢？不，暫時還不是，而且不會很快就成爲這樣的機關。但是在革命進一步發展時，……它是有一切機會發展成爲這樣的機關的」。

(同上斯大林全集 267 頁)

斯大林確認「武漢政府有一切機會發展成爲無產階級和農民革命專政的機關」，因而可以代替蘇維埃完成「土地革命」。他這種觀點，不須要往後的事變證明爲荒唐的幻想，即根據當時許克祥的政變所形成的反動局勢，已夠表明他完全在閉着眼睛說夢話，替革命製造最後的災禍。所以托洛茨基在那次全會上給了斯大林的災禍政策以扼要的抨擊，並直接地向中國的農民和工人呼籲：

「斯大林在此地再度宣佈他反對工農蘇維埃底建立，他的理由是：國民黨與武漢政府已經是足夠的手段與工具，爲土地革命之用了。以此，斯大林負起了，而且要國際也負起國民黨及武漢政府底政策的責任，正和他過去再三爲從前蔣介石底『國民政府』底政策負責一樣」。「我們和這個政策無共同之點。我們絲毫不要替武漢政府與國民黨領導者底政策負責。」「我們迫切地勸告共產國際拒絕負擔這個責任。我們直接對中國農民說：假使你們服從武漢領袖，不組織你們自己獨立的蘇維埃，則汪精衛一類的左派國民黨領袖，一定要出賣你們的。土地革命是一樁嚴肅的事情。汪精衛型的政客在困難情形中，將十次地與蔣介石聯合起來，反對工人和農民。在這樣的情況下，兩個共產主義者參加於資產階級政府，如果不是它準備對勞動群眾以新打擊的直接假面具，那便成爲無力的人質了。我們對中國工人們說：假使農民不由你們，革命的無產階級領導，而由小資產階級的激進派領導，那就不能把土地革命進行到底。因此，建立你們的工人蘇維埃將它們與農民蘇維埃聯合起來，由蘇維埃武裝你們自己吸引兵士代表到你們方面來，槍斃那些不承認蘇維埃的將

軍們，槍斃那些組織暴動來反對蘇維埃的官僚與資產階級自由派。只有經過農民兵士蘇維埃，才能爭取蔣底兵士底大多數到你們方面來。你們，前進的中國無產者，假使相信不到二十五萬人的領袖們的組織，小資產階級與妥協成性的領袖們的組織（指左派國民黨），能夠代替那包括成千百萬人的工農兵蘇維埃，那你們將是你們的階級與你們的歷史使命的叛徒。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如不將在蘇維埃的形式中前進而勝利，則將完全失敗。（《中國革命問題》61頁，着重點原有）

托洛茨基對於斯大林反對建立蘇維埃的抨擊和直接向中國工農所提出的綱領性的建議，假使當時被共產國際接納，送到中國執行，還有可能最後挽救革命的危機。但由於斯大林對共產國際的控制和對反對派文件的封鎖，托洛茨基向中國工農群眾的緊急號召，不但沒有達到中國，甚至沒有在共產國際的內部公報發表，因而托洛茨基挽救中國革命危機的最後建議只成了中國第二次革命悲劇的預言！

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全會既完全在斯大林的控制下，所以這次全會對中國問題所通過的決議，不過把斯大林的意見加以重複而已。例如決議說：

「共產國際執委會認為，對武漢政府估計不是的觀點，和實際上否認它的重大革命作用的觀點都是錯誤的，……武漢政府還不是無產階級與農民的專政，但是，它已走上這種專政的道路。

「無論在任何條件之下，共產黨不容許融解於別個政治組織之內，他必須成爲獨立的力量。……因此，共產黨在宣傳自己的政見時，在自己的旗幟下動員群眾時，不能爲外力

所阻。

「不過中國共產黨的獨立性，不可解釋為與無產階級勞動群眾，尤其與農民斷絕聯繫，從這一點出發，國際執委會最堅決的反對那個退出國民黨的要求，因為在目前的瞬間，無產階級的政黨正要在國民黨內確定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

前面幾段話，如果要給它們一個適當的評價，只能說是無知幻想和極端矛盾的混合物，只能引到災禍的結果。

斯大林似乎已發現「革命的國民黨左派」不很符合他的理想，尤其對於支配「武漢政府」的將軍們感到「不可靠」。於是，剛在共產國際執委會全會閉幕後，6月1日他給中國共產黨下了一道訓令。這個訓令包含五個要點，其中最突出的是：「提拔新的工農份子來代替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舊委員」，「剷除目前不可靠的將軍，武裝兩萬共產黨員，選拔五萬工農份子，創立一枝新軍」。但用甚麼辦法「選拔新的工農份子」，如何「剷除目前不可靠的將軍」，以及從何處獲得武器「創立一枝新軍」？斯大林在他的訓令中沒有一句話提到，好像武漢是在他的直接統治下，可以用專橫的官僚命令為所欲為似的。所以當中共中央政治局接到斯大林的訓令時，陷於張惶失措，不知如何應付，只得和國際代表團舉行會議詳細商討，結果是大家一致認為對斯大林的訓令無法執行，只有那個天真的魯易，把斯大林的訓令交給汪精衛，希望他考慮後表示同意。汪本已決定清除共產黨，看了斯大林的訓令後，不但加強了他的反共決心，並且加速了他的清共計劃。

1927年6月12日，汪精衛和他的反共同僚到河南鄭州，和馮玉祥將軍舉行秘密會議，其主要目的在對付共產黨和蔣介石。馮主張先清除共黨，壓平兩湖的工農運動，然後再和蔣介石談判。但在鄭州和汪會議後一星期，馮玉祥即和蔣介石在江蘇的徐州

舉行會議，在這次會議後，馮公開向新聞記者宣稱：「他忠實願望和國民革命軍合作，消滅軍閥制度和共產主義」。這就是莫斯科曾經認定並為之宣揚的「工人出身」「最可靠的盟友」的最後表示！

在汪精衛和馮玉祥的鄭州會議後，武漢——「革命的中心」——的空氣突然緊張起來了，反共的恐怖氣息到處可以聞到，中共的領導層和共產國際的代表都感到了一種可怕的陰影在他們的頭上飄浮，好像大禍就要來臨了。中共於6月20日匆忙地召開了一次中央執委會的擴大會議，試圖避免災禍，決定發表宣言，向國民黨左派表明態度。宣言是由瞿秋白事先和國際代表商討後起草的。它的要點是：「中國國民黨既然是反帝國主義的工農和小資產階級聯盟的黨，當然處於國民革命的領導地位」，「工農等群眾團體均應接受國民黨的指導與監督。…」「依照國民黨的主義，須武裝農民，但工農武裝隊均應服從政府的管理與訓練，武漢現有的武裝糾察隊，為避免政治的糾紛，可以減少或編入軍隊」。

無須解釋，這個宣言是中共向國民黨最後的一紙投降書！這個宣言發表一星期後，湖北總工會於6月28日自動解散了糾察隊，並將槍枝軍火移交武漢警衛軍保管。兩天後（6月30日），中共命令參加武漢政府的譚平山和蘇兆徵自動解職。這一切都表示中共自動地退出戰場，把工農群眾交給「國民黨左派」去自由處置！

在六月中旬，陳獨秀感到同國民黨左派的合作已陷入絕路，因而他提議共產黨退出國民黨，重新考慮局勢，製訂自己的獨立政策。但共產國際斷然拒絕了陳的提議，認為「退出國民黨，便等於把國民黨的革命旗幟讓給反動的右派」。因此，陳獨秀於七月初辭去了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職位，由瞿秋白代行總書記的職

權。瞿的唯一任務就是等待着左派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的處置。

汪精衛的左派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於1927年7月15日公佈了一道命令：所有加入國民黨及國民革命軍的共產黨員一律退出共產黨，否則，予以嚴厲懲罰。斯大林的「國共合作」政策便是如此可恥地被結束，中國第二次革命的悲劇也就由此收場。「汪精衛型的政客在困難情形下，將十次地與蔣介石聯合起來反對工人和農民。」「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如不在蘇維埃的形式中前進而勝利，則將完全失敗」。托洛茨基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會所作的預言，不到七個星期便完全被證驗了！

(七) 從極右的機會主義跳到極左的冒險主義

斯大林對於汪精衛的「7·15清共」，和他以前對蔣介石的「4·12政變」一樣，不但不加任何思考，從中吸取教訓，反而把革命的慘敗看成「革命發展到新的更高階段」。於是，從他以前導致革命慘敗的機會主義一下跳到冒險主義，這便產生了以後幾個月內一連串的盲目冒險的武裝暴動。

一、南昌暴動

在汪精衛宣佈清共後，斯大林匆忙地派遣他的表弟羅門那仔到武漢，這個輕浮的傢伙，既沒有考察當時革命失敗的嚴重局勢，更沒有召集當時留在武漢的中共領導幹部，共同商討當時情形和重定政治方針。他僅將斯大林指示武裝鬥爭的新訓令交給代理總書記瞿秋白去執行。這便是1927年8月1日的南昌暴動。

參加這次暴動的軍事力量是賀龍的獨立十五師，葉挺的十一軍二十四師，以及朱德的教導團（原屬朱培德的第三軍）共約三萬人。這些軍隊於8月1日佔領了江西省城南昌後，即宣佈成立

「革命委員會」，委員會的人選包括國民黨中央委員宋慶齡（孫中山的遺孀）和國民革命第四軍軍長張發奎。沒有發表任何政綱，更沒有任何革命措施，並且暴動是在國民黨的青天白日的旗幟之下進行的。因此，在一般群眾看來，這只是國民黨左派反對右派的政變。

暴動軍佔領南昌不到三日，在「革命委員會」的委員張發奎的圍攻之下，賀、葉、朱的軍隊驚慌失措地退出了南昌，向南逃跑，經過一個多月的艱苦旅程，於九月十三日佔領廣東的潮汕，不到一星期，在國民黨反動軍隊四面圍剿之下，賀龍和葉挺的軍隊完全潰散，賀葉兩人僅以單身脫離而免於難，只有朱德帶着殘餘的小部隊逃出廣東，最後和毛澤東在井崗山會合，後來成為「紅軍」的基本幹部。於是，在革命失敗後留下來的共產黨的基本軍事力量，在南昌的盲目冒險暴動中被摧毀了！

南昌暴動失敗後第二日，即8月7日，瞿秋白，在羅門那仔的指示下，召集了一個中央緊急會議（實際上，到會的中央委員只有幾個人），即所謂「8·7會議」，會議通過了「告全黨同志書」，把革命失敗的責任完全推到陳獨秀和譚平山等人身上，以此替斯大林和布哈林洗刷他們領導中國革命失敗的責任和罪惡。「8·7會議」不但沒有討論南昌暴動失敗的教訓，反而決定在湖南和湖北發動秋收暴動。

二、兩湖秋收暴動

自許克祥在長沙反叛後，湖南已成為最可怕的白色恐怖世界，差不多所有的工會和農民協會都被摧毀了。所留下來只是一些工人和農民的幹部，隱藏在礦區、工廠和較偏僻的鄉村，與工人和農民保持某種秘密的聯繫，湖北的情形，甚至比之湖南更壞，

在這樣的情形下舉行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假如不是瘋狂，至少是兒戲。事實上參加暴動的人很少。

在湖南，參加武裝暴動的隊伍約三千餘人，由萍鄉、安源的礦工和農民協會被解散後留下來的幹部和共產黨員組成，於九月八日至十二日在平江、萍鄉、醴陵等縣先後發動，一時佔了那些縣城，但不到幾天即被國民黨的軍隊打敗，大多數逃散了，只有少數跟着毛澤東上了井崗山。湖北的秋收暴動，只有湖北東南部幾個縣，如通山、通城、蒲圻等少數農民參加，而且很快就被反動的軍警鎮壓下去了。所謂兩湖秋收暴動，不但毫無結果，而且死傷了不少英勇的幹部，最壞的是，把原來隱藏在礦區工廠和農村中的許多幹部給暴露出來了。從此，中共失去了和工人及農民的聯繫，也就是失去了在工人和農民中活動的基地。

三、海陸豐的蘇維埃運動

廣東的海豐和陸豐兩縣，是中國農民協會的發源地，由農民運動的英雄人物澎湃，從1922年起不斷努力創立起來的。這兩縣的農民協會有近二十萬會員，經過長期的鬥爭，組織堅強，並鍛鍊出大批的幹部，成為廣東農民運動的模範和堡壘，甚至在李濟深效法蔣介石舉行「4月15日的政變」之後，海陸豐農民協會的力量尚能保持。中共的冒險主義者，在南昌暴動和兩湖秋收暴動失敗之後，便選擇了海陸豐為蘇維埃運動的試驗場。因斯大林已於1927年9月30日宣告「蘇維埃宣傳的口號現在必須成為行動口號」。

海陸豐的暴動開始於1927年10月末，11月1日佔領了海豐縣城，跟着又佔領了陸豐及鄰近的碣石和捷城幾個縣城，在暴動中成立了蘇維埃，組織了農民軍，公佈了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

農民，參加這次運動的有二、三十萬農民和手工業工人，這可以說是一個真正的農民群眾的土地革命運動。但這個運動，根本沒有得到廣州和香港等大城市工人階級的領導和援助（事實上，當時廣州和香港的工人階級，由於機會主義政策所造成的嚴重失敗，他們自身正處於極度被壓迫和剝削的地位），因而完全陷於孤立。在國民黨反革命軍隊的包圍和不斷攻擊下，終於被摧毀了。在暴動失敗後，死傷的農民戰士究有多少，從來沒有記錄，但有一件事實是絕對不可否認的，就是：經過這次「蘇維埃運動」的流產後，海陸豐那些強大的農民協會的組織被粉碎了，幾千個農民幹部和戰士，不是被打死，就是被迫逃亡了。從此，農民群眾又陷於地主豪紳任意剝削和奴役的狀態之中！

四、廣州暴動

看到南昌暴動和兩湖秋收暴動完全失敗之後，斯大林命令羅門那仔加緊準備新的暴動，並派遣海因·紐曼到中國協助羅門那仔製訂新的暴動計劃。羅門那仔從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中央的報導，得悉在廣州有一部份軍事力量，即張發奎部下的教導團，受共產黨員的指揮，省港罷工委員會雖已被解散，但留下了大批幹部，包括以前糾察隊隊員。於是，羅門那仔便選擇了廣州為最後舉行暴動的基地。恰在那時（1927年11月中），國民黨的張發奎（代表廣東系）和李濟深（代表廣西系）兩派軍閥，為了爭奪廣東地盤發生內戰。羅門那仔抓住了這個機會，立即命令中共廣東省委在廣州實行暴動，並派紐曼去廣州直接指導。

廣州暴動發動於1927年12月11日。擔任暴動的基本武裝力量為教導團和赤衛隊（由以前省港罷工委員會的工人幹部和糾察隊員組成的）。此外，有幾千黨員和工人積極參加了暴動的行列

，在暴動進行的第一天宣告成立「蘇維埃政權」（蘇維埃的委員，是由黨指定的），公佈了一批含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法令，如沒收大產業和銀行為國有，沒收地主土地歸農民耕種，沒收資產階級的房屋給平民居住等。但這個暴動僅僅延長了三天，便被張發奎和李濟深的聯合軍隊的進攻摧毀了（張李為了消滅共產黨的暴動才聯合的）。在這次暴動失敗中失去生命的，據國民黨官方的報告共五千七百餘人。他們是第二次中國革命殘留下來的一部份最果決最英勇的革命戰士。現在為了斯大林的冒險主義政策，償付了他們的生命！從此，廣州的工人階級對革命失望，對共產黨厭惡，而陷於長期痛苦和頹喪的生活狀態中。

（八）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問題的貢獻

前面對中共在革命準備時期和第二次革命過程中所表現的思想和政策的變化，以及它和共產國際領導的關係的敘述，目的僅在幫助年輕讀者更具體而深入地瞭解托洛茨基在《論中國》這部著作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但這部著作包含的內容異常豐富，所涉及的問題十分廣泛，年輕的讀者往往不容易抓住問題的中心，以及各種問題間的互相聯繫，因此，我覺得把托洛茨基所論述的各種問題中，特別是和斯大林爭論的各問題中，擇其最重要而具有現實意義者，給以簡要的闡釋是必要的。

一、在帝國主義壓迫下，各階級對反帝國主義革命的態度

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斯大林認為各階級，從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到無產階級，都會同樣感到有聯合反對帝國主義的必要。因而他們相互間的鬥爭會減少到無足輕重的地步，所以他提出了「四個階級聯盟」，作為反帝國主義的戰略基礎。

托洛茨基的意見恰和斯大林的相反，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不但不會減弱各階級間的，特別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的鬥爭，反而必然使這種鬥爭更爲尖銳化。他指出：「以爲帝國主義從外面機械似地焊合了中國底一切階級，那是大錯特錯。……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不是減弱，而是加強各階級間的政治分化。帝國主義是中國內部關係中一個很強的力量。這個力量的主要來源不是揚子江中的兵艦——它們不過是輔助物——而是外國資本與中國資產階級間的經濟與政治的聯繫。……凡使勞動者的被壓迫和被剝削群眾站立起來的一切事情，必然要推動民族資產階級去和帝國主義者作公開的同盟。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不是減弱資產階級與工農群眾之間的階級鬥爭，反而使這種鬥爭激烈起來，在每一個嚴重的衝突中都要達到流血的內戰地步」。（「中國革命問題」20—21頁，重點是我加的）。根據上述精確分析，托洛茨基指責斯大林四個階級聯盟的政策是斷送民族革命最有效的政策。反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革命，只有無產階級團結農民及城鄉一切貧苦群眾，在鬥爭的進程中，堅決地摧毀資產階級對帝國主義妥協的反革命企圖，才有可能。

二、關於共產黨的獨立問題

斯大林認爲國民黨是各階級聯合的黨，是體現「四個階級聯盟」的最好的組織形式。因此，他命令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通過這種合作去領導國民革命，完成資產階級的民主任務。

托洛茨基對國民黨的看法完全和斯大林不同，不管國民黨包含了多少小資產階級和工農份子，但本質上是資產階級的黨，是

由資產階級的代表們領導它的。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即等於充當資產階級欺騙工農群眾的工具。所以他從1923年初蘇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中共加入國民黨的問題時即堅決表示反對。1925年革命開始時，他「提出共產黨立即退出國民黨」。1927年3月4日，托洛茨基回答拉狄克的信中又重提共產黨退出國民黨的絕對必要。並預言：「如果承認共產黨繼續留在國民黨內，則對中國革命和無產階級將產生致命的後果。」這個預言很快就被蔣介石的「四·一二政變」證驗了。1927年5月10日，托洛茨基在論「共產黨與國民黨」的文章中，除了詳細地駁斥一切反對退出左派國民黨的論據外，又重新警告：「同汪精衛派同一組織」，我們即代他們負動搖和背叛的責任」。結果是：「代汪精衛負了背叛的責任」後，便被汪一脚踢開，被清除了！

依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特別是列寧所發揮的理論和布爾什維克的實踐經驗，無產階級的政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完全獨立，是絕對不可爭論的，因無產階級政黨的歷史任務，在於團結本階級的先進份子，形成革命的領導，揭露各種各式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政客們的欺騙，組織一切被剝削和被壓迫的群眾，準備武裝暴動，摧毀資產階級的國家機構，奪取政權，建立自己的專政，以此踏上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斯大林卻完全背棄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布爾什維克的經驗，把領導革命和改造社會的希望寄託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上層領袖（蔣介石和汪精衛），這便是中國第二次革命失敗的原因。

托洛茨基自始就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隨後又不斷提議共產黨退出國民黨，實行無產階級的獨立政策。他這樣做，不過是忠實地繼承布爾什維克的傳統立場而予以發揮而已。假如當時中共在托洛茨基的思想領導下，是極有可能走上勝利的，因為在革

命的高潮當中（1927年3月至4月），中共已成了名符其實的群眾黨，雖然它的黨員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員一起還不過十萬人，但它指揮了二百萬以上有組織的工人（工會）和一千五百萬有組織的農民（農民協會），這是一個壓倒一切的革命力量。它的失敗僅僅由於斯大林的機會主義政策。從這裏得出的教訓是，一個群眾的無產階級政黨，如沒有正確的政治領導，還是不可避免地失敗的。

三、關於蘇維埃問題

如果說，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參謀部，經過無產階級領導一切勞苦群眾走上革命、奪取政權的道路，則蘇維埃便是實行團結工農群眾和兵士、形成革命的組織中心、準備武裝群眾、舉行暴動、奪取政權的指揮部，取得政權後，即成為國家機關。這是從俄國三次革命得出的經驗和教訓，所以列寧在共產國際的綱領文件中把蘇維埃列為基本政綱之一。但斯大林完全忘記了這個教綱，把組織群眾、奪取政權的希望寄託於國民黨，他起初把國民黨看成為「革命的議會」，以此反對建立蘇維埃。當蔣介石的「4·12政變」，把那個「革命的議會」帶走了後，他又認為「左派國民黨」或「革命的國民黨」可以代替蘇維埃。因為他斷定「武漢的國民黨將在事實上轉變為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它將解決民族獨立和土地問題等民主任務。但結果是：「這個革命的國民黨」很快就「轉變成為」絞殺共產黨和工農的劊子手了。

托洛茨基根據他兩次領導蘇維埃運動（1905 和 1917）的親身經驗，認為只有工農兵代表蘇維埃，才能準備武裝暴動奪取政權。此外，沒有其他的組織形式。所以，自中國第二次革

命爆發後，托洛茨基即主張建立蘇維埃。他在1927年3月29日給亞爾斯基的信中寫道：「只有蘇維埃路線凝結的階級力量，可以進而適應革命的新階段，而不去適應昨日遺留下來的組織和政治關係，例如國民黨。……第一個問題是無產階級政黨之獨立，它與城市和鄉村小資產階級親密合作的方式是蘇維埃，蘇維埃或成為奪取政權的鬥爭機關，或為政權組織的機關。」「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大部份未經訓練，資產階級和地主子弟在軍官中佔大優勢，革命之明日因此有很大的危險。我以為捨兵士代表和工人代表親密結合外，別無他途可抵抗此種危險」。托洛茨基上面兩段話，對蘇維埃的基本作用和職能已說得很明顯，尤其是他指出「國民革命軍」的「大危險」，「捨兵士代表與工人代表親密合作（通過蘇維埃）外，別無他法可抵抗此種危險」，含有決定而迫切的意義。假如當時中共能得到托洛茨基這種指導，在上海立刻發動建立工人和兵士代表蘇維埃，會立刻改變局勢。因當時駐在上海的絕大部份國民黨革命軍的兵士十分同情工人群眾*，甚至國民革命軍的一個師長薛岳也同情共產黨，要求合作反對蔣介石。此外，駐在無錫和蘇州一帶的軍隊，由師長嚴重指揮，也是反蔣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共出而號召組織工兵蘇維埃，將立刻瓦解蔣介石的軍隊，因而他的4月政變將化為烏有。由此可以看出，在革命的危急關頭，正確的政策，如組織工兵蘇維埃，

* 上海三月廿一日工人暴動勝利後第五天。上海的工人和國民革命軍兵士雙方選出代表約千人，在上海商務印書館俱樂部舉行聯歡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演說的第一個是前鋒總司令白崇禧，白演說後，只有很少鼓掌聲，我代表中國共產黨講話，得到全體工人和兵士代表的熱烈歡呼，這一事實象徵着當時工人和兵士對國民黨將軍的冷淡和對共產黨的嚮往。

是何等重要，而具有決定性的了。

在蔣介石的四月政變後，托洛茨基更急切地要求建立工農兵蘇維埃，詳細地解釋了蘇維埃在革命中的決定意義和職能（見「中國革命與斯大林同志的提綱」）。他重複地指出，只有蘇維埃才能打開僵局，開闢革命的遠景。因當時湖南湖北的危機已達到臨界點：一方面，工農群眾已經組織起來，圍繞在共產黨的周圍。工人要求改善生活，農民要求分配土地；另一方面，軍隊繼續留在那些地主和資產階級出身的軍官們的控制下，這便形成了兩個互相敵對的營壘，要打破這種極度危險的局勢，只有成立工農兵蘇維埃，才能使工人和農民的代表和士兵的代表親密地結合起來，脫離軍官們的控制。但斯大林堅決反對這樣的蘇維埃，反對的理由是：蘇維埃的建立將推動軍官們走向反動。但事實恰相反，只有蘇維埃才能制止軍官們的反動，因兵士蘇維埃一經建立起來，反動的軍官們便失去了他們的反革命基地，俄國的十月革命便是最好的證明。

最新鮮的教訓是不久前智利的悲劇。1971—73年的智利，和1927年3月至5月間中國的情形很相類似：一方面，工農群眾的革命運動不斷高漲，要求社會改革；另一方面，軍隊全在反動軍官的掌握中，這是逼近攤牌的局面。但阿倫第根本想不到建立工農兵蘇維埃去掘毀反動軍官們的基地，只是拉攏幾個將軍參加他指定的內閣，以為這樣可以緩和將軍們的反革命行動，事實上却是給將軍們以時間和便利去組織他們的反革命的軍事政變而已，結果是成千上萬的工農戰士倒臥於血泊中，阿倫第本人亦成了他自己政策的犧牲品，這個教訓應該寫在革命黨的政綱中。

四、革命失敗後的策略問題

斯大林在中國第二次革命完全失敗後，從極右的機會主義轉到冒險主義，發動了一系列的武裝暴動，把革命的殘餘力量給予摧殘，加深了失敗的程度，幫助蔣介石穩定其反革命的軍事獨裁後，他突然發現「第三時期」的哲學，根據這種哲學，世界革命正在日趨高漲，無產階級準備暴動，奪取政權，已成為當前的迫切任務。所以，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通過殖民地提綱，對中國共產黨指出了如下的路綫：

「在目前，黨必須在群眾中到處宣傳蘇維埃的觀念，宣傳工農民主專政的觀念，及革命的群眾武裝暴動到來之必然性。它現在就應該着重鼓動推翻統治聯盟和動員群眾舉行革命示威的必要。……它應該始終如一地，一成不變地進行奪取政權，組織蘇維埃作為暴動機關，沒收地主及大財產所有者，驅逐外國帝國主義。……革命未來的增長將向黨提出一個急迫的實際任務：準備和實行武裝暴動，作為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及推翻……國民黨政權的唯一道路」。中共往後一個長時期在農村中實行游擊戰爭，組織「紅軍」成立「蘇維埃」，便是遵照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所指示的路綫而進行的。

托洛茨基在汪精衛的「7月清共」後，即已指出，中國第二次革命已完全失敗，應當採取防禦政策；斯大林的武裝暴動政策，只能摧毀殘存的革命力量。但斯大林稱托洛茨基的防禦政策為「取消主義」，因為這個防禦政策要「取消」他的盲目冒險主義。

當托洛茨基看到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的決議為中共規定冒險主義的戰略路綫時，他批評道：「布爾什維克的政策，不但以其革命的規模見長，而且以其政治的現實主義為其特點。布爾什維克主義底這兩個方面，是不可分離的。最大的任務是要曉得如何

及時地認識一個革命局勢，與如何徹底地利用它。但同樣重要的，是要懂得什麼時候這個局勢完結了，以及就政治觀點看，變成非革命的局勢了。再沒有比打架完結之後拿出拳頭來更爲沒出息與無聊的了。但這是布哈林底專長。首先，他證明國民黨與蘇維埃是一個東西，而共產黨則能夠經過國民黨，避免着戰鬥，取得政權。等到這個同一的國民黨，得到布哈林的幫助，擊潰了工人以後，他開始拿出拳頭來了。……必須清楚地懂得，現在中國並無革命局勢。那邊代之而興的倒毋寧是一個反革命的局勢，它正在轉變成爲長期未定的兩個革命的中間時代。有誰如果對你說這是悲觀與缺乏信心，你就鄙棄他好了。對事實閉上眼睛，乃是缺乏信心底一種最醜陋的形式」。(見《中國革命問題》210頁)

根據「一個反革命正在轉變成爲長期未定的兩個革命的中間時代」，托洛茨基替中國共產黨提出了一個過渡時期的民主要求的政綱，以代替斯大林的冒險主義路線。這個綱領包含最基本的民主要求：從八小時工作制、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到罷工的自由，這些要求歸納爲一個總的政治口號：召集徹底民主的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同時，將沒收地主土地歸農民和民族獨立的要求與國民會議的口號結合起來進行宣傳。這個過渡要求綱領的任務是在於從日常要求的政治鬥爭中恢復群眾的情緒和自信心，及以此重新團結他們自己，反對國民黨的軍事獨裁，換句話說，即由防禦的鬥爭逐漸地發展爲向統治階級進攻的鬥爭，當新的革命潮流到來時，必須成立蘇維埃，準備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奪取政權。1929年成立的中共左派反對派，便是根據這個過渡要求的綱領從事宣傳與活動的。

但在當時斯大林嚴厲控制和封鎖下的中國共產黨，當然看不到托洛茨基的建議，它只有遵照共產國際六次大會的決議「準備

和實行武裝暴動，作為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翻……國民黨政權的唯一路綫」。所以，從1928年秋天起，中共在江西、福建、湖北和安徽等省的農村中，發動了許多小規模的游擊戰爭，組織了「紅軍」和「蘇維埃」，甚至宣佈了「中華蘇維埃政府」成立。在一個時期（1930—34），中共的游擊戰運動曾有廣泛的開展，以致引起蔣介石集中全力的圍攻，形成了激烈的國內戰爭。但到一九三四年秋，在蔣介石的兇猛圍攻之下，中共最後放棄了江西南部的「蘇維埃」區，進行了「長征」，向中國西北逃亡，於1935年春才抵達陝西省北部。結果是：不但留在江西、福建、安徽和湖北的幾百萬農民遭受了蔣介石的殘酷迫害，其中有幾十萬人被毀滅了；就是中共的「長征隊伍」也損失了百分之九十，即由「長征」開始的三十萬人，達到陝北時只剩下三萬人。

當中共的殘餘隊伍逃到延安後，蔣介石立即調動了張學良統率的東北軍（即日帝國主義佔領滿州時逃出的軍隊）包圍延安，準備最後消滅中共的武裝力量。在這種情勢下，中共感到已陷入絕境，於是立刻改變政策，即從「推翻國民黨政權」轉而向國民黨要求建立「民族聯合陣綫」（這當然是根據斯大林的「人民陣綫」），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但在蔣介石看來，要抗日，必須先摧毀中共的武裝力量。所以他於1936年12月親赴西安視察張學良的部隊，準備實行進攻延安。

當蔣到西安後，張的軍隊中一小部份軍官舉行了一個小政變，俘虜了蔣介石，而欲置之於死地。因為他的「不抵抗政策」斷送了他們的「家鄉」滿州。這便是著名的「西安事件」。

斯大林看到「西安事件」，認為這是中共和蔣介石恢復合作抗日的絕好機會，當即電令中共設法「援救蔣介石」，並和他談

判合作抗日。已陷於危境的中共，立刻派遣周恩來到西安與蔣直接談判，其結果是：①中共保證蔣介石的安全，只要他同意領導抗日戰爭；②中共同意取消「紅軍」和「蘇維埃」，放棄土地革命，中共的武裝隊伍，在蔣的指揮下參加抗戰。這便是中國共產黨遵照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的決定，「實行武裝暴動……推翻國民黨政權」，經過十年（1928—1937）的流血戰爭，犧牲了幾十萬生命的結局！托洛茨基把這個結局作為教訓寫進第四國際的過渡綱領之中：

「廣州暴動必不可避免地失敗了以後，共產國際採取了游擊戰與農民蘇維埃的道路，而這時工業無產階級是完全消極的。這樣踏進了死巷以後，共產國際卻利用中日戰爭的機會，一筆勾銷了『中華蘇維埃』，不僅將農民的『紅軍』而且把所謂『共產黨』也臣服於同樣的國民黨，即資產階級了。」

五、關於中國革命的性質問題

在第二次中國革命的過程中，雖然托洛茨基沒有明白地提出不斷革命作為中國革命的戰略路綫，但他在論述中國革命問題的許多文章中，特別是在批評斯大林的文章中，對事變的分析和建議，都是根據不斷革命論的觀點而予以發揮的。

斯大林對中國革命採取的路綫，非常明顯地繼承了孟什維克的革命階段論，因為他一貫堅持先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民主任務（民族獨立與土地改革），然後再進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

為了先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民主任務，斯大林堅持無產階級必須和資產階級「合作」成立「四個階級的聯盟」。這個「聯盟」的具體表現，便是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為了

保持「國共合作」，斯大林迫使中共服從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執行國民黨及其政府的反動政策。斯大林之堅決支持蔣介石，甚至在蔣舉行了「三月政變」（1926年）、建立其軍事獨裁後，還以全力支持他領導北伐，其目的都在希望（實際是幻想）他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完成民族獨立與國家統一的民主任務。直到蔣介石的「四月政變」（1927）大規模屠殺共產黨和工農群眾、投降帝國主義後，斯大林才放棄了對蔣的「希望」。但他又立刻把完成民主任務的「希望」轉而寄託於汪精衛的「左派國民黨」及其武漢政府，直到汪精衛效法蔣的「四月政變」，發動了他的「七月清共」，才結束了斯大林依靠國民黨完成資產階級民主任務的幻想。

斯大林頑強地反對共產黨退出國民黨、執行獨立的革命政策，以及組織工農兵蘇維埃，都是根據他的革命階段論的基本觀念。因為在他看來這些都是越過了她的「民主革命的階段」。第二次中國革命便是在斯大林這條革命階段論的繩索下被絞殺了的。

托洛茨基的立場恰和斯大林的相反，他認定資產階級不但不能解決革命的民主任務，而且不可免地和帝國主義妥協來反對工農群眾的民主要求的。所以他一貫地反對斯大林的「四個階級聯盟」，以及基於此種聯盟的「國共合作」政策，認為「這將對中國革命和無產階級產生致命的後果」。因此，他自始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隨後又不斷提出共產黨退出國民黨，執行獨立的革命政策。在革命上升時期中，他不斷地提出組織蘇維埃，以此對抗蔣介石和汪精衛的國民黨及其政府，準備於時機到來時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解決民主任務，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

但托洛茨基為什麼不在中國第二次革命當中公開提出不斷革命的路綫呢？主要的原因是：不但斯大林派瘋狂地反對不斷革命

論，就是左派反對派的一些重要領袖，如拉狄克、勃列阿布勒歇斯基和史米爾加等，也不同意不斷革命的觀念。托洛茨基爲了爭取他們的合作，不得不在表面上避免使用不斷革命的名字，而在實際上將不斷革命的基本觀念貫注於對一切事件的分析和解決問題的具體建議之中。如前面所指出的：對中國資產階級反動性的分析，對四個階級聯盟和國共合作政策的抨擊，主張共產黨完全獨立和建立蘇維埃等，便是實現不斷革命的具體方案。

托洛茨基第一次明白地指出中國革命的不斷性，是在廣州暴動失敗之後。他根據這次暴動所成立的蘇維埃政權及其所宣佈的社會主義政策，給以精確的分析後，得出結論說：中國未來的第三次革命，將由無產階級專政，解決民主任務，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因爲「革命的階級辯證法，已使其他各階級耗竭了它們的能力，因而將無產階級專政，引導被壓迫的城鄉無數萬貧苦人民的無產階級專政提上了議事日程；……廣州暴動雖然有其時期的不成熟和領導者的冒險等缺陷，然而卻揭開了了一個新的時期之序幕，更正確點說，它揭開了中國將來第三次革命之幕。」

「廣州工人……且而國民黨各派都是非法的。這就是說，要根本解決民主任務，不僅大資產階級，而且小資產階級也沒有產生一種政治力量或政治派別，使無產階級政黨可以與之攜手合作，以解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問題的關鍵正在於：領導貧農運動的任務已經完完全全落於無產階級的，直接則落於共產黨的肩上了；要真正解決資產階級革命的民主任務，必須集中一切政權於無產階級的手裏」。

「這個根本的，同時是不可爭論的中國第三次革命的社會政治的前提條件，不僅證明民主專政的公式已無可救藥地失去了它的適用性，並且這個第三次革命，…… 將不會有一個「民主」

時期，……而將被迫於一開始時就要最堅決地動搖與取消城市及鄉村中資產階級的財產」(以上引文見「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中國革命問題》中譯本新編本78至79頁，着重點原有。)

1949年中共領導的第三次革命，在中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特別有利的條件之下，輕易地踏上了政權，但它仍舊堅持革命階段論，與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訂立聯盟（稱之為「協商會議」），組織「四個階級的聯合政府」，不僅保護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財產，甚至拖延土地改革，企圖實現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的階段論。然而，在階級鬥爭的辯證邏輯的逼迫之下，在國內外的敵對階級的嚴重威脅之下（特別是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帝國主義的威脅和國內資產階級的乘機反攻）

，中共爲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採取一些社會主義的措施，如實行計劃經濟和對外貿易獨佔，以限制資產階級的活動，採用「公私合營」的手段（1955年），逐步剝奪了資產階級的財產權，最後，在1956年的中共第八次大會上劉少奇宣佈「無產階級專政」已經存在，以表示「四個階級聯合政府」的結束。這一切都表明，在不可抵抗的客觀形勢的壓力之下，中共爲了自保，不得不向不斷革命的規律屈服，將資產階級的財產轉變爲國有的財產，以此踏進工人國家的軌道。這就證實了托洛茨基對於中國革命不斷發展的預測基本上是正確的。

但中共對不斷革命的屈服既是被迫的，不自覺的，經驗主義的，因而大大地歪曲了不斷革命的自然發展。這種歪曲的突出表現就是：它以各階級的「人民會議」代替了工農的「蘇維埃」，從而以「官僚獨裁」代替了「無產階級專政」，這便在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的政治結構之間形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要解除這種矛盾，使革命繼續發展、消滅國內一切剝削關係、對外推進世

界革命，中國像蘇聯、東歐各國、北韓和北越一樣，只有經過政治革命，剷除官僚獨裁，建立無產階級的民主政制，才有可能。

六、關於中日戰爭的政策問題

1937年7月爆發的中日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最重大的事變，這不僅對中國的民族獨立具有決定意義，而且對當時整個世界局勢也是一個最具爆炸性的因素，希特勒之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利用了中日戰爭以取得和日本的軍事同盟。就中日戰爭的性質說，在日本方面是非常明顯的侵略戰爭，是反動的；而中國方面的抗戰是正義的，進步的。但領導這個抗戰的蔣介石卻是極端反動的。因為他不僅是絞殺中國第二次革命的兇手，而且在長期間（自1931年9月日本侵佔滿州後），一貫地採取不抵抗主義，致使日帝國主義敢於肆無忌憚地發動了這次侵略戰爭，企圖吞併整個中國。在這種極度矛盾的情勢下，對抗戰的態度和政策發生了許多不同的傾向，主要是極右的機會主義和極左的教派主義兩種完全相反的傾向。

代表第一種傾向的是中國共產黨。它從抗戰的進步性這一點出發，不但取消了「紅軍」和「蘇維埃」，並且放棄了一切民主改革的要求，無條件地擁護蔣介石，自願在蔣的指揮下參加抗戰，這是斯大林在中國第二次革命中所實行的機會主義政策的重演。另一種傾向則認為蔣介石既是反革命者，則他領導的抗戰不但不是進步的，而且是反動的。它認為「中國戰爭是日本天皇和蔣介石之間的戰爭」，雙方都是反動的了。因而主張對抗戰採取「失敗主義」。不幸的是，代表這種失敗主義傾向的竟是一個老托洛茨基主義者：鄭超麟。這種失敗主義的傾向，雖然在抗戰初期沒有發生什麼影響，但在日美戰爭臨近爆發時，另一位托洛茨基主義者王凡西，認為日美戰爭一旦爆發，中國的抗戰即將被捲入帝

國主義的戰爭之中，而失去其進步性，變成反動的了。他就拿這種「抗戰變質論」為失敗主義辯護。因此，在中國托洛茨基主義的組織中引起了極大的混亂和激烈的爭論，以致最後引到組織的分裂。

對中國抗戰主張失敗主義的並不限於中國幾個托洛茨基主義者。這是一種帝國主義的傾向。例如，美國的奧列爾(OEHLER)和埃費爾(EIFFEL)便公開向托洛茨基關於中日戰爭的立場挑戰。為了答覆這種挑戰，托洛茨基曾特別寫信給第果·里維拉(1937年9月23日)，詳細而精確地暴露了奧列爾和埃費爾的荒謬主張，並表達了他對中日戰爭的基本立場，這可以說是托洛茨基對中國抗戰提供的戰略路線，同時也是他對中國革命問題的最後貢獻，值得我們盡可能把那封信的內容摘引下來：

「在我對資產階級報紙的聲明中，我曾說過：中國一切工人團體都應積極參加現在的抗日戰爭，却不絲毫拋棄其綱領及其獨立活動。可是埃費爾派叫喊道：『這是社會愛國主義，這是投降蔣介石，這是拋棄階級鬥爭的原則！布爾什維克在帝國主義的戰爭中主張革命的失敗主義，但西班牙的戰爭和中日戰爭就是帝國主義戰爭。……中國工農的唯一出路，就是以獨立的力量起來鬥爭，反對雙方軍隊，反對中國的軍隊同反對日本的軍隊一樣』。這幾句話是從1937年9月10日埃費爾派文件摘出來的。這些話已經足夠表明：說者不是真正的叛逆，便是十足的蠢才了。但是愚蠢到了這種程度也是等於背叛的了。

「我們從來未曾將一切戰爭置於同一平面之上，也不會這樣做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愛爾蘭人對英國的革命戰爭，支持波蘭人對沙皇的革命戰爭，雖然這兩次民族戰爭裏面，大部份領袖都是資產階級人物，有時還是封建人物，總之，是天主教反動派

自覺參加戰爭，這不是『替蔣介石服務』，而是違反蔣介石，而替一個殖民地國家的獨立服務。至於反對國民黨的『言辭』則是教育群眾所用的工具，爲了推翻蔣介石，一面在蔣介石命令之下（因爲不幸，他在獨立戰爭中掌握着政權）參加軍事的鬥爭，一面在政治上準備推翻蔣介石，這是唯一的革命政策。埃費爾派拿『階級鬥爭』來對抗這個『民族和社會愛國的』政策，但列寧一生就打擊這種抽象的毫無用處的對立。世界無產階級利益使他負有責任在反帝國主義的民族的愛國的鬥爭幫助被壓迫的民衆。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將近四分之一世紀，十月革命之後也有二十年。凡不了解此點的人，就應當視爲內部最壞的敵人，而被無情地驅逐出革命先鋒隊以外去。對埃費爾及其一類的人是應當如此處置的（引自中文版《中國革命問題》349-351頁，着重點是我加的）。

從前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出：托洛茨基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和歷史的經驗，不但給中日戰爭的性質作了精確的分析和判斷，而且給中國方面的抗戰指出了一個戰略方針：「一面在蔣介石的命令下參加軍事鬥爭，一面在政治上準備推翻蔣介石。」這個戰略方針，不僅對當時中國的抗日戰爭「是唯一的革命政策」，而且基本上可以適用於一切被壓迫國家反侵略的革命戰爭（因被壓迫國家的反侵略戰爭，往往是由於統治階級爲了自保，被迫地進行的）。這個戰略方針，還可以運用於斯大林黨統治的「工人國家」，當這些國家受到帝國主義武裝侵略的時候，「一面在官僚的命令下參加軍事鬥爭，一面在政治上準備推翻官僚專政」。

至於托洛茨基對於埃費爾派那種「愚蠢」而「叛逆」的確切批評，不僅摧毀美國的埃費爾派，並且間接給中國的埃費爾派（抗戰的失敗主義者）以沉重的打擊，這就幫助中國托洛茨基主

義的組織減輕了分裂的損害。所以，托洛茨基最後把中日戰爭和西班牙戰爭平行地寫進第四國際的過渡綱領之中，作為範例，以警戒那些教派主義的蠢才們。

結 束 語

為了明確地瞭解中共所執行的政治路線的演化和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問題的貢獻，根據前面的全部闡述，我們可以把中共的歷史（到托洛茨基被斯大林謀殺時為止），簡約地分為七個時期：

第一，在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思想影響下，中共走向布爾什維克主義路線的時期（1920年至1922年7月）。

第二，由於斯大林命令中共加入國民黨，中共從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路線，轉入孟什維克的機會主義時期（1922年8月至1924年8月）。

第三，中共一部份領袖根據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一些基本原則向左轉，轉向領導工人階級運動的時期（1924年8月至1925年）。

第四，在「國共合作」問題上，中共與共產國際領導發生激烈分歧的時期（1925年12月至1926年7月）。

第五，中共被迫地執行斯大林的孟什維克路線，直到革命失敗的時期，這也就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在中國問題上鬥爭最激烈的時期（1926年至1927年7月）。

第六，中共在斯大林控制下，從極右的機會主義跳到極左的冒險主義的時期；同時也是托洛茨基從反對斯大林的機會主義轉到反對他的冒險主義時期（1927年7月至1937年7月初）。

第七，中共實行冒險主義的武裝鬥爭失敗後，在斯大林的指

示下，又回到機會主義路線，實行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時期，同時也就是托洛茨基反對斯大林的冒險主義回到反對他的機會主義時期（1937至1940年）。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從第六時期起（即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無論在政治和組織上，都完全斯大林主義化了。它的領導從此變成爲盲目地執行斯大林政策的工具。另一方面，中共一部份領袖和幹部，根據過去革命失敗的教訓，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思想，在中共內部組織了左派反對派。從此在中國形成了托洛茨基派和斯大林派之間的不可調和的鬥爭。

最後，托洛茨基在他的《論中國》中所運用的方法，值得特別指出。我已經引用過托洛茨基的話：「如不研究中國災禍的方法，便不能瞭解十月革命方法的意義。」但什麼是造成「中國災禍的方法」呢？那就是斯大林的經驗主義的方法亦即形式邏輯的方法。例如，當斯大林觀察「帝國主義的壓迫」時，認爲這種壓迫對各階級都是同樣的；因而可以消除、至少減弱各階級間的矛盾，由此便得出階級合作的結論。「四階級的聯盟」以及「國共合作」的政策即基於此。托洛茨基依照辯證的方法，認爲帝國主義的壓迫「必然要推動民族資產階級去和帝國主義作公開的同盟。帝國主義的壓迫不是減弱資產階級與工農群眾之間的階級鬥爭，反而使這種鬥爭激烈起來，在每一個嚴重的衝突中都要達到流血的內戰地步」。第二次中國革命的全部歷史生動地證驗了托洛茨基的這種分析和預測，同時也就暴露了斯大林的分析和預測之完全破產，這表明在革命中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辯證法，是具有決定意義的。

義和團運動與帝國主義 *

(一九二四年九月七日)

(一)

中國自義和團這個真正民族群衆之反帝國主義運動失敗，亡國辱種之「辛丑條約」成立，一直到現在，（一九〇一——一九二四年）整整的二十三週年了。在這二十三週年中，中國無論經濟政治各方面，實際上已完全變成了國際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中國四萬萬民衆，已完全變成了國際帝國主義者的「欄內牛馬」，「鍋內魚肉」，宰割烹煮，都任其所爲，而莫可如何。更可耻的，就是一部份中國人，尤其是所謂「士大夫」之流，甘作帝國主義者之奴隸走狗，對偉大的民族運動，反「帝國主義之義和團」，不是羞爲稱道，就是妄誣之爲「拳匪」爲「惡徒」，替帝國主義作賤視自己民族之宣傳。無怪乎民族革命精神之日日消沉，媚外的奴隸主義之日日澎漲啊！

今日！一九二四年的九月七日！亡國辱種之辛丑條約的廿三週年紀念日！一個唯一的反帝國主義之民族群衆運動失敗日！我們——真正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衆，要想振刷中國的民族革命精神，打倒媚外的奴隸主義，在這個日子裏，首先須把這個日子在中國被國際帝國主義壓迫史上的意義重新介紹，尤其對於義和團運動須得重新估定其在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史上之真價值。我們應該替義和團洗雪其廿三年來被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所加之惡名，刷洗中國一班人腦中對於義和團運動之根本錯誤觀念。總之我們應告訴中國被帝國主義壓迫之真正民衆，重新起來認識這「九七」

* 原刊於一九二四年九月七日的《嚮導週報》第80期。

紀念日，認識義和團運動的革命精神，從這根本認識上得着解放自己的新道路。

可是要想真正了解「九七紀念日」，了解義和團的民族革命精神，就必須先懂得義和團運動與帝國主義的關係；因為義和團運動絕不是一個什麼單純的民族仇外運動，而是農民群眾受了帝國主義的過分壓迫之一種反抗運動。所以我們首先須分析在義和團運動以前國際帝國主義在中國各方面的勢力與其侵掠情形。

(二)

帝國主義本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之必不可免的階段。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帝國主義，在其本身上本已到了末日。所以列寧謂帝國主義為臨死的資本主義。可是資本主義雖到了末日，然而，始終想延長其殘喘，如是就拼命地向經濟落後的農業國——殖民地地去掠奪，剝殖民地之肉以醫己之瘡。

資本的帝國主義之根本病源是(一)生產過剩，(二)原料缺乏，(三)資本多餘，(四)勞力缺乏。因生產過剩，於是要求廣大的銷貨場，因原料缺乏，就要求廣大的原料出產地；因資本多餘和勞力缺乏就要求投資地和低賤的勞動商場。所有這些，完全是帝國主義的經濟要求。因為要達到它的經濟要求，就不能不用政治威權來保證。可是經濟與政治的要求太露面，於是又想出文化的要求來。所以無論任何帝國主義之對於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因要滿足它的要求，必然行使三種侵掠，——經濟侵掠，政治侵掠和文化侵掠。以前的英，美，法，日，俄，德等帝國主義之對於中國也完全如此，不過運用這些侵掠的政策各有緩急輕重之不同罷了。

帝國主義侵掠中國要以鴉片戰爭為始，從此英國帝國主義在中國得到商業經濟上的無上特權，因此法，美，俄，德，日，意各帝國主義，如蠅附臚，爭先恐後地向中國進發，經過「英法聯

軍」之役，「中法戰爭」、「中日戰爭」，「膠州灣事件」等，直到義和團起事之前日，國際帝國主義，在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已無外交，中國隱然一國際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我們且看當時，義和團起事之前日，國際帝國主義在中國之實際勢力究竟如何。

先看經濟方面，國際帝國主義侵掠中國，首先就想實現它們第一個要求，強迫中國人買它們的「過剩商品」，強迫中國人民開它們銷售商品的商埠，中國人民不願意，它們即以兵力臨之。結果，中國人民被征服了，它們的目的達到了。現在把一八四二年至一九〇〇年由帝國主義強迫所開的商埠列表如下：

上海	寧波	福州	廈門	廣州
芝罘	鎮江	南京	九江	漢口
汕頭	海口	營口	秦皇島	大沽
天津	張家口	吳淞	蘇州	蕪湖
沙市	宜昌	岳州	重慶	杭州
溫州	三都澳	拙北	江門	三水
北海	南寧	龍州	蒙自	河口
思茅	騰越	雲南府	嘉峪關	伊犁
塔爾巴哈台	喀什克爾	烏魯木齊	吐魯蕃	古城
哈密	恰克圖	庫倫	烏里雅蘇台	科布多
亞爾				

以上五十一個商埠是帝國主義者的「過剩商品」所堆集的地方，同時就是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帝國主義實際上的領土。再看它們商品入口之增進數目。

一八六四年	入口	五一，二九三，五七八兩。
	出口	五四，〇〇六，五〇九兩。
	出超	二，七一二，九三一兩。
一八七四年	入口	六四，三六〇，一六四兩。
	出口	六，六七三，八六八兩。
	出超	一，三五二，〇〇四兩。
一八八四年	入口	七二，七六〇，七五八兩。
	出口	六七，一四七，六八〇兩。
	入超	五，六一二，〇七八兩。
一八九四年	入口	一六二，一〇二，九一一兩。
	出口	一二八，一〇四，五一一兩。
	入超	三三，九九八，三八九兩。
一八九九年	入口	二六四，七四八，四五六兩。
	出口	一九五，七八四，八三三兩。
	入超	六八，九六三，六二四兩。

由上表可以看出帝國主義商業侵掠的突進，入口由五千一百萬餘兩增到二萬六千四百萬餘兩，由出超二百萬餘兩倒轉來至入超六千九百萬兩。此中尤須注意入口品多工業品，而毒人之鴉片每佔入口十分之一，出口品則完全為原料。因入口大超過出口，於是中國現銀幾全為帝國主義者所吸收，以致中國後來的金融完全破產。

在中國工業經濟方面，當時帝國主義者亦已開始進行，譬如紡織一業，英國有「怡和」，（設立於一八九五年）「老公茂」（設立年同上）；德國有「瑞寶」（即現在英之「東方」，一八九五年設立）；日本有「上海紡織有限公司」第一廠（一八九六年設立）、第二廠和第三廠（均設立於一八九五年）。這些

紡織工廠當時規模雖不甚宏大，然比起中國人自己所辦的來，（如恒豐，三新，久通源鼎新……等）始終是佔優勢。在礦業方面，帝國主義的勢力，也是非常大的。許多重要礦山採辦權，都歸它們掌握。

在財政經濟方面，那時帝國主義者更是獨霸。因為那時中國的舊錢號已漸破產，新式銀行尚未有一家成立。而帝國主義銀行則已有麥加利（一八五三年設立），滙豐（一八六五年設立），有利（一八七五年創辦），東方滙理（一八七五年設立），嘯嘯（一八二四年設立），橫濱正經（一八八〇年設立）與台灣（一八九五年設立）等。對國外的一切通商滙兌，固然完全由這些銀行包辦，即國內一切金融，尤其「商埠」所在地，亦幾完全受到它們的操縱。它們還在中國發行鈔票，又放債滿州政府，從中取得重利。我們把外國銀行和帝國主義者直接所借與滿州政府的借款列表如下：

借 款 別	起 債 期	債 額	年 利
滙豐銀借款	一八九四年	一,六三五,〇〇〇鎊	七分
滙豐金借款	一八九五年	三,〇〇〇,〇〇〇	六分
麥加利借款	同上	一,〇〇〇,〇〇〇	六分
瑞記借款	同上	一,〇〇〇,〇〇〇	六分
俄法借款	同上	一五,八二〇,〇〇〇	四分
英德第一借款	一八九六年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	五分
英德第二借款	一八九八年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	四分五厘

以上借款總計起來，為四千九百四十五萬五千鎊，以每鎊值中洋十元計，則為四萬九千四百五十五萬元。利息又是從四分至七

分，超過尋常利息二三倍。這種巨大的借款和過分的利息，究竟歸誰擔負？

難道是滿洲政府？很明顯的，這個負擔完全落到中國最大多數的農民肩上。

看上邊帝國主義對於中國工業的投資與對於滿洲政府的借款投資，在帝國主義本身，確已解決了它們的「多餘資本」問題。可是對中國民衆，新工業破壞了舊時的手工業，借款則加重農民負擔，迫之急速破產而失業，這就是帝國主義之賜。

還有關於當時交通上的權利，也完全操在帝國主義者手裏。鐵路不是由它們建築，就是借它們的借款，聘它們的技師。總之名義上建築鐵路，管理鐵路雖為中國政府，在實際上完全是帝國主義者所把持。航業一層，又全歸它們包辦，對海外航業固不待說，即內河流域，如揚子江，西江等的大輪航行，又幾全為帝國主義者所操縱。郵政一層也是法國帝國主義者暗中支配。

我們再看帝國主義者當時在中國政治上的特權。自一八五八年天津中英條約第五條訂立。

『英民犯罪，由英領事懲辦，中國民欺害英民，由中國地方官辦理。兩國人民爭訟事件，由中國地方官與英領事官同審辦。』之後，（同時中法和約第六條亦有同樣的規定）從此帝國主義者在中國享有「領事裁判」之特權，從此中國人民在法律上棄掉了自衛的權力，從此中國在政治上變成了「合法的半殖民地」。此後凡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各地之一切跋扈行爲，及一切之糾紛教案，莫不出此種法權的讓與所造成。同時在中英和約第一條上均規定英、法各派公使駐北京。從此就成就了東交民巷無上威權的太上政府——公使團，直接統治北京政府，間接統治中國全民衆，一直到现在。

自南京條約為英國帝國主義強迫規定海關稅值百抽五。一八五四年英、法、美帝國主義乘洪秀全與滿洲政府內訌之機，奪得管理海關權。從此中國全部經濟生命完全操諸帝國主義者之手，以致對外貿易毫無發展之可能，本國產業絕沒有振興之機會。

至帝國主義當時對中國的「文化」侵掠，更是可怕。凡帝國主義文化侵掠的唯一方法是佈宗教，開學校。宗教一方面是帝國主義昏迷殖民地民衆之一種催眠術，另一方面又是帝國主義侵掠殖民地之探險隊，先鋒軍。現在且錄關於德國帝國主義者俾斯麥對於加特力教徒之前後相反態度如下。

「先是俾斯麥在一八七三至一八七五年之間，對於加特力教徒盡剝奪其政治上之權力。凡不服從政府命令者，皆嚴重處分之。因此當時教徒多逃往他國。後來有加特力教徒安察耳和富制兩特美士於一八七九年至山東傳教，不久安察耳竟在山東南部取得牧師長，甚有勢力。適其時值德國探險家維斯曼烏爾夫之徒，稱揚傳教事業，於取得殖民地大有作用。俾斯麥聞之，於是即回復加特力教徒之權力，適安察耳歸柏林，他又接見安察耳，厚加禮貌，與之約束，並說德國今後對於傳教事業，當加以熱心之保護。結果因安察耳，德國竟取得青島，膠州灣以及山東一切特權。」（見清朝全史第四冊）由此看來，傳教與帝國主義殖民政策之關係如何，傳教徒與帝國主義者本身有什麼分別？讀者當能明瞭。

在義和團起事以前，帝國主義的宗教，在中國的實在勢力如何，如多少教會，多少宣教師，信徒多少，我手邊沒有確實的統計可查，無從斷定。可是我們根據當時教案之多，（自西江流域，揚子江流域以至山東直隸，東三省各地，差不多無日不發生教案）即可以反證當時宗教勢力之盛。教會學校也沒有確實的統計

，但是有教會的地方差不多都附有學校，由此亦可想像當時教會學校的勢力絕不在小。

末了我們把帝國主義所割據中國的領土，強迫所借的租借地以及因歷次戰爭或教案所得的賠款列舉如下：

領土除安南，緬甸不計外，有：

香港、九龍、澳門、台灣。

租借地除上海、天津、漢口、廣州各地的租界不計外，有：
廣州灣、膠州灣、威海衛、大連、旅順。

賠款，有：

鴉片戰爭共賠款二千萬元

英法同盟進攻北京之役共	賠款一千六百萬兩。
天津事件（同治九年）	賠款二十五萬兩。
台灣事件（同治八年）	賠款五十萬兩。
煙台事件（光緒元年）	賠款二十萬兩。
伊犁事件（光緒七年）	賠款九百萬盧布。
中日戰爭（光緒二十一年）	賠款二萬萬兩。

(三)

由以上帝國主義對中國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之種種侵掠，以及用強迫所取得種種權力，如此，究竟對中國一般民衆發生什麼影響呢？中國一般民衆對帝國主義有什麼反感呢？這些問題，用不着我來答覆，只把帝國主義的偵探——牧師，斯魏磁（HSWITH）所招的口供抄寫出來，就很夠了。斯魏磁對義和團運動曾特別著了一部《波動的中國》（CHINA IN CONVULSION），他在那部書上批評國際商業說：「許多從『文明』逐漸

地進攻中國內地，無數受禍者他們自己不明白受災害的原因，好像日本農民被地震所造成的海水或海岸沉落所起的潮水之淹沒一樣。可是有許多人很知道在外國商業未進來擾亂舊秩序以前，在普通的年歲裏是夠吃夠穿的。現在各方面都缺乏，覺得前途一天一天地可怕，像這樣的經驗，在活動的各方面，能怪中國人對新秩序感覺很深的不滿意嗎？

「火柴從外來，洋油及洋油所帶來的各種洋燈，代替了中國工業大部分，對社會有極大的影響，此處不能詳說。人們讀了輪船公司的報告，紗貨商業在中國怎樣興盛，此種商業從廣東到牛莊，將來極可樂觀。……但是沒有一人能讀到此種商業的發展，實大影響於中國生產棉花地面上之無數萬人民。這些人民以前靠着紡織十五寸寬的布來謀極低度的生活；一尺布須費兩天勞力，在市場上把布賣去，買進能供一家最低度的生活需要品，餘則再買些棉花來繼續紡織。但是現在呢，外國棉紗貨有很好的『樂觀』，可是土貨則完全失掉了它的市場，從那時到現在，都是如此。……費力的紡紗工作沒有利益了，又沒有別的生產來代替他！」

斯魏磁雖然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可是他在這段文字裏，關於中國農民群眾和手工業者，受了帝國主義的商業經濟侵掠之後，是如何破產，如何窮困悲慘可怕，却描寫得非常明顯，非常合於客觀事實。我們再從反面舉一件事實來看，恰與此相合。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中國近數十年來失業遊民，土匪之衆多，可惜我們對於遊民，土匪沒有統計，如果統計起來，其數目必然多得可怕。但是遊民和土匪從那裏來的呢？非常明顯，所謂遊民和土匪，就是失業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他們起初也是很好的安份守己的「有職業人」，但是自從帝國主義者，右手拿手槍，左手挾商品，強迫輸入中國以後，他們競爭不過，於是就墮落成爲無業的遊民

和土匪了。

我們再看斯魏磁引加勒勾耗 (A. R. COLPUHOUN) 所著《行到中國》(OVERLAND ON CHINA) 一書上的話，批評天主教說：「犧牲者的血是法國在中國侵掠的種子，（當時在中國的天主教，完全在法國帝國主義者卵育之下，故單言法國）；法國用教會和本地的教徒作挑撥的代理人；遭禍與犧牲是它政治上的收穫。英國商業的優勢之對於英國，猶之天主教徒的保護權對於法國一樣，因此它們地位的影響，對於中國人差不多相等。但是法國從宗教的材料較英國從商業的材料所得利益更十倍。在法國政府卵育之下，天主教已經成功無上的威權。不顧本地的法律和習慣，宰制異教鄰舍，超越所在國家法權。無論何時，教徒與非教徒有爭論，不管爭論的是非如何，牧師就立刻為之袒護。牧師如果不能恐嚇地方官，強迫給權利與教徒時，他即自己作當事人，控告於法國領事。如此無法無天，是非的真意完全顛倒了。在外強方面，這樣的干預自必跟着而來，天主教徒由此亦更為橫蠻而腐敗。當法國教會官廳，可以壓迫人民時，本地的教徒更變本加厲的恐嚇。」

加勒勾耗這一段文章，完全是描寫法帝國主義怎樣利用天主教侵掠中國，天主教徒在中國怎樣，橫行無忌，牧師怎樣袒護天主教。這些完全是事實。不過不僅法國帝國主義強護下之天主教如此，就是德英美所擁護的新教也一樣可以與之稱「難兄難弟」。

由上兩段客觀事實的描寫看來，中國手工業者和農民群眾受帝國主義如此之經濟的嚴重壓迫，另一方面，又受教會與教徒之無理摧殘。農民群眾，與手工業者以及一班普通人民，在這樣嚴重壓迫與無理摧殘之下，若非木石，他們必然要發生反動出來。

所謂義和團運動，不過是這種必然的反動之結晶罷了。

現在我們來分析義和團的起源和其結合的成分。義和團的祖先是白蓮教，創造白蓮教的韓林兒是一個仇視北胡——元韃子的民族主義者，所以白蓮教的根源就是反抗外族壓迫的民族結合。他們假教為名，不過希冀藉以逃避當時之法網而已。自朱元璋恢復漢族統治，於是白蓮教之目的已達，因而自然消滅，所以白蓮教在明代三百年中，寂然無聞。自滿族入主中夏，漢族統治權，又落於外人之手，於是明朝遺老與當時一班不甘屈服於滿族統治下之志士，群起結合，復借白蓮教之名，以圖實行恢復漢族統治權之實。在乾隆末年與嘉慶十八年，兩次大舉，皆以恢復明祚為口號，惜為滿洲政府所壓滅。從此白蓮教更被嚴禁，其教遂分為「天理教」與「八卦教」二派，義和團實為八卦教之一分派，由此我們可以知道義和團的來源，其歷史上天然帶有反抗外族壓迫之特性。

但是義和團為什麼拋棄反抗滿族之本來目的，反與之結合而反抗國際帝國主義呢？其理由非常簡單，義和團本性是封建時代的真正民族革命者，它見着當時剝削中國民衆，壓迫中國民衆的唯一敵人，不是滿族，而是國際帝國主義，所以它轉舵回帆，拋棄對滿洲政府之舊怨而反抗帝國主義。然此不過就義和團的歷史上說，要真正明白義和團所以反抗國際帝國主義之原因，還須看它的組成分子。

白蓮教原來的組成分子，在封建的農業社會裏，不用說最大多數是農民。其餘一部分是失業遊民，手工業者，少數的「士階級」。義和團也是一樣，它的成份自然大多是農民，和着手工業者，失業遊民與「士階級」。可是須特別注意的，義和團組成分子的性質已大與白蓮教異。因為那時的中國，已經成了資本帝國

主義宰制下的中國，農民、手工業者等已經嘗着資本主義的第一重滋味。他們的感覺與一百年前或數百年前白蓮教徒的感覺全然不同。他們眼見天津，上海各大城市裏所賣的貨品很少是中國人自製的，他們親眼見着洋鬼子好幾次派兵遣艦，硬要中國政府開某某城作商埠，租借某某城，某某地方應該割讓給它。他們又看見中國政府賠了許多款項給外國人，在另一方面政府把他們的田租加到好幾倍。他們又看見地方的痞棍，有錢的地主，新老爺們都入了洋鬼子的教堂，巴結洋鬼子的勢力來欺壓他們。（因當時吃教的多半是地痞與地主或新式官僚）他們親自看見他們的親戚或朋友們在中日之戰被外國人打死了。他們又看見洋鬼子燒毀了他們皇帝很好看的圓明園。許多外國的兵隊却在北京天津附近鄉村裏搶劫他們的物件。（指英法聯軍入北京事）

所有這些極深刻的印象印在那些頭腦本來十分簡單的農夫、手工業者和失業遊民的腦子裏，在他們眼中、心中，只有「可恨的洋鬼子」，「該殺的洋鬼子」！那裏還有閒工夫來記得要報復什麼滿洲人，和受人利用等事呢。這就是義和團（指義和團的群眾）所以丟了滿洲政府來反抗帝國主義的根本動因。有了此種動因，只要有人說「殺洋鬼子」「我們有方法可以殺洋鬼子」，「我們可以堵住洋鬼子的槍，不能開放」。他們聽了，直狂跳起來，什麼都不管了，只一心一意「殺洋人去」。所以有人說，當着山東、直隸，各處農民投入義和團，及天津與直隸鄰近的義和團進北京之時，好像瘋人一樣。殊不知這就是封建社會裏農民群眾的原始暴動之本色。

(四)

我們已經知道帝國主義對於中國農民群眾，（中國最大多數

是農民，所以說中國人民直以農民群眾代之）之嚴酷的侵掠如彼，農民群眾對於帝國主義之侵掠，無形中所起之反感又如此，於是中國農民群眾之對於帝國主義的反抗暴動，是歷史必然律（在印度、波斯、土耳其等均曾經過），發動不過是遲早的問題，誰也不能作違反他們本意的利用（譬如利用之保護帝國主義），更不能根本阻止他們不發動；而只能在一定的範圍內不違反他們的本意來利用他們，或以更良好的方法來領導他們，有人說：「義和團的暴動，全由義和團幾個領袖的野心（如李中來之流）與滿洲政府反動派的仇外心理（如戴漪毓賢等）所造成。」這個觀念完全錯誤。沒有李中來，在當時義和團自然有別的領袖來發展它；即沒有義和團的名目，當時義和團的群眾，必由旁的名目和旁的形式來結合。義和團沒有戴漪毓賢來發動，必有旁的人來發動。義和團的群眾好像一付炸藥，李中來，毓賢，戴漪等不過一束引火，偶然借他們作一時的發動力而已。李中來，毓賢，戴漪等這些引火不發動，終究有旁的引火來發動，炸藥遲早是要爆裂的。

我現在要批評義和團幾句，義和團固然是一個農民群眾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但因為它的經濟基礎始終是在封建的農業的社會裏，所以它是一個無組織的原始的農民之反帝國主義暴動，因此彼帶有幾分復古的色彩。被反動的封建階級利用，徒有其衝動的反抗熱情，而沒有看到歷史的進化趨勢，不了解科學的革命方法，所以終於失敗。然而這完全是客觀歷史條件的限制，絕不是當時義和團領袖與其群眾之主觀的錯誤。可是義和團運動，在中國近百年來的民族運動史上，甚至在全部中國歷史，始終佔着極重要的位置，有偉大的歷史價值，它的價值決不減於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它雖然失敗，但是我們可以從它的失敗裏，尋到

將來成功的真教訓。

所以我現在對義和團運動的結論是：

義和團運動，是中國農民群眾受了外國帝國主義過分壓迫，而起的一種反帝國主義之民族革命運動。

義和團的失敗是由於：(一)不懂得歷史進步的趨向(二)因被反動的封建階級利用(三)不知道科學革命方法（組織與戰略）。

因此我們從義和團運動與其失敗所得的教訓是：

- 一、 我們——真正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衆，真正的民族革命者，應該繼續義和團之廣大民族群眾革命運動的偉大精神。
- 二、 我們應仔細看清歷史前進的趨向。盡力脫去復古的色彩，往進化的路上前進。
- 三、 我們認定真正的敵人——帝國主義者與軍閥；可是絕對不能與任何反動派合作。
- 四、 盡力運用最進步的科學的革命組織與科學的革命策略。

中國被帝國主義壓迫的人們啊！

起來奮鬥罷！

我們前途的光彩無限呢。

江浙戰爭之世界政局的背景 *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七日)

江浙戰爭在表面上雖是一個單純的中國軍閥戰爭——直系與反直兩系戰爭，而在實際上確是一個世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暗鬥。在這個暗鬥中，却含着世界政局之變幻離奇的縮影。

我們試看，在直系背後不是英美帝國主義嗎？在反直系皖奉軍閥的背後，不又是藏着日法帝國主義嗎？從外面看來，彷彿這兩派帝國主義是專為幫助直與皖奉軍閥而結合的，又彷彿是專為侵掠中國而結合的；其實不然，侵掠中國，幫助中國軍閥固然是這兩派帝國主義結合的原因之一，但關於歐洲問題與近東問題，更有極重要的成分在。

我們知道在中國問題上，日美兩帝國主義是死敵。而在歐洲與近東問題上，英法帝國主義也是冤仇。當歐戰時，日美兩帝國主義都趁火打劫發了大財。尤其日本在中國奪得種種特權，大有獨吞中國之勢。而美國又值貨品與金子充滿了屋脊，而無處可售無處可投，看來只中國還聊可揜足。但開頭就碰到日本的帝國主義，於是日美在中國的衝突就起來了。我們只看數年來，在凡爾塞和會上日美對於山東問題之爭執，美國之召集華盛頓會議等，無處不看出日美兩帝國主義對於中國問題之明爭暗鬥。

自歐戰結果，凡爾塞和約成立，法國在歐洲大陸，一方面奪取了德國的鐵與煤成就為大工業的國家；一方面又使東歐的小協約國變成它的附庸，成就其執全歐牛耳的政治地位。於是英國不

* 原刊於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七日的《嚮導週報》第83期。

但失了歐陸市場（尤其是德國），且新遇了一個世界的勁敵。這只看英人對凡爾塞和約之批評，對法佔據魯爾之警告，在洛桑會議上英法之爭論等，就可證明英法帝國主義互相嫉視之程度。

但在中國，美最忌日，而又畏英日之同盟，於是頭一步遂破壞英日同盟，反聯英以制日。在歐洲，法最忌英，同時英亦恨法，於是英結美以抵法，法亦聯意以抵英。最近日本帝國主義見美帝國主義向中國進攻之猛，日皇遂遣其太子遊歐而與法締結秘密同盟。因此無論在中國與在歐洲都形成這兩派帝國主義——英美與日法的勢力。在這兩派勢力下之一切問題，都牽腸掣肘，不易解決。

此外又有一派新勢力，此即蘇維埃俄羅斯，它在西歐代表進步的無產階級，在東方則代表被壓迫的民族。它大有聯合西方無產階級與東方被壓迫民族共同推倒全世界帝國主義之勢力。全世界的資本帝國主義，無論英美日法，見之都膽戰心寒。於是各帝國主義又有聯合以抗蘇俄及壓迫東方民族運動之共同趨勢。

按上面這種國際政治的形勢，反映到中國的政治上，自然形成兩個戰線：（一）兩派帝國主義——英美與日法，各扶植一派軍閥造成軍閥與軍閥的戰爭。（二）各派帝國主義與軍閥結合造成反蘇俄與反國民革命運動的暗鬥。這就是江浙戰爭背影裏之世界局面。

前月之倫敦會議與現在日內瓦會議，對於自凡爾塞和約所遺留下來的許多難題，都逐漸解決，這是歐洲英美法各帝國主義間之一種暫時的妥協，嫁禍於無產階級之一種毒計（如道威斯計劃之於德國無產階級），同時這種妥協精神與嫁禍政策必反射到中國，牠們——英美日法各帝國主義，對於中國問題的解決，即對於江浙戰爭的解決，將必互相讓步，而以共管的精神出之。我們試看近日英美所盛倡之和平干涉論便足以證明。如果此種和平干涉論的主張成功，中國就完全成了國際的殖民地了！在另一方

面，他們並可以由此抵抗蘇俄與壓倒制他們死命的國民革命運動。

現在蘇俄早已明白國際帝國主義對待中國的毒計，故羅斯坦氏公然揭破列強關於協定中國之陰謀，蘇俄人民並且在莫斯科各處組織非外人干涉中國會（見路透社五日電與子林西報社評（九月十日））。

被壓迫被宰割的國人們，蘇俄尚且如此，我們自己怎樣呢？快起來啊，我們不消滅帝國主義與軍閥，帝國主義與軍閥將必然消滅我們。

江浙戰爭與國民黨 *

(一九二四年九月廿四日)

江浙戰爭，直接是一個軍閥與軍閥（直派與反直派）的戰爭，間接是一個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英美與日法）的戰爭。這一層我們在本報八十二期與八十三期裏，已經列舉各方面的種種事實，詳細地證明過了。想凡閱過本報的人當已明瞭。並且我們已指明此次戰爭將來之結局，必然出於兩派帝國主義的妥協，召集所謂「和平會議」或類似和平會議的其他方法，來宰割中國，共同管理中國，玩它們已經在歐洲對於德奧所玩過的老把戲。

我們國民革命者，尤其是代表國民革命的國民黨，對於此種外國帝國主義與本國封建軍閥，圖私逞慾，夥同勾結所製造出來之亡國戕民的強盜戰爭，應取何種態度呢？非常明顯，只有極端反對，不管直派與反直派，英美與日法，通通認為是刺殺中國國民的劊子手，中國國民之不共戴天的死敵，只有準備一律消滅之，絕不能表同情於任何方面，至於幫助一面去打倒一面，更是荒謬絕倫了。但是同時我們應乘此機會，用全力去喚醒國民，在各方面的事實上指給國民看：外面帝國主義怎樣賄買軍閥，軍閥怎樣勾通帝國主義；最要緊的是組織國民群眾在國民革命的旗幟之下，努力訓練使能成為真正革命的國民軍，準備將來之大舉。此外絕無他道。

可是現在的國民黨——改組後的國民黨，却又蹈了從前錯誤的覆轍。她對此次江浙戰爭，不但不站在國民革命的觀點上去觀察，站在國民群眾的要求上去行動，反而倒在軍閥中反直派一邊

* 原刊於一九二四年九月廿四日的《嚮導週報》第84期。

，搖旗吶喊，爲之虛張聲勢，這豈不是咄咄怪事！尤其是民國日報吶喊聲中之曲解阿諛，更覺肉麻可惡。我們試看該報主筆葉楚傖君對江浙戰爭是怎樣說：

「……浙江討賊的決心，浙江討賊的實力，已取得民間的同情，尤其是主張革命的，對浙江有空谷足音之感，十分表同情；然則浙江討賊之師，更進一步，就是國民革命之師了。」（九月四日楚傖的「浙江討賊與國民革命」）什麼是賊？英美帝國主義的走狗直系軍閥固然是國賊，難道著名的親日派賣國賊皖奉系軍閥便不是國賊了麼？直系國賊固應討，皖奉系國賊便不應討麼？軍閥間殘民以逞的戰爭可張以討賊的名義麼？什麼「民間表同情」，直是見鬼！我看除了幾家受了日法帝國主義和盧張軍閥運動的報紙外，民間只有痛入骨髓的「同情」。不然，爲什麼盧永祥被吳佩孚所收買的夏超等趕出浙江，浙江人民一聲不响；什麼「尤其是革命的……十分表同情」我要問是那些革命的？恐怕只有掛着革命招牌，而骨子裏常想着陞官發財之國民黨右派，乘此機會大表同情罷。至於什麼「然則浙江討賊之師，更進一步，就是國民革命之師了。」這簡直是昏話，簡直與所說「吳佩孚討奉之師，更進一步，就是國民革命之師了，」同一滑稽。真奇怪！代表國民革命的國民黨機關報竟有如此的「言論」，尤其奇怪的是：

「……與其說『浙存盧存，浙亡盧亡』，不如說『義存盧存，義亡盧亡』，……這次盧氏用兵，爲的是申張正義，如果拋棄了正義，雖勝亦不足齒於民口；如果堅持正義，雖敗亦無害於盧；盧的存亡，在精神上，不在形質上。現在盧已歷次申明，堅持正義……」（九月廿二日楚傖的「浙江變化無害於義師」）

楚傖先生慣替反直軍閥瞎吹，現在更絕頂聰明吹出「義存盧

存」「義亡盧亡」頭腦清醒的人讀了楚儉君這聯妙句，至少要肉麻三天。這樣「認賊作父」我不願再加批評。但我却非常可惜，一個國民革命黨的機關報，如今竟完全成了賣國賊段祺瑞派之盧永祥軍閥的留聲機！同時我又有一個疑問，如果孫中山失了廣東，民國日報的楚儉先生將何以稱說：「孫存國存」，「孫亡國亡」？

像以上同樣的論調，在民國日報上楚儉先生所包辦的「言論」欄裏，是天天可以看得見的，請愛惜國民黨的人去注意罷。

此外如江浙國民黨的宣言，也簡直像一個安福部的支部。他只說江蘇齊燮元怎樣「罪大惡極」，直系怎樣應討伐：殊不知它們所憑藉的段派盧永祥，完全與齊燮元沒有兩樣。那裏還有資格夠得上「討」直呢？討直只有真正的國民，真正革命的國民黨，可是同時盧永祥和張作霖也在被討伐之列。浙江國民黨這樣的鼓吹，人家只有疑心他是安福部，那裏還肯隨着他去討國賊呢？

就是孫中山先生九月五日所發表的宣言，也彷彿是一篇駱賓王討武則天的檄文，我們絕看不出其中有真正代表國民要求的意義在，代表國民黨的使命在。我們只覺其中有許多疑問！為什麼軍事行動的傳統政策在國民黨改組至今還不停止？為什麼代表國民革命的領袖，現在還只是看見直派是軍閥應當討伐？為什麼中山先生一言也不說及直派與反直派背後之英美日法等帝國主義之陰謀？

總之國民黨此次對於江浙戰爭的觀察，完全錯誤，他只看見直派軍閥，賣國殃民，而却全忘了反直派也一樣是軍閥，也一樣是賣國殃民。尤其錯誤的，就是把製造江浙戰爭的真正主人翁，——站在直與反直兩方之英美日法等帝國主義者，完全看掉。

國民黨的觀察既如此錯誤，自然由觀點所發生出的行動也就不用了。所以孫中山就有聯合西南，即聯合唐陳北伐之舉動。唐

繼堯是法國帝國主義的走狗，他對於國民黨，對於孫中山是怎樣，誰也知道。像這樣的人，也聯合來北伐，就令北伐成功，我不知道中山先生將他怎樣！至說到陳炯明，國民黨和中山先生還希望他來北伐，這未免太滑稽了一點！

總之，國民黨此次對於江浙戰爭的政策，完全暴露了它原來的面目，——傳統的軍事行動政策，它不啻把改組後的一切宣言，黨綱與政綱的原則全部束之高閣。

但是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自改組後生氣勃勃的國民黨，為什麼現在倒轉去比前還更壞呢？這個非常明顯，國民黨雖然改組，而黨中最大多數仍是舊來之非革命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他們向來就是靠着依附軍閥與帝國主義來陞官發財；改組後加入的新分子主張真正國民革命，打倒軍閥與帝國主義，他們便驀然起來反對。反對的唯一方法，就只有破壞國民黨的新政綱，使國民黨走那舊時非革命的老路子，仍然與封建軍閥和帝國主義去妥協。

我寫到這裏，我對於國民黨的前途是很抱悲觀的。但我覺得國民黨還有一小部分較開明的領袖，我希望他們趕快覺悟，知道這次對江浙戰爭的政策是上了右派反革命的當，是右派反革命一方面想陞官發財，一方面想破壞國民黨新政綱之陰謀（只要看主持民國日報之右派領袖楚傖的言論就可證明）。我希望他們趕快回頭，改變對江浙戰爭的政策，嚴令右派停止附和軍閥的可耻宣言，一方面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宣佈直與反直兩派軍閥之歷來惡狀，揭破英、美、日、法各帝國主義在江浙戰爭背後所伏之種種陰謀，另一方面則下一動員令，使全體黨員去宣傳群眾，組織群眾，訓練群眾，準備將來之大舉。

我們屢次說，國民黨要想成功它的歷史使命，打倒帝國主義

與封建軍閥，它的基礎絕不能建築在幾個軍隊上面，只有建築在真正的群眾上面，才有可能。如果國民黨不懂此一點，它想成功它的使命是絕對不可能的。

辛亥革命的原因與結果 *

(一九二四年十月八日)

(一)

凡是一個革命絕不是憑空而來的，必有其最深遠的原因，無論資產階級的革命，無產階級的革命或殖民地的國民革命，都是一樣。所謂最深遠的原因就是經濟的變動，在物的方面，是新生產力與舊生產關係的矛盾，在人的方面，是新階級與舊階級的衝突。這種經濟變動又絕不是一時的，必經過長久的醞釀，醞釀到一定的程度才一發而不可收拾，必待新經濟制度產生，新階級完全取得統治地位，那時社會的平衡才得恢復。

法蘭西的大革命，有人說是由於路易十四的昏庸暴虐，貴族僧侶的貪婪驕恣，其實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則在法蘭西當時的經濟已根本搖動，即資本主義經濟的產生與封建制度經濟的崩壞，所以法國的革命是資本主義對封建制度的革命，也就是資產階級即所謂第三階級對封建階級的革命。俄羅斯的十月革命也有人以為是沙皇暴虐和歐洲大戰的結果。固然沙皇暴虐與歐洲大戰是革命爆發的原因，可是還有致此爆發的原因之根本原因在，這個就是俄羅斯的經濟，一部分已經發展到了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的經濟中已包含有社會主義的經濟在，歐洲大戰是這種帝國主義的經濟產生出來的，所以俄國的革命是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革命，也就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革命。土耳其的革命原因比較複雜，然而根本說來，始終是一個經濟問題。就是土耳其的封建經濟受了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猛烈侵掠，在這種猛烈侵略之下，土耳其的舊經濟系統差不多全被破壞了，同

* 原刊於一九二四年十月八日的《嚮導週報》第86期。

時在這種被破壞的基地上又產生了一點新的經濟——幼稚的資本主義經濟。土耳其革命，便是這種新經濟所造出來的新勢力——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連合被破壞的舊經濟中所留下的勢力——農民與手工業者，對國際帝國主義的猛烈侵掠之一種反抗，同時又是對已被破壞的封建制度之一個清算。

(二)

辛亥革命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國民革命，與土耳其最近的革命是同一性質的。其原因也是非常複雜。不過我們現在看來，却很明顯，絕不像一班人所說，僅僅由於滿洲政府之昏庸暴虐和其貪官污吏的暴斂橫征及漢人仇恨滿族所致，而實在是中國封建制度的經濟受了國際帝國主義的猛烈侵掠之結果。

國際帝國主義之侵掠中國是多方面進攻的，然而最根本的還是經濟的侵掠，政治和文化等的侵略不過是達到經濟侵掠目的之一種手段而已，經濟侵掠中最利害的是商業。帝國主義從那天起直到辛亥革命之前日，在商業、工業、財政、經濟各方面固已無微不至，然而起初根本破壞中國的經濟基礎的是商品的輸入。國際帝國主義自南京條約以來，在中國所獲之商埠已有八十餘處，它們的商品好似水銀一樣借此八十餘商埠作孔道，灌滿全中國。它們的對華貿易，在一八六四年進口僅五一，二九三，五七八兩，到一九一一年即辛亥年已增至四七一，五〇三，九四三兩，而出口則由五四，〇〇六，五〇九兩僅增至三七七，三三八，一六六兩，出入相抵，由出超二，七一二，九二一轉為入超九四，一六五，七七七。此處更須注意的，入品均為貴價之工業品，而出品則為廉價之原料。中國受了帝國主義此種猛烈的商業侵掠，發生什麼影響呢？我們知道在帝國主義未侵入之先，中國在經濟上

是一個小生產自足的國家，換言之，即是小農生產與小手工業生產自足的國家，在這種小生產制度之下，如不遇特別災患，大概是家給人足的。可是自從帝國主義強迫開放商埠，挾其商品輸入之後，中國的手工業者那裏競爭得過，於是整千整萬的都離開他們的工具而流為失業者了，就是未遽然離開工具的，也只是苟延殘喘。

至於農人們呢，也是一樣，因為工業生產品日貴，農業生產品的價格却不見得增高（因為是原料），於是入不敷出，結果亦只有破產。對於中國手工業者與農民因受帝國主義之商業侵掠而破產的現象，描寫得最好的只有斯魏磁（H·SWITH），他自身亦是帝國主義的走狗）他在一九〇一年在他所著的《波動之中國》裏：

「許多從『文明』逐漸地進攻中國，無數受禍者他們不明白受災害的原因……。可是有許多人很知道，在外國商業未進來擾亂舊秩序以前，在普通的年歲裏是夠吃夠穿的。現在各方面都缺乏，覺得前途一天一天地可怕，……。」

火柴從外來，洋油及洋油所帶來的各種洋燈，代替了中國工業大部分，對社會產生絕大的影響，……。人們讀了輪船公司的報告，紗貨商業在中國怎樣興盛，此種商業從廣東到牛莊，將來極可樂觀。……但是沒有一人能讀到此種商業的發展實大影響於中國生產棉花地面上之無數萬人民。這些人民以前靠着紡織十五寸寬的土布來謀極低度的生活……。但是現在呢，外國棉紗貨有很好的「樂觀」，可是土貨則完全失掉它的市場，從那時到現在都是如此。……費力的紡紗工業沒有利益了，又沒有新的工業來代替它！」

手工業者與農民破產的結果，一方面減少了中國的生產，另

一方面又造成無數百萬的土匪，流氓，這種影响普遍到各方面，遂成就中國封建制度經濟的根本破壞。然而同時因外貨輸入，商業畸形發展的結果，由此中又造成一種商業資產階級，尤其是華僑，這種新階級是要代替封建社會而發展的急先鋒，並且這種商業階級中當時很少數的已經進為工業資本家了。

由上看來，多謝帝國主義的商業侵掠，掘封建制度與帝國主義之墳墓的新勢力，——商業資產階級，與破產的手工業和農民，就從此漸漸養成了。又加以當時帝國主義之工業資本亦開始猛烈侵掠，在各地開採礦山（如英人之於開平煤礦，德人之於博山濰縣炭礦，日本之於奉天撫順及本溪湖之炭礦……），創辦紡織業（在辛亥年外國紡織業已有八廠，日四，英三，德一），以及其他火柴，麥粉，電氣等各種工業，這樣一方面是帝國主義進一步的侵掠，同時對當時中國的新興商業資產階級與以很深的刺激，使他們感覺得非振興工業不可，後來所謂鐵路商辦與礦山商辦之爭就由此而起。在財政經濟方面，帝國主義已用它們的銀行（辛亥時外國銀行共有匯豐、麥加利、有利、東方匯理、花旗、荷蘭、橫濱正經、台灣、朝鮮和華比十大銀行），操縱了中國一切金融權，在另一面拚命的放款與滿洲政府，攫得修路、探礦及海關糧稅各種特權（當時所欠外債除各鐵路借款外，可考者共一二二，九五五，〇〇〇鎊。計中洋約十二億二千九百五十五萬元）。帝國主義此種銀行的操縱行為，完全扼住了中國的全部經濟命脈，使中國經濟毫無發展餘地，至拚命的放債，則除攫取各特權之外，並利用此種財權以挾制滿洲政府，滿洲政府因為要付利息起見，不得不重取之於農民，農民因此破產愈速。

總觀上面帝國主義在商業、工業、財政、經濟各方面的侵掠，可以得出幾個要點：（一）使中國全部小生產的經濟破產，而造成

大批含悲帶憤的無業遊民或半無業遊民；(二)養成了一部分商業資產階級，並與以許多刺激，使他們感覺得非舉辦工業不足以救國；(三)使舊的封建階級墮落，並加重新階級與舊封建階級間之惡感；(四)中國的商業資產階級及代表商業資產階級的智識階級，漸看出帝國主義侵掠的可怕。由此辛亥革命的基礎就成立了。

現在我們且把革命過程中的事實指出來看一看。當時真正參加革命的社會階級份子就是會黨（即破產的農民和手工業者），新軍（會黨的化身），華僑，及國內少數商人，智識階級（國內外新學生），和袁同情於商人階級的官僚。所謂代表辛亥革命的同盟會就完全由這些份子組織而成。這些份子，那一個不是帝國主義侵掠的結果而產生的呢！當時革命的口號，所謂排滿，就是說滿洲政府對外怎樣軟弱無能，對內怎樣橫徵苛斂，其實滿洲政府之所以軟弱無能，在客觀上看來，並不是滿洲政府的本身錯過，而是國際帝國主義壓迫的自然結果，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現象，世界沒有一個腐朽的封建政府可以抵得狼吞虎噬的帝國主義住的，所有亞洲的古國如以前的土耳其、波斯、印度、高麗莫不如此。至說苛斂，亦是帝國主義侵掠的必然結果，封建階級的政府，沒有雄厚的資產階級作後援，它要擔負外而與國際帝國主義作表面上的「交歡」，內而一切所謂新政的海陸軍，官營實業以及新教育等費，又加以幾十萬萬的賠款與外債，怎麼能當得起？不重重的苛斂於民從那裏出？若說漢人排斥滿族，這自然有相當的作用，可是民族思想也必粘附在經濟和政治上才有意義，單純的排滿觀念是人家不會懂得的，必得說滿洲政府，怎樣剝削我漢人，壓迫我漢人，侮蔑我漢人，才有作用。其實滿洲政府所以如此這般的剝削，壓迫，蔑侮，却原是作了帝國主義的傀儡。所以我們不能專拿排滿觀念作辛亥革命的根本原因，只專倡排滿而忘記

真正敵人國際帝國主義，這正是當時代表革命的國民黨之錯誤（下面詳說）。

在辛亥革命起事之前日，有幾件重要事即引起辛亥革命爆發之近因，很值得我們加以說明的。(一)鐵路商辦問題，這個問題起自浙江，而湖南，廣東，以至四川。當時滿洲政府主張鐵路國有國辦，而浙江湖南四川各省的商人及代表商人的智識者，官僚極反對之，以至釀成絕大的風潮。照現在看來鐵路國有，已成公論，反對鐵路國有只有反動的資產階級。然而在當時，反對鐵路國有却是很有意義的，因為當時所謂鐵路國有國辦，實際就是帝國主義所有所辦（如滬杭甬鐵路與粵漢鐵路借英款，川漢鐵路之借英美德法四國債款及買他們的材料和聘工程師等），商人階級起來爭辦，這是商業資產階級的一種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行動，反過來說，這樣的舉動是帝國主義的侵掠所釀成的。(二)收回礦權與礦山商辦問題，庚戌年直隸人力爭已為英國開辦之開平煤礦，雲南人力爭已為法國開採之雲南七縣礦山，山東人力爭沂水金礦，主張從德人手中收為商辦……，所有這些都是表示商人階級或代表商人階級者之一種覺悟，與爭鐵路同一意義。(三)各處鄉民反抗官吏苛斂事件，此種反抗運動在庚戌年幾遍全國，無慮數千百起，參加每一次運動的鄉民人數從一千到十餘萬（如廣西歸順數縣數百餘村鄉民反對抽捐運動，河南葉縣萬人反對加稅，山東葛縣十餘萬人因地丁而起的運動，……），他們的口號總是要求減捐，據河南葉縣鄉民所發的傳單，稱當地縣官在一年中已抽捐七次。這可想見當時農民之痛苦。然而此種痛苦的根源，亦何莫不是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如上所說）。(四)水災事件，因水災而各地飢民鬧荒，這似乎是與帝國主義無關了，然而仔細說起來，又何嘗沒有關係。如果中國不受帝國主義侵掠，何致貧窮到這步田地

，縱或水災深重，又何嘗不可維持現狀呢？

總之有了國際帝國主義的侵掠在前，中國的經濟基礎因而根本崩壞，由此在各方面發生種種病象，辛亥革命就是這種病象匯合起來之最後的表現。所以我說辛亥革命是中國封建制度的經濟受了國際帝國主義猛烈侵掠的自然結果。反轉來說，辛亥革命的原因便是國際帝國主義的侵掠。

(三)

辛亥革命的原因既是如此，但是辛亥革命的結果是怎樣呢？這是大家看得見的。滿清政府是推倒了，可是代替滿清政府的依舊是最反動的袁世凱，——滿政府的臣僕封建階級。此外我們還看見在南京草了一紙臨時約法的空文，南方幾個省分，還有幾個革命黨員作都督，其餘的我就知道了。我現在要問這個革命是成功還是失敗？要判斷這個問題，須將把革命成功的原則說幾句。我們已經知道，革命是一個由新生產力所產生出來的新階級之一個必然的要求。所謂新階級的要求：第一是消滅阻碍新生產力發展的舊生產關係，換言之，就是要建設適合於它的新經濟，這所謂經濟的要求；第二是消滅擁護舊生產關係的舊統治階級，破壞舊政治，取得政權，以建設適合於它的新政治，這所謂政治的要求；第三凡是一個階級必有其特有的階級意識，即階級的理想，要想取得政權，建設新經濟，如果階級的理想，階級的覺悟不普遍，不徹底，也是不行的，所以須提高階級覺悟，宣傳階級理想，這所謂理想的要求。

辛亥革命雖然是半殖民地的國民革命，階級性質不十分明顯，然在實際上當時革命所代表的意識確是資產階級的。在經濟上是幼稚的商業資產階級代表新生產力的表現，我們看它們爭辦礦

山，爭辦鐵路就非常明瞭。然而當時阻碍這種新生產力發展的障碍物，一方面固然是滿洲政府的封建階級，然而根本上却是帝國主義。所以我以為那時辛亥革命的要求：一、打倒一切帝國主義所加於中國的經濟關係，和一切封建社會的生產關係，建設較開明的資本主義之新經濟。二、消滅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政治特權，建設較開明的民主政治。三、推翻一切舊封建社會的思想，與帝國主義所帶來的欺騙觀念，建設較合乎群眾要求的理想。但是辛亥革命於此三者得了什麼結果？第一條的經濟要求，達到了沒有？誰也知道沒有這麼一回事。第二條的政治要求，上邊說過，打倒一個封建政府換一個封建政府，所謂前門出虎，後門進狼。第三條，更可謂莫名其妙。由此我們可以說辛亥革命是完全失敗了的，至少也可以說沒有成功。這可以十三年來的民國歷史作證明。

(四)

辛亥革命由事實證明是失敗了，但是失敗的原因在那裏呢？這個問題，再重要沒有的，我們每個國民革命者都應該來仔細研究一下。純粹的客觀的抽象說明，自然是辛亥革命的客觀條件尚未成熟，遂成了流產。然而具體說來，却不這樣簡單，我以為當時代表辛亥革命的主人翁——國民黨，應負相當的責任。我對於這一層在本報八十五期「我們為什麼反對國民黨之軍事行動」一文裏，已經稍微說過。最重要的點是：(一)國民黨沒有認清真正的群眾在那裏；(二)沒認識它真正的敵人；(三)沒了解革命的步驟，——由宣傳、而組織訓練、而武裝暴動。在那時候國民黨的群眾是商業資產階級、農民、智識階級、手工業者、很少數的工人、小商人等；失業的農民和手工業者所變成之土匪，固然可以利用，

但絕不是基礎群眾，真正的基礎群眾是商業資產階級和農民手工業者。國民黨對此僅看見商業資產階級中之一部份華僑，而忘了最大多數的國內商業資產階級和農民，手工業者，只專心致力於會黨和軍隊運動，所以結果就成了土匪軍隊的「革命」，所以當時國民黨對於商業資產階級之鐵路商辦礦山商辦，和農民群眾之反抗加捐等偉大的運動，絕少參加，所以革命時及革命後，這些群眾都懂不到國民黨為誰的利益奮鬥，它們都不願意與國民黨發生關係。國民黨的敵人很明顯的是國際帝國主義與滿洲政府的封建階級，然而國民黨把前者完全看掉了，對於滿洲政府的封建階級，也只看見滿族，沒有看見整個的封建階級，所以革命的口號，僅一個空空洞洞消滅滿族，沒有使群眾明白革命真正的對象是帝國主義與封建階級，結果推倒了滿族而帝國主義與封建階級——袁世凱，還依然存在，釀成現時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互相勾結所鬧出來之不可了結的大禍。不懂得革命步驟，即革命政策，所以國民黨從開始起就幹所謂軍事行動，永不注意群眾的宣傳與群眾的組織和訓練，所以辛亥革命時與辛亥革命後，在國民黨面前都是幾個土匪頭子——軍閥，滾來滾去。現在還是一樣。

辛亥革命是中國國民革命第一次試驗的大失敗，現在看來是那時群眾的幼稚尤其是代表群眾的國民黨的幼稚。現在擺在我們面前，有這多豐富的經驗作參考，應該不要再失敗下去。我希望還想代表國民革命的國民黨和每個真實的國民革命者，當這個辛亥革命十三週年的雙十節，重新來審查一下，從此或者找到新的道路。

英國工人政府的命運 *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五日)

所謂英國「工人政府」，本來不過是字眼上這樣稱呼，若按實說來，簡直是一個英國資產階級的政府，不過這個資產階級的政府，因為內部有幾個工人貴族——第二國際黨的首領麥克唐納爾等辦事，與尋常純粹的資產階級政府稍微有點不同罷了。為甚麼英國資產階級要麥克唐納爾等這般工人貴族來辦事呢？這是因為牠們看見麥克唐納爾等素來主張勞資調和，反對主張無產階級革命的共產黨，替資產階級壓服工人階級，這樣很足以表示牠們對於資本主義的忠實。恰好當英國的失業問題不能解決，同時英國保守黨又略與自由黨有衝突，所以代表資產階級的自由黨就決然扶起麥克唐納爾幾個老爺上台，一方面利用牠們可以對付失業工人，另一方面又可以抵擋保守黨的鎗法，這樣自由黨何樂而不為。然而這個並非自由黨資產階級主觀上的願意，實在是資本主義末期的必然現象。大戰後歐洲的無產階級已不能似戰前那樣馴伏，故資產階級也不能如戰前維持其統治權，安然統治無產階級，因此遂不得不利用出賣工人階級的第二國際首領為其代辦，在大戰時與大戰後，德、法的資產階級利用考茨基與格德一班人大收其成效。去年這次英國資產階級捧麥克唐納爾上台，不過是大戰後之第二次的利用罷了。

麥克唐納爾的工人政府八九個月來，雖替英國資產階級作了不少事，如對外之壓制蘇丹愛爾蘭，對付中國廣州政府，和對內

* 原刊於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五日的《嚮導週報》第87期。

之壓迫工人罷工以及種種繼續喬治和克松內閣時代之政策等，不無功績，可是牠始終不免有所失檢，如對於英俄和約與勞動者週報主筆康白爾案，不能盡合資產階級的意思。所以代表資產階級的路易喬治在里塞斯特對幾萬人演說時，就指斥麥克唐納濫用職權，謂寧使國家受總選舉之煩擾，而不允《勞動者週報》案調查；又謂工黨之極端份子，強迫政府干涉此案之司法，並為俄國擔保借款，政府今若不能駕御此種極端份子，則他日得國會多數，而能抵抗自由黨，保守黨及他人時，政府不將無所忌憚乎……。這裏非常明顯，工黨的左派份子稍為擁護英俄和約和勞動者週報調查案，換言之，即是工黨左派份子有一點兒與蘇俄和共產黨接近，所以路易喬治就是犧牲麥克唐納的工人政府亦所不惜了。

麥克唐納的工人政府，本為英國資產階級即自由黨用得着牠才扶牠上台，於今牠——麥克唐納對主人有點兒不盡忠，作事作錯了，主人要牠滾蛋，本來沒有甚麼稀奇，我們對於這個英國資產階級忠僕，賣工人階級的麥克唐納之滾蛋，也一點沒有甚麼可惜。只是眼巴巴望着倫敦的第二國際黨，觀此情景，未免傷懷罷。

現在麥克唐納聽了路易喬治的話似乎是大悔已過。他在未開選舉之先即在工黨大會上決定三案：(一)拒絕共產黨加入工黨，(二)不承認共產黨員為工會或地方工會會員之工黨候選員，(三)共產黨員不得為工黨黨員。這樣不啻麥克唐納跪倒在他的主人英國資產階級面前要求說：『老爺！我並沒與反對你的共產黨有甚麼關係，不信，你看我對待牠們何等嚴刻！』

一方面麥克唐納這樣地表示，同時英國的失業問題並沒解決，究竟自由黨的資產階級是否肯遽然丟掉這個不中用的忠僕，還是疑問。

照我們看來，麥克唐納爾的工人政府，在客觀的條件上，對英國的資產階級目前還是用得着的；不過英國資產階級恐僕人有失，放不下心，仍要自己來下手，這也是意中事。但是英國真正的無產階級，不管路易喬治來統治或麥克唐納爾來統治，在實際上都是一樣。不過麥克唐納爾的工人政府多能延長一天，英國之不覺悟的無產階級即能由此多得一點教訓，——麥克唐納爾反叛工人階級的教訓，這個對於世界將來無產階級革命的意義上，倒不無價值，我們姑且拭目以待。

廣東商團事變之根本原因及其對中國 國民革命上所與之教訓*

(一九二四年十月廿二日)

久被英國帝國主義所培養出來，圖謀顛覆廣州政府，殺戮廣東工農，將藉以作宰制廣東工具的法西斯蒂反革命之商團軍，現在中山先生竟排除一切妥協派的牽制，不惜犧牲一切，毅然以武力擊散之，自有廣州政府以來，這總算是一件差強人意的事，也算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一件事。這個消息傳到世界帝國主義（尤其是英國）的耳裏，必將引起嚴重的攻擊，在中國各地的反革命黨和反革命的報紙，也必將乘機煽動，附和帝國主義而攻擊中山先生（反革命的時事新報，已開始攻擊），在另一方面又必然引起革命派之同情與贊許。所有這些，都是客觀上必然到來的反射現象，我們現在姑且不論。我們是主張國民革命者，我們站在國民革命的見地上來考察這個事變，應該怎樣？我以為第一須仔細地研究這次商團事變之根本原因在那裏。第二須從這次商團事變中指出對於將來中國國民革命之幾個根本教訓。大家須知道，這次商團事變不是一個簡單問題，牠是在中國歷史上法西斯蒂的武裝反革命之第一次出現，並且是在遠東歷史上法西斯蒂的武裝反革命之第一次出現。牠不僅含着在中國歷史上的嚴重意義，並且含着世界史的嚴重意義。所以中國的無產階級和真誠的國民革命者絕不能把這件事變輕輕看過，就是世界的無產階級也必須把這件事變來考察一番，尤其是對於亞洲各殖民地的無產階級與國民革命者更有重要的意義。

* 原刊於一九二四年十月廿二日的《嚮導週報》第88期。

(一)

法西斯蒂本來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垂死的帝國主義之必然的產物。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垂死的帝國主義，一方面資本主義國家中間，爲得爭奪殖民地及其他種種衝突，結果，爆發而成爲帝國主義的戰爭（如一九一四——一八年之歐洲大戰）；另一方面，真正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隨着帝國戰爭之犧牲與痛苦而爆發，同時資產階級的反動走到極端，以前之德謨克拉西的假面具自行揭破，而明目張膽地，嚴酷地施行其狄克推多，在這洶濤澎湃的階級鬥爭狀況之下，社會經濟已根本動搖，到處呈出不安現象，因此小資產階級與智識階級…等日益破產而瀕於極悲慘的恐慌狀態中；它們身受此種禍亂，因昧於階級偏見，而不知此種禍亂之來源實由於資本主義的崩壞，資產階級的專橫，它們却只看見無產階級之反抗資產階級——罷工、示威，和暴動等，因此它們就痛恨無產階級，以爲社會的不安寧彷彿是無產階級搗亂起來的，因此它們由痛恨無產階級而專與無產階級作敵，破壞無產階級的組織，攻擊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資產階級見其如此，更盡力利用之，於是所謂「法西斯蒂」就成就了。法西斯蒂之分子的組成，多是已破產或將破產的小資產階級、智識階級、退伍軍人、失業游民…等。現在法西斯蒂在歐洲已成了一種普遍的運動（尤其在幾個無產階級革命潮流較高的地方，如以前之匈、奧、意、現時之德國、波蘭、保加利亞…）已成了資產階級用以殺戮無產階級，保持其殘喘的專門工具。法西斯蒂是世界資本主義白色恐怖的表徵。意大利的法西斯墨索里尼早已爬上政治舞台替意大利的資產階級殘殺無產階級，壓潰意大利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去年德國十月革命之失敗，固由於德國共產黨領袖之政策錯誤，而加爾等法西斯蒂之猛烈攻擊無產階級亦爲其根本原因之一。其餘波蘭、保加利亞等國之革命失敗，也大半由於法西斯蒂之作祟。這

是歐洲資產階級利用法西斯蒂攻擊無產階級之成功。在歐洲資產階級的唯一死敵是無產階級，所以資產階級拼命利用並製造法西斯蒂來對付牠。亞洲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因帝國主義戰爭的結果國民革命運動已如日東升，然這種國民革命運動實是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致命傷，所以世界帝國主義之視亞洲國民革命運動，猶如視牠們本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一樣。所以牠們也一樣地把牠們在歐洲利用法西斯蒂的慣技搬到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來對付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國民革命運動。這一次廣東的商團就是英國帝國主義之第一次的嘗試。

(二)

在歐洲法西斯蒂的組成分子，是由於與資產階級接近的小資產階級和智識階級等，然而在半殖民地的中國，如果工農階級真正起來，小資產階級與智識階級大部份固然免不掉要變成法西斯蒂，然而主要分子，依現在的經驗與情形看來，必然是與帝國主義相依為命的買辦階級，這次廣東的商團就是實例。我們現在要想真正明白廣東發生這次法西斯蒂商團的根本原因，就必須考察廣東現時之經濟狀況與階級關係。我想大家都知道廣東是接受歐美帝國主義侵掠最早的一個地方，也就是受帝國資本主義感化最早的一個場所。廣東的商業資本家，在百年前就已露頭角（如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之十三商行），百年來包攬在全中國銷售歐美帝國主義之商品的，差不多十分之八九是廣東人（試看上海、漢口、天津…各大商埠廣東商人之勢力就可知道）。所以商業資本主義在廣東特別發展，並且特別集中（如先施、永安等大商業托拉斯）因此商業資產階級即買辦階級的勢力在廣東也特別大。因為商業資本主義發展和集中的結果，同時就大影響於農民與手工業的經濟方面。農民經濟受了帝國主義與本地商業資本主義的雙重侵掠，自然破產得特別迅速，因此農民的境遇愈顯得悲慘

；另一方面土地急激的趨於集中（廣東多大地主，如海豐姓林的竟有地十萬畝，此種大地主，在他省實罕見），所以在廣東的鄉間，早已大起階級的分化，農民與地主之間（地主一部份為商業資本家，一部份則為官僚封建階級）界限最顯而最嚴。我們試看近年來海豐，陸豐，惠陽，普寧等縣農民之反抗地主運動（大多半為抗租運動）層見疊出，就非常明瞭。在手工業經濟方面，更是奇形怪狀。廣東雖然商業資本主義較發達，可是那裏的商業資本家貪於營商的高利，大多遷往南洋及各省，始終只作那資本的原始積累，至今還未進到工業資本主義。所以廣東的生產還是家庭手工業的生產，並且此種生產非常發達。可是在這些家庭手工業下之工人，受那商業資本家的嚴酷剝削，恰好是英國十六、七世紀的家庭手工業工人，受當時商業資本家之嚴酷剝削一樣（當時商業資本家，一方面以高利的資本借給家庭手工業者，並供給他們貴價的原料；另一方面又以廉價買回家庭手工業者所製出來之生產品，所以當時手工業者受苦非常）。因此廣東工人最仇視商業資本家，這個也只看廣東工會之發展與其工人年來之奮鬥和買辦階級的種種衝突，就可明白了。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須特別注意，廣東商業資本主義所以這樣發達，並不由於內部的生產發展，而全由於帝國主義之商品輸入，所以廣東的大商業資本家，全是帝國主義的買辦，——英國帝國主義的買辦。（因為廣東的商業經濟以香港為中心，統治香港的是英國帝國主義）因此廣東的商業資產階級，即買辦階級，差不多一切行動都要受英國帝國主義的牽制與指揮。在此種情形之下，我們就可知道廣東如果真正有反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運動起來，英國帝國主義是毫不客氣必要指使牠的買辦人——商業資產階級來鎮壓的，何況廣東的買辦階級與地主同時又屢遭工人與農民之反抗，在牠們的階級利益上竟用得這一個鎮壓呢（因真正反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運動）

，是工農階級爲之中心），所以這一次廣東的商團，一方面固由於英國帝國主義的指使與幫助，另一方面買辦階級亦有相當的自動。國民革命是帝國主義所深怕的，但是隨着國民革命而起來的工農階級，亦確是買辦階級的眼中釘。所以自國民黨本年改組，工農階級的先覺分子參入以來，廣東的英國帝國主義與買辦階級就無日不在圖謀顛覆國民黨之廣州政府的計劃中，英國帝國主義差不多無日不在牠的香港報紙上造謠，說「國民黨赤化」，「廣州共產在即」的一類鬼話，以圖慫恿廣東的買辦階級與地主，使之急速地法西斯蒂化。這就是廣東商團所以成爲法西斯蒂之根本原因了。此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由於國民黨的軍事行動政策。買辦階級固然恐懼工農階級，但這個只是一小部份大商業資本家，其餘大多數的小商人群衆，倒不怕甚麼赤化，共產在即，因爲他們並沒有多少產可共，他們所最惱恨的，就是有加無已之種種苛捐，他們本來每日所得無幾，而強迫之承受此種不能負擔的苛捐，那有不反抗之理（並且每次捐款一來大資本家因分配權在手，往往嫁之於小商人，所以小商人吃虧越大）。故當商團提出減捐問題出來，小商人即非常踴躍，就此可見。但是擁有十餘萬軍隊的廣州政府又決不能不向人民要錢，所以苛捐是軍事行動之必然結果，但是代表國民革命之國民黨却因此失去了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衆之同情。同時國民黨因忙於軍事行動，對於這些群衆又沒有作過一點切實的宣傳和組織工作，使得他們自然傾向於買辦階級，爲買辦階級所利用。只在這一點上說即足以致國民黨之死命，何況還有與此而生的種種弊端，所以我們根本反對國民黨的軍事行動政策，也就爲此（見本報八十五期「我們爲甚麼反對國民黨之軍事行動」）。

由上說來，我們可以小結一下，廣東法西斯蒂的商團產生之根本原因，是由於反帝國主義之國民革命運動發展到了一定的程

度（雖然廣東的國民革命運動很不徹底，很幼稚，但在帝國主義看來，已是很可怕的了。帝國主義利用買辦階級所製出來以壓制此種運動之必然的現象。此種現象若是中國的國民革命運動日益增大，不但是在廣州如此，而且將見遍及於全國。我們須知道，在中國的客觀環境上，一方面有買辦階級，一方面有失業游民，退伍軍人，很有成功法西斯蒂運動之可能。現在帝國主義已稍稍厭棄軍閥，大有想扶植一派買辦階級組織商人政府之傾向。如果這種買辦階級的商人政府出現，即是中國的法西斯蒂政府出現，是國際帝國主義宰制中國之一種最新巧最惡辣的方法。這次廣東的商團如不失敗，英國帝國主義必實行其政策，組織廣東商人政府。歐洲的資產階級自己已漸漸不能統治歐洲的無產階級，不能制止無產階級的革命潮流，故造成一種特別的最反動的兇惡工具——法西斯蒂來對付，來延長其殘喘，同樣對於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也必然要利用其經驗，現在不過是英國帝國主義在中國廣東之初試未成。在不遠的將來，我們將在高麗看到日本帝國主義在安南看到法蘭西帝國主義玩這同樣的把戲。

(三)

廣東法西斯蒂的商團事變，既不是一種偶然現象，是帝國主義對付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之一種特殊的新政策所造成成功的，是買辦階級對於新的工農階級之一種恐懼心理所釀成的，同時又是國民黨的軍事行動政策之結果。由此在國民革命上我們應該得到幾個根本教訓。

- (1) 帝國主義現在不但利用封建的軍閥來宰制中國，並且已由在歐洲製造法西斯蒂對付無產階級的新發明，在中國照樣泡製來對付中國，壓制主持中國國民革命的工農階級。這種惡辣手段已是帝國主義宰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之更進一步的辦法。

- (2) 我們從前以為中國國民革命的分子是包括工農以至資產階級，如此自然買辦的商業資產階級也在內，現在事實教訓我們是怎樣！像這樣買辦式的資產階級，不僅不是革命分子，並且還是極端的反革命分子，——法西斯蒂，比任何封建軍閥只有過之無不及。所以以後我們不應希望買辦階級來革命，我們應極力宣傳反對牠，使不得誘惑群眾。在國民黨中所有的買辦階級應一律開除之。
- (3) 在這次商團事變中始終抵制法西斯蒂商團，犧牲生命，擁護中山政府到底的，只有工農軍和各工團與農團。由這裏更足以證明工人和農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將來真正能擔負中國國民革命的偉大使命的，只有中國的工農階級。所以我們就站在國民革命觀點上，站在想成功國民革命的見地上，對於中國的工農階級，應表示偉大的信仰，真誠地去與牠們攜手，才有成此偉大事業的希望。像國民黨現時只相信幾個土匪軍隊頭，或幾個買辦階級，結果不至流到陳廉伯與陳炯明之叛黨和陰謀覆黨不止。
- (4) 作國民革命，必得按照一定革命步驟，——由宣傳群眾而組織群眾，訓練群眾以至武裝群眾，打敗統治階級，取得政權。但現在國民黨之軍事行動，不但不是國民革命的策略，而是製造反革命的工具，驅逐革命群眾往反革命走的一種鞭策（如驅逐廣東大多數的小商人群眾傾向買辦階級，傾向帝國主義，變成法西斯蒂）。所以國民黨如果還想代表中國的國民革命，中山先生還想使中國國民脫離帝國主義和軍閥之壓迫，像現在的軍事行動是絕對要拋棄的。

此外我們還須明白這次商團事變之擴大，完全是國民黨的右派和幾個土匪軍隊頭釀起來的，如果當已經查獲商團偷運軍械謀倒廣州政府之時，廣州政府出以快雷不及掩耳之手腕，立即解散

商團，迫令繳還槍械，何至有十月十五日之事。這正是「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在這點上本報已經批評不少，現在由事實證明是絕對不錯，我不知中山先生對於右派和土匪軍隊頭范石生等的感想如何？

現在帝國主義侵掠中國，宰制中國的方法是一天一天地巧妙，一天一天地惡辣；在中國國民革命的過程上，代表國民革命的國民黨之種種錯誤觀念，錯誤政策，都一天一天地由事實證明。故我們重三復四，很誠懇地向中山先生忠告，須趁早審查過去失敗之原因，放棄錯誤之政策，快來接近真正的革命群眾，往真正革命的道路走！不然，時過境遷，恐將來悔之已晚矣。

請看麥唐納爾之革命方法 *

(一九二四年十月廿三日)

無產階級要想根本消滅資本主義，打倒資產階級，建設無產階級的政權，創造共產主義的社會，唯一的方法只有用革命的手段，解除資產階級的武裝，武裝無產階級，直接奪取政權，此外絕沒有第二條路。這個道理，馬克思與列寧不知道說了幾千萬遍，可是掛着馬克思主義招牌之第二國際黨的先生們始終不願意領會。據他們的意思，達到社會主義的社會，無須武裝暴動，只要努力於國會運動，與資產階級競爭選舉，勞動者如果能在國會取得大多數的議席，那時就可以着手於社會主義的建設了。自然我們也不根本反對國會運動，但是我們認國會運動只是揭破資產階級的假面具，宣傳無產階級思想之公開機關，絕不能由此達到消滅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這是近十年來歐洲各國社會黨之國會運動的經驗可以證明的。

現在麥克唐納爾的工人政府，已快被英國的資產階級坍台，他還想藉選舉競爭獲得國會多數來維持這個寶貝，真是夢想！無論選舉他是絕對失敗，就是勝了，他的工人政府對英國無產階級有甚麼好處？啊！我錯了，這原來就是第二國際黨麥克唐納爾唯一無二之革命方法！

* 原刊於一九二四年十月廿二日的《嚮導週報》第88期。

評反革命的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 *

(一九二四年十月廿六日)

我在雙十節讀了許多上海報紙關於雙十節的「囈語謊言」，如時事新報張東蓀之「罪惡就是無知識」，……以及新聞報會愚公君之「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等，差不多肚子都氣破了，當時嘆了一口氣道：「中國的輿論界竟糟糕到如此地步」！後來又想有如此糊塗的中國社會，這樣糊塗的社會輿論也是必然的現象，當時本想作一篇文章說明這個道理，後來因為他事所牽，就擱下了。

但從那天以後，糊塗中之最糊塗的「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一篇文章、竟引起幾個人的討論，並且有人還要稱讚它，附會它，甚至於懂得一點唯物史觀的理論的天生先生也稱讚伊有八分真理，（見天生先生之「評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在那篇文章裏解釋會君的荒謬與錯誤，很有些對的地方。會君的理論本已根本攻破，無奈天生先生的結論仍是稱讚伊有八分真理，彷彿自己只有兩分真理，可謂自相矛盾。）真是奇怪極了！到了昨天又有一位章淵若先生硬把那篇糊塗的「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來討論，他並且還不絕口地稱讚說：「遠徵博引，闡理甚明，而其論中心思想之條件，尤能適合國內的情勢，應乎國民的需要，終算能得要領，切中時弊，在意志麻木，思想墮落，隔靴搔癢的言論界裏，居然能聽到這種論調，不可謂非差強人意之事」唉！尊信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主張國民革命的章先生，竟如此的傾倒他，這未免太糟

* 本文是批評國家主義派會奇的，刊於一九二四年十月廿六日出版的《國民日報》的「覺悟」副刊。

了！或者這也許是章君想引誘曾愚公來相信三民主義，作國民革命之一種手段，可是這樣的手段是絕對使不得的，因為要宣傳別人來信仰主義，只有解釋對方的錯誤，指出自己的主義之真諦，絕不可拿自己的主義去與人家所說正與其主義相反之糊塗的反革命論調附會，如果這樣，將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照本年大會所解釋的）就不知道要變成什麼東西了！為什麼曾愚公的「中心思想與中心人物」論是糊塗的反革命論調呢？現在且聽我說來！

什麼是「中心思想」？中心思想即是在某一個時代裏，某一個地方或國家甚或全世界的大多數群眾之一種實際生活之要求的表現。若更深切一點來說，就是某時代某地方之新生產力的反映，站在新生產力上之某一階級或某一群眾的實際要求。在封建社會的末期，發生了機器生產的新生產力，有了代表該新生產力的新資產階級，於是就有主張消滅封建制度，推倒封建階級，和經濟上的工業主義，貿易自由主義，政治上的德模克拉西主義、總言之即資本主義的中心思想。這種中心思想從十七世紀的英國，十八世紀的法國，十九世紀上半期的德國，意大利及到二十世紀初的各東方經濟落後國，支配了當時當地一般人的全部腦筋。自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垂死的帝國主義，發生了更新式更集中的托拉斯的新生產力，並有了站在該新生產力上更進步的新無產階級，於是主張無產階級革命消滅資本主義，剷除資產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中心思想，就是共產主義的中心思想又起來代替了資本主義。這亦是從英、法、德、而俄羅斯、而全世界，現在已成了全世界唯一無二之中心思想為佔全世界絕對多數之勞動群眾的唯一無二的新希望；此種思想，俄羅斯已經實現，德國又在目前。同時伴着帝國主義之壓迫而來的，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又有要求民族解放，打倒帝國主義與本國封建餘孽的中心思想。中國是一個

半殖民地，在中國的中心思想，目前自然是民族解放主義，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打倒本國封建軍閥」，「建設民族獨立的國家」，「以國家的力量和指揮發展國民經濟。」可是我們看看曾愚公對於中國現時之中心思想是怎樣說呢？他零零碎碎舉了許多歷史上的所謂什麼「中心思想」，而其結論則為：(1) 主義——絕對主張國家主義，使全人民皆了然於國家之組織，以愛國為唯一之天職，……(2) 政策——提倡社會政策，本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之義，以國家之權力，防止貧富之懸絕，消弭階級鬥爭，……。「絕對的主張國家主義」，這是什麼話！國家主義在拉丁文為 NATIONALISM，原意為民族主義，譯國家主義本屬不妥，它本是資本主義發展之產物，它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上有兩重意義：(1) 初期的資產階級用以結合國內各階級的人民，反抗別國的封建階級或資產階級之壓迫的意思；（如意大利，美洲合眾國……）(2) 是資產階級已建設自己的階級國家後，用以內而欺騙國內勞動階級普通人民，外而對敵其他資本國家尤其在侵掠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意思。現在之所謂民族主義，在殖民地或半殖民是屬於前者，即是民族解放的意思；在資本主義國家則屬於後者，是壓迫他民族時所表現的欺騙意義。曾君的國家主義如果屬於前者，則絕對用不着冠以絕對一個形容詞，因為民族解放主義，並不能絕對，它一方面要與世界各弱小民族聯合向共同的仇敵國際帝國主義進攻；另一方面必須世界無產階級的幫助，因為只有世界的無產階級才能真正打倒資本帝國主義，能真正解放被壓迫的民族（蘇俄就是實例）這樣所謂民族主義就自然不是絕對的，而且是國際的了，只有將民族主義放在國際主義之下去活動，才能真正達到解放被壓迫民族的目的。然而曾君說絕對的主張國家主義，使全人民以愛國為唯一天職，這就是主張絕對的國家主義的

愛國主義。這簡直是資本帝國主義者所主張的國家主義：因為資產階級要絕對的保持他們的階級國家。內以壓迫無產階級，外以壓迫弱小民族，所以絕對的主張其國家主義，並且絕對的愛它的國家。大家看像曾君這種糊塗的國家主義說是什麼話：啊！有了，這是意大利法西斯蒂的口頭禪，曾君大概是從那裏抄來的罷。至講到社會政策，如果在另一方面也有點相當的意義；但是放在曾君所主張那樣絕對的國家主義的國家裏，就糟糕了，並且所謂什麼「社會政策」本是歐洲資本主義國家裏一種對付勞動階級，緩和階級鬥爭之巧妙手段，為一班改良派的小資產階級，投機派的社會主義者，反革命的法西斯蒂之一種獻媚資產階級、阻礙勞動階級運動的金科玉律。可是資本主義已到了末運，階級鬥爭一天天地增高，無產階級一天天醒悟，此種政策在歐洲已漸成歷史上的古董，曾君又硬要搬到中國來，可是弄錯了：(一)中國還不是歐洲資本主義的國家，對付勞動階級還用不着，並且中國的勞動階級已從歐洲勞動階級學到經驗，不能再上這種欺騙政策的當。(二)這種政策根本不能成立，因為它絕不能「防止貧富之懸隔，消弭階級鬥爭」，這是在歐洲已經實驗過的了。啊！我又明白了，曾君是主張意大利法西斯蒂之絕對的國家主義，絕對的愛國主義的，自然所謂「社會政策」，也是從莫索利尼那裏抄來的了。曾君對於「中心思想」最末了的標語是「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從表面看來，這似乎與我們所主張的「推翻國際帝國主義，打倒封建軍閥」的標語相合的。其實完全兩樣。因為他之所謂「強權」，是含糊籠統的，並沒有指出一個確定的對象，譬如曾君在法國就曾經跟着法國帝國主義反對蘇俄，他以為蘇俄是強權，（見《先聲》，在法國出版）而不知蘇俄是被壓迫民族的擁護者。在這樣一個籠統的「外抗強權」之口號裏，一方面把幫助中國的好友（

現在的蘇俄，將來之蘇德，蘇法………………) 都稱之爲「強權」，另一方面倒把真正壓迫中國的英美日法等帝國主義放鬆了。「內除國賊」也是一樣地含糊，國賊固然有許多種，然現在唯一的國賊，是整個的封建軍閥，其餘的官僚政客爛紳等都不過是軍閥之爪牙而已，若含糊籠統的叫國賊，一則混亂了國民對敵的視線，二則又是放鬆了真正的敵人軍閥。總之他這兩個標語，在理論甚屬不妥，何況照他上邊所主張的國家主義與社會政策看來，是暗裏藏刀正在準備着要殺人呢。章淵若君沒有分析他的內容，就拿來與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牽強附和，殊不知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按照本年國民黨改組大會在黨綱上所發表的，是很明顯地「推翻帝國主義」與「打倒軍閥」的意思。章君這樣的附會，未免把國民黨看得不像樣了。

現在我們來看什麼是「中心人物」。「中心人物」是中心思想的代表者，是在某一時代某一社會裏，代表群眾之實際要求而奮鬥的急先鋒，換言之，就是代表群眾利益而奮鬥之領袖。所謂群眾的領袖即「中心人物」之條件，絕不是什麼呆板板的邏輯、死公式所能說明，並且中心人物也不是一個短時間所能產生的，好像雕匠雕塑木偶一樣。即令勉強要說明中心人物之條件，我以爲最重要的是：(1) 須真能懂得他所代表的群眾之真正要求，真正利益。(2) 須懂得當時當地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況，社會之階級關係，尤其是他所代表的群眾之敵方的真實狀況。(3) 須懂得並且能夠實現群眾要求，達到群眾利益的手段。(4) 有真正能代表群眾而奮鬥百折不回的精神。此外還有一個先決問題，就是他所代表的群眾絕對要是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階段上之最進步的階級或民衆，至少要該階級或該民衆所走的路，是向社會進化之路程一方面去的。像這樣的中心人物是我們所需要的中心人物。可是這樣的

中心人物是短期間所能成就的嗎？是我們要想造就某人為中心人物或造就自己為中心人物就成了中心人物嗎？夢想！癡說！這完完全全是歷史的產物，與我們主觀上的願望一點也沒有關係。像這樣的中心人物，必有他的特別環境與特別機遇。他在某種特別的環境裏產生，得到某種特別機遇的訓練，經過長久的奮鬥時間，得了群眾的信仰，有了豐富經驗，那時候群眾才認定他為他們真正的領袖。才算得社會真正的中心人物，那時才能夠符合我上邊所說之(1)、(2)、(3)、(4)的四個條件。現在我們拿幾個模範的中心人物來看看。美國華盛頓總算是當時美國資產階級的中心人物了，為什麼他成為中心人物呢？因為他替美國的資產階級，反抗英國資產階級的侵掠，奮鬥十數年，建設北美合眾國之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所以成為美國之中心人物。換言之所以成為當時之中心人物，是因為他懂得當時美國資產階級真正利益，而又能替他們奮鬥。然而這絕不是華盛頓自己願如此，也不是當時美國某一部份人把他如法泡製而成。列寧是俄羅斯無產階級的中心人物，並且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中心人物，然而列寧之所以成為如此偉大的世界中心人物，是因為他生在特別的俄羅斯環境裏，他能夠懂得俄羅斯無產階級甚至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之利益，並且能替他們奮鬥，一直奮鬥到死。這是偶然的嗎？難道是俄國的無產階級故意製造出他來或者他自意願這樣製造出來的嗎？現在我們看看曾君所謂中心人物之條件如何，他說：「中心人物之條件，至少應具下列各項：(1)有一定之主義，(2)有一定之主張，(3)有具體之計劃，(4)有實行之手腕；此外，如闊大之胸襟；寬宏之度量；鮮明之態度；勤儉之習慣；亦為中心人物不可缺之修養焉」。這完完全全是呆板的死邏輯，死公式；完完全全是他腦中空想的抽象「英雄」。想當作模型拿來雕塑人

中國此時的中心思想，只有「推翻國際帝國主義，打倒封建軍閥」，與此相反將都是反革命的中心思想，故意含糊的也必然將走到反革命的思想方面去。至於中國的中心人物，就要看誰能真正代表中國被壓迫的民衆去奮鬥，去推翻國際帝國主義，去打倒封建軍閥，那時就是誰，現在空空懸擬一個什麼「中心人物」，提出許多製造中心人物的條件，不惟與事實不符，並且完全是癡狂的思想，至於自己自尊自大，以什麼中心人物自居，或擬定一個中心人物的模範來學習，製造自己，我們只笑他「多見其不知自量也！」我們如果真正是站在群衆的觀點上，如果真正爲群衆的利益，就要在解放中國被壓迫的民族（自己在內）的工作上，去盡一份子的力量，只有硬着頭去幹，向推翻帝國主義與打倒軍閥的目標上去不斷地開槍，許多知識階級，小資產階級的的糊思妄想，應該澈底拋棄。至於要作反革命的中心人物那又是別的問題了。

我告訴大家，曾愚公是要學克勒滿梭、普恩齊、莫索里尼式的「大人物」的，然而這個可隨他的自由去學。但我望大家要明白，這是最兇惡的反革命的想頭。他之所謂中心思想是最反動的思想，他之所謂中心人物，是最反革命的人物，這我已在上面說過了。謂予不信，請看他以後的言論與行爲！

十月革命與列寧主義*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七日)

「誰是馬克思？馬克思是『資本論』的著作者。誰是列寧？列寧是『十月革命』的著作者」。這是托洛茨基轟動一時之名言。現在若有人問：「什麼是十月革命」？我便回答說：「十月革命就是列寧主義的產品。」

誰也知道十月革命是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是俄羅斯的無產階級對於其資產階級之革命；可是同時它又包含着一個農民革命和一個被壓迫民族的革命，就是俄羅斯的農民對於其地主封建階級之革命，俄羅斯的許多弱小被壓迫民族對於帝國主義的大俄羅斯壓迫民族之革命。所以在十月革命裏，不但八百萬純粹的俄羅斯無產階級得從俄羅斯資產階級之鐵鎖底下解放出來，而俄羅斯之一萬一千萬農民和六千萬弱小被壓迫民族，也從這個革命裏得到新的生命，從這個革命裏脫離了地主封建階級和大俄羅斯壓迫民族之千年繩索。打倒俄羅斯之一切資產階級，一切地主封建階級和帝國主義的大俄羅斯壓迫民族，解放俄羅斯之八百萬無產階級，一萬一千萬農民，六千萬弱小民族；總言之即消滅俄羅斯之一切壓迫階級，解放俄羅斯之一切被壓迫階級，把這一切被壓迫的階級團結在一個社會主義的蘇維埃聯邦裏，共享人類真正自由平等之幸福，這就是十月革命之總成績，這就是十月革命之真正意義。

十月革命的著作者是列寧，十月革命是列寧指導俄羅斯的工人，農民和被壓迫民族所創造出來的創作，所以十月革命即是

* 原刊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七日的《嚮導週報》第90期。

「列寧主義」的具體表現。因此我們知道列寧主義所包含之根本點就是解放無產階級，解放農民，和解放被壓迫民族之理論與策略。換言之，即無產階級革命，農民革命和被壓迫民族革命之理論與策略，——實驗過的理論與策略。

現在俄羅斯的工人們，農民們和被壓迫民族已經從十月革命中解放出來了，已經擺脫了他們之牛馬奴隸的生活了；可是全世界——俄羅斯以外——的工人，農民和被壓迫民族，還是依然被壓迫在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地主，和帝國主義的壓迫民族之鐵鎖下，還依然是資產階級，地主和帝國主義的壓迫民族之牛馬奴隸！這樣，所以俄羅斯的十月革命，還不過只解放了全世界之一部份——俄羅斯——的被壓迫階級，俄羅斯的十月革命還不過是全世界的「十月革命」之開端。

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是全世界的「十月革命」，繼續俄羅斯十月革命之偉大的使命——解放全世界之被壓迫的工人們，農人們和被壓迫的民族。要完成俄羅斯十月革命之偉大使命，成功世界的十月革命，只有列寧主義，只有著作十月革命的列寧主義。

現在著作十月革命的著作者列寧是死了！可是「十月革命」的精神——列寧主義，還是依然存在，並且永久存在。

全世界的工人們，農人們，和被壓迫民族！你們要想解放你們自己，消滅你們的仇敵，只有起來研究列寧主義，實行列寧主義，努力繼續十月革命的工作！

被壓迫在雙重壓迫之下的中國工人們，農人們，和一切民衆，國際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的牛馬奴隸！起來！「列寧主義」是我們的武器，「十月革命」是我們的大道，我們來練習我們的武器——列寧主義，我們來走向我們的大道——十月革命！

帝國主義戰爭的「休戰紀念」到了 *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十一月十一日，全世界的強盜帝國主義之四年零三個月的大屠殺的暫時休止日，（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帝國主義者自己所說的「歐戰停戰，世界「和平」開始的「紀念」日」，到了！這一天，巴黎，倫敦，華盛頓和東京城裏的有產階級，帝國主義者，一定手忙腳亂，發號施令，教牠們的奴隸們，懸燈結彩，遊街示威，紀念牠們的「紀念日」，高呼牠們的「勝利」！向全世界的無產階級示威，向全世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被壓迫民衆示威。現在上海的英美日法帝國主義者，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也一樣在那裏準備着在這天到黃浦灘慶祝他們的紀念，在他們的紀念碑上點綴花圈，高呼「勝利」。

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呀！全世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奴隸呀！資產階級帝國主義者是這樣地慶祝牠們的「勝利」哩，但是你們是怎樣呢？

不錯！資產階級帝國主義者是勝利了！資產階級帝國主義者爲了爭奪世界殖民地——市場與原料出產地，——而起的屠殺大戰爭，果然牠們從戰爭中得到勝利了！法國的資產階級帝國主義者，把羅蘭的煤礦和鐵礦都搶到手了，把魯爾變成了牠的「安南」了，從德國得到了幾萬萬金馬克的賠償了，法國的史乃德孑然成了全歐洲的鋼鐵大王，德國太上皇帝了。英國資產階級帝國主義者，把小亞細亞阿拉伯等許多殖民地的管理權確定了，小亞細

* 原刊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的《嚮導週報》第91期。

亞的石油礦搶到掌握了，太平洋中從前德國人所管理的許多海島奪過來了，以前與牠競爭世界海上霸權的唯一可怕的德國帝國主義打倒了。美國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者，趁着這次戰爭無形中搶奪了全世界的商場，將牠的商品散滿全世界，把全世界的金子都吸收到自己的腰包裏去了，金子堆滿屋脊了；牠又放了無數萬萬借款給歐洲，歐洲的「文明」國都成了牠的債戶了，牠那副銀行資本的鐵網把全世界罩得緊緊的了；莫爾干成了全世界的唯一主人翁了。小日本的帝國主義者也居然大發其財，青島和整個的山東一轉瞬間就到了手了，太平洋中好些島子上都插着太陽旗了，收買中國的幾萬萬借款也趁着這個機會暗暗地交給中國的賣國賊了；在中國的許多特權都從此被承認了。（凡爾塞分贓會議所承認）

還有在非洲的許多德國殖民地都被英法瓜分了，德國資產階級在各地的許多財產都變成了英美日法等帝國主義者的贓物了，現在牠們從道威斯計劃中又把全德國完全變成了牠們的經濟共管地了。呀！帝國主義者真勝利！可是英美日法的無產階級得着甚麼呢？是的，英美法德俄意奧的一千萬工人和農人們從戰爭中得了一個「死」！這一千萬工人和農人們的妻與子從戰爭中得了一個寡婦的銜頭和一個孤兒的別號！還有三千萬赴過戰場的工人和農人們，得着了一個無手或無腳的「殘廢」或是神經病和楊梅毒！全歐洲幾千萬的小資產階級都得了一個無情的貧困與饑荒！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被壓迫奴隸又得着甚麼呢？不錯，幾十萬黑奴不消說在前敵上得了一個「壽終正寢」！印度澳洲和安南的幾十萬軍隊也得着了一個「馬革裹尸」的榮譽。印度澳洲的工農們還得着一個捐助戰費的大好機會。至於半殖民地的中國呢？真也受賜不少！從前德國強搶去的青島和山東許多礦山以及鐵路權，蒙凡爾塞和約的批准，得日本帝國主義代管了，因為段祺瑞的參戰，幾萬萬的賣國借款也得成立了，幾萬華工又得了好機會已死

於法、比「文明之邦」；還有一層更重要的就是中國從此能成爲日美帝國主義逐鹿之場了，並且將來還有資格成爲帝國主義第二次戰爭之爆發地了。

呀！全世界工人們，農人們！殖民地的奴隸！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確是勝利了，你們看，牠們又正在那裏準備着第二次戰爭呢。你們聽見法國航空隊之大發展嗎？你們聽見英國和美國議院裏的帝國主義者議員老爺們提議增加軍費案嗎？英國之建築新嘉坡軍港嗎？你們聽見日本的帝國主義正在準備擴充軍備嗎？世界帝國主義宰割你們的第二次大戰爭，就在眼前呀！不是英法在近東動手，就是美日在中國開端，這一個戰爭比以前更兇惡十倍，因爲帝國主義者的殺人器具比以前更完備了，要發明了，將來的戰爭一定是使用航空隊和使用毒氣。帝國主義現在是慶祝他們的勝利，但他們的慶祝聲中含着甚麼意義？你們須仔細注意呀！

半殖民地的中國被壓迫民衆，英美日法……帝國主義的奴隸！第二次世界大戰一定是在太平洋，太平洋邊的中國呵，你們看見兩派帝國主義——英美與日法，從江浙戰爭開始到現在，不是正在那裏拼命地暗鬥嗎？你們看看北京城裏，現在不是美英挾着馮玉祥，另一方面日法又挾着奉張與皖段在那裏搗鬼嗎？請你們看看：黃浦江，白河口，西江口以及長江一帶有多少英美日法帝國主義的軍艦？這些軍艦衝來撞去是爲着甚麼啊！是不是明白地告訴我們：「當心點，我們英美與日法，快要開火了，請奴隸們準備犧牲點罷！」你們看黃浦灘帝國主義者的慶祝會不是明白警告我們說：「我們英美日法的歐洲大戰是得着勝利了，這樣大勝利只有從搶奪殖民地的大戰爭中可以得着，我們趕快準備第二次大戰罷！」我們想將來第二次大戰誰是第一個犧牲者？可怕呀！我們前途的命運就是帝國主義者正在替我們準備的第二次大戰爭！！

決死戰的時期到了，全世界的工人，農人和被壓迫民族要想脫離這個恐怖的「死」與一切犧牲，只有一條路，絕對的不遲疑的打倒一切萬惡強盜的帝國主義，——英美日法……，中國的工人們農人們和一切民衆，只有在這一條絕對的路上走，只有絕對的與帝國主義作最後之決死戰，我們才有生之可能。起來！決死戰！

目前政局與工人階級 *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日)

自北京政變後所造成的中國政局，在整個的中國歷史過程上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因為這不過是段張軍閥代替了曹吳軍閥在北京的地位，日本帝國主義戰勝了美國帝國主義在北方的勢力，中國人民始終還是被壓在國際帝國主義與北洋軍閥的雙重壓迫之下，與以前沒有什麼兩樣。然而在這一「頃間」裏却不能不說是一種新的局面，至少也可以說是可以引起人民注意政治的一個局面，如果人民能夠起來努力，或者也許能造成一個相當的新局勢，至少也可以從這個局面上得到一點相當的政治覺悟。所以代表國民革命的國民黨發表宣言，主張召集國民會議，解決目前的政治問題，並且主張在國民會議之先召集國民會議預備會；同時中國共產黨亦發表宣言贊成國民黨所主張之國民會議，尤其指出國民會議預備會之重要及其任務——籌備國民會議和代理臨時執政，並且替民衆向將來的預備會和國民會議提出十三條具體要求。我想凡是被壓迫的中國人民都應該起來站在國民黨的號召之下，按着中國共產黨所指示的具體要求去努力實現國民會議，實現國民會議的預備會，不管這種努力將來成功或失敗，但總須利用機會，以盡人爲的力量，總須從這一個努力上得着新的道路。

中國的工人階級不用說是應當起來贊成此次國民黨之主張，努力圖謀實現中國共產黨所指示之要求的。我們知道中國的工人階級不但是中國將來之唯一主人翁，並且是中國國民革命之真正領導者，中國的國民革命只有中國的工人階級起來作領導才能作

* 原刊於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日的《嚮導週報》第94期。

到底，才能根本消滅帝國主義與軍閥。像這樣的偉大責任，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已在中國工人階級近年來的許多運動上（如香港海員之罷工和京漢路之「二七」爭鬥……等）表現出來了。因為受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壓迫和剝削最利害的是中國的工人階級，所以中國的工人階級特別富有革命性，特別有指導中國國民革命之資格。因此對於目前的政局，解決目前的政治問題，中國工人階級是應起來參加的，並且還須以領導的資格起來參加的。但是中國工人階級現在除了須普遍地努力參加這種運動外，即參加解決目前的政治問題外（如如何使國民會議和預備會議得實現，如何使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要求能在將來的國民會議和預備會議被採納等），一方面還須特別提出它本階級的最切身最急迫的要求。在目前它的最切身的和最急迫的要求是：

（一）須急速恢復京漢各路自「二七」後所被解散的工會。

（二）須急速恢復唐山二千餘工友的工作。

（三）須阻止素來壓迫京漢各路工友的交通系復辟。

四 懲辦在「二七」慘殺京漢路工友的兇手——吳佩孚，蕭耀南……。

以上這幾種要求是北方一大部份工友之最急迫的要求，因為自「二七」以後，所有在直派勢力下以前所成立的工會都橫被吳佩孚勒令解散了，現在吳佩孚既去，要恢復這些原來的工會是絕對應該的；唐山二千餘工友被英國帝國主義者詹莫森，紐摩赤無故遣散，（見唐山工人宣言）現在正在飢餓之中，這尤須急速恢復其工作，不然這二千餘工友將難免流於餓殍。懲辦「二七」慘殺京漢工人的兇手，這更是法律上名正言順的要求。交通系素來壟斷中國的交通機關，作威作福，尤其是對於京漢，津浦各路的工友百般剝削與壓迫，所以交通系向來就是各路工人，尤其是京

漢工人之死敵。自直奉戰爭之後，交通系的勢力已失，現在段祺瑞登台，交通系又大肆其活動，大有恢復其舊時勢力之勢。如果此輩復辟，將來尋仇報怨，京漢各路工人所受壓迫必更甚於吳佩孚時代。現在各地的工人應將這些要求提出於段祺瑞之前請其急速解決，並以此試驗段祺瑞比曹吳是否有所差別。如段祺瑞不允許則提出於將來之預備會議和國民會議，並以此試驗該預備會議和國民會議，是否真是代表民衆之會議。

中國的工人階級，尤其是京漢，津浦……各路和唐山的工友們，趕快起來力爭以上四個要求之實現，如果這幾個小小的要求都不能實現，我們可以斷定什麼預備會議，國民會議完全是空話，段祺瑞完全是與吳佩孚一樣。然而我們不管現時之段祺瑞允許不允許，甚至將來之國民會議和預備會議允許不允許，我們工人總得向他們提出，我們即以此來試驗他們，我們絕對爲這些實際的要求而奮鬥！誰反對我們這些要求，誰就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就反對誰。工友們！快起來，去贊助國民黨此次對時局之主張，擁護共產黨所提出之要求使之實現，尤宜去爲自己的特別的實際要求（如上邊所提出者）而奮鬥！

段祺瑞執政與不平等條約*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日)

自北京政變後，段祺瑞擬入都就臨時執政時，東交民巷的帝國主義（法國帝國主義發難）即提出以承認「外國條約」做承認段為臨時執政之條件。不久段祺瑞果有「外崇國信」之宣言，博得帝國主義之「誇獎」。現在梁鴻志代表段祺瑞對日本帝國主義者（日記者）談話又公然有如此表示：「日記者問：此次臨時執政政府成立，對於各國條約之履行有無變更？梁答：對外條約不論何國均應遵守，此次臨時執政政府成立，其對外之一切權利義務，均當遵守不變，何況條約上明文之規定，當然須一一履行之。日記者問：任何一國如有特別關係者如何？梁答：此點不難判別，蓋所訂條約均依照明文履行之，如有特別關係者，亦將從特別條約上而履行之」。（十二月七日時事新報京訊）

由上面看來，段祺瑞要想取得政權，遂不惜承認帝國主義對於宰割中國之一切不平等條約，換言之，就是段祺瑞為着取得繼續曹吳在北京的地位（為帝國主義所承認之地位）而甘心承認一切賣國條約。這個問題是何等嚴重呀！

自此次北京政變，最反動的曹吳軍閥被推倒以來，在中國民衆方面本有一綫新的希望，這希望就是召集國民會議，產生真正人民的國民政府，內而廢除軍閥，外而修改不平等條約。因此代表國民革命的領袖中山先生，即發表宣言，召集國民會議，而國民會議唯一的責任，就在「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等」，換言之即在反抗帝國主義之侵掠。（見中山先生在滬對新聞記

* 原刊於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日的《嚮導週報》第94期。

者之演說) 中山先生此種主張，完全是代表中國真正的民意，救治中國目前唯一的要道。因為帝國主義強迫中國所訂之一切不平等條約不廢除，中國政治經濟絕無改進之希望，猶如奴隸之賣身契約（中山先生謂中國與各國所訂條約為奴隸之賣身契約）不取銷，奴隸絕沒有自由發展之可能。例如海關稅條約不廢除，中國的工商業有沒有發展之可能？領事裁判權不取銷，租界不收回，中國有沒有實行民主政治之可能？其餘如各種鐵路，礦山，借款……等條約，無一不是束縛中國政治經濟的發展和造成中國軍閥擾亂的根源。所以我們的結論，就是要想改造中國須從根本推翻帝國主義下手，廢除不平等條約，還不過是初步工作。帝國主義的勢力在中國存在一日，帝國主義不平等的條約在中國施行一日，中國的擾亂就延長一日，中國人民的奴隸生活就多過一日。所以中國目前唯一解決時局的先決問題即在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之一切不平等條約。（商報長壘君謂「必先有合理上軌道之政治，而後國力得有正當之發展；必先內有清明強固之政府，而後改約廢約，始有提出交涉之主體」。像這樣的論調就外表看似很有理由，其實這是倒果為因的說法。殊不知如果帝國主義對中國所加束縛不解除，中國那裏有合理上軌之政治！那裏有清明強固之政府！）

帝國主義自江浙戰爭以來，一方面幫助軍閥，擴大戰爭，一方面與各軍閥私訂借款條約（如美之無綫電借款，導淮借款，英之滄石路借款……等），同時又力謀在中國進行道威斯計劃。這真是「無所不用其極」了！現在曹吳已倒，英美帝國主義在北方受一打擊，此時正可發展民衆的力量以圖根本推翻帝國主義之不平等條約，如中山先生與中國共產黨之所主張。而段祺瑞居然以臨時執政政府貿然承認帝國主義宰割中國之一切不平等條約，此

種舉動，不啻曹吳第二，純屬賣國行爲，國人應起來鳴鼓而攻之呀！我們看梁鴻志答日記者之話：「如有特別關係者，亦從特別條約上而履行之」，這完全表明老賣國賊段祺瑞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之真實態度。我想大家還記着，當民國六年，段祺瑞掌政，安福部專權時，段祺瑞向日本帝國主義所借數萬萬參戰借款，所訂之種種賣國條約，此種借款與條約，經當時人民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至今尚未得到確定的担保與承認。現在段祺瑞既如此表示，那就是承認其當時與日本帝國主義所訂之一切亡國借款和亡國條約爲有效。並且由此可以推及段祺瑞已承認曹吳與帝國主義所訂的一切賣國條約爲有效。「此而可忍，孰不可忍」！

國人們！現在段祺瑞以臨時執政政府，敢如此專橫，試問與吳佩孚有何分別？這完全是去一吳佩孚又來一吳佩孚，真是所謂「以暴易暴」。我們應趕快起來反對，而反對的積極方法則在於急速促進國民會議預備會，從根本上取銷段氏之臨時執政的狄克推多。如果國民會議預備會不能召集，我們人民就須重走武裝革命的道路，以革命打倒此輩軍閥，以革命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之權力。

誰是中國國民革命的領導者 *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一)

處在半殖民地的中國人民，處在國際帝國主義與本國封建軍閥雙重壓迫之下的中國人民，應該聯合起來作國民革命，推翻國際帝國主義與打倒本國封建軍閥的革命，這是絕對沒有疑問的。除非是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的走狗或患神經病者，誰也不能否認這個革命；除非是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的走狗或患神經病者，誰也應該來參加這個革命。因為國民革命是我們處在國際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雙重壓迫之下的一切人民之唯一出路。

由此，我想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問題，絕不是應該國民革命與否的問題，而是誰來領導這個國民革命，即那一個階級來領導國民革命，使國民革命能夠徹底與怎樣作國民革命的問題。前一個問題比較後一個問題更為重要，如果前一個問題不解決，後一個問題就無從說起；因為一個革命，必定要在一個比較確定的更進步的階級意識指導之下才能進行，才能有確定的方向，才不至走到混沌模糊的瀚海裏去，才能達到最後的目的。半殖民地的國民革命，雖然是混合各階級的力量而進行的，然而必得有個主要的進步的階級作中堅、作領導者，才能使各階級的意識比較集中，各階級的力量集中，不致為某一反動階級的私利所亂，才能引導革命的勢力到目的地，徹底的消滅帝國主義與軍閥。

* 原發表於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的《新青年》國民革命專號。

在階級分化較明顯的國家裏之革命，所謂革命的領導階級本不成問題。如十八世紀法蘭西大革命，當時的階級分界是很明顯的，一方面是貴族僧侶的舊封建階級，即統治階級；他方面是新興的第三階級，即資產階級，被壓迫階級。（固然在被壓迫階級方面還有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等，然農民、小資產階級並沒有社會經濟的新發展之要求，只有消極抵制封建階級的剝削之需要；工人此時也說不上有發展其社會經濟的必要。所以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在當時只有第三階級有直接革命的需要。）在這樣情形之下推翻封建階級的法蘭西大革命，自然是資產階級為領導者，也只有資產階級能作領導者。英國十七世紀之資產階級革命與德國一八四八年之革命都是如此。在現時德、法、英、美所需要之革命，更是非常明顯，是單純的無產階級革命，自然負擔領導革命責任的只有無產階級。在俄羅斯的十月革命，早先雖很有些爭論，但經過二月的資產階級革命之後，無產階級應直接起來領導這個革命（最重要的是領導農民階級），在當時已是很明顯的事實了。惟在半殖民地階級尚未十分分化的中國裏，對於現時誰是國民革命之領導者一問題，放在我們面前，就未免有點混亂了。你說資產階級嗎？若按國民革命的性質，似乎應該是資產階級來領導（因國民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的）。可是由各方面事實證明，中國現在的資產階級，不惟沒有這樣事實的表現，並且還沒有這種志願，有時甚至於相反。如此問題就發生了。你說是工人階級嗎？似乎無產階級的本身很幼稚，而這個革命的性質又不是無產階級的（因無產階級除現時的國民革命之外還有其將來自己的階級革命）。因此也成了問題。但在經濟的觀點上，又只有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有領導中國國民革命之可能性。所以我們此時應從客觀的環境上，從客觀事實的表現上，來觀察中國，來

分析中國現時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之真實勢力，究竟誰能擔負指導中國的國民革命，誰是中國國民革命的領導者。

(二)

我們說過按照領導國民革命的本性，國民革命應該是資產階級的。現在我們看中國的資產階級究竟是怎樣？

先看銀行資產階級。現在在各資本主義國家裏銀行資產階級，差不多是與工業資產階級分不開的，大銀行家同時就是大工廠主。銀行的創辦是爲着發展工商業的便利，因此銀行的發展也就隨着工商業的發展而發展。在中國的銀行資產階級完全兩樣。中國的大銀行家最大多數是賣國的官僚，如新舊交通系。這是因爲中國銀行業的發展，並不是跟着工業的發展而發展的，創辦銀行也並不是因爲工業的便利，而是爲着政府要借外債。所以創辦銀行的人，多半是刮地皮之大官僚。這些官僚式的銀行家，一方面藉銀行經營外債或內債，得到巨大的回扣和紅利；他方面又藉此可以作官，再繼續不斷地刮地皮。如此就形成中國之奇形怪狀的銀行資產階級、財閥。這些財閥的唯一責任是在幫助軍閥賣國，幫助軍閥刮地皮或自己刮地皮。其餘一部分銀行資產階級除替軍閥政府經營借款之外，還作一點投機的買賣，可是它們因資本的不充足，又完全成了外國銀行的附屬物。由此看來，我們希望中國的銀行資產階級來作國民革命，打倒與它們相依爲命的帝國主義與軍閥，這是不是等於癡人說夢？並且他們不但不能革命，而且是必然的反革命者。

再看商業資產階級。中國的商業資產階級應分成兩部分看。一部分是專替帝國主義的資本家銷售洋貨或替他們收買原料的，即買辦階級。一部分則爲土著的商業資產階級，如鹽商、絲商、

茶商……或所謂售賣國貨之商人等。此種分法，本還是相對的，若徹底言之，中國所有的商業資產階級直接或間接差不多是外國資本家之買辦。土著的商業資產階級，因直接間接受了帝國主義之種種壓迫，軍閥之種種摧殘，在其經濟地位上確感覺到國民革命之需要。可是它勢力太薄弱，另一方面它還沒脫離宗法社會的關係，還是「在商言商不談政治」之軟弱心理，所以它不敢出頭向帝國主義與軍閥宣戰。它至多只能跟着別的階級跑。絕無領導別的階級之可能，這是近年來土著商人對待帝國主義與軍閥之態度可以看出來的。買辦的商業資產階級，的確是一種偉大的勢力，無論在數量上，在質量上，都在中國資產階級隊伍裏頭佔絕對的優勢。這是半殖民地的中國，作了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商場後的中國，商業資本主義畸形發展之結果。很明顯的，買辦階級的發生是由於帝國主義的侵入。買辦階級的長大，是由於帝國主義侵掠的進展，換言之，有了帝國主義的侵掠，才有買辦階級，有了帝國主義更猛烈、更廣大的侵掠，才有買辦階級更發展的機會；更貼切點說，帝國主義要在中國銷貨、買原料，才有代它銷貨和買原料的買辦階級，帝國主義銷貨越多，買原料越多，那時，買辦階級也越發財，越有勢力。現在我們說要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買辦階級的主人，你想買辦階級願不願意？何況帝國主義又天天用甘言巧語慫恿它呢。所以自從有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出現，買辦階級就老不耐煩，現在它更是毫不客氣地替帝國主義充先鋒來反對主張打倒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者了。我想大家還記得，當我們在「五四」運動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排斥日貨時，當時代日本帝國主義銷售日貨的買辦階級，或明或暗，就從中破壞，反對我們的舉動。我們再拿這一次廣東的商團事變來看罷。年來因為國民革命的潮流日高，在各處都招了帝國主義的大忌。本年國民

黨的大會因時勢所迫，在其新黨綱上採納了國民群眾「推翻帝國主義與打倒軍閥」的兩個要求，於是英、美帝國主義就發狂了，它們處處都想法消滅國民黨，消滅國民黨的廣州政府。（其實廣州政府何嘗是真正的國民黨的，不過是幾個新軍閥、新官僚面子上擁戴中山先生的一個政府罷了）。另一方面廣東的買辦階級也嚇得魄不附體；於是廣東的買辦階級就勾結英國帝國主義組織商團，謀倒廣州政府，壓迫革命的工農群眾，演成十月十五之大事變。這件彰明較著的事實教訓我們是怎麼？近來上海閩北商人又屢次呈請上海領事團，願以該區（即閩北）劃為帝國主義的租界，要求保護；當臨城案發生時，上海及各地的買辦階級亦大為帝國主義抱不平。聯電呈請美英大帝國主義共同管理「野蠻」的中國。至買辦階級之對於軍閥，有時間或打幾個電報，主張廢督，主張裁兵，但是它絕沒有落到實際上去。到了真正的國民革命者來要打倒軍閥時，它反而與軍閥合作了，反而幫助軍閥來壓迫革命者了。這是從京漢路罷工時，北京和漢口的買辦階級幫助吳大軍閥壓制工人的事實上和這次廣東買辦階級勾結陳炯明軍閥謀倒廣州政府的事實上，可以證實的。本來買辦階級幫助封建軍閥也是自然的傾向；因為（一）它的主人翁，帝國主義，是幫助軍閥的；（二）它在有些地方不能不利用軍閥來保護自己的利益。由此我們可以知道買辦階級絕不願意推翻帝國主義與打倒軍閥，它並且還要擁護帝國主義與軍閥，它將是反國民革命的法西斯蒂。

但是有人說：商人階級中如華僑曾經作過不少的革命工作，曾經幫助辛亥革命的成功，不能一概抹殺。不錯，華僑曾作過一些革命事業，但這是已往的歷史材料。華僑在已往的歷史上是革命的，可是在將來的歷史上却是反革命的了，至少也不能說還能革命。這個理由甚簡單，因為以前的華僑一方面受了外國帝國主

義的直接壓迫，需要一個自己的（階級的）祖國來保護；他方面又積累一點原始資本想拿到本國來辦工廠，同時又受了革命黨人之排滿宣傳，所以它就來幫助革命了。但是華僑到了現在，一方面受了辛亥革命的教訓（因為辛亥革命後華僑並沒得什麼，只覺空擲了無數金錢）；同時看見國內的無產階級又稍稍抬起頭來，它不惟不來像辛亥前那樣幫助革命，反而覺得前途大有危險。我們試看從國民黨改組，一部分工農階級的先進分子加入之後，在廣東造謠言，最反動的很多是華僑，他們天天造謠說國民黨赤化。所以中山先生在本年八月國民黨擴大執行委員會上閉會那一天演說道：「大家須明白，現在的華僑已經不是革命者了！」我以為這是中山先生深知華僑的一句話。

工業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比較獨立，與帝國主義的關係比較的淺，利害衝突比較的大，對於軍閥之連年戰爭，騷擾地方，製造土匪，勒捐重稅，妨害它商品的銷路與原料的來源。（如紡紗業因戰爭而商品停滯，原料來源缺乏，以致歇業者不少。）在這種情形之下，工業資產階級在其客觀的經濟要求上，確有革命之必要。它恨不得趕出帝國主義，收回關稅權，消滅軍閥，建設它自己的政府。但是在事實上它的力量太薄弱。中國真正的工業資產階級在其數量上太可憐。除了一部分紡織業的工業資產階級外，我們數不出多少工業資本家。因為中國之新式大工業，一大部分是在帝國主義手裏（如紡紗業，據一九二三年調查在全國已開工之總錠數為一·一〇六·八一〇，中國資本家佔四九九·三四六，而外國資本則佔六〇七·四六四；棉機共七·二二九，中國人佔三·〇九〇，外國人則四·一三九。其餘如礦山、電氣業、烟紙工廠……等都是如此。）另一部分則屬官辦（如製造廠、鐵路……），所以真正私人資產階級實佔最少數。同時中國的工業

資產階級發達得太晚，它現在剛剛走上工業的道路，正在打算目前關於自己本身上的小算盤，那裏有功夫有氣魄來營這廣大無垠的政治革命大問題。至於要它公然出頭來領導國民革命，來與最兇猛可怕的帝國主義和其走狗軍閥宣戰，這自然是沒有的事。所以工業資產階級近年來在各種事實上所表現出來的軟弱心理（如對於萬惡的軍閥僅打一個廢督裁兵的空電報，對於帝國主義之協定關稅，則只到帝國主義所開的華盛頓會議上去請願帝國主義開恩……），完全由於它的經濟基礎薄弱之反映。

但是有人說：「工商業幼稚的資產階級的懦弱心理，自然不易贊成革命，但產業發展到一定程度，企業規模超越地方的而漸成為全國的，同時又遭遇軍閥之阻碍或外貨外資之競爭，經濟的要求，自然會促起它有政治革命必要的覺悟。」這就是說中國此時資產階級雖然懦弱，不敢起來革命，若等到了它發展成為一個大階級時，換言之，等到中國成為資本主義國家時，那時中國的資產階級自然要起來革命，起來推翻帝國主義，打倒軍閥了。這樣的推論，未免有點機會主義罷。殊不知障礙中國產業發展的正是帝國主義與軍閥。若帝國主義不推翻，軍閥不打倒，中國的資產階級有發展成為一個大階級之可能嗎？中國有發展成為一個大資本主義國之可能嗎？這種很淺顯的道理，我想誰也知道。並且這裏還不要忘記了一種事實，就是現在的世界，已經不是十九世紀時代，世界的無產階級已經很兇猛地向世界的資產階級進攻了，不能容許任何一國的資產階級很平安地發展它的資本主義了。即令中國的資產階級有發展的可能，恐怕那時中國的無產階級又要取而代之呢。所以現在無論那一國的資產階級都有其後顧之憂。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也是一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一方面很憤恨其宗主國帝國主義之壓迫，想起而革命

，可是同時又望着站在背後的無產階級，很獐狎地可怕。此種情形在現時之印度表現得非常明顯，印度的資產階級，在其經濟實力上，本可反抗英國帝國主義，脫離英國帝國主義之羈絆。但是印度的資產階級始終不敢起來以武力對抗英國，只想在英國帝國主義下合法的印度會議裏多爭幾個議席，慢慢地改良改良，反不若一班小資產階級之熱烈的國民運動，還表現一點印度人民之浪漫的民族精神。中國的無產階級如果起來（中國的國民運動愈提高，中國工農階級的勢力必然隨之而擴大），在國民革命運動的戰綫上，中國的資產階級不惟不敢出來作領導，打先鋒，它必然還是流到反革命一方面去。由上說來，我們可以知道中國的資產階級中反革命的成分居多（如財政資產階級和買辦的商業階級是絕對反革命的，工業資產階級因恐無產階級襲其後的原故亦很有反革命之傾向），而革命希望的很少。（僅土著的商業資產階級，革命的需要較大，但必須有旁的階級來指導）。在這種情形之下，要資產階級來參加國民革命，已是難能之事，若望其來作國民革命的領導者，寧非夢想。

(三)

中國的資產階級既不能領導國民革命，但是誰能領導呢？與資產階級對抗的是工人階級，究竟中國的工人階級是怎樣？

先看工人階級的數量。在經濟落後，產業不發達的中國裏，自然工人的數量是很少的。可是在同一情形之下，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比較起來，它的數量却已是不少了。中國工人階級底確實數目，現在還沒有可靠的統計可考，有人說一百六十萬或云一百八十萬（專指產業工人言）。然而這樣的數目不甚重要，我們所要說明的就是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數量之對比，究竟誰強誰弱

。在純粹的工業國家裏，資產階級的數量與工人階級的數量之發展成爲正比例，這就是說有多少工業，就有多少資本家，就有多少工人。但是在半殖民地的中國，這個比例完全不同了。我們在上邊說過，因爲中國的大產業，如運輸業中之航海業甚至內河中之航業、紡織業、大礦業以及電氣業……等，大部分操在帝國主義者手裏，即外國的資產階級手裏，這些資產階級自然不屬於中國。可是在這些企業下之工人，確是中國的工人階級，如幾萬海員，如開灤之煤礦工人以及在山東、奉天各地凡外國資本家所辦礦山下之工人不下幾十萬，紡織業工人六十餘萬，這均是中國真正的工人階級，而且是最有覺悟的工人階級。在另一方面如許多官辦之企業，如交通部所屬之鐵路郵電等企業以及兵工廠、造船廠……等，在這些企業裏只有工人，沒有資本家，因爲資本家是政府，即現在之軍閥。在這些國家企業下之幾十萬工人階級，若拿來與資產階級比，亦完全是多餘的。以上的說明，完全是事實，這很可證明工人階級在數量上強過資產階級無數倍。

我們再來看看工人階級之覺悟力，即革命的要求。我們已知道資產階級之與外國帝國主義接近者與軍閥有關係者如財政資產階級、買辦階級甚至一部分的工業資產階級，都是反革命的。可是工人階級却與此相反。在外國資本家企業與官辦企業下之工人，革命性格外的發展，格外的仇視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這個完全是物質上直接衝突的反映。因爲他們直接受外國資本家之剝削與壓迫，直接受封建軍閥之剝削與壓迫，他們天天看見猙獰兇惡的帝國主義與軍閥拿着鞭子向他們打，他們一舉一動都在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嚴重監督之下。大家想在這樣的環境裏，能不發生反感嗎？中國的資產階級有沒有這樣的感觸？即中國的農民和手工業者能不能得到這樣的教訓？中國一班智識階級——大學教授、

學生、普通教職員、醫生、服務於公私機關的職員……等，像工人階級在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之企業下所嘗的這種「滋味」，他們能不能領會？我曾經同幾個海員、唐山的煤礦工人和津浦鐵路工人談過幾次話，我一提起外國資本家和中國軍閥他們就咬牙切齒。他們歷數外國人在海船上之怎樣賤視中國海員，怎樣不平等地待遇；津浦路上之英國管理員怎樣地刻薄，唐山之英國人怎樣兇惡，怎樣地壓制他們，管理鐵路之官僚，怎樣貪暴無恥，怎樣地壓迫工人；當工人罷工時或有什麼要求時，外國人與中國官僚怎樣共同陰謀對付，凡此種種都是我們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可惜我此地不能一一寫出來。但是由此我們可知道中國工人階級所受外國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之殘酷的待遇，比中國任何階級要迫切，所以中國的工人階級認識它的敵人——帝國主義與軍閥，比任何階級要明確，要深刻。這就是中國工人階級能擔負領導中國國民革命之唯一客觀條件、根本原因。

現在我們且舉幾件中國工人階級反抗外國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之事實來看，一九二二年的香港海員總同盟罷工，在這次罷工運動裏，以六萬海員居然霎時間能團結一致，並且奮鬥經過月餘之久，結果征服了極兇惡的帝國主義。他們當時那種奮鬥精神，那種決戰態度，那種持久毅力，是不是資產階級所能望及？同年唐山煤礦工人與洋灰工人，亦五萬人總同盟罷工，反抗英國帝國主義的資本家，經過很兇猛的戰鬥，雖卒為英國帝國主義走狗封建軍閥楊以德所壓潰，然而中國工人階級之奮鬥、勇敢與犧牲的精神，反抗帝國主義的精神，亦於此表現出來了。京漢鐵路的罷工，當時工人竟以徒手而與武裝的軍閥決戰，不惜犧牲一切，這種勇猛、奮鬥、犧牲的精神是何等偉大！這是不是中國人民直接反抗封建軍閥之破天荒的舉動？此種偉大的表現，不僅證明了中

國工人階級真正能擔負領導中國國民革命的使命，並且證明了它已是世界革命之先鋒軍了。在最近廣東商團事變上，更加證明買辦的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對於國民革命之極端相反的趨向。其餘中國工人階級在各方面對於反帝國主義與反軍閥的表現，都是極明顯而極堅決的。這完全是由於它那天然反帝國主義與反軍閥的客觀條件所規定。反過來說，中國工人階級之反帝國主義與反軍閥的革命性與覺悟力都是天然的。所以中國工人階級天然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

我們討論中國的國民革命問題，絕不要忘記了中國不是一個與人世絕緣的孤島，它始終不過是全世界許多需要革命的地方中之一個地方。這一層非常重要，如果忽略了，就絕對不能懂中國的國民革命，對於中國國民革命絕對不能有真正的信仰。現在全世界已經到了一個整個的革命時期，並且聯成了一條整個的革命戰綫。在歐、美、日本資本主義國家裏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革命，而在非洲亞洲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是被壓迫民族對宗主國帝國主義的革命，即所謂國民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國民革命是站在一條聯合戰綫上，同向世界的資產階級即帝國主義進攻，是互相依賴、互相幫助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即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之國民革命的勝利，譬如英國無產階級革命成功了，印度的國民革命還成問題嗎？現在站在這兩個革命——世界的無產階級與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綫上，當總指揮的就是已經無產階級革命和國民革命成功了的蘇俄。它把它從革命中所獲的勝利，無論是物質的、是精神的都盡力貢獻於世界的革命者，可是參加中國國民革命的各階級中，誰能夠真正容納此種貢獻——尤其精神的貢獻即革命的經驗——呢？資產階級嗎？它在世界革命的過程上已是反革命的嫌疑犯，它很有與世界資產階級聯合之傾向。所以只有

中國的工人階級能容納蘇俄之供獻，能得世界無產階級之幫助，能吸收世界革命之經驗，僅在這一點上，已能決定中國無產階級絕對是中國國民革命之領導者。

現在還有兩個關於中國工人階級的疑問，應該解釋一下。(一)有人謂中國工人大多數還沉睡在宗法社會裏，滿頭腦還是宗法社會的思想，一切行動還不能脫離宗法社會的習慣，還不能有真正的階級覺悟。不錯，這是事實，可是絕不能因此遂謂中國工人階級不能領導國民革命。因為工人儘管有宗法社會的思想，有宗法社會的習慣，但是一到了物質的衝突時，與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真正衝突時，那些平時的什麼宗法社會思想和宗法社會習慣，都失了作用，它依舊是最勇猛的敢死軍。這是我們上邊所舉出京漢路工人等的流血事實已證明了的。並且工人階級經過兇猛奮鬥一次，它的階級覺悟也就發達一次，它那宗法社會的思想和習慣也就洗刷一次。經過幾次兇猛奮鬥之後，不惟宗法社會的思想與習慣不成問題，而且其革命性、其階級覺悟更特別發展。譬如經濟落後，宗法社會習慣最深的俄羅斯之工人階級（如俄國工人以前篤信宗教就是一例），所以特別有革命性就是這個道理。何況中國的資產階級也一樣充滿了宗法社會的思想與習慣，在這一點比起工人階級來更是落後呢。(二)有人又謂中國工人在物質上不及資產階級的雄厚，彷彿是應該隨着資產階級走的。這裏我不明白，所謂物質基礎，這是指如我上邊所說之工人階級的數量呢，還是指資產階級錢多呢？如果是指數量上說，上邊已答覆了。如果是指錢多，那就未免滑稽了，那就只好教全世界的無產階級不要革命了，因無產階級生來就是沒有錢的。然而俄羅斯的「窮」無產階級却已革命成功了。可見「錢多」與「錢少」是沒有問題呀！

(四)

國民革命乃是各階級之合作的革命，除了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外，還有農民、手工業者、小商人、智識階級、各種苦力、甚至游民無產階級。我們現在討論國民革命之領導者的問題，對於這些階級的利益之趨向，就是這些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那一方面接近，亦很可決定其領導者的地位。所以我們應把這些社會分子來分析一下。

佔中國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農民群眾，為中國國民革命之偉大的勢力，誰也不能否認。我們可以說，如果中國的農民群眾不來參加國民革命運動，中國國民革命運動是不會成功的。何況中國的國民革命，農民本是直接的主人翁，即是西歐的無產階級革命，也必須得農民的幫助，才有可能。但是農民因為經濟地位的落後，階級觀念的守舊，無論無產階級革命，無論國民革命，始終只能作一個主要的輔助階級，而不能作領導者。但是中國的農民，按他現時的經濟地位，階級利益，容易與誰接近呢？輔助誰呢？這裏非常的明顯，就是誰能真正打倒軍閥，誰能幫助它反抗地主的壓迫，它就跟誰走、輔助誰。因為農民近年來因軍閥連年戰爭，苛捐重稅，逼迫到了絕路，所以農民此時之恨軍閥已深入骨髓，我們只看惠州農民之反對陳炯明，湖南農民之反對趙恒惕以及陝西農民之暴動等，就可知道。另一方面因軍閥重苛地主，地主則復嫁之於農民，於是農民之恨地主、反抗地主亦在所發現（尤以廣東為甚）。但是農民反抗軍閥、反抗地主，資產階級能夠幫助他們嗎？這是絕對沒有的事，並且有許多資產階級同時還是地主呀。所以幫助農民反抗地主、反抗軍閥的、只有工人階級，這可以拿廣東和湖南的事實來證明的。指導湖南衡州農民反抗地主反對趙恒惕的全是工人階級的代表，或加入工人階級隊

伍的學生，指導廣東惠州、海豐各地農民反抗陳炯明和該地地主的也是如此。並且我們看最近廣東工團與農團之一切共同的主張與行動，反對廣東的買辦階級陳家軍閥，更可證明農民已經實際跟隨工人階級、輔助工人階級了。由此我們可以斷定中國的農民必然是跟着中國的工人階級，受工人階級的指揮的。

手工業者更容易與工人階級接近，因為他在經濟上與工人階級已相差不遠（手工業者中之帮手已近無產階級，所差者不過一為用手工具生產，一為用機器生產而已），所以手工業者之輔助工人階級，受工人階級的指導，這是絕對沒有疑問的。（譬如廣東湖南的手工業者已很多與產業工人組織在一工會裏。）並且手工業者不僅在國民革命上是工人階級的助手，就是在將來的無產階級革命上也一樣的是助手。

小商人在其性質上，較近於資產階級。但是他們處處都受大商人的壓迫、排擠，而對於工人階級倒反兩不相關。在反對抽重捐苛稅的軍閥和賤視中國人（自小商人看來是如此）的帝國主義，他們又是必得要參加的。這樣，所以小商人是容易受工人階級的指揮。

現在來看智識階級。智識階級本沒有確定的經濟基礎，因此也沒有確定的階級傾向。它是依附着社會各種有經濟地位的階級而存在，所以它不能成一整個的階級，只是備各種階級的使用，在資本社會裏，智識階級十分之八九是附屬於資產階級，為資產階級所使用，因此它常是反革命的，如現時西歐各資本國裏之智識階級十分之八九是屬反動派。可是在中國却不然，除一部分為帝國主義所收買、軍閥所僱傭、資產階級所役使以外，差不多都有幾分浪漫的革命性，它們大概雖是資產階級的心理，但他們實受帝國主義的侮辱（在智識階級看來），受軍閥的冷視（軍閥不

用它)與摧殘(如學校學生們和教職員之要求教育而被打被驅逐甚至被殺就是)，所以它們也很反對帝國主義與軍閥，很贊成國民革命，並且有時還很激烈地參加革命。但是誰能夠領導它呢？換言之，就是它要在那一個階級的指導之下活動呢？這很難確答，但是我可以斷定，如果有一部分的智識階級，仇視帝國主義與軍閥最深之智識階級，即智識階級之左派，它要成功國民革命，

推翻帝國主義與軍閥，它必然要受工人階級之領導，在工人階級的意識底下去活動。(關於中國智識階級問題極複雜，容當專著論文討論。)

苦力，即各種夫役，黃包車夫……等，它們在經濟地位上，是極受壓迫的人，光在這一點已很接近工人階級了，自然是容易接受工人階級的指揮。游民無產階級，即青、紅幫，一切土匪和兵士等，這些群眾確是中國一個大難題，在國民革命上亦很難對付。他們沒有一定的階級意識。他們只要飯吃，誰給他們飯吃，他們就給誰服務，不管封建軍閥，也不管帝國主義。所以現時大部分之游民無產階級都為軍閥所利用，成了一種保證軍閥賣國殃民之武器。其餘的化為土匪，也是殺人放火，不分皂白。本來游民無產階級是受外國帝國主義之商品侵掠而失業，受封建軍閥之剝削與擾亂而更流落，可是它絕不能懂得這個道理，它很難認識到它們的真正敵人——帝國主義與軍閥。然而真正的國民革命絕不是建築在游民無產階級的基礎上(現時之國民黨就是因建築在游民無產階級如土匪軍隊的身上以致不能成為革命的黨)，所以游民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的群眾上不甚重要，可是也有相當的作用，因為它也是被壓迫的，有時也有用得着它的地方，不過必須在工人階級的意識指導之下，才可以免除許多危險，才有相當的革命意義。

我們分析以上各種階級，姑除開游民無產階級外，差不多是與工人階級接近的，容易受工人階級的指示與領導的。我們現在可以斷定，在物質的基礎上，在革命的覺悟上，在世界革命的環境上，以及中國各社會階級的利益和意識之趨向上，中國的國民革命，只有中國的工人階級配作領導者，也只有它能作領導者。

(五)

現在還留下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的國民革命，在客觀的條件上，既只有中國的工人階級能夠作領導者，爲什麼中國的工人階級就不把這個革命，作成自己的階級革命——無產階級的革命呢？這個道理非常明顯。因爲：(一)中國工人階級此時唯一的敵人並不是中國的資產階級，而是外國帝國主義與本國封建軍閥；(二)在世界革命的意義上，在中國革命歷史進化的階段上，中國工人階級打倒外國帝國主義與本國封建軍閥，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之第一個步驟，是中國工人階級走到無產階級革命必經之路；(三)中國的各種社會階級在國民革命的意義上現時是能夠受工人階級之領導的，可是如果拿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意義上就很有些疑問了，恐怕有許多分子馬上就會變成反革命者。中國工人階級，在策略上，爲的大敵在前，消滅共同的仇敵，也絕不能使階級過早分化，分去革命的勢力。有此三個原因，所以中國工人階級在目前只集中各階級的革命勢力於國民革命之一個焦點上，以期消滅當前之大敵——帝國主義與軍閥。可是同時中國工人階級的使命絕不限於國民革命，絕不限於消滅帝國主義與軍閥，它自有它更偉大的使命，最終的目的——無產階級革命。所以它一方面須極力領導國民革命，推動國民革命到底；另一方面又須準備將來之無產階級

革命。

列寧在一九〇七年說：「無產階級（指俄國的）的積極責任，是在推動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革命到底而為其領袖。」接着他又說：「要無產階級抓住德謨克拉西的小資產階級，尤其是農民，以與專制皇帝和背叛的自由派資產階級奮鬥，在這種條件之下才有可能。」（見「對於資產階級政黨之關係」《列寧全集》第八卷四一一頁。）這是列寧主張俄羅斯無產階級在當時對於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之態度。當時的俄羅斯與現在的中國很有相彷彿的地方。所以中國工人階級此時一方面應該起來作國民革命的領袖，推動資產階級性的國民革命到底。要推動這個革命到底，也就須抓住一切小資產階級（自然最重要的是農民，而手工業者、小商人、小資產階級的智識階級亦很重要。）以與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和反革命的一切買辦資產階級奮鬥，那時中國的國民革命才有達到目的之可能，中國的國民革命才不至於流產。

（本文文內重點，都是由著者後來加上的——編者）

孫中山先生之態度問題 *

(一九二五年一月七日)

凡是民衆領袖，當其代表民衆利益而與敵人奮鬥時，必須有明確的態度和保持此態度之堅決的意志。必如此才能得到群衆之真正的信仰和擁戴，才能屈服敵人，才能達到最後之勝利，不然必難免最後之失敗。這是由許多歷史事實可以證明的。

此次中山先生北上，確是以民衆領袖的資格，代表民衆之利益而與帝國主義和其工具，封建軍閥，奮鬥之表現。因此當中山先生發表召集國民會議宣言而北上之時，全國各階級的民衆如潮水一般興起，歡迎，發表宣言，遊街示威，組織國民會議促成會，總之無處不是表示他們對於他們的領袖中山先生之十二分熱烈的信仰和擁戴，這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事。由此我們亦可以看出中國群衆之覺悟程度，只要民衆的領袖導之以方，中國政治前途之發展，未始不可樂觀。

但是中山先生自抵天津以來，對於自己前所發表之主張，譬如他所主張之預備會議，並未正式發表召集的宣言和怎樣召集的條例，又未提醒段執政召集，我們認此已爲中山先生之失策。直到段祺瑞公然以臨時執政的名義承認各帝國主義之不平等條約，公然以臨時執政之名義擅行宣佈召集善後會議之條例，這是向我國民下哀的美敦書，亦即是向中山先生下哀的美敦書，我們以爲代表國民革命的領袖中山必然出來抗議，可是中山先生終未正式發表一言！然而我們還以爲中山先生尚未進京，也許進京後一齊發表。可是現在中山先生抵京又十日了，依舊是噤若寒蟬！我們

* 原刊於一九二五年一月 七日的《嚮導週報》第98期。

忍不住要問了，不知道中山先生的態度究竟如何？據中山先生的宣言，明明白白是主張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而段祺瑞現在却公然擅自向帝國主義承認此種條約之繼續有效；中山先生明明白白主張召集人民團體的國民會議預備會，而段祺瑞現在却公然擅自召集其軍閥的善後會議，像這樣是不是段祺瑞向民衆與中山先生下哀的美敦書？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現在民衆對於段祺瑞此種哀的美敦書，已經有好些有了答覆，就是有好些團體已正式宣言反對段祺瑞之承認不平等條約和其所召集之善後會議了，可是代表民衆的領袖中山先生對於如此重大的事件，至今還是一言不响，我們不知道中山先生此次北上究爲什麼？他爲什麼發表那樣的宣言，中山先生此種曖昧的態度，殊足以引起民衆之懷疑。

據本報北京通訊員羅敬同志的通訊：「近來中山左右在同志間宣傳兩大原則：(一) 絕對不妥協，(二) 又不決裂。」這個我們不能了解，如果像羅敬同志所解釋：「與段不妥協，亦不與段做露骨的反對，將來結果只有悄悄地使中山離開京津或假一個什麼好名義作海外遊客」那就糟了。這就是說中山先生發表堂堂皇皇之宣言，結果只是一走，如此將來群衆還能信仰中山先生擁戴中山先生嗎？

總之中山先生自到津京以來所取之態度是很曖昧的，是有失群衆的信仰的，是有碍於國民革命之進行的，我們無須多多批評。但我們十二分誠懇地希望中山先生成功其在中國所負之國民革命的歷史使命，因此我們希望中山先生不要失去民衆的信仰，希望中山先生趕快表明其態度。據我個人的意思，中山先生此時應根據其所發表之宣言嚴重地向段祺瑞提出，而極力主張召集預備會。中山先生應該抱定站在民衆的利益上，而下與帝國主義和軍閥奮鬥之決心，由這個奮鬥中更進一層地宣佈帝國主義和軍閥之

罪惡，取得被壓迫的民衆之真實的信仰和擁戴，那時最後的勝利才是中山先生的，不然最後的失敗也將根基於此。

二七鬥爭之意義與教訓 *

(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

自帝國主義侵入中國後，在中國近數十年來的革命運動史上，表現得最有價值而最可注意的，是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及「二七」鬥爭。在這四個運動中，二七鬥爭是最後的表現，而又是最進步的最革命的工人階級在中國階級鬥爭史上之第一次的表現。中國的工人階級從香港海員罷工，開灤礦工罷工，直到二七鬥爭，已由經濟的總同盟罷工，而直轉為純粹政治的總同盟罷工(二七鬥爭純粹起於要求集會結社自由)以至於以徒手工人而與封建軍閥的武裝軍隊格鬥。這是中國工人階級之最急進而最猛烈的表現。二七鬥爭是中國工人階級鬥爭史上之最光榮，最偉大的第一頁。從這一頁最光榮和最偉大的歷史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出兩點最重要的意義：(一)在這次鬥爭中充分地表現了中國工人階級之偉大的團結與一致的精神。當鄭州會議之時，不僅京漢路數萬工人全體一致遣派代表出席，即各路工人如津浦，粵漢，京奉等幾至全中國的鐵路工人無不派有代表參加，並且其他武漢，上海，廣東各地的工人團體亦多派有代表赴會慶賀。這已夠證明中國工人階級之團結與一致的精神了。到鄭州會議被壓迫解散，京漢路總工會的總同盟罷工命令下時，全路工人幾如响斯應，雖各地軍閥走狗百般威脅利誘，然而全路工人始終服從總工會命令。至二七失敗，各地工人更是激昂慷慨，憤起而與軍閥抗爭。道清，正太，及津浦南段都一致罷工援助，其他各路都表示參加，惜均為武力壓迫，未能成功。此外在湖北由全省工團聯

* 原發表於一九二五年二月出版的《嚮導週報》第101期。

合會發佈總同盟罷工，為京漢路工人之後援，當時曾經實行罷工的工團有粵漢路工人，漢陽鋼鐵廠工人，漢冶萍輪駁工人，揚子機器廠工人，丹水池工人，其他準備罷工而未成者有武漢電話，電燈，自來水及其他工人。同時上海方面許多工團亦有此種運動，均為軍閥嚴防不得實行。其餘各地工團對於京漢被害工人救濟，無不踴躍從事。總之，在二七鬥爭中全中國工人階級在行動上，在鬥爭上已很明顯表現一致的團結了，已表現他們認識自己整個的階級利益而一致地對付敵人了，這個意義是何等偉大而有價值啊！(二)在此次鬥爭中並充分地表現了中國工人階級之最勇猛的奮鬥精神和偉大的犧牲精神。我們知道京漢路的工人階級完全是在曹吳瀟等野蠻軍閥的武裝監視之下，然而京漢路的工人絕不因此有所恐懼，只是勇猛地奮鬥以期達到應有的集會結社等自由目的。當蕭耀南軍隊以武裝向江岸總工會進攻時，工人群眾依然不退，竟以徒手與之搏戰多時而不肯退。直到領袖們極力命令工人退避，才始走散，以至死傷百餘人，尤其是江岸工會會長林祥謙臨刑時之慷慨激昂，施洋同志之從容就義，其他各路及工團明知必被軍閥資本家壓迫失敗，而卒以同情罷工，表示願意為階級而犧牲，這種奮鬥精神，犧牲精神，是何等勇猛而偉大啊！

在二七鬥爭中，據以上兩點最重要的意義之顯示，很足以證明中國工人階級不僅是能擔負中國的革命事業，並已證明能擔負世界的革命事業。在以前「誰來擔負領導中國的民族革命」似乎還是問題，到二七鬥爭之後，這個問題由事實教訓我們完全解決了，擔負中國一切革命事業——由民族革命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只有中國的工人階級。中國工人階級由二七鬥爭的證明，是中國民族革命之唯一先鋒軍，領導者，並且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軍之一枝有力軍隊。

但是這一個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二七鬥爭，至今已歷二週年，中國還很少有人懂得，然而這是無足為怪的。可是站在無產階級隊伍的同志們，也對於這個鬥爭發生懷疑誤解，這是我們在這二七鬥爭第二週年紀念日子不能不申辯幾句的。據那些同志的意思，以為「二七」是當時指揮者的錯誤，以為鄭州會議被解散後的總同盟罷工命令是不應該下的，以為江岸工人是不應與蕭耀南的軍隊格鬥或早須與蕭耀南妥協的。甚或有人謂當時的工人群眾太囂張太野蠻的。其實這都是些帶有機會主義的人們見鬥爭失敗之自然的表露。當每一個鬥爭失敗後，機會主義者總不肯從客觀事實去分析事象的真原因，從鬥爭中去學到真教訓，而只憑主觀的見解，按照自己的畏縮心理去推測，事後去歸咎個人，歸咎群眾，甚或認為歷史之自身錯誤。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莫斯科工人武裝暴動失敗之後，俄國少數黨的態度就是如此。蒲列哈諾夫批評莫斯科工人武裝暴動說：「不該去拿武器」。其實當時工人要拿武器去起暴動，已經是革命潮流急趨直下之必然的表現，已絕不是事後用「不該」兩字所能否認。所以列寧答覆蒲列哈諾夫說：「恰好相反，應該更堅決地，有力地，進攻地去拿武器，應該向群眾解釋，僅僅一個和平的總同盟罷工是不可能的，必得要一個嚴刻的和殘酷的武裝鬥爭」。我們須知道，群眾的革命潮流一起來，尤其是無科學組織的群眾，到了某程度，絕不能受指導者之如意指揮，只得由群眾之自然的要求向自然的方面進展，必至達一定的目的或為敵方所壓迫時，才能終止。所以莫斯科工人之武裝暴動，是群眾的革命潮流已到一定程度非如此表現不可的。二七鬥爭事件也是如此。受數重壓迫與剝削——軍閥，官僚走狗，帝國主義者，各鐵路的高等管理員，工程師之均為外國人（京漢路則純為法比兩國人）的京漢路工人，一旦見有機會可以得到一

點自由，可以從此爭得一點應享的權利；一轉瞬間又被人奪去，怎由得他們不狂爭瘋鬥！所以當鄭州會議被解散之後，當時的工人羣衆，當時的工人代表，尤其是京漢路南段的代表，差不多已憤不欲生，所以在代表會議上決定總同盟罷工時，雖有些份子主張暫時不發罷工命令，然而潮流所趨，此種老成的主張已完全失其效力。至蕭耀南向江岸工人進攻時，工人亦決無他法可以避免，而工人之所以冒死徒手奮鬥，亦完全爲一種積久的憤氣之所致，一切常態的理智那時均失其作用。至說在事前不與蕭耀南妥協，殊不知吳佩孚蕭耀南早已準備着一網打盡之計，那裏容有妥協之餘地；何況羣衆至此，已走極端，在客觀上已不能隨便回頭了。至謂當時工人羣衆之激昂與「野蠻」，殊不知這正是羣衆到了革命潮流高漲期中之本色，我們遍觀一切革命史如法蘭西大革命，俄羅斯十月革命都是如此，何況京漢路工人並不那樣。總之二七鬥爭不是偶然的，不是人爲可以使之產生或阻止的，是中國近百年來的社會經濟政治所養成的，即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壓迫所逼成的。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用不着並且不應該事後用主觀的見解去推測，因失望而去歸咎別人和羣衆。我們的責任是在找出真正的客觀原因來，從這種觀察中得着真實的教訓。我以爲二七失敗的根本原因是：(一)以前在京漢路上（各路亦然）主持工會的人所作的工作，偏重在表面，只專注意於分工會總工會之成立，而來不及注意到下層的組織工作，如工廠支部的工作，沒有切實去訓練過工人羣衆，所以工人一暴動起來就顯出原始的狀況，而不容易制止。待到失敗之後，工人已有的上層組織即完全瓦解，前功盡失（以前各地的工人運動都有此種現象）這是第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教訓。(二)工人階級的政黨沒有與工人羣衆發生最密切的關係，無產階級之革命的理論與革命的組織，還沒深入到

工人群眾去，如果京漢各路的工人群眾當時與中國共產黨有密切的關係，中國共產黨握住了真正的指導權，在京漢路作指導工作的人都受黨的支配，那二七鬥爭的失敗，絕不至於如此。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第二個教訓。(三)工人群眾以前對於軍閥吳佩孚之保護勞工的假面具，沒有認清，總以為吳佩孚不至於如此槍殺工人；因此沒謹慎的防備，以至過於誇張。殊不知軍閥與工人階級在其階級利益上，已是絕對不能調和的仇敵，若遇到真正的利益衝突時，不是你死，必是我亡。這是從實際上給了群眾一個教訓，這也是值得我們注意之點。然而以上的原因完全是客觀的，因為中國勞動運動歷史如此之短，那裏就能免除我們現在指出之錯誤，譬如黨與工人群眾之關係，其實那時的黨自身還在組織時代，何能深入於工人群眾之中？但是我們現在應該指出這些客觀的失敗原因來，這是我們最可寶貴的教訓。

現在壓迫二七工潮的萬惡曹吳軍閥已倒了，殺工人的劊子手蕭耀南也在地位搖動之中；另一方面又值新軍閥尚未能鞏固其地盤與勢力時，京漢路工人乘着這個機會，又居然能在鄭州——以前被吳佩孚壓迫的地方——團結全路工人參加全國鐵路總工會代表會議了，這是何等可賀啊！但是我們在這個可賀的熱淚聲中，很誠懇地希望京漢路工人先進份子來注意我們所指出的二七鬥爭的教訓，將這些教訓變成京漢路將來進行工作上之實際生活才不至再蹈以前的失敗。我們更敬告京漢路的工友們，你們的前途還是多麼險阻！你們的仇敵還在那裏虎視眈眈，祝你們好好地記取二七鬥爭的教訓，審慎地努力奮鬥，得到最後勝利！

上海總工會被封與上海工人今後的責任

(一九二五年十月五日)

*

上海總工會何以被封？我們要了解這個問題，須知道上海總工會，換言之，即上海工人在此次「五卅」運動中所演的作用。

在五卅運動中最能與帝國主義以嚴重打擊的，就是中國的工人階級，尤其是上海的工人與香港廣州的工人。我們看見英日等帝國主義者有幾千萬噸貨物在上海香港廣州等處一點也不能上岸，我們又看見他們在中國沿海沿江所有的輪船一步也不能移動，他們在上海香港各地的工廠都完全關閉，他們的洋行甚至飯店，都歇了生意。總而言之，就是他們在中國一切的活動都被停止了。然而我們試問何以如此？是不是上海香港等處的海員、碼頭工人、工廠工人、洋行的職員、飯店西蔥不給他們工作？我們又問何以上海香港廣州等處之海員、碼頭工人、工廠工人、洋行職員等不給帝國主義者工作，能堅持至數月之久呢？這層我想誰也能知道，是因為上海香港廣州的工人們都有了堅強的偉大的組織——總指揮機關。這總指揮機關便是上海的上海總工會和香港廣州的港粵罷工委員會。所以我們說五卅運動所以成爲一個偉大的運動，能堅持至數月之久，與帝國主義以嚴重的打擊的，就是上海和香港廣州的工人，就是上海總工會和廣東的罷工委員會。自然我們並不否認商人罷市學生罷課而奔走呼號以及各種民衆之熱心捐款濟工……等在五卅運動中之作用。然而如果沒有上海香港五十餘萬工人之罷工，沒有上海總工會和港粵罷工委員會之堅決與機敏地指揮上海廣東香港的工人，我敢斷言此次五卅運動，決不能

* 原刊於一九二五年十月五日的《嚮導週報》第132期。

與帝國主義有何等打擊，決不能引起世界無產階級的同情，祇不過曇花一現而已。我們看上海香港及各地商人之半途罷市而妥協而反動就可知道。

因此帝國主義遂拼命地想摧殘指揮上海罷工工人的上海總工會和指揮廣州香港罷工工人的港粵罷工委員會。但港粵罷工委員會在廣州政府統治之下，帝國主義雖陰謀險狠亦無可如何，只能利用反革命軍閥——楊希閔劉震寰魏邦平梁鴻楷等謀倒廣州政府而已。但在上海，他們則嗾使其走狗奉系軍閥，上海的統治者，摧殘上海總工會了。

現在我們可以說上海總工會被封之根本原因，是上海工人在五卅運動中所表現的勢力之可怕，帝國主義者看到此種勢力之存在，是將來要制他的死命的。然而我們從反一面又可以看出此種勢力是救中國的唯一勢力，是能解放中國被壓迫民族的唯一先鋒軍。

我們會屢次說過，要想把中國民族從帝國主義及其工具——封建軍閥的枷鎖下解放出來，換句說，要想達到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只有中國的工人起來奮鬥，起來作領導才有可能。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工業區，是俄羅斯的彼得格勒，俄羅斯的二月革命以至十月革命都是彼得格勒工人為領導，俄羅斯革命的成功也可以說是有彼得格勒的偉大工人群眾的努力。中國將來國民革命以至無產階級革命的成功必然依靠在上海工人群眾之上。

我們知道上海總工會雖被封了，但是上海總工會在上海二十餘萬工人的腦中決不會消滅，一遇有機會，上海總工會馬上就會復活起來。並且上海數十萬工人在此次五卅運動中，在上海總工會指導之下，已經學到了許多經驗，許多革命的初步方法，將來再進一步，就要走上武裝暴動的道路，走上武裝革命的道路，就

要學彼得格勒工人的榜樣由二月革命而至十月革命。

上海的工友們！你們應認識你們的責任，你們在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上在中國無產階級革命上所處的地位與使命。你們是俄羅斯彼得格勒的工人，你們要準備領導並且訓練全中國的被壓迫民衆去消滅帝國主義與其工具軍閥，你們並且還須準備你們最後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工作。上海的工友們！彼得格勒的工人就是你們的模範，你們向彼得格勒的工友那裏去學他們的革命經驗！

（本文文內重點，都是由著者後來加上的——編者）

我們的北伐觀 *

(一九二六年九月八日)

廣州國民政府的「北伐」，現在已由宣傳醞釀而見諸實際行動了，並且北伐軍在事實上已經攻下岳陽，逼取武漢，因此「北伐」在中國目前政局上已成了一個中心問題，已成了各社會階級和各方面的實際勢力注意之焦點。從帝國主義反動軍閥資產階級研究系國家主義派國民黨右派……以至於工農群眾，對於北伐不管贊成與反對，差不多都有相當的表示。可是「北伐」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北伐的真正意義在那裏，直到現在大家還不大了解，多是模糊誤會。帝國主義反動軍閥研究系國家主義派……等，固然不用說對於北伐，是信口雌黃，任意誣蔑，就是北伐的本身（國民黨，北伐軍）和贊助北伐的民衆也多誤會，他們不是過於誇張，便是過於輕視。這種過於誇張或輕視的態度，對於北伐前途的進行上，即對北伐的實際策略和實際行動上，都不免要陷於主觀，這是很危險的。現在「北伐」雖然是浩浩蕩蕩的前進，雖然給了參加北伐和贊成的人們以無限的希望，可是北伐的前途還是很艱難的。北伐的真正意義在那裏，北伐前途究有多少希望，還是很值得我們詳細研究的。

我們爲了要答覆一切反動派對於北伐的誣蔑，要解釋一般民衆對於北伐的誤會，總之，要使北伐更順利的進行，使北伐將來能得到更大限度的效果，那我們每個誠實的革命者，我們每個忠實地參加北伐和擁護北伐的人，對於北伐的真正意義，這回北伐在中國目前民族解放運動上的意義，都有更明確地來認識，更深

* 原刊於一九二六年九月十日的《嚮導週報》第170期。

切地來了解之必要，只有明確認識與深切了解之後，才可以免除我們主觀上過分的誇耀和輕視，那時我們的實際策略和行動才可以減少錯誤，才可以順利進行。

北伐的歷史根源

我們要了解此次北伐的真正意義，須首先明白它的歷史根源。北伐並不是憑空而來的東西，有它經濟的政治的背景，這種經濟和政治的背景，又為長遠的歷史所形成。

大家都知道，「北伐」這個口號不是什麼新的花樣，在近幾十年的中國歷史上已經出現過好幾次，太平天國之「北伐」，姑且不提，單就辛亥革命以來，便已經有了三次：(一)辛亥革命軍的北伐；(二)民六南方護憲政府之北伐；(三)民國十三年江浙戰爭時孫中山先生之聲言北伐（彼時在北伐的本身力量上雖然有點滑稽，但中山先生確曾發表過北伐宣言，並進兵韶關），此外如民四西南的袁稱帝之役，雖然沒有北伐的口號，也可以說帶有北伐的性質。自然這幾次的北伐都帶有誇張的性質，不是「北伐」本身的力量到了真能討伐敵人的程度，而多是因受敵人的壓迫而起的一種防禦戰爭（如護憲如討袁，實際上只算是防禦南伐）。不過這些次的北伐，在其性質上有一個共同的點，便是反抗或企圖消滅北方的封建勢力，即北伐的對象是北方的封建階級——滿洲政府及其後身袁世凱段祺瑞曹錕吳佩孚等，而北伐本身則皆為代表南方革命勢力的軍事力量（不管當時那些北伐的本身如何複雜，投機，有多少缺點，如護法軍討袁軍等，但在當時客觀上始終是代表南方革命勢力反抗北方封建勢力的一種軍事力量）。總之，歷次北伐，在其性質上都帶有一種南方革命勢力企圖向北發展，剷除北方封建勢力或抵抗北方封建勢力南侵的傾向——即中國革命勢

力的發展由南而北的傾向。但是這種傾向的原因何在呢？這裏便到了經濟的和政治的問題了。

原來中國近數十年來的經濟發展是由南而北，由海濱而陸地。在古代的中國經濟是以黃河流域為中心，並且其發展的趨勢是由北而南（指唐宋以前），因為當時的社會經濟基礎完全建築在自給的農村經濟上。迄到西方帝國主義將它們的商品強行輸入以後，長江和珠江流域的商業發展便一日千里，逐漸形成了初期的商業資本主義，並且還有少數近代的產業發生，使當時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受了一個很大的打擊而流於破產。在這種情形之下，新興的商業資產階級——華僑，破產的農民手工業者——兵匪，以及少數工人，便成了革命的種子了。而在北方如山西陝西河南等地直到現在大部分還是停滯在純粹的封建的農業經濟狀況之下，雖然沿海沿鐵路的地方如山東直隸奉天商業亦頗發展，並且有不少的近代產業，可是比起長江和珠江流域來還是幼稚得多，尤其在整個的經濟制度上，無論如何，北方比南方要落後一步。

在政治上中國歷代封建勢力的根據地又都在北方，（自滿洲政府至現時之北洋軍閥都在北方），也就正因為北方經濟比較落後，而宜於此種封建勢力之生存和發展。同時自帝國主義侵入中國後，為要在中國實現其經濟侵略之目的，維持其特殊地位，便不能不利用中國舊統治階級的勢力，因此便必須維持北方此種封建勢力——滿洲政府直至現時之張吳，以為它們侵略之工具。因此，在政治方面，北方也較南方落後，南方的民衆比較在北方要自由。

由以上經濟和政治的原因，中國的革命勢力自然地容易產生於南方，並且容易發展，而在另一方北方的封建勢力，因落後的經濟與帝國主義之維繫，能延長其命運。因而形成近數十年來南

方革命勢力與北方封建勢力互鬥之形勢。我們來看一看實際的情形。太平天國的革命勢力不用說完全發生於兩廣，便是辛亥革命之先鋒軍的同盟會一班領袖差不多都是南產，（尤以廣東湖南江浙居多，如孫中山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朱執信黃興宋教仁陳英士……等），至於參加辛亥革命之群眾不用說是南方商業資產階級的華僑會匪新軍和新智識階級等分子了。而在封建的勢力恰好相反，滿洲政府的皇族不待說，封建軍閥如皖如直如奉無一不是北方的產品，所有軍閥的領袖自袁世凱馮國璋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張作霖以至孫傳芳，沒有一個不是產生於北方，至他們的群眾更無須說是北方之已破產和將破產農民群眾了。自然南方也出了不少軍閥，如唐繼堯趙恒錫陳炯明陸榮廷等，可是這些小軍閥差不多曾經都多少參加過革命，他們都是從革命的隊伍裏反叛出來的，而他們的反叛又多因北方軍閥之威脅和利誘，並且這些軍閥雖然反動，但表面上還時常帶什麼聯省自治一類假面具，藉以欺騙民衆，這也就證明它們與北方軍閥不同之處。至於革命的勢力自然在北方也有相當的發展，也曾經出過許多革命黨人，尤其近來北方的鐵路工人，唐山的礦工，河南直隸的農民以及許多青年學生，都已經漸漸成爲北方偉大的革命勢力，不過這些都是最近發展起來的（在五四運動後），還沒有成爲一種堅強的有組織的群眾力量，不能直接給北方封建軍閥以致命的打擊。

在南北根本上既然形成兩種相反的政治勢力，因而自然形成歷年來的政治鬥爭。自辛亥以來北方的封建勢力和南方的革命勢力差不多在兩相對峙的狀態之下，不是南方革命勢力企圖討伐北方封建勢力，一所謂「北伐」，便是北方反動軍閥勢力征討南方一可以謂之「南伐」，或利用南方革命叛徒搗亂使自相殘殺。民國十五年來的歷史，除了北洋軍閥因帝國主義的唆使自相爭鬥以

外，便是此種南北相反的政治勢力互相鬥爭的歷史。如果北方的封建軍閥不消滅，或者北方的民衆革命勢力不形成起來，此種南北鬥爭的歷史是要延長下去的。

由上面說來，我們可以知道，所謂「北伐」是有政治經濟的背景，有歷史的根源，有相當的革命意義。

至於說到這次國民政府的北伐，除了以上所說的歷史根源外，其直接原因是由於吳佩孚的「南伐」，即吳佩孚侵佔長沙，企圖進攻廣東。而吳佩孚的南伐又是五卅運動的結果。由反帝國主義的五卅運動而引起反對奉系軍閥的戰爭，由反奉戰爭而引起奉吳聯合的反國戰爭，以至於吳佩孚企圖進攻廣東侵入湖南的戰爭。總之，由中國民衆和接近民衆的軍事勢力之反帝國主義運動反奉戰爭而引起帝國主義及其工具反動軍閥之反攻，即所謂「反赤」或「討赤」。「反赤」是反國民革命，是現時帝國主義反動軍閥及一切反動勢力之反對國民革命運動的總口號。因此，這次的北伐是反赤的直接影響，是反赤運動逼迫出來的。國民政府的北伐雖然早就在準備，但如果沒有帝國主義的反赤工具吳佩孚之壓迫，還沒有如此之快，故這次北伐是防禦「反赤」的進攻，含有制止「反赤」的性質，含有繼續五卅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性質。但是現在北伐的發展已由防禦而轉而進攻的形勢了。

前此北伐失敗之原因

我們已經知道北伐在歷史上不是一次，前此的北伐都是失敗了的，但是失敗的原因在那裏呢？這是值得我們追究的。我們知道，北伐是一種革命的表現，但是革命是有一定的步驟的，革命的進行必按照革命步驟才有勝利之可能。第一步是宣傳，宣傳群衆使其了解自身的痛苦和痛苦的來源以及解除痛苦的必要和方法

；換言之，即須使群眾認識自己的地位和真正的敵人，了解革命的必要及怎樣革命的方法。第二步是組織，革命是一種奪取政權的死活鬥爭，如果革命群眾沒有堅強的組織，只是烏合之眾，那絕對不會成功。所以革命的第二個步驟必須將各種革命群眾組織成爲一種戰鬥的力量，並且還須有一個堅強的政黨作一切群眾組織的重心，擔負最高的指揮責任。第三步則爲武裝暴動或軍事行動，即武裝群眾，以群眾的武裝解除壓迫階級的武裝，奪取政權，以建設群眾所需要之新的政治和經濟的社會。自然宣傳與組織絕不是死板板地劃分某一期只作宣傳某一期專作組織，而是要同時並進的，即是武裝暴動也是時常要準備的，可是這三個步驟，如果有一不備，革命是很難成功的，革命沒有軍事行動固不能成功，但只有軍事行動而無群眾的宣傳與組織，那也沒有成功之可能，即或偶然軍事勝利，結果只能算是幾個軍人的勝利，至多不過能成功一時的軍事獨裁，絕不能成功群眾的革命。總之，凡是革命的軍事行動，必須群眾的宣傳和組織工作到了一定程度，軍事力量要由群眾內部發展出來的，即是革命的武裝須建築在群眾的基礎上，而絕不是像軍閥或資產階級的僱傭軍隊，如此，才有成功群眾革命之可能。可是自辛亥以來的革命，便只有軍事行動而無群眾的宣傳與組織（自然也沒有堅強的政黨作領導）尤其對於北方民衆差不多簡直沒有顧及，歷次北伐便是單純的軍事行動之表現，這種單純的軍事行動便是歷次北伐失敗之根本原因，也就是中國近年來革命失敗之根本原因。

自中山先生創辦興中會到辛亥革命之前夕，中間所有的革命準備工作差不多都集中在軍事行動一點，如運動會匪和新軍等，很少注意到當時群眾的宣傳和組織，如農民手工業者國內商人都是當時真正的廣大的革命群眾，可是當時的革命黨人很少注意到

此，很少在這些群眾作宣傳與組織的工作，因此革命黨自身的組織自然也不能擴大和強固。（中山誠然是個偉大的革命者，革命的偉大領袖，但只專注意軍事行動而忽略群眾的宣傳與組織，這不能不說是中山先生革命多次失敗之重要原因）因此辛亥雖然爆發了，但結果只憑一些新軍和會匪形成的軍事勢力，去打當時幾百年來根深蒂固的封建階級，民衆尤其北方的民衆又沒有積極參加和擁護革命，所以辛亥革命就成了流產。南方雖然有幾省的督軍是革命黨人，但不久那些督軍因為沒有民衆的監督，都一個一個地不是脫離革命投降敵人，便是無形墮落而為新式軍閥了。到了討袁護憲等役，那更無容說，只是簡單的軍事行動。辛亥前雖然缺乏群眾的宣傳與組織，但始終還有民報民呼報……等一類的宣傳機關和會匪華僑同盟會等一類的組織，但到辛亥以後連這些東西都沒有了。所以討袁護憲等的北伐其實不過南方幾個革命軍人和投機的新式軍閥與北洋軍閥的混戰而已，離真正革命的軍事行動真是一萬八千里。所以在當時的民衆看來自然以為與他們沒有關係，如此焉有不敗之理？自然以前北伐的失敗在客觀上還有許多其他的原因，但是這個只單純地作軍事行動是一切失敗原因之最主要原因。

這一次的北伐，當然比以前大大的進步了，因為中國近兩年來，尤其自五卅運動後，一般民衆的革命認識與要求，都有猛烈的發展，在組織上也有巨大的進步，尤其是工人和一部分農民群眾，他們不但了解他們的痛苦和痛苦的來源，了解革命的必要，並且還相當了解革命的方略，有了偉大的組織（如上海廣東工人和粵湘農民）。我們看這次北伐軍入湖南以後，所到之處，都有廣大的群眾為之作種種關於軍事上政治上的有利工作，各地的群眾也很多是幫助北伐軍之行動，反對北洋軍閥吳佩孚張作霖孫傳

芳等，便可知這次北伐軍的環境與以前大不同了。然而由此我們便可以說此次北伐是群眾的宣傳和組織工作已到了一定的程度，北伐軍已經是群眾的武裝，北伐已經是革命群眾的軍事行動麼？我們革命者不應欺騙自己。此次北伐雖然比以前進步了很多，可是還不能說是革命群眾的軍事行動，只能說是接近革命民衆或爲革命民衆所贊成的軍事行動，這是我們可以從北伐軍的來源和內部的複雜可以看得出來的。北伐軍大部分是由小軍閥的軍隊投誠改名或改編的，如唐生智彭漢章王天培等，這些軍隊及其軍事領袖投誠國民政府固然於革命有重大的影響，有重大的意義，但是他們昨天確還是軍閥的軍隊，還是小軍閥，他們跑到革命的門裏來還沒有幾個鐘頭，不用說他們不是革命群眾自己的武裝，並且他們對於革命群眾還有多少的懷疑與憂慮，這是我們應當注意的，革命的黨——國民黨比以前固然進步了不少，已能指揮相當的群眾，但是黨的力量還很薄弱，還說不上能指揮一切的政治和軍事，實際上還是幾個軍事領袖的作用，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至於群眾雖然有了相當的組織，對革命有相當的認識，但在全中國全部的觀點上看，有組織的群眾還只是很少一部分，佔全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三萬萬餘農民，有組織的不過是幾分之一而已。所以群眾的力量還很幼稚。所有這些弱點都是此次北伐軍身上無可諱言的。

各方面對北伐之認識

北伐究竟是什麼？此次北伐的真意義在那裏？我們現在應該簡單來答覆這個問題。我們根據上面的說明，這次「北伐」是：(一)代表南方革命勢力向北方發展；(二)防禦吳佩孚南伐，由防吳南伐而轉爲討吳北伐。由第一點此次北伐仍然含有南方革命勢力企

圖消滅北方封建勢力的意義，含有繼續辛亥革命的意義；由第二點則含有繼續五卅運動的意義，含有抵禦「反赤」派進攻的意義。但是同時北伐的本身還不是一種真正由革命民衆內部發展起來的武裝勢力，它不過是一種接近民衆的軍事勢力。因此，這次北伐雖然是代表南方革命勢力向北發展，雖然代表南方的革命民衆討伐反赤的吳佩孚，在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發展上在防禦反赤的運動上有極偉大的意義，但還不能說是真正民衆的革命勢力已發展到了一定程度之一種民衆革命的軍事行動，是推翻封建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指取消帝國主義在華之特殊勢力）的國民革命之最後階段，而只是「南方革命勢力向北發展，討伐北洋軍閥的一種軍事行動」（獨秀同志「論國民政府之北伐」），只是代表五卅以來南方的革命勢力抵禦北方「反赤」派進攻的一種軍事行動。

現時各方面對於北伐的認識有幾種錯誤傾向：（一）以爲北伐是國民革命的全部工作，彷彿北伐軍是真正民衆勢力已發展到一定程度之一種武裝力量，換言之，北伐軍是民衆的武裝，北伐是國民革命的全部工作。這種見解忘記了北伐軍構成的原素，因而把北伐看得過高，過於奢望，這自然是一部分站在北伐本身上的人們——一部分北伐軍的軍事領袖和執政的國民黨領袖及不了解實際的民衆——陷於主觀的一種錯誤。這種錯誤可以發生一種大的危險，站在北伐本身方面便是易於自視過高，而不能了解自身的弱點和群眾的要求及北伐前途的真正可能性。在民衆方面，則容易忘記自己的責任，輕視自己的地位，對北伐存過分之奢望，而不努力於自身的組織工作、取得部分政權的工作，及怎樣以民衆地位參加北伐的工作。（二）以爲北伐不過是一種通常的軍事戰爭，如上海一部分資產階級及一些小資產階級的智識分子。他們根本

上沒有了解北伐軍是接近民衆的軍事勢力，北伐的對象是摧殘民衆壓迫愛國運動之帝國主義的走狗封建軍閥。北伐根本雖是軍事行動，但始終是革命的行動，是達到解放中國民族運動之一種鬥爭。(三)北伐是赤化運動，「南北戰爭爲赤與非赤的戰爭，中國人與外國人的戰爭，」(孫傳芳致蔣介石書)這種論調是帝國主義(尤以英國帝國主義宣傳爲最甚)反動軍閥買辦階級研究系國家主義派國民黨的反動右派以及一切帝國主義軍閥的走狗章太炎等所捏造出來的。這些份子誣蔑北伐軍爲赤化軍，北伐爲赤化運動，本沒有什麼稀奇，因爲它們本是革命的對象，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敵人，它們對於凡含有民族運動的一切運動都誣之爲赤化，自然對於目前在民族解放運動上佔重要地位的北伐是要誣爲赤化的。但是還號稱爲國民黨黨報的上海民國日報，天天只是爲北伐軍蔣介石向帝國主義反動軍閥及一切反動派作很笨的辯白，而不揭破這些反赤派的內幕，指出這些反動派所以反赤的陰謀，這是很可惜的。此外還有「獨立青年」稱：「『赤』與『討赤』之爭，乃思想之爭，乃封建思想與民主思想之爭，而非甚麼赤與非赤之爭。有共產黨在內固成爲他們討赤派的絕好的口實，但即無共產黨在內而只是三民主義，亦是要受封建派的排斥的。我固然不敢相信蔣馮是民主主義者，像張作霖吳佩孚那樣的人，腦中絕沒有民主主義四字，更不必說有此精神了。」(獨立青年第一卷第七號「顯微鏡下的時局」)。獨立青年是國家主義左派的刊物，本來是反赤的，現在因事實的教訓也不能不改變論調，像這樣的說法，總算是比較合乎事實的。至少可給他們的兄弟鬻獅派一個巴掌。但這裏我們要注意，「赤」的北伐軍似乎是代表民主主義的思想，但是在實際上也還是很複雜，不用說昨天投誠的王彭唐方離民主主義很遠，便是廣東黨軍的許多領袖也很難說的，至於北

方的吳張軍閥，固然是封建專制的餘孽，但要說到他們有什麼專制主義的真正理想也不甚合事實。我以為這班人自身到現在已無所謂思想，不過簡單的是帝國主義的工具是無廉耻的強盜而已。張宗昌之強盜性情與土匪行動，固不待說，張作霖完全是個紅鬍子，是日本帝國主義簡單的走狗，也是大家知道的，即吳佩孚雖然讀了含封建思想的關岳傳古文觀止三國演義，但他何嘗有什麼主義！因封建主義至少也須有相當的信義觀念，而吳則今天聯國反奉，明天便聯奉反國，如此反覆無常，純係一無耻無信之強盜。我們由以上這些關於北伐的認識，便可以看得出目前中國各種社會階級之對於北伐的態度了。

北伐前途——決定北伐勝利的條件

北伐前途將達到何種程度，我們還很難確定。但代表反動軍閥的太平導報和代表買辦士紳階級的醒獅肯定地斷定北伐必然失敗（見太平導報第三十二號南北軍事預測和醒獅第八九號「論蔣介石北伐不能成功之六大原因」）但是現在的事實已證明他們的觀察只是主觀的希望，事實上北伐已逼近武漢，據本日申報漢口電，並稱漢陽已下，不管武漢現在是否已下，我們從各方面分析北伐軍與吳軍的實力及各方面的形勢，（見本報一六七和一六八兩期），可以說北伐軍取得武漢不過是時間問題。至北伐軍取得武漢後，將來如何發展，當然要看那時的環境如何，但我們也可以大概推測有兩種趨勢：（一）至高限度以湖南湖北為根據地，北則取得河南，或將河南置於中立派之手，成為奉系軍閥與北伐軍的緩衝地，南則取得江西或進而由鄧如琢陳調元周鳳岐起來驅逐孫傳芳，在安徽江蘇浙江等省成立北伐軍與帝國主義間較緩衝的局面，經過相當休養時期後，北伐軍再同北方國民軍聯合與奉張決

最後之勝負。(二)取得武漢後，對武勝關以北和東南暫時妥協，或只對奉妥協，對東南則仍取得江西和福建，以兩湖為根據，經過相當期間再圖發展。總之，北伐軍的前途在軍事上現在還不能根本剷除北方和東南及各地一切封建軍閥，即下武漢後還不能直搗北京，武漢之下，須告一段落，以後的勝利不能專靠簡單的軍事行動，須視政治運用之如何而定。

可以決定北伐軍前途命運的有兩個根本條件：(一)能否真正得到群眾的擁護，(二)北伐軍自身能否始終有一致的團結，(三)能否有明確的適合民衆要求的政治主張。要想真正取得民衆的擁護，絕不是空口宣傳所能辦到，必須使群眾在北伐軍已到的所在得到實際的利益，必須有正確的政治主張和政治設施。如廢除苛捐雜稅，保護民衆一切自由權——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抗租等，總之，絕不可只顧目前的小利益或因軍事行動而防害民衆的利益，犧牲民衆。要想保持北伐軍內部的始終一致團結，這也不是空言所能辦到。我們絕不能否認現時之北伐軍內部是非常之複雜，從蔣介石唐生智李宗仁李濟琛……到王天培彭漢章袁祖銘方本仁，雖然同是站一個戰綫上，但實際上難免同床異夢。尤其到打下武漢，快至勝利關頭之時，問題的困難是可以想見的。要想解決將來的必然產生的困難，預防將來的危險，現時北伐的軍事領袖們就須根本了解，根本覺悟。北伐軍現時本身最重大的缺點是：(甲)北伐軍號稱黨軍，但實際上只有幾個軍事領袖的權威，只有某系某系的結合，而沒有黨的指揮。國民黨自三月廿日後，在各方面的領導權威已成強弩之末，尤其在軍隊中，許多軍事領袖差不多看國民黨是達到個人某種目的之工具，而心目中並沒有黨的存在。沒有黨便無所謂主義，便沒有真正共同的較遠的目標和趨向。如此而欲求始終一致團結，那是很困難的，簡直可以說沒有可能

。所以北伐軍想保持各軍事領袖始終一致的團結，只有建立較堅強的黨，只有將黨的權威提高起來，黨的權威應該在一切軍事領袖之上，在任何軍事領袖之上，以黨來支配一切。然而作到這層是非常艱難的，問題不在黨員群眾，而全在軍事領袖自身，軍事領袖如果只顧個人目前利益，不肯向遠的方面看，不肯犧牲，不肯以身作則，黨始終只能作一班軍事領袖之工具，黨將完全犧牲在軍事領袖之手，黨如果犧牲了，軍事領袖固然沒有好處，那時便是革命的破產。（乙）北伐是國民政府的北伐，北伐軍是國民政府的北伐軍，但是現在的國民政府是很軟弱的，是有名無實的，實際上不過是軍事領袖的一個特別機關，它不惟不能支配政府下的民政和財政，就連自身也要受束縛，這種現象，國民政府的勢力只在廣東一隅還可維持下去，但一到長江流域，那是不行的。雖然在軍事時期政府不能不帶一點軍事的性質，不能不受軍事的限制，但絕不可不注意國民政府的建設事業，建立民治主義政府的基礎，因此便不可不建立政府的權威，要以整個的政府支配軍事，不能以軍事去支配整個的國民政府。如果北伐軍下了武漢，現時的國民政府應該有相當的改變，應該逐漸離開軍事的支配，而有獨立的形式與權力，指揮北伐軍已經攻下的地方之一切政治的建設，使國民政府確然有相當的民治政府的氣象，在各方面有相當政治權威。因此，國民政府的政治領袖如汪精衛應使之趕快消假復職，使政治上有領導的重心。至對於適合民衆要求的政治主張，也是攻下武漢後須特別注意的。現在一般人還不明瞭國民政府北伐的用意，甚至懷疑北伐軍是赤化，就是一般贊成北伐的民衆也還不甚了解，北伐軍到武漢，國民政府便應公開的將它的政治主張宣佈於一切民衆之前，並還須籌所以切實履行其政治主張之法。我以為北伐軍在政治主張上最須注意的是召集國民會

議的問題，人民自由權的問題。(重點是著者後來加上的一編者)

我們爲了中國的國民革命的成功，爲了北伐前途的勝利，我們不能不苦口的指出北伐軍的缺點和所以救治之道。現在北伐軍快到勝利之途，北伐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中國的革命由這次北伐的勝利，打倒吳佩孚，進而肅清破壞奉系軍閥，破壞北洋封建軍閥的統治，逐漸肅清全中國的軍閥勢力，統一中國，建立比較民治主義的政府，以對抗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或許有相當之可能。然而要看北伐軍的軍事領袖能否了解目前北伐軍的地位，能否真正站在革命的見地去犧牲一切，能否真正擁護民衆的利益而定。不然北伐軍即或取得武漢還未可樂觀，還可以發生巨大的危險。

至於民衆此時對北伐的根本責任是：(一)盡力參加北伐，幫助北伐軍在客觀上達到儘可能的勝利，(二)在參加北伐中發展自身的力量，儘可能的建立自己的政治地位，取得應得的一切政治權利。(重點是由著者後來加上的一編者)

一切參加北伐和贊助北伐的人們，須在客觀上來了解北伐的真正意義，脫去主觀的偏見，很客觀地運用革命的策略，很真誠地進行革命的工作，北伐前途的勝利當在眼前。

列寧主義是否不適合於中國的 * 所謂「國情」？(一九二七年一月廿一日)

列寧主義不僅是解放世界無產階級唯一的武器，而且是解放一切被壓迫民族和一切被壓迫民衆的唯一武器。被帝國主義重重壓迫的中國民族自然祇有在列寧主義的旗幟之下，完全接受列寧主義這武器——理論與策略，才可以解放出來。但是有人（尤其國家主義者和國民黨右派）却以為中國有中國自己的「國情」，列寧主義不適合於中國。

然而列寧主義究竟是否不適合於中國的所謂「國情」呢？這是我們列寧主義者應該切實答覆的。要答覆這個問題，我們須得切實瞭解究竟什麼是列寧主義，尤其是產生列寧主義的環境和列寧主義在俄國革命中的實際運用。

什麼是列寧主義？斯大林答覆這問題說：「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恰切點說：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見斯大林所著列寧主義概論）。斯大林關於列寧主義的定義這個答案是非常之對的，是很科學的。但我們為要使得普通的人們容易瞭解起見，還可以簡單地說：「列寧主義是現代的馬克思主義或者現代的共產主義。」

列寧主義的內容究竟是怎樣呢？要瞭解這問題，便須先瞭解產生列寧主義的環境。斯大林說：「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條件內生長起來形成起來的，這時帝國主義的矛盾性發展到了極點，這時無產階級的革命成了直接的實際的問題，這時工人階級準備

* 原刊於一九二七年一月廿一日的《嚮導週報》第184期。

級革命的開幕。

列寧主義便是在這樣的環境——國際的和俄國的——當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列寧主義，一方面天然成了反抗並消滅世界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唯一武器，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另一方面又天然成爲解放被壓迫民族和解放被壓迫農民群衆的理論和策略，即解決「民族問題」和「農民問題」的理論和策略。這便是列寧主義的內容。所以我們以爲列寧主義——現代的共產主義，不僅是解放世界無產階級的武器，而且是解放一切被壓迫民族和一切被壓迫民衆——特別是農民的武器。

列寧主義的產生及其內容既是如此。那末，列寧主義究竟是否適合於中國的所謂「國情」呢？這裏便到了應該來看看中國究竟是什麼一種「國情」的問題了。現在國際狀況，仍然是帝國主義所支配的國際狀況，仍然是資本主義的矛盾性達到極點的國際狀況。這是無人能否認的。現在的問題只是：中國處在這個資本主義矛盾性達到極點的帝國主義的國際狀況之下，中國的所謂「國情」究竟如何，尤其是否與列寧主義的策源地俄國絕對不同。斯大林所告訴我們的：「沙爾的俄國是種種壓迫的故鄉——資本家的壓迫，民族的壓迫和軍事的壓迫——俄國的壓迫是最無人道的最野蠻的形式」。究竟現時國際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所統治的中國是不是如此？霸佔海關，協定關稅，強佔鐵路郵政和航行一切交通權，自由奪取礦山、強迫劃定租界，強置領事裁判，甚至自由屯駐海陸軍，自由屠殺中國民衆（如五卅屠殺，沙基屠殺及萬縣屠殺等），製造軍閥戰爭，凡此種種，難道不是帝國主義對待半殖民地的中國之最無人道最野蠻的壓迫嗎？！連年戰爭，破壞一切交通和金融，禁止一切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無限制

的苛捐雜稅，甚至自由屠城屠村（如吳佩孚在河南張宗昌在山東屠殺紅槍會事），自由殺戮民衆（如段祺瑞的「三一八」慘案，吳佩孚張作霖孫傳芳張宗昌等在各地的隨便逮捕濫殺等），凡此種種，難道還不是封建軍閥對於人民之最無人道的最野蠻的「軍事壓迫」嗎？！至於資本家對於工人的壓迫，更是顯而易見的事，我們只看中國工人的工作時間多自十二小時至十七八小時，工資低至一二角，甚至幾個銅板，便可知道工人的經濟痛苦了，資本家對於工人的待遇簡直是對待牛馬一般，我們到處都聽見資本家尤其帝國主義的資本家打工人甚至殺工人（引起五卅慘案的顧正紅便是被日本帝國主義的資本家打死的）便是事實。至於工人沒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權那是不用說了。在現時的世界，資本的壓迫，殖民地的壓迫和軍事的壓迫，其無人道，其野蠻，還有甚於中國嗎！？中國民族所受的壓迫，真是世界的模範壓迫，中國是種種壓迫的故鄉，是沙爾的俄國第二啊！至說到中國封建軍閥對於帝國主義之忠實比之沙爾更超過百倍。它們不僅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看家狗」，簡直是劊子手；它們不僅是替帝國主義從幾萬萬人中榨取借款的利息交付倫敦東京紐約巴黎的代辦者，而且簡直是將中國一塊一塊地割賣給帝國主義的賣國賊。另一方面我們看見日本帝國主義差不多完全佔領了東三省和山東，長江和西江流域差不多完全成了英國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但是同時美國帝國主義的經濟勢力又蓬蓬勃勃地向各方面發展，因此便形成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鉅大衝突，中國成了世界帝國主義競爭的最後戰場，帝國主義此種衝突反映到中國封建軍閥方面，便形成民國十六年來的軍閥戰爭。

由上面的情形表現出來，中國是完全繼續着沙爾時代的俄國狀況，因此形成了現代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之矛盾衝突的焦點：

幾萬萬被壓迫民族與帝國主義的衝突，幾萬萬被壓迫人民，特別是農民，與封建軍閥的衝突，工人與資本家（特別是帝國主義的和官僚的資本家）的衝突。帝國主義中間（特別是日、美、英之間）的衝突。這些矛盾衝突的總和之表現便是現時的「國民革命運動」。

中國的國民革命的鬥爭，與俄國反沙爾主義的鬥爭一樣，天然成了反帝國主義的鬥爭，成了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將天然要接近而且應該變成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

我們現在且問問主張中國的所謂特別「國情」的人們——尤其是國家主義者和國民黨右派，中國的國情有什麼特別？中國一般民衆不是同俄國那時一樣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封建軍閥（如俄國的沙爾）的壓迫嗎？中國的幾百萬工人和幾萬萬農民不也是同俄國的工人和農民一樣受資本家和地主土豪劣紳的壓迫嗎？自然中國的工人農民和一般民衆所受的壓迫程度與俄國那時有不同的地方，但是要求解除壓迫始終沒有什麼不同。中國的全民族是否應該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下解放出來？中國一切被壓迫民衆是否應該從封建軍閥的鐵蹄下解放出來？中國的幾百萬工人和幾萬萬農民是否應該從資本家（尤其帝國主義的和官僚的資本家）和地主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重重剝削和壓迫下解放出來？我想若不是帝國主義者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和專門剝削人的資本家地主，或它們的走狗，誰都應贊成這個解放運動。

由我們的觀察，由每一個真實革命者的觀察，中國的所謂「國情」，簡直是俄國第二，是現代帝國主義的各種矛盾點的總合之表徵。中國的解放運動，中國的革命將無疑地與俄國革命的形勢俄國革命的過程相近（自然不是完全一樣），所以中國的革命特別用得着列寧主義全部的理論和策略——自民族問題，農民問題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也只有列寧主義的理論和策略能解決

中國問題。因為中國情形在現在世界上是第一等的複雜，因此解決中國問題也是第一等困難。現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包含着歷史上許多時代的成分。資本主義是從英國發生出來，由英國向西走便到美國，向東走則到法國，由法國而德國而俄國，但資本主義愈往東走則愈複雜，因為愈東走，則東方的舊勢力——封建制度的勢力——愈大，資本主義因碰到東方封建制度之種種歷史的複雜關係常呈特別複雜的狀態。法國的資本主義比英國複雜，德國比法國複雜，俄國又比德國更複雜，在俄國內差不多同時保存全人類經濟發展的一切形態。自資本主義到了中國，與中國四五千年遺留下來的封建制度混合，同時加以帝國主義的特別侵略和特別播弄，使得中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呈更複雜而奇異的狀態。譬如資產階級的民族的德謨克拉西革命，在英法差不多由資產階級擔任，那時工人和農民的力量是比較小的。在德國無產階級的作用就更大了，但始終還是資產階級作領導。在俄國就完全相反了，俄國的資產階級不惟軟弱不能領導俄國的民族德謨克拉西革命到底，反而與封建階級的沙爾妥協以反對無產階級，因此，俄國的工人和農民不能不擔負推倒封建沙爾的德謨克拉西革命直到無產階級革命。在現今中國民族德謨克拉西革命的國民革命裏，事實表現出來，顯然幾乎成了俄國革命的歷史復演，並且資產階級更軟弱更反動，工人階級更有力，尤其是農民一開始便完全與工人一致，這種現象是證明中國社會之特別，同時也就是證明列寧主義之理論和策略特別適合於中國，能全部的適用於中國。

中國是俄國而後帝國主義各種矛盾性總合的地方，同時便是世界帝國主義戰綫的鎖鍊的最弱的地方，也便是革命最容易爆發而且容易發展的地方，俄國的革命便是前例。斯大林在三年前曾

預言世界革命的將來的爆發點仍然是在帝國主義鎖鍊最弱的地方，不是印度，便是德國。但是現在照國際的狀況觀察，情形却有點變了，我以為中國或者也是一個繼承俄國的候補員。但是有人說，從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革命到社會革命，必經過一道萬里長城，經過長久的時間，這是說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革命後，還須經過資本主義的長期發展，才能達到社會主義革命。但是這個理論已被列寧打倒了，並且已被俄國革命的事實證明是不對了，所以列寧說，由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革命轉變到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中間不一定要經過資本主義的發展（見列寧的第三國際第二次大會民族殖民地問題草案）。

自然我們列寧主義者，承認中國目前的革命是民族的德謨克拉西的革命，還說不上無產階級直接的社會主義革命，但是這個革命始終是反帝國主義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並且這個革命絕不限於民族和德謨克拉西，必然是很快的向社會主義革命的方面走。

現在是列寧主義的時代，是人類社會整個的新時代，是人類社會中不僅無產階級而且是一切被壓迫民衆要求最後解放的時代，中國一切被壓迫的民衆應站在列寧主義的旗幟之下起來爭得解放，也只有在列寧主義的旗幟之下學會列寧主義的理論和策論，才能得到解放。依照列寧主義的理論和策略，中國目前國民革命的幾個根本原則是：

- （一）中國國民革命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
- （二）中國的工人階級是革命的先鋒隊；
- （三）中國的革命應該擁護大多數農民的利益到底；
- （四）完全承認國內一切民族平等；
- （五）永續革命（不斷革命）。

我們如果承認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我們便應徹底地反對世界帝國主義，應使中國的革命與世界革命勢力——領導世界革命的蘇俄和其他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及其他被壓迫民族——親密地永久地合作。反蘇俄和仇視其他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便是反革命。我們如果承認工人階級是中國革命之先鋒隊，我們便應絕對尊重工人的利益，如果犧牲了工人的利益，便是犧牲了革命。我們如果承認應擁護大多數農民的利益，我們便須在鄉村徹底打倒土豪劣紳，剷除鄉村壓迫農民的一切封建制度的餘毒。我們如果承認國內一切民族平等，我們便須徹底承認蒙古和西藏等民族有獨立權。反對蒙古西藏的獨立權的，當然是反革命。最後要明白國民革命並不是中國最後的革命階段，國民革命只是到社會主義革命之路，人類最後的真正的解放只有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只有努力建立人類共產制度的社會。列寧主義的極終理想，便是要領導全人類由種種被壓迫的社會到共產主義的社會。所以我們應瞭解「永續革命」的意義，要從國民革命作到無產階級革命。

中國被壓迫的民衆們要得到真正的最後解放，只有站在列寧主義旗幟下來奮鬥，來學習列寧主義，來接受列寧主義的理論和策略，使列寧主義成爲我們解放自己的唯一武器。

（本文文內重點，都是由著者後來加上的——編者）

怎樣答覆英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

(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

在幾星期前英國帝國主義在它所發表的什麼「新提案」上還宣言不干涉中國，可是未過二星期英水兵便在漢口九江殺人了！或者以爲這還是小小事情，算不了什麼真正的干涉。但是現在英國帝國主義是怎樣呢？請看：

電通社二十三日倫敦電：「英政府召集陸軍預備兵後，使國民驚倒，開戰開戰之聲，日震吾人耳鼓，教會且開始祈禱和平，儼然令人想起歐戰當時的光景。」

大陸報云：「據聯合社北京電稱，倫敦已命參謀及管理人赴華，組織警備隊，而爲之領袖，並有兵一旅，將於星期五離加爾格打云。」

路透社二十五日喀爾喀太電：「聞英兵一大隊將於星期四日登太克里華運船赴華，印兵兩大隊定星期日續發。」

路透社二十四日瑪爾太電：「貝福夏與赫福夏聯隊之第一大隊及波德聯隊之第二大隊，定星期一日乘美甘狄克號出發，此兩大隊共約一千七百人，軍官連警官看護婦人等，皆隨隊同行。」

路透社二十四日倫敦電：「飛將軍三十人已抵波資茅，隨水兵赴華。……據聞斯加波羅之第五裝甲車隊已奉命準備，於必要時赴中國。」

路透社倫敦二十四日電：「陸軍部公報稱，上海防軍將以下述軍隊組織之：(一)第十三步隊，內爲米德爾塞斯聯隊之

* 原刊於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的《嚮導週報》第186期。

第一大隊，加米羅寧之第一大隊，波德聯隊之第一大隊與格林霍華資之第一大隊；(二)第二十四步旅，內為金河衛之第二大隊，貝福夏與赫福夏之第一大隊，波德聯隊之第二大隊與夏文台之第一大隊；(三)第二十印度兵旅，總司令為陸軍少將鄧堪，定明日乘輪赴滬，各隊將乘運兵船陸續出發。」

大陸報云：「據二十五日聯合社電稱：英印兵一萬六千人，外如航空隊、鐵甲車、坦克砲車、醫院船及其他軍用物品現已起程來滬，或將次出發。」

新聞報二十七日二時倫敦電：「英政府派赴中國之兵，全力在一萬九千至二萬一千人之間，已開一千，本星期內續開一萬一千，均步兵。英海部宣佈泊在中國之英艦有巡洋艦六，驅逐艦八，砲艦十五，潛艇十二，滅魚雷一，其他小艦不計，尚待添派二十艦，大小不等。」

以上這些消息告訴我們甚麼？這還不是英國帝國主義準備武裝干涉中國，準備對中國宣戰嗎？據英國帝國主義者自己說是：「保護英僑在中國的生命財產」。但我們要問：「英國帝國主義者在華的生命財產」向來有過什麼危險？中國人於何時何地殺過多少英國人，佔領過「英僑」多少「財產」。英國帝國主義五卅時在上海屠殺三十餘人，在廣州沙基屠殺百餘人，在南京漢口重慶等處屠殺數十餘人；不久以前在萬縣屠殺五千餘人，這次在漢口殺傷十餘人，我們試問在這些屠殺當中，有幾個「英僑的生命」受了危害？！在萬縣英國帝國主義者幾乎轟毀整個的城市，損失財產數千萬？那時所謂「英僑的財產」究有何損失？！我們不講英國帝國主義對於中國其他一切經濟的政治的侵略，單祇這幾件事實，已證明英國帝國主義，在中國危害了數千人的生命，損害了數千萬財產，現在倒反過來說要保護「英僑的生命財產」，

這不是光天白日下活見鬼嗎！即令保護，那爲什麼值得這樣調兵遣艦呢？英國帝國主義在華的水陸軍本已在一萬以上，軍艦已有四十餘艘，現又加調二萬餘大軍，加派二十砲艦，究竟爲了什麼？這還不是準備向中國宣戰！連英國帝國主義者自己也覺得：「……開戰開戰之聲，日震吾人耳鼓，……儼然令人想起歐戰當時的光景」，因而「驚倒」啊！！

無容說了！橫蠻而殘狠的帝國主義尤其是英國帝國主義是不講理的。它們只要能夠搶得幾文額外利潤，只要能夠保障它們額外利潤的進行，換言之，只要怎樣能夠剝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衆，只要怎樣能夠保持它們的剝削權利，所謂「既得權」，無論甚麼手段它們都可以採用的。尤其到了它們的既得權有危險時，它們是不顧一切的了。自近年中國民衆的覺醒，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特別是最近國民革命軍佔領武漢以來，帝國主義特別是英國帝國主義簡直急得發狂了。上海屠殺，沙基屠殺，萬縣屠殺，這次的漢口殘殺，進兵滿州，封鎖大沽，幫助陳炯明鄧本殷楊希閔劉震寰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張宗昌，引誘買辦階級國民黨右派國家主義派，攻打國民軍和國民政府，反對革命，破壞革命，總一句話，所有應有盡有的方法，只要可以壓迫中國革命民衆，摧殘革命勢力，破壞革命戰綫的，它們都用盡了。現在只差一着，便是直接的武裝干涉，直接的宣戰！

果然，無耻的殘暴而橫蠻的英國帝國主義現在調兵遣艦集中到上海來了，準備宣戰了，準備向我們廝殺了！！這是英國帝國主義最後的一個步驟。英國帝國主義利用軍閥作工具的政策已漸次表現失敗，直接的屠殺政策也未成功，反而引起更廣大的反抗運動，提出什麼「提案」來緩和民衆和勾結所謂「穩健份子」以破壞革命戰綫的陰謀政策，也很難收急效，於是英國帝國主義便毫不

客氣要武裝干涉起來。這種武裝干涉是繼續鴉片戰爭和八國聯軍的行動啊！今天帝國主義自己說得很對「這次的駐兵上海，是義和團以後的第一次」（廿八日大陸報）。鴉片戰爭是第一次，攻打太平天國是第二次，英法聯軍是第三次，甲午之役是第四次，攻打義和團的八國聯軍是第五次，這一次將是第六次了。這一次的形勢特別與干涉太平天國的形勢相似。太平運動本是一種民族革命運動，帶有反帝國主義的性質，如果太平運動成功，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別權利是不能存在的，帝國主義尤其英國帝國主義看到這種危險，當太平政府成立南京，佔領蘇常，上海將入其掌握之時，便毫不客氣地一面以軍火軍需幫助清廷，一面直接組織所謂「常勝軍」，以英人戈登為領袖將軍，攻打太平軍，太平運動就從此消滅了！現在正是北伐軍已取得湘鄂閩贛及一部分的浙江行將進佔上海，因此英國帝國主義的舊經驗便復活起來。英國帝國主義已自己宣言這次進兵是在保護上海，這還不明顯嗎？上海是帝國主義，特別是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根據地，現在眼見其工具孫傳芳之衰弱，而國民革命軍又是如潮湧而來，消滅太平天國的極得意的經驗為什麼不採用呢！

全國被壓迫的民衆們，英國帝國主義這種無恥的不顧一切的武裝干涉，這是我們絕對不能容忍的。現在美日法等帝國主義似乎不贊成英國的武裝行動，美國已經有正式的宣言（路透社二十六日華盛頓電），北京日使也有非公式的表示（國聞社二十六日北京電），甚至日本國內還有反英出兵的濃厚空氣（電通社二十七日東京電）。不過我們須知道這些帝國主義這次不能與英同其步驟，是站在它們各自的利益觀點上的，並且它們還是兩面政策，一面申言不贊成英國的武裝行動，同時却加派艦隊，如美之增派亞細亞艦隊，日之增派巡洋艦四艘等；我們應申言，如果美日

法等不贊成英國帝國主義之主張，便應明白宣言，尤須馬上停止其調兵遣艦之行動。

英國的武裝干涉，好像一個寒熱表擺在全中國人的面前，可以測定誰是真正的賣國賊，誰是真正的中國人；這就是說：實際上反對英國帝國主義這個武裝干涉的，就算是中國人，否則便是賣國賊，是帝國主義的走狗。上海的民衆已經漸漸起來反抗英國強暴了，即連素來反動的江蘇省教育會也發表抗議英兵進駐上海宣言了，不過上海的報紙尤其是申商兩報的態度，彷彿英國進兵是很平常的，尤其混蛋的是商報，商報近來簡直替英國宣傳了。奉系軍閥的張作霖張學良曾經宣言，如果英國以武裝干涉南方，他們將放棄內爭，一致反抗英國，現在英國的武裝干涉到來了，但是張作霖將怎樣呢！東方社二十六日的北京電說：「安國軍總司令部方面對於英政府用防範滬租界名義斷行派兵一萬六千名之舉，以爲英政府此際不至逾越保護英僑生命財產之範圍，而比較的持冷靜之態度，蓋北方政府以爲在此時英國若能以武力抑制南方，實爲無上之徵倖，即使不然，亦希望南方傷害列國之感情，而終陷於對外關係之失敗。」原來奉系軍閥是想望「英國以武力抑制南方」啊！最奇妙的是上海的甚麼國民外交協會，當此英國海陸軍大舉來中國之時，一言不响，反而憑空致電交部，反對蘇俄向我國邊境增兵，恰如前年日本進兵滿州時，國家主義者拚命反對蘇俄出兵一樣，世間奇事，真是無獨有偶啊！

英國帝國主義的二萬大軍，幾十隻兵艦馬上就要到了，英國帝國主義殘殺我們就在眼前，這是全中國全體民衆的生死關頭啊！我們能夠忍受嗎？絕不能！但是我們究竟怎樣答覆英國帝國主義，這個武裝干涉，這個宣戰呢？全中國全體被壓迫的民衆們，我們應該無疑地堅決地，以武裝答覆武裝，以宣戰答覆英國的宣

戰！

被壓迫的民衆們，我們應一致起來準備與英國帝國主義宣戰罷！

英國帝國主義欺負中國人太過甚了，中國人已被逼着沒有路走了！英國帝國主義到現在還把中國人當鴉片戰爭義和團時代的人看，還把國民革命政府當太平天國政府看待，我們能忍受嗎！英國帝國主義不要痴想，現在的中國已絕不是義和團了，現在的中國已經大大的改變了，中國的民衆大部分已經漸漸覺醒了，並且已經組織起來成爲一種力量了，就是世界的狀況也與以前大大不同，現在正到帝國主義臨死的時期，即如英帝國主義內有幾百萬工人尤其是礦工正在與英國帝國主義者鬥爭，企圖根本消滅英國整個的帝國主義制度，外而印度非洲澳洲加拿大的被壓迫民族的反英運動如潮興起，所有這些都是證明英國帝國主義已快到臨死的時期，現在對中國這樣的橫蠻舉動，正是它的「臨死發狂！」

全國被壓迫的民衆們，我們不要以爲英國帝國主義多麼可怕，實際上英國帝國主義是百孔千瘡，英國最可恃的是海軍，但海軍對中國廣漠的大陸是沒有多大用處的，至英國的陸軍通共不過三十餘萬。英國帝國主義的勢力不是絕對不可抵抗的。我們大家知道，小小的土耳其也曾抵抗英國，落後而微小的里孚居然抵抗法西兩大帝國主義至一年餘之久，何況四萬萬人的中國啊！

如果英國帝國主義真要逼人太甚，我們只有準備與它決一死戰，我們或者失敗了，但我們相信最後一定能得到勝利，或者也許由我們反抗英國的武裝運動竟能使英國帝國主義解體也未可知。我們現在應積極準備武裝以反抗英國帝國主義的武裝，以宣戰答覆英國的宣戰。在這個準備武裝宣戰之先，全國民衆應全體動

員起來作反英的示威運動，抵制英貨，在英國人產業和機關底下的工人和職員應準備總同盟罷工。應一致要求全體英兵離開中國。

國民政府此時應堅決地反抗英國帝國主義此種野蠻舉動，應堅決地向英帝國主義抗議，令其即刻停止運兵來華，並撤退在華已有的海陸軍，國民政府應該知道這是光榮的爭鬥，國民政府須知此種鬥爭不僅有中國全體民衆作後盾，而且有世界的無產階級和其他一切被壓迫民衆作後盾，國民政府應站在革命的觀點上，站在全中國全體民衆的榮譽上去與英國帝國主義爭鬥。

全中國被壓迫的民衆們，英國帝國主義的武裝壓迫已到我們頭上來了，這是我們絕對不能容忍的，如果英國帝國主義真要施行其武裝干涉，我們只有與之背城借一。起來！

反對英國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

撤退英國在華所有海陸軍！

抵制英貨！

廢除中英間一切不平等條約！

準備武裝反抗英國帝國主義的武裝！

目前革命右傾的危險 *

(一九二七年五月六日)

中國目前的革命已到了一個歷史的嚴重時期，已到了決定中國革命之未來命運的時期。 這個時期擺在中國一切革命者的面前尤其是工農階級的面前，要求一個明確的認識和堅決的鬥爭。

自北伐軍佔領武漢取得江西以後，中國革命的全部局面已很明顯地表現出來：一方面革命勢力特別是革命軍和工農群眾的勢力異常發展，革命的潮流愈加普遍而深入。 從廣大的城市到荒僻的鄉村都充滿了革命的空氣和革命的鬥爭，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反對買辦官僚，反對貪官污吏地主土豪劣紳等的口號與事實，幾乎無處不有，尤其是國民政府勢力所至之處。 總之，革命的發展已到了一個更廣泛而更深入的階段，使得整個的中國成了全新的劇烈的革命局面。 但是同時在另一面却發生了一種革命右傾的現象，便是在革命的隊伍中發生了一種妥協甚至反動的傾向，這種妥協甚至反動的傾向，已公開地或秘密地破壞革命的原則與革命的策略，已公開地或秘密地企圖與敵人妥協，反對革命民衆的利益，反對真正爲民衆利益而奮鬥的革命分子。 總而言之，這種妥協甚至反動的傾向，企圖終止革命的進行，企圖毀壞革命已達到的成績，企圖使現時全新的劇烈的革命局面回到以前死沉沉的被帝國主義軍閥及一切惡勢力支配的局面去。 這是目前革命中極危險的一個現象，足以毀壞全部革命而有餘。

* 原刊於一九二七年五月六日的《嚮導週報》第190期。

究竟這個危險傾向的實際狀況是怎樣呢？大家知道中國國民革命的根本策略，是：根本剷除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消滅封建軍閥，掃除一切買辦官僚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等惡勢力，召集國民會議省民會議鄉民會議等，建立民主主義的政治，擁護工農利益，與蘇俄結成永久的，反帝國主義同盟等，所有這些都是孫中山先生和國民黨兩次大會及最近中央聯席會議所重複宣言和決定的。所有這些策略都是革命的最低限度的策略，離開了這些最低限度的革命策略，便是根本離開了革命。但是現在實際究竟怎樣呢？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已經在革命的隊伍裏動搖起來了，站在國民黨最高地位的人物居然有說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不是呆板的，意思便是可以隨時變更，可以與帝國主義妥協的。

事實上國民黨內所謂穩健分子已經開始進行與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間的妥協工作了，已經與日本帝國主義公開地或秘密地通使往來，尤其奇異的在廣州竟公然禁止民衆援助武漢「一三」案的反英示威。曾因反革命而被拘的吳鐵城忽然經過南昌而出現於日本東京，向幣原外相擔保中國人永不反日。在另一方面日本的清浦佐分利等帝國主義者風塵僕僕於武漢南昌廣州之間，並公開宣言日本與南方穩健分子已有相當諒解（見佐氏回國談話）。對消滅軍閥的口號表面上雖沒有公開放棄，但事實上也表現許多令人可疑的現象。奉系軍閥的楊宇霆趙欣伯幾次公開宣言與南方穩健派可以合作，只要穩健派排除激烈派，排除共產派；梁士詒且說南方與北方久有使節來往，南北妥協合作當為期不遠（見東方和電通社電信）。三月一日趙欣伯又說：「現在南北兩方並無感情之衝突，除共產主義而外，政見相同之處甚多，如欲合作，確有可能之性質。……即在蔣中正方面，亦嘗間接示意北方，極力辯明南方確非赤化，並謂近來對於共產運

動抑制甚力，決不令其蔓延。 察其語意，似亦願與北方合作…… 1（三月一日上海商報北京通信）。 所有奉系軍閥這些公開的宣言，如果與南方的穩健派毫無關係，為何穩健派至今尚無一言申明？ 至對工農利益，不惟沒有擁護，在廣東廣西江西等處地方而且是向工農進攻，到處充滿了限制工農的空氣。 廣東縣長隨便殺死農民代表（如海康四會），防軍民團隨便殺死農民數十人（最近花縣），政府不惟不加以懲辦，反而說縣長是很好的（某軍事長官語），農會是土匪。 至於工人，在廣東已受嚴厲的限制，工人的罷工自由權已被剝奪（如鐵路水電……等不得政府允許，絕對不能罷工），商人已乘機向工人進攻，致最近廣州市被廠主和店主辭退的工人多至五六千以上。 這難道也是擁護工農利益麼？！ 掃除買辦官僚貪污官吏土豪劣紳等策略，變成了容納甚至扶植的策略，許多買辦官僚……土豪劣紳等如賀德霖龔德栢國家主義派研究系交通系等都跑進國民黨來了。 廣東廣西江西的許多貪官污吏很多都受了防軍和所謂穩健分子的保護和扶植。 聯席會議所決定的省民會議縣民會議鄉民會議至今無人提及，甚至說出聯席會議的決議案本來是不能實行的，要行也等在十年二十年以後（一個甘乃光派的言論）。 對蘇聯的聯絡在穩健派裏也說出只是暫時的策略，如對日本和美國一樣（大概是丁惟汾的話）。 至於政府問題，至今還純在軍事獨裁的狀態之下，甚麼民主主義的影子也找不着，甚至連國民黨也在軍事獨裁之下，名義上以黨治國，實際上是以軍治黨，在廣東和江西國民黨選舉省執行委員都是由軍事長官和某幾個人按自己的意思圈出的，代表只能畫諾，連黨內的民主主義都完全喪失了。

以上所略舉的種種事實都是不能否認的，人人看得見的。 這些事實如果再發展下去，一定要毀壞全部的革命。 我們如果

不讓革命毀壞，便須堅決地起來與這些事實所表現出來的右傾危險奮鬥。

現在我們先得研究這個革命右傾的根本原因。凡是一個革命到了最緊要的關頭，到了將要成功的關頭，往往內部發生妥協的傾向。如法國大革命時，所謂平原黨的溫和派如羅蘭夫人一班人便主張與貴族妥協，反對急烈的激進派的羅拔斯比。俄國二月革命後，代表資產階級的米留哥夫和代表小資產階級的克倫斯基一班人，企圖與西歐帝國主義妥協，繼續舊俄皇政策，反對本國革命的工農和被壓迫的弱小民族。在辛亥革命時黃興宋教仁等也是主張與袁世凱妥協反對中山先生的革命策略。現在所謂穩健派的右傾也是如此，這都是革命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必然的現象。因為每一個革命尤其是民族革命必有各種階級的份子參加，這些階級份子都各代表其自階級的利益，因而各有各的政見，如現時參加中國革命實包含有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以及資產階級。很明顯地這些階級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尤其是資產階級利益，與其他階級的差得很遠。現時國民黨內所謂穩健派便完全表現其資本階級的色彩，他們看革命已經發展到了相當的階段，已經看見工人農民起來不僅為一般革命的利益爭鬥，而且為自階級的利益爭鬥，已經看見敵人帝國主義軍閥向他們表示讓步，如是便想停止革命的進行，企圖抑制急進的革命份子，抑制工農的利益。但是資產階級的代表者為甚麼要容納或扶植買辦官僚……地主土豪劣紳呢？原來代表資產階級的人，想在革命中爭得絕對的領導權，使革命適合於自階級的利益，但現在看到工農階級勢力的發展，客觀上已超過資產階級的支配力，資產階級的代表者已不能如意指揮，於是便不能不援引與他利益比較接近（在階級的觀點上）的買辦官僚地主了。在另一方面，許多買辦官

僚地主土豪劣紳等，原本是壓迫工農小資產階級，站在帝國主義軍閥一方面，仇視革命，反對革命，但近來看見革命潮流已經不可遏止，革命勢力的發展非常之猛烈，尤其自北伐軍佔領長江上游，半個中國已入於革命勢力範圍，向來依附在軍閥勢力下反對革命的人此時已完全失其憑藉，於是不得不搖身一變而投入革命旗幟之下，與其站在革命外反對革命，不如鑽進革命內利用革命名義來破壞革命，來壓迫工農及小資產階級為妙。自然此外還有許多小資階級，特別是智識階級的份子，以革命為昇官發財的投機事業而加入革命隊伍的非常之普遍。

我們現在且舉出幾個人來看，黃郛賀德霖龔德栢馬文車段錫朋等，不都是變成國民黨了嗎？黃郛以前是甚麼人，大家都知道，完全是個買辦式的官僚，現在居然跑到南昌成了政府的要人，聽說將來還有作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之希望哩！無怪乎左派激烈的反對啊（見東方社二月二十八日漢口電）。至賀德霖更是一個無聊的最卑鄙的買辦，聽說在南昌也佔重要地位，將來也有作國民政府財政部長之望。但我們還要知道黃賀二人到南方來完全是研究系的計劃，是研究系的張嘉璈派他們去的。研究系是專門反對國民政府，是國民黨的死敵，但近來看見國民政府的勢力已將要統治中國，於是改變方針，一方派人如黃賀等進國民黨到國民政府裏去，在革命內造成他們的勢力；另一方面則公開改變態度，由仇視的改為贊成的態度，如最近上海時事新報，申言改組，重新表明態度，便是事實（時事新報為要巴結國民黨，張嘉璈曾請國民黨人高一涵作主筆，高見研究系大投機，聞已婉辭）。龔德栢更是混蛋了，他在去年一二月間還在北京拿吳佩孚的錢辦大同晚報，專門攻擊國民軍，攻擊國民黨，曾被國民黨逮捕監禁，現在居然也到了南昌當了甚麼機要秘書，真是希有

奇聞！馬文車是陳炯明的走狗，一向反對中山先生，現在也成爲純粹的國民黨員，北伐軍總司令部駐粵的機要人物。至於現在江西聲勢赫耀，壟斷江西國民黨，號稱純粹三民主義的信徒的段錫朋先生，其歷史是怎樣呢？段先生留歐洲時不用說是反對國民黨之一人，回國後，在上海在北京見人談話間還是不滿意國民黨，謂國民黨不徹底，不過是個民族自由黨，有人勸他加入國民黨，並勸他到廣東去，他還不以爲然。及到廣東差不多半年也未加入國民黨，一天到晚說些譏諷話，譏笑譏笑革命黨人，批評批評革命那樣不好，這樣不好。但現在居然成爲純粹的三民主義信徒，純粹的國民黨人員並且是江西國民黨的領袖了。不過真正革命的國民黨左派要法意，這位純粹國民黨員段先生在江西國民黨內已經組織了一個小小的秘密的團體，有黨綱有章程，名字叫S M呀！至於陳炯明的死黨吳倚滄和國家主義派曾顯浩之加入廣東省國民黨執行委員，也是一個事實。總之，從前反對國民黨的許多買辦官僚地主土豪劣紳及其代表者如交通系研究系外交系國家主義派及許多反動的智識分子，現在都搖身一變或準備變爲國民黨人，他們常常昂首驕顏地向共產黨示威說：「我是純粹的三民主義信徒，我是真正國民黨。」意思是說：「中國革命成功後，其政權還要由我們真正國民黨員掌握四十年呢！」（戴季陶先生的推論）。國民革命的隊伍內既有這麼許多反革命的貨色，再加上帝國主義的威脅利誘，（英國的炮艦政策與新提案的妥協政策並施，日本則純用勾引政策），奉系軍閥的半攻半讓，革命那有不右傾之理！何況革命隊伍裏原來就已有許多非革命的份子哩。

總結起來，目前革命右傾的根本原因約有以下五點：（一）革命中代表資產階級派妥協並趨於反動；（二）買辦官僚……地主土豪劣

紳等或其代表者以及投機份子多量的加入革命隊伍；(三)帝國主義的威脅利誘；(四)軍閥的讓步；(五)革命民衆勢力特別是工農勢力的發展。所有這些原因，都是客觀的而不可避免的。現在我們革命者的問題便在怎樣與這種由客觀所發生出來的右傾危險奮鬥，怎樣糾正這危險。

但究竟怎樣去奮鬥去糾正呢？我以為唯一的先決問題要團結革命隊伍中的真正革命派，即革命的左派。堅決地不斷地攻擊假革命的右派，揭破右派的妥協陰謀，指出右派妥協和反動的行動。但是以甚麼為標準呢？這裏便到了革命原則和革命策略的問題了。我們要團結革命左派，要打擊右派，與革命的整個右傾危險奮鬥，只有站在真正的十分正確的革命原則上和革命策略上才有可能。

中國國民革命的本質是反帝國主義，是肅清帝國主義的工具封建軍閥。是替佔中國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農階級謀解放。所以中國國民革命是世界反帝國主義革命即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總革命中之一部份，而不是一個甚麼單純的資本主義的民族革命。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世界，世界無產階級直接推翻資本主義，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的時代，已經不允許世界有任何資本主義的平安發展，同時也就不允許世界有任何單純的資本主義的民族革命，現在世界上不管在資本主義國家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每一種革命運動，都不過是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之一部份，都不過是促成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之一種原素。中國的國民革命是打擊世界帝國主義的一種強有力的動力，應該是促成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有力原素。中國國民革命應該是替中國大多數工人農民造成一個建立社會主義的基礎，而絕不應替少數的資本家買辦地主造成一個發展資本主義的基礎，

因為如果只替少數資本家買辦地主造成建立資本主義的基礎，結果中國仍然要歸帝國主義統治，不過那時統治的方式和工具不同，是以道衛斯一類的計劃代替不平等條約和以資本家買辦官僚地主代替軍閥罷了。因此，真正的革命者要根本認識中國革命的性質，不是單純的資產階級的民族革命，而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之一部份，從中國的國民革命中應創立社會主義的基礎，應在國民革命的過程中去逐漸完成社會革命，徹底達到解放工人農民以至一切小資產階級的道路。如果了解中國革命的本質與趨勢，對於目前的革命策略便應當是徹底剷除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以至於根本消滅世界帝國主義為止，而不是簡單限於取消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等。同時對於封建軍閥也是徹底消滅，並且還須進一步徹底剷除帝國主義和軍閥的一切羽翼——買辦官僚、貪官污吏、地主土豪劣紳等。帝國主義軍閥買辦官僚貪官污吏地主土豪劣紳是三位一體，是中國工人農民及小資產階級的死敵，是革命之絕對的對象，只有剷除消滅之，絕無調和之餘地（自然在某種範圍內可以利用敵人的衝突，但只是利用，而絕不能妥協）。工人農民是中國民族的精華，是創造中國新社會的先鋒軍，是革命的主人翁，離開了工人農民的利益，反對工人農民的利益，便是絕對的反革命，是根本毀壞革命。蘇俄是反帝國主義的燈塔，是領導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及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的大本營，反蘇俄或遠蘇俄都是表示脫離世界革命的戰線，加入反革命的帝國主義的營壘。

中國革命應該創造一個革命的民主制，而絕不應造成個人的軍事獨裁，個人軍事獨裁的結果，必然要離開群眾的立場，犧牲群眾利益，回復到封建時代專制的惡制度去，回復到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支配城市和農村一切民衆的惡制度去。目前革命已經很

迫切地需要一個革命的民主獨裁政治，廣大的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直接參加政權支配政權的民主政治，為工農小資產階級真正謀利益的政治，打擊一切反革命派並對一切反革命派施行獨裁的政治。

目前革命已經表現出一個右傾的大危險，從帝國主義軍閥到我們革命營壘裏的所謂穩健派先生們，正在調眉擠眼，暗渡殷勤，很有戀愛成功之勢。一切革命的民衆們，一切真正的革命分子，應該立刻團結到左邊來，堅決地一致地站在革命的原則上和革命的策略上，與此種右傾的危險奮鬥，這是革命的生死關頭，必須取得最後的勝利！

我們的口號應當是：

團結革命的左派！

為徹底反抗帝國主義而奮鬥！

為徹底消滅一切軍閥而奮鬥！

為根本剷除買辦官僚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及一切反革命派而奮鬥！

為徹底擁護工農利益而奮鬥！

為建立革命的民主獨裁政治而奮鬥！

為消滅一切企圖與敵人妥協和反對民衆利益的右傾危險而奮鬥！！

南北妥協問題 *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

現在擺在全中國一切被壓迫民衆的面前，擺在一切革命分子的面前，有一個最嚴重的問題，便是革命右傾的問題。這個革命右傾的具體表現是：一方面革命戰綫中的右傾派所謂穩健派投降敵人——帝國主義和軍閥——與敵人妥協；他方面右傾派進攻真正革命的左派——工農階級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以爲投降敵人之條件。（投降敵人與壓迫左派是相因而生的，投降敵人必要壓迫左派，壓迫左派必投降敵人）。

現在南北妥協的聲調已經高唱入雲了，這是表現什麼呢？這便是革命右傾更具體之具體的表現，這便是革命戰綫中的右傾派投降敵人之明證。我們且看：

順天時報奉天二月五日東方社電：「楊宇霆於與左分利局長之特別會見，關於對外問題，傳楊氏透出，自國家見地，南北有妥協之可能性。」

東方社北京二月十二日電：「關於南北妥協問題，現在政客之往來漸形頻繁。安國軍欲以平定豫局爲妥協之緊要戰策，目下正在節節進行……。」

路透社北京二月十二日電：「楊宇霆昨抵北京，聞力勸張作霖勿用兵南方。」

時事新報北京二月十五日電：「趙欣伯語人，南北妥協說漸趨有力，……。」

路透社一月十四日北京電：「楊宇霆與梁士詒現謀奉天

* 原刊於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二日的《嚮導週報》第191期。

與國民黨間之和解。」同日電通社北京電：「張作霖爲促進南北妥協機運起見，將於數日中歸奉。」

東方社二月廿四北京電：梁士詒關於時局談話：「所謂討赤，所謂國民革命，要皆不過急進保守兩派實現其理想之表面文章而已，……中國之事有外人不能想像微妙之作用，外表雖以主義相爭，而其內幕仍通聲氣，均不旋踵即相結合，而臻於和平統一實現之時期，余想其時期已不遠，當努力俾使實現也。」東方社同日又電：「梁士詒在其私宅中開會議，討論南北妥協具體的進行方法。本日依據日前受梁密旨南下探詢南方當局及各有力者意見已回京之鄭洪年之報告，更進一步討論具體的方策云。」

申報北京二月十八日電：「南北妥協，某顧問斡旋甚力，該顧問日前曾遊匡廬，十六夕返京，携去條件七，帶回條件四，詳情無所悉。聞蔣對主義有所剖解，不承認南方共產，又對俄顧問謂係客卿，且英美日法均有人充南北顧問云。」

路透社二月二十一日北京電：「路透電社及各報訪員今日謁見楊宇霆，據稱非俟南軍排除俄國赤黨，決無議和之望。」

申報二月十九日載趙欣伯對電通社記者的談話：「楊宇霆所主張之南北妥協說，現已漸趨有力，倘使南方能排共產主義，則南北之妥協亦非不可能。」又：「現在南北兩方並無感情之衝突，除共產主義外，政見相同之處甚多，如欲合作，確有可能之性質，只須南方放棄共產主義，北方未嘗不可與之合作。即在蔣介石方面亦嘗間接示意北方，極力辯明南方確非赤化，並謂近來對共產主義抑制甚力，決不令其蔓延，察其語意，似亦願與北方合作。」

東方社三月二日北京電：「孫寶琦通知梁士詒，關於南北妥協問題，俟與梁士詒一派接洽後，不日將由天津赴滬，在京之李石曾預定所事告一段落後，即赴漢口。」

東方社四日北京電：「近因南北妥協問題來京奔走與安國軍接洽之李石曾氏，以南北之主張非絕對不能一致，且現下之形勢，各方面之意向確有趨於南北妥協之勢。故李於昨日出京，繼由天津上海轉赴漢口，與南方當局進行南北妥協之交涉。」

時事新報七日北京電：「張作霖與人談時局，謂南征在防赤，南方必有自覺之一日，收回主權不用暴力，黨軍苟驅逐左派，予將抒誠與圖統一。」

順天時報三月七日載：「蔣介石進行南北妥協，挽人提條件。據某機關消息，蔣介石因共產黨之專橫，久已蓄意排斥。前因軍事正急，對武漢九江各處戰事俱利用共產派以取勝。蔣之目的本欲佔領長江以南為止，因自己之實力現時不能驟然發展至長江以北，現在與國民黨舊人及中立各派密商反赤，即以反赤名義與北方攜手。……蔣之聯北計劃現正積極，已倩人提出條件，惟其內容不能宣佈云。」

中國電通社三月十日北京電：「近日此方南北妥協之聲調甚高，據接近楊宇霆氏某要人傳出消息，現南昌蔣介石確已派褚某携條件來京，經過李石曾楊度與楊氏（宇霆）協商，惟其條件與協商結果均異常秘密云。」

以上這許多通信社和報館的消息難道都是造謠的嗎？我們將這許多消息摘下來，只要讀者細心看一遍，再拿來與事實對照，便知道都不是無因的啊。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通信社和報紙的消息說得更具體而明確，因為日本帝國主義者是南北妥協的主謀

人，是親自參與南北妥協的陰謀計劃的。這次南北妥協的主要目的，雖其「條件內容不能宣佈」，却已很明顯地表現出來是「反赤」，是右傾派向革命左派的進攻，如在北方提出「排除俄國赤黨」、「只須南方放棄共產主義」，「驅逐左派」，以及南方「極力辯明確非赤化」，「近來對共產主義抑制甚力，決不令其蔓延」，「現正與國民黨舊人和中立各派密商反赤，即以反赤名義與北方携手」等。我們還可以從事實上看出來：南方的「反赤」工作確已開始，並進行甚猛，如在廣東江西極力抑制工農運動，如廣東以軍隊解散國民黨市黨部，如廣東江西國民黨省黨部改選時用圈定法排除左派和共產派，以及順天時報所載蔣介石將解僱俄顧問鮑羅庭，反對武昌左派徐謙等，這些都與北方所提議的「排除俄國赤黨」，「抑制共產主義」和「驅逐左派」等條件正相符合，難道這也是偶然的嗎？我們從以上的消息與事實上可以知道：現在南北妥協已經不是空氣，而是事實。進行南北妥協的主要人物也很明顯地看得出來，在北方是楊宇霆，在南方是蔣介石，中間牽綫的是李石曾梁士詒孫寶琦楊度等一千人。

但是這個南北妥協如果成功，其結果將是怎樣呢？這又是很明顯的：一、停止反軍閥的北伐戰爭；二、停止反帝國主義的爭鬥；三、南北一致討赤——即討伐一切真正革命分子；四、南北一致反俄。總之，國民黨多次會議的宣言政綱和中山先生所遺留下來一切革命策略及遺囑都要從此完全被推翻，那時所剩下的只是「南北合作」，這南北合作如果成功，那時自然把革命送上了斷頭台，使垂於危亡的帝國主義與軍閥統治中國之勢力重新鞏固起來。

南北妥協究竟能否成功呢？這要看全國被壓迫的民衆和一切革命分子的奮鬥。我們知道這個妥協有其歷史的根源和社會基礎

。辛亥革命會經過這樣的妥協而失敗，但不管失敗與否，這「妥協」始終是那班國民黨穩健份子所願意而且需要的，因為現時那班穩健份子所代表的是資產階級買辦官僚地主和土豪劣紳等，他們原來是可以與帝國主義和軍閥合作的，他們的利益固然有時也與帝國主義軍閥衝突，但他們認為他們的真正敵人還不是帝國主義軍閥，而是工人農民及一切被壓迫勞苦人民，因為被壓迫的人民如果解放了，他們剝削的對象就完全失掉了，等於根本打破了他們的飯碗。所以他們願與帝國主義軍閥妥協，而反對工農等一切勞苦群眾，反對共產黨，反對國民黨左派以及一切真正的革命分子。

可是我們革命者究竟應該怎樣？難道真讓這班穩健派把革命葬送麼？我們須知道革命的勝利並不是某幾個人的努力得來的，而是無數工人農民兵士和其他許多革命黨人犧牲精血和生命積聚起來的，因此我們決不能讓少數人葬送革命，拿無數人爭得來的一點革命勝利品去與敵人作交易。讓一百步講，要與敵人妥協，也得經過大家的同意。自然我們也認在某種困難環境之下，是可向敵人讓步的，如俄羅斯一九一八年與德國訂結不列斯特條約，由這個讓步的條約可以救住當時革命的危機，這是為革命而向敵人讓步。可是現時南方穩健派與北方奉系軍閥妥協，難道是為救革命的危機而讓步麼？完全相反，是為救反革命的危機而讓步。現在我們的敵人可謂到了最後的五分鐘，只待最後之一擊就完了。我們看現時的革命環境是如何的順利，河南以前是反革命的吳佩孚勢力所佔據，而現在吳佩孚却已無形消滅，吳之部下如靳雲鵬魏益三田維勤等均轉成為革命之用，成為反抗反革命的奉系軍閥有力之工具，並且數十萬紅槍會也起來贊助革命反抗奉軍。在安徽陳調元王普葉開鑫以前也是障礙革命發展反對革命的，現在

都就了革命的範圍，反北伐軍的安徽轉成了反對直魯軍之勢力了。在江浙北伐軍有很大的進展，取得了整個的浙江和江蘇一部分，尤其重要的，以前反對革命，障礙革命進展的孫傳芳勢力，現在也同吳一樣，無形消滅了。同時上海的市民又強有力的起來響應北伐軍，打擊孫傳芳張宗昌，進行民選政府運動。所有這些都是證明革命的進步。現在革命的敵人愈加單弱了，從前的奉魯直三軍閥，現在只剩下奉魯了，現在軍事上從山西河南安徽江蘇都可以向敵人進攻，奉魯軍閥已處八面受敵之勢，何況奉魯軍中從高級軍官畢庶澄許琨到營長連長紛紛地私向革命投誠哩（最近幾天魯軍軍官向駐滬國民政府密請投降者日不下十數起）。現在只要北伐軍下總攻擊令，決然可以一鼓而掃平奉魯軍閥，統一全中國。可是我們的所謂穩健派先生們却不願這樣幹而與之妥協，恐怕馬上消滅了他們親愛的敵人，將來沒有人幫助「反赤」。這還不是救濟反革命的危機保存反革命的勢力麼？！

全國一切被壓迫的民衆們，一切真正的革命者！事實是如此：我們費盡幾許精血和生命所換得來的一點革命勝利，現在却有人要當作私有物拿去與敵人交易，這樣，我們還能容忍麼？我們爲了革命前途計，爲了無數爲革命而犧牲的烈士計，現在再不能客氣了！究竟誰與我們的唯一兇惡敵人奉天軍閥妥協並爲什麼而妥協？這是我們應該質問的了。我們現在有權利要求各通信社各報紙所指出來的兩方穩健派——蔣介石答覆，須立刻答覆是否真與北方妥協，並且須答以行動，便是立即對奉魯軍閥下總攻擊令，繼續北伐，直至根本剷除一切軍閥；立即停止向工農進攻，向左派和共產派進攻，因爲這種進攻分明接受了奉天軍閥和帝國主義所提出的條件。

一切被壓迫的民衆們，起來：

反對南北妥協！

反對與奉魯軍閥妥協的假革命派！

立即繼續北伐，消滅一切軍閥，統一全國。

讀了蔣介石二月二十一日的講演以後*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

蔣介石總司令二月二十一日在南昌總部第十四紀念週的講演，這是一篇很嚴重的講演，在目前政治上甚至全部的革命上都有極嚴重的意義。自蔣介石這篇講演發表以後，京滬帝國主義的通信社和報紙如東方社、電通社、路透社、順天時報、字林西報等都大吹而特吹，語句之間都表現一種極興奮的樣子，差不多異口同聲說：「蔣介石已起來反對左派，抑制共產派了。」同時孫傳芳、張宗昌的上海新申報和西山會議派的上海江南晚報也都大作其社論，對於蔣介石的演說大字登出，大加贊揚，說是：「到底蔣介石不錯，還能起來抑制共產分子。」爲什麼帝國主義和反動的報紙通信社見到蔣介石的演說如此起勁，如此得意呢？原來近兩月來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報紙通信社等不斷地發出一種「穩健派蔣介石限制工農反對左派制裁共產派」之流言，希圖破壞革命的聯合戰綫，可是在蔣介石本人方面始終還沒有公開的表示。迨到二月二十一日的演說一來，於是帝國主義和反動派所發的流言，却得到一個證據，彷彿證明他們不是完全造謠的，這樣怎令它們不起勁不得意洋洋呢！？的確，在蔣介石總司令這篇洋洋數千言的演說裏，對於武漢的徐謙派大加以申斥外，特別是看重共產派，差不多演說中十分之六七是對共產派說話的，說共產黨黨員如何強橫，他要如何制裁共產黨，如說：「現在共產黨黨員，有許多對國民黨黨員壓迫，表示強橫態度，如此，我何能不加糾正」「共產黨黨員有不對的地方，有強橫的行動，我有制裁的權力。」這樣，

* 原刊於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八日的《嚮導週報》第192期。

與順天時報所載：「蔣介石因共產黨之專橫，久已蓄意排斥，……現正與國民黨舊人密商反赤，即以反赤名義與北方攜手！」，和張作霖的軍師趙欣伯所傳出：「蔣介石方面亦嘗間接示意北方，極力辯明南方確非赤化，並謂近來對共產主義抑制甚力，決不令其蔓延……」這些流言不是若合符節嗎？這在政治的意義是多麼嚴重啊。

我們現在且丟開蔣介石總司令這篇演說的政治意義，來看共產黨黨員是否真正壓迫國民黨黨員，是否真有強橫的行動一層。如果共產黨黨員真正壓迫國民黨黨員，真正有強橫的行動，我以為共產黨的高級機關自己便應該加以糾正，加以制裁，完成革命的聯合戰綫。但是事實究竟是怎樣呢？果真如介石先生所說：「事實上共產黨員對國民黨員壓迫，有強橫的行動」嗎？介石先生只說「事實上」，而却始終沒有舉出任何的「事實」，我以為這是不能含糊的，現在應該請「事實」先生出來證實「共產黨黨員對國民黨黨員的壓迫和強橫行動」。在介石先生未舉出事實之先，我現在姑就我所知道的「事實」略舉出幾件：(一)廣東國民黨省黨部選舉執行委員會時，張靜江禁止各地代表自己選舉，而用圈定的方法硬排除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不惜拉進一些陳炯明黨羽和國家主義者，違反自己所定的整理黨務案。這是誰「壓迫」誰，誰「強橫」？！(二)江西國民黨省黨部的執行委員會之選舉，也同樣用圈定法排除了共產分子，這又是誰「壓迫」誰，誰「強橫」呢？！(三)福建的所謂純粹國民黨黨員林壽昌等最近也公然在福建政務委員會提出，強迫政務委員會解散福建國民黨省黨部，理由則謂省黨部係共產黨把持，（其實福建省黨部裏面只有一個共產黨黨員），這又是誰「壓迫」誰，誰「強橫」呢？！(四)我們再追想去年三月二十號的事件，當時孫文主義學會派歐陽格惠東

生繆斌王柏齡等，假造蔣校長的命令，騙李之龍開中山艦至黃埔，另一方面則報告介石先生，謂李之龍要請蔣校長赴俄國，結果，造成了三月二十號的冤案，逮捕了在廣州第一軍中和黃埔的全體黨代表共產分子，並牽連及國民黨左派罷工委員會以至俄顧問，隨後又撤退了在潮汕的金佛莊郭俊等一般C P分子的軍官及軍事政治工作者，幾釀成大慘殺，這事是介石先生自己親身經過的，難道還不明白麼？這樣的事件，難道外人不知道，真要死後才發露麼？這又是誰「壓迫」誰，誰「強橫」呢？夠了，夠了，我們很不願多舉，說來實令人悲憤！？我們且專就介石先生演說中自己所吐露出來的話來看。「譬如中央有一個決議，有一個命令，或委一個幹事，有許多同志來問這個決議，這個命令，這個幹事，究竟是那一個執行委員提出的，這個執行委員究竟是跨黨分子不是，這個決議，這個幹事，是否真正為本黨的。」這是什麼意思？這還不明顯嗎？一個決議，一個命令，委一個幹事，都要懷疑到跨黨與否，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們這裏要問國民黨用人行政以什麼為標準？以革命的利益革命的工作為標準，還是以跨黨與否為標準呢？像介石先生所說完全是以跨黨的標準來定國民黨的命令決議和用人了，我不知道中山先生要C P加入國民黨究竟為的什麼！唉，對跨黨分子是如此，還要說共產黨黨員壓迫國民黨，強橫，真正有趣哩！

現在一班從西山會議派「悔轉過來」的，一班新進來的國家主義者和研究系，或投機分子如段錫明如龔德柏等，都自稱為「純粹的三民主義信徒」或「真正國民黨員」，而謂共產黨員則為跨黨分子，有時甚至認國民黨左派亦是跨黨者，彷彿一切黨權，一切政權都應歸此輩所謂純粹三民主義信徒或真正國民黨員掌握；但此輩却完全不知道或忘却了國民黨改組以來的發展史，却一

點也不明白國民黨改組以前是什麼一個景象，改組以來幾年的工作是何人在那裏奮鬥，我們可以不客氣地說，國民黨改組幾年的工作差不多是C P和幾個左派支持，這是大家應該知道的。現在湖南湖北上海江蘇的國民黨是誰發展起來的？北伐軍未到江西以前的江西國民黨是何人作工作？爲江西國民黨而死的趙醒農是不是跨黨份子？在方本仁鄧如琢的嚴重壓迫底下奮鬥而被監禁的是些什麼人，是否是現時操縱江西國民黨省黨部自稱純粹三民主義信徒的段錫明一班先生們？在廣東省黨部一向奮鬥的又是否係陳炯明的黨羽吳倚倉和國家主義者曾顯浩等先生們？現在奉系軍閥嚴重壓迫下的天津北京是那些人在那兒支持國民黨工作；除了幾個跨黨分子和左派奮鬥外，有沒有所謂純粹的三民主義信徒在那兒工作？有許多所謂純粹的三民主義信徒或老黨員在被壓迫的時代，被壓迫地方，在困苦的奮鬥中，我們都沒有看見，到了革命快要勝利了，大家都昂起頭來，說：「你是跨黨分子，你是C P，我才是真正國民黨黨員，純粹三民主義信徒。」碰到中央發一個命令，一個決議，委一個幹事，都要查問這是否跨黨分子所提出，彷彿跨黨分子等於被剝奪一切公權的囚犯，這樣，怎令人不悲憤！

本來我們對於革命是只願奮鬥，不願計功的。我們以爲革命黨人的榮幸便是在革命主義的旗幟下去奮鬥，去犧牲，革命黨人應該爲被壓迫民衆的利益而犧牲一切。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完全爲了中國工農階級的解放，爲了全中國被壓迫民衆的解放，中國共產黨黨員每個人都準備爲這偉大的解放工作而犧牲，認爲以前共產黨黨員在各種運動中，在東江北伐以及各種軍事鬥爭中，槍斃殺頭監禁陣亡都是預備犧牲的，都是革命的光榮，原無表白之必要；可是有許多人一向反對革命，或對革命持旁觀態度，或

譏誚革命黨的人，一旦看見革命要勝利了，便昂起頭來充好漢，自稱什麼純粹信徒，什麼真正黨員，企圖排除一切，那我們就不能不檢一檢查革命歷史，計較計較歷史上的革命功績了。介石先生自稱是革命領袖，這幾年來總算在革命中工作，應該知道誰是革命中勇往奮鬥的，誰是臨陣退後的，工農運動且不提，單在軍事一方面說，自黃埔開辦以來，經過二次東征，經過劉楊之役，經過廖案以及這次北伐，跨黨分子究竟如何？金佛莊郭俊（最近在富陽戰死）章炎曹淵等跨黨分子是怎樣？惠東生王柏齡繆斌等許多孫文主義學會分子，純粹三民主義信徒，在攻武昌攻南昌之役是如何？好了，讓將來的歷史家去評判罷。

復次，蔣介石說到他是中國革命的領袖，他有糾正及制裁共產黨的責任，這也是應該說明幾句的。第一，我們要認清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獨立的政黨，除共產第三國際外，絕不受任何人的糾正或制裁；在中國國民革命的戰綫上，自然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要密切地誠懇地協商合作，但只是協商合作，而決不是受其什麼糾正或制裁。某國民黨個人或領袖覺到跨黨黨員有所謂壓迫國民黨黨員或強橫的地方，則只有用合法的手續，即按國民黨黨紀，把他當一國民黨黨員加以處分；或由國民黨高級機關轉告共產黨高級機關自己懲治。至於某個人或某領袖要糾正或制裁中國共產黨或其黨員都是笑話。第二，我們對於介石以前誠然認為是國民黨的領袖，是中國革命的領袖；但須明白中國革命的領袖不止一個，有工人的領袖，農民的領袖，軍事的領袖等，在黨的方面則有國民黨的領袖，有共產黨的領袖；介石先生不過許許多多領袖中之一個。一個領袖不能隨便說要糾正一切，制裁一切，這樣，只有專制時代的皇帝可以辦得到。總之，革命領袖的權利與責任是有一定限度的，每個革命領袖應該明白自己的權

利與責任，並且還須明白革命領袖是要領導革命，要時時顧到革命群眾的利益，反此，則立刻可以失其領袖的地位。

，至於武漢國民政府臨時聯席會議問題與汪精衛先生回職問題，我們也有點意見。介石先生說漢口聯席會議是無根據的、非法的，等於西山會議；這句話很有妨碍於革命所已經得到的勝利。因為大家知道漢口聯席會議在國民政府離開廣州至這次國民政府正式成立的中間，事實上確在武漢代表國民政府的職權，最明顯的如「一三」案是漢口聯席會議辦的，漢口和九江的租界是漢口聯席會議收回來的，如果否認漢口聯席會議便等於否認「一三」案之交涉，等於否認收回漢口和九江的租界，這樣，倒是英國帝國主義非常之歡迎的。國民政府遷都武漢本來是國民黨中央聯席會議所決定的，是合法的，當政府和中央黨部人員尚未完全至武漢之時，一部份政府與中央委員自然可以從權組織臨時聯席委員會執行政府職權，無所謂無根據或非法，因為政府決不能像那時幾個月在旅行中過流浪生活。只有後來南昌隨便變更聯席會議決定改遷南昌才是非法哩。

汪精衛先生的復職，在近來中國革命局面的發展上，是非常必要的，誰也不能反對。尤其一切革命民衆和真正革命份子都很熱烈地盼望汪先生回來，即介石先生亦確曾發表電報請汪復職，這是對的。但是汪先生至今還沒有復職，是這什麼原故呢？據介石先生說：「就是現在有許多人故意造出一種空氣使他不能夠出來銷假……」！究竟介石先生所謂「許多人」是誰，我們無從知道；而介石先生自己已申言：「我們相信汪精衛同志定可以團結到底，合作到底的，我們兩個人感情道義，無論為公為私，決沒有什麼阻碍。……希望他趕緊回來，共維大局。」介石先生這個態度很好，大概所謂使精衛不能銷假的「許多人」中，自然介石

先生不在其內了。因此我們向革命的民衆和革命黨人提議，如果大家認爲在革命的觀點上需要汪精衛先生復職，便應起來剷除使精衛所以不能復職的阻礙，這是必要的。不過我們於請汪復職之時，也不要忘記了使汪去職之故，大家或者還記得汪精衛先生是去年三月二十號事件發生後去的，這是特別應該了解的。

蔣介石先生說：「我們革命環境一天一天好似一天，軍閥和帝國主義只會天天崩潰下去……如果我們的內部團結起來的時候，革命成功是不成問題的，因爲我們的敵人已經自己在崩潰，……」這種觀察是很對的。不過我們還得說明的，我們的敵人雖然自己在崩潰，可是革命的戰綫也正在分離，革命戰綫內有人正企圖和敵人妥協，接收敵人的口號向自己的朋友進攻。現在江西廣東福建許多省份都不是高唱限制工農運動嗎？不是大倡反對共產派嗎？不是革命戰綫裏邊「反共產派」，「反工農」，「反俄」總言之，所謂「反赤」的口號都與帝國主義和軍閥及買辦官僚土豪劣紳等異口同聲嗎？像這樣裏應外合的反赤，革命的內部怎麼能團結起來啊！現在革命誠然是到了勝利的關頭，同時也是在極危險的關頭，要渡過這關頭只有團結革命勢力；但是須團結真正的革命勢力，跟着帝國主義和軍閥買辦官僚劣紳反赤的人，我們是應該反對的，我們是要與之奮鬥的。現在事實教訓我們，對於誰是真正的革命者，誰是假革命者，我們已經不僅只聽他的口頭禪，我們要看事實了。西山會議派現在還在嚷「繼續總理革命」，可是事實上已變成軍閥和帝國主義「反赤」「反共產」之工具口裏儘管嚷着革命，究有什麼用呢。

現在中國是兩個絕對不能調和的營壘！一方是反革命的帝國主義軍閥買辦官僚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等，他方是革命的工人農民和被剝削的小資產階級。共產黨是堅決地站在工農方面的。中國

將來的鬥爭便是這種革命勢力與反革命勢力的決死戰，但是我們相信工農和被壓迫的小資產階級一定要取最後的勝利，誰反對工農和小資產階級的利益誰便會到最後的失敗。中國革命前途的路綫已非常之明顯，何去何從，是在人們自己去認識。

評中共中央的機會主義和 * 盲動主義路線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二日在支部幹事會
和中央省委區委各代表參加的聯席會議上的發言

第一次發言：

剛才聽了主席報告今天召集會議的意義之後，我很不瞭解今天會議的性質。據主席說，今天的會議是要解決我同澤楷同志兩個人的問題，即我們所提出對於中央之不同的政治意見問題。並提出四個問題：中東路問題，反對派問題，機會主義派問題以及中國將來革命性質問題，要我們表示意見。據此我認為今天會議是不合組織路線的，因為我們對於中央之不同的意見，乃是一個政治問題，須要從政治上來解決。我個人確實是反對中央整個的政治路線，認為中央的政治路線是繼續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的，

* 本文輯自一九八〇年香港出版的《十月評論》總47期，該刊編者曾加如下按語：

「著者在上述聯席會議上作了三次發言，內容是直接批評當時中共中央所執行的共產國際的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的政策，特別是具體指出瞿秋白、李立三、李維漢和向忠發一九二七年在武漢負責時所表現的最可恥的機會主義的事實。

著者在發言後幾個月，便被中共開除黨籍了；這些意見自然也不會為中共所發表，讓其他黨員知道。

我並提出整個不同的政治路線，我已在支部小組會議上詳細報告過一次，並已準備寫出來交給中央（已經動手寫了一部分）。但我所提出來的問題是關於黨整個政治路線的問題，我是希望由中央公佈出來交給全黨討論，問題只有這樣才能解決，決不是幾個機關派幾個代表開一個聯席會議可以解決的，因為這是政治的問題，不是一個什麼事務問題或單純的工作問題。像今天這樣的會議要想企圖解決我對中央所提出的整個政治路線問題，我認為此種企圖是完全不對的，不會成功的。至於所謂中東路問題，反對派問題，機會主義派和革命性質問題，我認為也用不着在這樣的會議上來要我們表示態度或發表意見，只要在支部小組會議上提出來討論就夠了。因此我對於今天此種會議的形式，以此種會議形式來專門解決我和澤楷同志所提出的政治意見問題及要我們表示對上面那四個問題的態度，我都認為不對，不合組織路線，因此我不願意接受此種會議的談判。

至於克全同志所說現在「時局緊張」，不便於討論我們所提出來的政治問題，說今天必須解決我們的問題。我認為此種說法是

這份文件，據著者開頭處附語說明：「當日會議上雖有省委帶去的紀錄者，但我見其未認真記錄，同時又恐其記錄不實，故會議後特自記出來，並以此交給中央，作為我當日負責發表的意見。」

……本文標題和小標題原件沒有，係由編者加上的。從內文看來，個別文字可能會有錯漏，但暫時無法找到其他版本校正，祇好寄望於將來補做了。

此外，原件談到陳獨秀時，是用「撒翁」代名詞，「代英」即憚代英，「澤楷」即汪澤楷。」

完全錯誤的。第一，我要問現在時局究竟緊張到如何程度？照我看來，現在的時局就沒有什麼了不得的緊張；第二，即令時局就是緊張，對於討論政治問題也是沒有什麼不便的。並且我認為時局如果真是緊張，尤其應當討論，因為我們既已發現黨的整個政治路線是不對的，是機會主義盲動主義的，是不適合於革命而且有害於革命的，那就非舉行嚴重的討論不可，黨的政策非根本檢查和改變不可，時局愈緊張，就愈須討論。當一九一八年蘇聯與德帝國主義，訂結白萊斯德和約之前，那時蘇聯的時局不是緊張到了極度嗎？一髮千鈞，危在旦夕嗎？何以列寧於那種時局極度緊張時偏偏還要將白萊斯德條約提出來討論呢？在列寧看來只有討論才能得出共同的意見，得出真正的革命策略，才能公開的在群眾面前暴露所謂布哈林等左派共產黨員的錯誤。在新經濟政策施行之前，蘇聯時局之緊張也是到了百二十萬分的，而列寧仍然是提出全黨討論……這些都證明列寧多數黨對於重大的政治問題，特別是到「時局緊張」時，尤其不怕討論，尤其要舉行討論，這才是真正布爾什維克的精神。現在的問題是在於黨的政治路線究竟有無錯誤，但關於這一層我在支部小組會議上及和克全與趙芸談話時已經嚴重地指摘出來，如黨對於資產階級的幻想，對於估量國民黨政權之階級性的錯誤，對於農民問題的錯誤，特別是對於目前革命形勢之估量的錯誤，以及近來不斷示威之盲動的行動，這一切都只有使黨日趨削弱，日益墮落於機會主義的泥坑中而無由自拔，客觀上實是障礙革命，幫助敵人，並培植未來革命失敗的種子。我認為這些錯誤都非很小，而是異常之嚴重的，即令中央不同意，亦必須將我們的意見提出公開討論，並且必須討論，無論誰是誰非，我認為討論的結果於黨的策略總是有益處的，為什麼要拿「時局緊張」這個幌子來停止討論呢？！如果黨

的路綫真是對的，一經討論之後當更加明瞭，這有什麼可害怕呢？！所以我認爲克全同志說「時局緊張不便於討論」的意見是異常之錯誤的，根本不懂得布爾什維克之自我批評的精神，這種說法完全是違背布爾什維克的傳統精神的。

現在我再重複一句，我所提出來的政治意見，必須由中央公佈全黨討論才能解決，決非今天此種會議所能解決的，故我始終認爲今天會議的企圖是不對的，是不能真正解決問題的。

第二次發言：

我始終認爲今天會議的企圖是不對的，現在的會議既已召集，現在我們既經將會議的性質重新確定，今天的會議決不能也不應解決我們所提的整個政治意見的問題，只是關於四個問題徵詢我們的意見，那我自然可以相當表示我的意見。但在我發言之先，希望代英同志將反對派與機會主義派的實際情形加以說明，反對派組織情形如何，其理論的基礎怎樣？又機會主義派在組織上究竟怎樣？其現在的思想傾向怎樣？並且我希望代英同志必須舉出事實，不要只是根據傳聞，道聽途說……

現在聽了代英同志的報告，我便可以發表我的意見了：

中東路問題

(一)關於中東路問題。將這個問題第一次提出討論、提出意見的可以說是我，因爲正當中東路事件發生的第二天就是我們開小組會議的那一天，在小組會議上我首先便向克全同志提問中央或省委對中東路問題有無指示，克全同志答還沒有指示，因此我便提出意見：我認爲中東路事件是中國革命失敗之後，帝國主義利用反動的國民黨政府予蘇俄以最後的打擊，也就是帝國主義公開進

攻蘇聯，這對於蘇聯對於中國都是極危險的。因此我主張在八一示威運動中應以中東路事件爲中心，應當提出「擁護蘇聯」，「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反對帝國主義走狗國民黨政府進攻蘇聯」……的口號，同時必須將此等口號與群眾實際鬥爭和容易了解的口號聯繫起來，並且請克全同志將我這個意見迅速轉達省委和中央。這就是我最初對於中東路問題所提出的見解。我現在問克全同志，我當時對於中東路事件所提出來的意見是不是如此？（克全答：是的。）但我現在應該聲明我當時這種見解是不完全的，因爲那天我只看到帝國主義進攻蘇聯，沒有看到在中東路事件中美帝國主義的作用及美帝國主義同日帝國主義之間的衝突，所以隨後我在支部會議上又隨便提到中東路事件主要是美帝國主義挑撥起來的，美帝國主義想利用南京政府去掠奪中東路；美帝國主義曾主張由新銀行團管理中東路，事實上便是由美國資本管理中東路；隨後我們又看見南京政府主張以金錢收回的辦法，這就是美帝國主義借錢給南京政府，以中國政府名義贖回，而實際上還是落在美帝國主義之手。正因爲如此，所以日帝國主義極力反對，進兵滿洲，不許中國兵通過南滿鐵路，這不僅威嚇蘇聯，而且是威嚇南京政府，向美國示威。像此種形勢很有引起帝國主義戰爭之可能。因此，我認爲對於中東路問題宣傳的口號，除我在上面所提出之外，還須加上「反對美帝國主義利用南京政府搶奪中東路」，「反對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南京政府出賣中東路」，「反對因搶奪中東路而引起的帝國主義戰爭」。

（此處原稿缺去四行——編者）中東路問題獨秀同志一共寫了三封信給中央，前二封已經由《紅旗》發表，至第三封信至今還沒發表出來，但我是看過的。我個人對獨秀同志第一封信認爲

寫得太簡單了，並且「誤國」二字是有些不妥當，容易引起誤會，這當然是獨秀同志提出問題疏忽的地方，也可以說是錯誤的地方，但是從信的整個精神看，獨秀同志的根本意思確是希望中央除一般主要的口號之外，還須有最切合群眾、使一般群眾容易瞭解的口號，這從他第二第三兩封信中已經明顯地說出來，在第三封信中且把他對於中東路問題整個的意見從頭至尾聲明一遍，我認爲大致是對的。但中央對於獨秀同志的答覆我覺得過於誇張，過於吹毛求疵。自然，不對的地方批評糾正是可以的，並且是應該的，但必須平心靜氣從整個信的精神上去批評，而不應只捉住「誤國」一個字眼，便把什麼機會主義，第二國際……等等大帽子都加上去，並且彷彿從「誤國」二字便可以證明整個的獨秀都是機會主義似的。像這樣的討論問題，顯然可以看出是根據成見，別有用意。因此我認爲中央這種態度是不對的，非布爾什維克的。

至於中央對於中東路問題之分析和指導，在我看來亦作了很大的錯誤，並且是很嚴重的錯誤。自然中央提出「擁護蘇聯」「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等的口號是對的，並且我是首先提出的。但是中央始終沒有看到美帝國主義在中東路事件中之作用，沒有明白南京政府在中東路事件中事實上是受美帝國主義指使的，沒有看清楚在中東路問題中日美帝國主義間之顯著的衝突及其衝突的危險性——戰爭，反而認爲中東路事件完全是日帝國主義所指使的，因此只是提出反對日帝國主義的口號，對於美帝國主義一字不提，殊不知這正合美帝國主義與南京政府的需要。當中東路案發生，美帝國主義便張牙舞爪鼓吹共管，說日帝國主義如何企圖獲取中東路，主張國際共同解決，指使南京政府反對日帝國主義。像中央只是提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在客觀上這不是替美帝國主義和南京

政府效力嗎？！這顯然是中央的最大錯誤，毫不分析每一客觀實際的複雜錯綜的事實，只是根據假設籠統地便作出結論。但是至今中央還未明白改正此錯誤，在獨秀同志第三封信中已說到這一點，但中央至今還未將它公佈出來。這又可見中央往往企圖將自己的錯誤隱藏起來，而專事追求人家的錯誤而誇大之，這實在是布爾什維克黨中最不幸的事件！

總之對於中東路問題，在我看來，獨秀的信（指第一信）在字句上雖有不妥當的地方，但是中央忽略美帝國主義在中東路事件中之作用，其錯誤更大，尤其是我認為中央的態度不對，特別是中央把中東路問題故意地張大其辭，並在各級黨部會議上大事其宣傳煽動，捏造一機會主義派的名詞而攻擊之，同時又將獨秀真正的政治意見書（獨秀同志對於黨政治問題的整個意見曾有一書面意見，與中東路問題的信同時提交中央）與關於中東路問題第三封信（在這信中聲明對中東路問題的全部意見）隱藏起來，不使同志知道，這完全不是布爾什維克黨的態度，這簡直是陰謀家和無聊政客的行徑，因此我對於中央此種態度是極端反對的。這就是我對於中東路問題的態度和意見。

機會主義派問題

（二）至關於機會主義派的問題，據代英同志剛才的報告，中央認為並沒有什麼機會主義派的組織，也沒有什麼明顯的機會主義派的理論系統，而只是有一種傾向，這傾向的代表就是獨秀同志對於中東路的意見。原來所謂機會主義就是這麼一回事，既是如此，我便可以表示我的意見了。

但我首先要問，當某人對於某一單個問題提出意見，即令是

錯誤的意見（但非原則的）之時，便是否就斷定他整個人都是機會主義者呢？我認爲是不可以這樣斷定的。我剛才說過獨秀同志對於中東路問題所提出的意見在第一次信上表現出來是過於簡單而且「誤國」二字是不妥當的，然而在整個的精神上是希望中央注意於切合群衆能容易瞭解的口號，並且在第三封信上已經將他整個意見申敘出來，我看在原則上是沒有什麼了不得的錯誤，而中央遂以機會主義的大頭銜加之，這是不對的。但有人說：「總之獨秀過去是機會主義者，現在對於中東路問題不過是重覆表現罷了」，（中央有些出席各種會議的代表如此說）但我要問究竟是不是根據於他的過去而遂斷定其現在呢？如果如此，那我就要問在過去機會主義時期中（特別在五次大會至與國民黨破裂前——一九二七年四月至七月的時期中）是否只獨秀一人指導黨的工作，在黨內專政呢？是否除獨秀同志外，當時參加中央指導機關，特別是參加當時中央政治局的人都不負責任呢？不錯，獨秀同志在機會主義時代的確是在黨內負主要責任的一人，不錯，獨秀同志在過去確是有錯誤，我們應該以布爾什維克自我批評的精神坦白地承認自己過去的錯誤；根據這一原則，我個人認爲獨秀同志在機會主義時期確是我黨機會主義政策之執行者的一人，在整個的機會主義政策之下他本人確有許多不正確的見解和言論，這都是歷史的事實，無可諱言，也用不着諱言。但我要問參加當時政治局直到現在還在黨內負重要指導責任的人，如秋白、立三、恩來、維漢、忠發等同志是否在當時都是一塵不染的布爾什維克，或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其思想，其言論，其行動，都一點沒有機會主義的色彩呢？從我所知道的事實看來這些同志與獨秀同志在過去同是一樣的機會主義的執行者，其程度只有過之無不及。在座的代英同志當時是在武漢工作的，是耳聞目見、親身經歷

的。譬如就拿秋白同志來說，他在當時是擔任中央農民部長。當時中央對於農民運動的許多指令和通告，都是秋白起草簽字負責發出的，然而那些通告和指令正是大斥各級黨部對於農民運動之「過火」指導，大罵「過火」的運動是流氓行動，嚴令禁止「過火」的行動，糾正「過火」的「錯誤」，令各級黨部須「顧到」國民政府的一般「政策」，……這還不是當時農民運動中百分之百的機會主義的表現嗎？我們至今都罵譚平山長農政部時發出許多無恥的機會主義的告示與訓令，其實譚平山都是根據黨中央農民部的通告與指令而行的。當五月五日馬克思紀念日在漢口中央俱樂部開紀念會時，秋白同志曾有一個妙不可言的演說，大意是說「「革命的」孫中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目前革命中是一致的，中國目前的革命是「革命的」孫中山主義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合作走到非資本主義之前途。」（與和森在五次大會上所提出「爭得孫中山主義與馬克思列寧主義之非資本主義之前途」的口號如出一轍）。該演說洋洋數千言，曾登於五月六日的漢口民國日報，想代英同志一定聽過或讀過的。秋白同志這種演說，究竟是什麼主義？後來在他自己著三民主義一文中已有答案，他說三民主義即孫中山主義是小資產階級反革命的理論，既然孫中山主義是反革命的理論，而謂之可以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合作」走到非資本主義之前途，這不僅是機會主義，簡直是曠古奇聞！後來七月初在武昌臨時召集的中央委員及負責同志的聯席會上，秋白曾提出一個政治決議案，並報告和解釋他的意見，這個決議案就是有名的和森同志所謂集機會主義之大成的向國民黨最後表示退讓也可以說最後投降的一個決議案呢！只就這點點事實看來，秋白究竟是否機會主義者，想可以明白了。其次我可以說到現在還在中央負主要責任的立三同志。立三同志在當時是中央政治局委員，

担任中央勞動部主任，同時是國民政府勞工部的秘書長。大家都知道，在當時黨的中央勞動部與國民政府勞工部曾發出許多禁止工人運動「過火」的通告和訓令，那些通告和訓令都是經過我們的立三同志親自簽字發出的，即如在武漢當時我黨是大罵武漢的工人「過火」的，工人糾察隊的武裝是我黨自動解除的，而在我黨負勞動部主要責任和當國民政府勞工部秘書長的立三同志對於那些事實究竟有沒有責任呢？除了他應負中央政治局應負的責任之外，對於這些事實究竟有無機會主義的嫌疑呢？至忠發同志現在是我們黨的總書記，但在武漢時究竟是如何呢？他在六次大會上自己會公開承認他在武漢時是作了工賊的工作（見布哈林報告的結論）「工賊的工作」已經不是機會主義，直是反革命了，然而作過反革命的工賊工作的忠發同志現在依然還是我們黨的總書記！如果要拿過去來規定現在，這怎麼解釋呢？至於維漢同志大家都知道是馬夜事變臨陣脫離的人，當馬夜事變後幾天長沙近郊農民群眾及各地農民和工人群眾自動拿起武裝起來反抗「馬夜事變」和進攻長沙時，而我們的維漢同志竟公然下令停止進攻，以致農民工人大遭失敗（還有一點我們也應該指出來的，就是維漢同志脫逃之後，有一月的期間是沒有與中央接頭的），然而維漢同志現在還居然是負重責，作江蘇省委書記。即如在座的代英同志，你能說你當時沒有機會主義的錯誤嗎？你試回想你當時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及其他許多地方的演講，我恐怕百分之百是機會主義吧！即我自己雖然當時沒有參加中央政治局（指五次大會後），沒有直接負政治指導責任，但我在當時黨的整個機會主義的政策底下，我的思想觀念上也是含有機會主義的成分的。對於當時我黨的機會主義的錯誤我們應當坦白地承認每個人的責任，自然整個的機會主義指導是國際的，但在中共一方面說，每個會

負指導責任的人都不好只圖塞責，學那「功歸於己罪卸於人」的市儈行爲。何況像秋白、立三、維漢、恩來等同志，不僅是機會主義負責者，並且同時是盲動主義，即另一種機會主義的負責者，更應該自己明白呢！

由此說來，我想某人現在還是機會主義者與否，決不能拿過去的歷史事實去斷定他，必須根據於他現在的思想與行動。根本問題則在於：他現在是否已經瞭解過去的錯誤，承認過去的錯誤，他的思想與行動已否有根本的改正；只有根據這個觀點來評判某人現在是否機會主義者，這才是正確的評判。並且還須特別明白所謂中國黨的機會主義是整個的，從國際一直到中共都是要負責任的，特別是最高的指導機關如國際所負的責任越大。

很明顯的，現在的問題是：獨秀同志現在是否還堅持過去的見解，是否不承認過去的錯誤。據我個人知道，獨秀同志對於過去機會主義的錯誤自己是承認的，是瞭解的，在他給中央的政治意見書中開始便已明白地表示出來了，尤其是在他的政治意見中，關於許多問題的見解更可以明顯看出來，中央如果將他的政治意見書公佈出來，大家就可以看到的。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倒感覺得中央現在負責任的人反沒有瞭解過去機會主義的錯誤，並且還在加緊其機會主義的錯誤。譬如立三同志就是近來表演機會主義最厲害之一人。我現在只舉一、二件事實來證明。譬如立三同志之對於富農的見解，他說：「因為他（指富農）具有資本的剝削，是鄉村的資本家，這是與封建地主階級相矛盾的，當然是能革命的。」（參考《布爾什維克》第二期《中國革命中的農民問題》）因此他主張貧農「現在必須與富農中農組織在一起——一個農民協會之內……然後才能奪取並鞏固組織上的領導，對富農中農的領導。」你們看，這就是我們立三同志對於富農的高見！ 第一，我們的

立三同志到現在還認為鄉村的資本家即鄉村的資產階級還「當然」是革命的！能反對封建地主的！換言之，即中國現在的資產階級，至少鄉村的資產階級還「當然」是革命的；第二，所以我們的立三同志堅決地主張貧農「必須」與富農中農組織在一起，換言之，即與鄉村的資產階級組織在一起，即貧農「必須」與鄉村的資產階級聯合戰綫！「領導」鄉村的資產階級！對於立三同志這種高見妙論，我很不願意在此地加以多少批評，因為在我將來給中央的政治意見書上還要詳細批駁的。但我在此地要問大家，立三同志這種高見是否機會主義呢？其機會主義的程度比之獨秀同志的「誤國」口號為何如呢？我必須指明一點，立三這種錯誤決不是在單個問題上之小小的錯誤，這完全是列寧主義理論上的根本錯誤，基本原則上的錯誤，在戰略上說來，這完全是繼續與國民黨資產階級合作時代的觀點，並且由此必然造成將來革命的嚴重失敗。還有立三同志對於中國一般資產階級的認識也完全是機會主義的（如布報第一期「現在形勢的分析與前途」中所分析的），在我的政治意見書上將來都要詳加指駁的。總之立三同志現在的思想完全還是以前機會主義時代的機會主義的思想，一點也沒有改正，並且還發展了。最可惜的也是最滑稽的，就是他用他腦子裏最可恥的機會主義的言詞來開口閉口罵人家為機會主義，罵人家「觀念成問題」，這我們可以從他「反托洛茨基主義和中國的機會主義」一篇大文中充分地看得出來。他在那篇文章裏對於中國機會主義的解釋，同時便就證明了他還是以機會主義的觀點去解釋機會主義，結果除了充分表演他的機會主義的觀點以外，充分證明他還在繼續機會主義固執機會主義的成見以外，甚麼也沒有解釋。因為立三同志完全不明白我們黨過去機會主義的根本所在，只是用官僚主義的觀點企圖證明中國革命的失敗與共

產國際的領導機關無關，共產國際的領導是非機會主義的，如此如此而已。像這樣的官僚態度怎麼能夠討論偉大的歷史的革命問題呢？！在我看來中國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即機會主義的根因，便是我們過份的估量了資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即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因此我們的政策是企圖與資產階級合作到底，甚至希圖中國革命和平轉變到非資本主義的前途（布哈林的意見）；因此我們用全力幫助了資產階級，用全力武裝了資產階級，把無產階級附屬在資產階級的尾巴上，使之搖旗吶喊，充當苦力，這有過去鐵一般的歷史事實作見證，誰也不能磨滅的。在此地的同志們我想都多少可以感覺到的。特別是代英同志在過去是參加過許多重要工作，親身經歷過的。我只就幾件最明顯的鐵一樣的事實來證明。譬如從物質方面說，國民黨的經費差不多是我們的蘇聯供給的，其數目都是每月幾十萬（指北伐前）；大家都知道黃埔軍校完全是我們蘇聯創辦和供給的，每月的經費都從三十萬元至六十萬元。大家都知道資產階級的代表蔣介石完全是由我們的蘇聯和國際及中共扶助起來的，從他軍事人才的養成（黃埔軍校）到槍枝子彈大砲軍餉甚至軍事技術人才（如顧問教官之類）的供給，無一不是出之於蘇聯，甚至到「三月二十號政變」後我們還要提供他好幾萬槍枝。李濟琛、程潛、張發奎、魯滌平等的軍械也有許多是我們蘇聯供給的。在北方的資產階級的代表馮玉祥，在南口戰爭前後，我們的蘇聯所供給他的槍械子彈軍餉，其數目說來真令人驚異。最奇異的是關於農民運動的經費，在北伐前實際每月由蘇聯供給幾十萬元，而交由國民黨的中央發給其各級黨部，由其各級黨部派我們的同志用國民黨名義作農民運動，或經過國民黨發給農民協會，總之，以蘇聯無產階級的金錢幫助國民黨在農民群眾中發展和鞏固其資產階級的影響。因此直到最後農

民群眾中還很多只知有國民黨、孫中山、蔣介石、汪精衛、三民主義……而不知有共產黨！還有一件小小的事實，那是我在廣東時並且和代英同志都談過的，即蔣介石要求我們在黃埔軍校中一千多同志，退出共產黨作純粹國民黨員或退出國民黨作純粹共產黨員。當時我極端反對，我記得代英同志也是反對的，但是國際代表鮑羅庭却是堅決地贊成我們的同志退出自己的黨的，並且後來鮑羅庭得到國際的回電也是承認我們在黃埔軍校的同志可以退出共產黨。你們想想這些事實，我們過去是如何幫助國民黨資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是如何的遷就退讓！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後來國民黨資產階級從蔣介石、李濟琛、馮玉祥、唐生智到汪精衛、陳公博繼續的反叛，屢次的屠殺工農階級，屠殺我們的同志，事實上都是我們自己用自己所有的力量（物質的精神的）扶養起來的結果，真是所謂「養虎遺患！」最可痛心的是資產階級後來槍殺工農及我黨黨員的槍枝子彈大半都是蘇聯的無產階級製造出來的！而在另一方面，蘇聯無產階級所製出來的槍枝子彈，中國的無產階級和農民都沒有得到一枝半個，換言之，就是我們的蘇聯與國際並沒有武裝中國的工農，只是武裝了中國無產階級的敵人——資產階級——我想這是絕對不可否認的鐵證啊！

我說的以上一些事實，從立三同志看來，或其他許多官僚份子看來，都一定要說我是反對國際，歸過聯共。其實我是真摯護列寧的國際，愛護列寧所創造的國際和聯共的，唯其如此，所以我敢於根據布爾什維克自我批評的精神指摘出來。希望國際和聯共根據事實去找出真正的革命教訓改正其錯誤，不要因為負責者為塞責起見，把責任圖賴下級機關因而不惜隱藏掩飾偉大的付了重價的歷史革命教訓，繼續其錯誤，馴至一誤再誤，遺害於整個的

世界革命。列寧在共產主義左派幼稚病一書中說得非常之對，他說：

「政黨對自己的錯誤之態度如何，是判定這個黨是否認真，是否事實上能執行其對於本階級和勞動群眾的責任之最重要的和最可靠的標準之一，公開承認錯誤，尋求此錯誤的原因，分析其所以發生此錯誤的環境，細心審察糾正此錯誤的方法——這便是認真的黨的標幟，這便是黨執行其責任，這便是教育並訓練階級，以至於群眾的。」

這就是列寧對於黨之自我批評的革命的精神。無產階級的政黨，要執行其偉大的歷史的使命，只有在列寧此種自我批評的革命精神之下去訓練自己才有可能。就是斯大林也曾經說過：「無產階級政黨的自動批評，在自己的錯誤上求訓練和學習；因為只有如此，才能夠養成黨的真正中心分子和真正的領袖。」因此他指出第二國際之所以墮落，所以陷於機會主義的泥坑中而不能自拔，便是由於沒有自我批評的精神，只是文過飾非，「以虛偽自誇的言辭，掩護自己的缺點，因此窒息了活的思想並障礙了黨在自己的錯誤上求革命教育的工作了。」（見列寧主義概論）

中國的革命是失敗了，這是事實，國際領導中國革命的許多錯誤，這也是事實（如上所指出來的），既然是事實，為什麼我們不可以批評呢？為什麼我們還要「以虛偽自誇的言辭，掩護自己的缺點」呢？共產國際是列寧創造的應當遵照列寧的遺教，應當時時刻刻有自我批評的精神，才不至陷第二國際之覆轍，才能真正領導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就是站在我們每個黨員的立場上也應該時時刻刻按照列寧的精神去批評國際的領導。但是近來事實的表現却與此相違，只有上級機關批評下級機關，批評黨員，而下級機關和黨員群眾便已不能批評指導機關，有的（像立三）

還站在官僚的立場上掩飾自己的和上級指導機關的錯誤，我認爲這種現象對於黨對於革命都是異常危險的。

由上面說來，立三同志至今不但滿腦子堆滿了機會主義的觀點，而且深染了官僚的習氣，只是站在官僚的立場上專爲上級指導機關「掩護其缺點」，這在本質上是不忠實於革命，侮辱了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也就是侮辱了列寧的共產國際。

現在我們再回到本題來，究竟現在的獨秀同志是不是機會主義呢？如就過去而論現在，以過去機會主義的錯誤而判定現在亦是機會主義，從上面已顯然證明是不對的。「現在」的獨秀同志究竟是否機會主義應以獨秀同志寫給中央的政治意見書來判斷，因爲這是他現在對於革命對於黨之現實的政治主張；可是中央直到現在（已經二月餘）始終不公佈出來，不管中央的主觀怎麼樣，但在客觀上被證明中央是在隱藏獨秀同志的政治意見，故意不使同志知道，同時又利用獨秀同志對於中東路問題所發表的一點「錯誤」，在黨報上大登特登，大吹特吹，加以機會主義的頭銜，甚至於在黨員群眾會議上公開宣傳獨秀同志是機會主義者，並捕風捉影，造成一機會主義派的名詞與反對派的名詞並立起來，這究竟是什麼用意呢？！我在這裏再重覆一句，我認爲中央這種對獨秀同志的態度，絕對不是布爾什維克的態度，這是陰謀式的小氣式的政客行徑，絕對不是布爾什維克黨的指導機關所應有的行徑，像這樣絕對不能解決黨內的政治問題，只有造成黨的無窮的糾紛，給黨員群眾以最惡劣的影響。

從以上各方面的分析，現在黨內並沒有什麼機會主義派，（中央的機會主義派除外）而中央却憑空造出一機會主義派的空氣以之與反對派相並立，並以黨中央的名義發出通告，作出宣傳大綱，並強迫每個同志表示態度舉行反對，這種情形，依我看來顯

然含有嚴重的政治作用，就是中央現在看到已有人反對中央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看到黨員群眾的不滿意，先發制人，預先製造好兩頂帽子——機會主義派與反對派，好像以前北洋軍閥製好的紅帽子（赤化）一樣，只要有人反對他，他就把紅帽子往你頭上一套，於是逮捕、槍斃、下獄，都有了名義了。同樣將來只要有人反對中央，不滿意中央，批評中央，對中央提出不同的政治意見，中央都可以拿反對派和機會主義派的帽子往你頭上一套，於是不給工作，撤除工作，警告，留黨察看，直至開除黨籍，都有了名義，如此這般一來，自然沒有人敢於對中央，對各級機關發表不同的意見了，如此黨的領導機關自然會「太平」起來，（事實上只有引起更大的糾紛）但我以為黨果真如此，那就將要完全離開列寧主義的革命精神而變成可恥的腐敗的官僚機關了。

但是事實上我們黨內究竟有無機會主義呢？要解答這一問題必須根據事實，根據實際的材料，決不可徒託空言，捕風捉影。依我從黨在各方面所表現的事實上（理論的與行動的）考察起來，我們的黨確有很嚴重的機會主義存在着。但這種機會主義恰好與中央所指的相反，恰好就在黨的領導機關裏，就在中央本身。我在支部小組會議上曾經說過，我們的中央一年來的政治路線，就是機會主義與盲動主義之繼續。然而我所指摘的決非空言，而是完全根據事實，根據於中央所發表的一切文件（通告、訓令，給各地的通信及黨報等）和一切行動（如不斷的示威，對於罷工運動的指導……）因為今天不是我發表整個政治意見的時候，不便詳說，並且我的書面報告將要一一寫出來的，故在這裏只要舉幾件事實就足以證明中央之機會主義的路線了。第一，關於資產階級問題。中央認為資產階級是「能解放」農民的（中央給河南省的信說，如果馮玉祥是資產階級，他就應解放農民）。剛才我

們引過李立三對於鄉村資本家富農的見解，認為富農「當然」是能革命的……這難道不是機會主義的幻想嗎？第二，關於農民問題，中央根據李立三對富農之機會主義的分析，便作出「聯合富農」的策略（見給廣東省委及毛澤東的信），這種機會主義對於黨的危險已經國際指出來（但我要聲明，國際對農民問題的指導，其本身仍然有錯誤，這在我的政治意見書中將要指出的）；第三，對於目前革命形勢的估量以為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或革命開始復興，因而主張不斷的示威，主張從每一個小的罷工鬥爭必須要擴大到廣大的政治總同盟罷工以至於暴動的鬥爭，這都是十分明顯的盲動主義的表演，完全沒有看到客觀情形和主觀力量，只憑着自己腦子裏的空想，因此使黨一天一天地脫離群眾，黨的力量一天一天地趨於削弱，使黨員群眾一天一天感覺沒有出路，這難道不是事實嗎？因此我認為黨現在正處在最危急的關頭，黨的整個政治路線都是機會主義的（盲動主義也是機會主義之一），因此我便堅決的反對中央之機會主義政治路線，因此我要求全體黨員即刻起來糾正中央的機會主義路線，這就是我對於機會主義的態度。

反對派問題

（三）反對派問題。據代英同志說，現在反對派已經有組織，並辦有機關報，有系統的政治見解和主張。這個問題自然是我黨十分嚴重的問題，無論怎樣，這都是值得每個黨員嚴重注意的。至代英同志說要我今天馬上對於這個問題表示態度，但我不知道要怎樣表示？如要簡單的表示反對或贊成，這是我今天辦不到的。因為我認為對於這樣的嚴重問題要反對或贊成絕對不可以隨隨便便的。像這樣的問題必須搜集各方的材料，如反對派對於蘇聯問

題，對於世界革命問題，對於中國革命問題的種種文件，以及斯大林布哈林等反對反對派之一切重要文件，都須加以精細的研究和考慮之後，然後才可以表示態度，然後才不是盲目的拜物教式的反對或贊成。我們大家都知道，反對派問題並不是單獨的中國問題，而是整個無產階級的國際問題。這問題初發生於聯共，而現在已成為國際的現象了。我們都知道，我們的蘇聯共產黨自從列寧死後便發生了托洛茨基、拉狄克等反對派的鬥爭，隨後季諾維也夫同加米也夫等又加入反對派反對斯大林布哈林的領導；現在情形更是複雜了，除了托洛茨基的反對派以外，還有里哥夫、托木斯基等的所謂右派；現在布哈林也被稱為新右派，被打下去了。總之，我們姑不問聯共黨內各派所代表的政見內容如何，但就表面看來，已顯然表示聯共已呈分裂之現象，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實。並且像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也夫、里哥夫、托木斯基、斯大林……等都是列寧的戰友，同列寧共同完成十月革命，創造無產階級的蘇維埃政權，創造共產國際的。然而現在除了斯大林、里哥夫以外差不多都離開了聯共的領導機關，離開了國際的領導機關，有的甚至還被流放去了，這不是無產階級歷史上，現代無產階級營壘中之一鉅大的事變嗎？我們是無產階級營壘中一分子，我們對這樣歷史的鉅大事變，我們當然是必須特別注意的，我們每個人都必須表示態度，但我們表示態度決不可只根據於道聽途說，人云亦云，也決不能只根據官場一紙通告或宣傳大綱，而必須根據事實，根據正確的材料，換言之，必須根據於反對派之一切重要文件，以及反面的文件，都必須詳細知道反對派對於蘇聯之經濟政策的主張，對於富農問題之主張，對於建設社會主義國家之主張，對於黨內德謨克拉西（即：黨內民主——編者）問題之主張，對於世界革命問題之主張，特別是對於

中國過去革命問題之一切主張，以及對於中國現階段和將來的革命性質問題之主張，對所有這些主張，我們都須用馬克思的辯證法，從客觀上加以正確的分析，並證之以事後的歷史事實（譬如中國革命過去失敗的歷史事實乃是我們親身所經歷的，誰預言得對，我們只要不拘成見，一看就可以分辨的），如此我們所表示的態度才不是盲目的。現在如果要問我對於反對派的態度，我可以這樣答覆：我現在正在十分注意這個問題，正在設法搜集各方面的材料，（並望黨供給我的材料）正在從事於精密的研究，審慎的考慮，在研究和考慮尚未達到自信有結果之前，我是不能表示一定的態度的。但達到一定的結果以後，那時我就毫不猶豫的告訴黨，告訴群眾。如果我是贊成反對派的主張，我便要公開地站在反對派的政治路綫上奮鬥；如果不贊成反對派的主張，當然要反對反對派。我是決不中立的。我認為每一個真正的布爾什維克派的革命家，若從客觀上認識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利益之後，那就只知堅決地不顧一切為革命而奮鬥，不盲從，不拜物，只有服從真理，服從無產階級的革命利益。

但是同時我要請代英同志轉告中央注意，對於反對派問題還要用合法的手續來解決，黨應當將反對派的一切重要文件公佈出來，交給黨員群眾去研究，究竟反對派的理論與政策對不對，讓群眾去自己認識，然後黨員舉手贊成或反對才不是盲目的。就是中央要黨員群眾反對反對派，也只有如此才能靠得住；不然今天反對，明天如果看到反對派的東西又可以倒過來贊成的。總之，黨對於黨員之對於某一問題，特別是重要的政治問題，都必須使之自覺地有所主張，因為盲目的服從是沒有用處的，今日可以盲目的服從，明日亦可以盲目的來反對。每個布爾什維克黨的一員都應當是自由活潑的自覺的，然後在一切問題上表示出來，一切

工作上表現出來，才不是機械的刻板板的，而是積極的能自動自出主意的，能隨機應變的，能自動領導群眾去爭鬥的。

以上就是我對於反對派的態度。

「那你對於我所說之反對派對於中國革命的幾個理論問題，有什麼意見呢？」（代英問）

是的，我沒有說到代英同志所提出來之反對派的幾個政治意見的問題，但是還要問代英同志所說的究竟是不是反對派的真正意見呢？如是的，那又根據於什麼文件呢？因此我對於代英同志所敘述之反對派的意見很難以表示意見，現在如一定要我表示意見，那我可以就我自己對於那些問題的意見說明一下罷。

先說現在國民黨政權即南京政府的階級性問題，南京政府究竟是資產階級的政權，還是各階級聯盟的政權呢？如用簡單的表示，我可以說是資產階級的，決不是中央所說之什麼買辦封建地主豪紳資產階級聯盟或混合的政權。中央對於南京政府這種分析完全是根據它一貫的機會主義的觀點，根據它對於資產階級之機會主義的幻想而來的，這完全是繼承過去對於「國民黨是各階級的聯盟」之機會主義的舊見解。（可以說中國整個革命就是被這個觀點犧牲了的）幾年來革命的失敗，一切偉大的同時是最可悲慘的歷史事變都已充分證明我黨對於國民黨這種各階級聯盟的觀點之錯誤，證明這觀點是完全離開馬克思主義的，完全是機會主義出賣階級的，然而我們的中央直到現在還死守着這個觀點，還絲毫不改地運用這觀點來分析現在國民黨政權之階級性，我們的中央真可謂「至死不變」的了。

何以國民黨的政權是資產階級的政權呢？這個問題說來異常複雜，我們今天不能詳細分析，因為我在我的政治意見書中將要詳細說明的，但在此地可以指出來，中央這個觀點在實際上是掩

護資產階級，是淆亂無產階級對於主要敵人（資產階級）的視線，同時並給了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幻想，事實上便是幫助了資產階級。譬如中央通告七十七號說：「現在的反動統治很明顯的是地主豪紳買辦資產階級的聯合政權，地主階級居於領導地位，南京已成爲桂系西山會議派的大本營（自然還包含一些資產階級的右傾份子），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評論派和粵方委員等都只有匿跡消聲。所以南京政府的政策更加反動，對外之中日交涉比以前寧案尤爲可耻的投降」，這段文字的內容我暫不分析，但大家顯然可看出來：南京政府的政策之「所以」更加反動，對外中日交涉之「所以」比以前寧案尤爲可耻的投降，完全是因爲「地主居於領導的地位」，因爲「民族資產階級革命評論派和粵方委員匿跡消聲」，反之，假使在南京政府中民族資產階級「居於領導的地位」，地主階級「匿跡消聲」，那南京政府的政策將不會「更反動」，對外之中日交涉將不會「尤爲可耻的投降」。中央此種對於民族資產階級之幻想，爲民族資產階級辯護，難道還須要解釋嗎？所以後來南京政府的蔣介石派反對桂系，與桂系戰爭時，中央便認爲蔣介石是代表資產階級反對桂系的封建地主階級，認爲蔣、桂戰爭是資產階級對封建階級的戰爭，換言之，即階級對階級的戰爭，（見三十三號通告）因此便有人依據中央的意見而得出如下的結論「……因之這次戰爭在客觀上是有革命的意義」（見中央通告卅四號）。這還不是替蔣介石作宣傳嗎？所以蔣桂戰爭時蔣介石有幾篇演說和宣言中反對桂系的立言（如說統一，裁兵，裁釐，發展交通實業等政策之不能實行，都由於代表封建地主軍閥之桂系所障礙，因此他（蔣）所以代表民衆討伐桂系……），就好像預先看了我們中央卅三號通告和卅四號通告似的，彷彿像從前「國共合作」時蔣介石是在「接收」我們中央的「領

導」一樣呢！

我想，中央分析國民黨政權是封建地主豪紳資產階級的聯合政權，猶如從前分析國民黨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工農聯合的政黨一樣，毫無疑義的，這種分析在實際上只是替資產階級掩護其反動的面貌，即隱藏其反革命性，混亂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視綫而已。

現在時間已經說得很多，恕我不能按照代英同志所提出來幾個問題（如封建經濟佔優勢，即鄉村支配城市的問題，國民會議問題等）一一加以解說。這些還是在我的政治意見書中去說罷。

革命性質問題

四現在我且將關於中國將來革命性質的問題提一提。我開始便說過，關於革命性質的問題，今天是絕對不能解決（企圖在這樣的會議上解決革命性質問題，是再笨沒有的）並且也不能多加討論，這個問題自然是現時中國革命理論上一個最重大而且是最嚴重的問題，也就是我黨將來是否能執行歷史的使命，是否真能領導無產階級革命徹底勝利之一個根本問題。如果我們對於這個問題沒有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的決定，那在未來的革命中我黨仍必然要重演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之悲劇。因此我們目前對於這個問題絕對要排除一切成見，絕對要離開過去機會主義的觀點，必須從中國這幾年來革命鬥爭發展的事實上，從革命鬥爭中各階級關係的轉變上，以及現時中國政治經濟的實際狀況，和整個國際的形勢上，重新加以精密的審查，然後才有正確的結論。因此我今天對於這個問題不欲多發表意見。但我認為六次大會對於革命性質的決議案是根本錯誤的，依照六次大會對於革命性質

的決議作下去，我敢斷言，在未來的革命中我們的黨絕對將重演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的悲劇，必然要斷送未來的革命。因此我現在提議中央，關於革命性質問題，必須付之全黨討論，絕對不要用黨的命令來解決此等有關整個無產階級命運的問題。至於六次大會對革命性質的決議何以根本錯誤及我對此問題的詳細意見如何，將來在我的政治意見書中一定要說到的，故在此地我只好簡單表示我是根本反對六次大會對於革命性質的決議的。

第三次發言：

剛才代英同志對於我的發言提出一些意見和解釋：一、中央對於獨秀同志的政治意見書並不是不發表，而是因為中央工作太忙，沒有能急速的發表，這是希望大家要原諒的。並且如果中央真不發表，這對於中央本身是不好的，那將是中央的錯誤。二、希望我們不要採取與中央對立的態度，須依照黨的組織路線爭鬥，尊重黨的紀律。三、對反對派問題現在十分嚴重，因我的地位與在群眾中的影響，還是希望我立刻表示態度。

我現在對於代英同志提出來這些問題略加以解答。代英同志說中央對於獨秀同志的政治意見書沒有發表是因為工作太忙，那我就要問為什麼中央對於中東路的前兩封信又不因為工作太忙而發表那樣的快呢？獨秀同志的政治意見書自給中央到現在已經兩月了，難道中央真是因『工作太忙』沒有時間發表嗎？何以獨秀同志關於中東路問題寫給中央的第三封信至今也不發表呢？並且我還知道尹寬同志曾有一個政治意見書交給中央，到現在已經半年多了，也未看見中央發表出來，這又作何解釋呢？這也難道是中央因為『工作太忙』而不及發表嗎？（代英想辯護）代英同志

你用不着辯護，我們革命黨人要真實些，不要詭辯，錯了就錯了（代英同志插說，中央不發表尹寬同志的信是錯的），中央當然是錯的。顯然可以看出來！中央對於同志政治意見之發表與否，全以該政治意見之是否有益中央本身，即有益於中央『威信』為標準，對於該意見之是否有益於革命利益，有益於無產階級的利益，有益於整個黨的利益，中央是在所不顧的。如果看到某人的意見中可以找到一點錯處（自然是從中央看來）來作宣傳的材料時或打擊某人時，中央便很快的公佈出來了，如對於公佈獨秀同志寫給中央關於中東路問題之第一封信就是根據此種動機而來的。至於看見有些政治意見（書面的或口頭的）指出了中央政治路線的錯誤，而同時沒有辦法可以解釋，公佈出來嗎，勢必至於損失中央的『威信』，那時中央便很直覺地堅決地決定不公佈，甚至還要禁止聲張和討論，這在不發表獨秀同志的政治意見書及今天以『時局緊張』的名義企圖停止我們發表政治意見和討論政治問題的事實上，這就是鐵證。我在這裏要附帶問代英同志一句，是不是我將來的政治意見書中央也不發表呢？（那一定要發表的，不發表對於中央的威信反倒是不好——代英）不錯，我也以為中央不發表我們的政治意見書，不把我們的政治意見公之於全黨黨員討論，而想把我們貢獻於黨貢獻於革命的政治意見隱藏起來，這樣不僅中央違背了革命的利益，違背了黨的利益，即就中央本身說來，要想鞏固其威信是絕對不可能的。在黨員群眾看來，只是證明中央害怕真理，黨的領導機關既表示害怕真理，那還有什麼『威信』可言呢？並且黨的政治路線，既已走到原則上的錯誤，既已根本是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的，中央就想用高壓手段來掩飾自己的錯誤和隱藏我們的政治意見，不使黨員群眾知道，禁止黨員討論，即令辦到『偶語者棄市』，我想這亦是沒有用處的

，而且是很笨的。因為從黨的錯誤政策上每一步每一事都證明黨的政治路線之破產，證明黨的政治路線是一天一天地陷黨於沒有出路，使黨一天一天地削弱而趨於破滅，這些事實一定要反映到黨員群眾中甚至到無產階級的群眾中去的，黨員群眾和無產階級的群眾終究要起來反抗黨中央之錯誤的政治路線，中央的威信終究不會保存的。黨要想保存其真正的威信，只有經常地特別在政治路線已被發見有原則上的錯誤時，勇敢地提出全黨討論，吸收各種不同的政治意見，及時糾正自己的錯誤，改變黨的路線，那才有可能，也僅只有此種方法能夠維持黨的存在，保證黨對於無產階級的政治指導。同時我們要將黨的指導機關的利益與整個黨的利益，即無產階級革命的利益分開出來，如果指導機關犯有錯誤，只有站在黨的利益上去改造它，我們不能爲了指導機關少數人的利益（當已經犯了有危害於黨的錯誤，而企圖掩飾時）而遂犧牲整個黨的利益。

至於代英同志希望我們不要與黨取對立的態度，按照組織路線爭鬥，尊重紀律。但我要問，我們現在向黨發表意見，指出黨的政治路線之錯誤，希望中央公佈全黨討論，這究竟是不是按照組織路線尊重紀律呢？這在什麼地方可以看出我們是與中央對立的呢？是否因爲我們提出來的政治意見與中央之機會主義的整個政治路線不同，而遂謂之與中央『對立』呢？如果是如此，那我認爲此種『對立』是沒有不可以的，並且在布爾什維克的傳統精神上看來還是應該的。列寧不是曾經提出整個的政治意見與馬爾多夫等孟雪維克派對立嗎？我們現在是真正按照黨的組織，尊重黨的紀律的。譬如我個人，我已經發見黨的政治路線完全錯誤，因此我在支部會議上都從許多日常的政治問題，日常的工作中歷次指示出來，如近來的不斷示威運動我都屢次指出是不合客觀環

境的，是盲動主義之殘餘的表現，要黨加以改正。我最近並且在支部小組會議上發表我對於黨之全部的政治意見，指出黨的整個政治路線之錯誤，並且提出一個整個的政治路線，希望黨公諸全黨討論，而加討論和採納，並且我已準備將此意見用書面寫出來交給中央——像這樣，我想總算是十分按照黨的組織路線，十分尊重紀律了；因為我認爲我自己是十分明白布爾什維克黨的組織路線和鐵的紀律的。因此我同時要提出所謂黨的組織路線和紀律，絕對不是單方面的，絕對不是黨員群眾應該遵守，而指導機關及其負責人便可以隨隨便便破壞的。因此我認爲中央也要按照組織路線來解決我們所提出的政治問題。譬如像以今天的會議要想解決我們的政治意見，這是不合組織路線的，中央不發表獨秀尹寬等同志的政治意見書，這更是違反布爾什維克黨的組織路線，違反了布爾什維克之鐵的紀律的。對於我將來的政治意見書，中央將是否發表公諸全黨討論，我現在還不敢信；但如果不公佈出來，或甚至禁止討論，我要問代英同志，這是否合乎黨的組織路線呢？我認爲如果這樣，中央是違反組織路線，中央本身已是違反布爾什維克自我批評的精神，違反布爾什維克的政治紀律的。因此我這裏有個實際問題要提出：假如中央不將我們的政治意見公諸黨員群眾討論，又不予以答覆，甚或以『時局緊張』的大帽子禁止我們發言，禁止同志討論，那時我們將一次要求，二次三次要求黨公佈給群眾討論和答覆，中央或始終拒絕，那時叫我們怎麼辦呢？那時我們還是犧牲我們政治意見，自己消極起來，對革命不負責任，眼見着中央繼續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的錯誤，眼見着黨日趨破滅？還是繼續鬥爭呢？依照布爾什維克的精神，自然並且應當繼續鬥爭，更要堅決地鬥爭，但是我們想那時鬥爭的結果將怎樣呢？像這種情形如果發生出來，中央應不應當負責任

與行動之銜結。現在我們黨的政治路線顯然已走到原則上的錯誤，在事實上黨已脫離群眾。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黨唯一的正端道路，只有根本從政治上着手，根本改變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重新接近群眾，重新提高黨員即無產階級先鋒分子之階級覺悟性，只有如此，才能挽救黨的危機，才能把黨回復到布爾什維克的道路上，才能說得上布爾什維克之鐵的紀律。如果黨的領導機關自己的政治領導破產，不從政治上圖謀挽救，改變政治路線，而只是希圖機械地使用「鐵的紀律」去箝制黨員群眾的政治意見，停止黨員的『異議』，那時「鐵的紀律」在群眾看來不僅是『空虛』，『廢話』，『玩笑』，而且要認為是官僚們壓迫他們的工具了。如此一來，布爾什維克之「鐵的紀律」將要在群眾中根本喪失其尊嚴與威權。因此我爲了要擁護布爾什維克之傳統的鐵的紀律之尊嚴與權威起見，我更反對中央離開列寧所說布爾什維克之「鐵的紀律」的一些根本條件而機械的使用紀律，用紀律的名義禁止黨員發表政治意見。

至於代英同志說到反對派問題十分嚴重，因我個人的地位在群眾中能發生影響，要我立刻表示態度，我的答覆是：正因為如此，所以我不能隨便的盲目的表示我的態度，我須要自己詳細審察後才能表示我的態度的。

×

×

×

我希望代英同志將我今天所發表的意見一一轉達中央，末了，我希望中央：

一、重新審查自己的政治路線，同時讓黨員群眾自由發表各

個人心中所欲言的對於黨之一切意見（政治的、組織的、工作方法的）。

二、發表獨秀同志的政治意見書及我們任何人將來的政治意見，公諸全黨討論。

三、公佈反對派的一切文件，讓全黨黨員同志自由討論自由判斷。

四、停止對於黨員之一切機械式的紀律的箝制，恢復布爾什維克黨黨內應有的德謨克拉西制。

評中共第六次大會及其決議案(一) *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一、批評「六大」之必要

第六次大會已經開過一年多(一九二八年八月)，直到現在我們才來批評它，這似乎已是『明日黃花』，未免太過時了。然而一個大會的議決案并非應用於一個短時期，在第七次大會之前或在未經過某種手續改變之前，六次大會的議決案始終還有其實際的政治作用，始終還是黨目前以至今後實際政治行動的總方針。單在這一點上，我們現在來審查六次大會及其議決案，還是必要的。

況且六次大會所決定的政治路線，一年來的實際經驗已經證明其完全破產，現在已有一部分黨員群眾對它懷疑，甚至已起來根本反對它，可是黨的領導機關還是奉它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教條，為其發號施令的根據，并藉以為欺騙及壓制黨員群眾之工具。甚至有一部分參加實際工作的幹部同志，在他們的日常工作中，日常生活中，已完全感覺黨的路線行不通，黨沒有出路，但一談到六次大會的議決案，似乎根本上還沒有甚麼(自然是黨一般的政治水平線太低)。就是項英李富春所領導的所謂調和派，他們在黨員群眾中確是宣傳反對現在的中央的，說中央現在的指導不行，中央的政治路線和工作方法都走不通，但一說到六大的議決案，他們似乎還是認為非常正確，聲言極端擁護；他們說現在中央的錯誤正是因為沒有能真正瞭解(如他們所『真正』瞭解的)

* 本文原刊於一九三〇年三月一日出版的《無產者》第一期。看來還有其餘部份，但現時無法找到一一編者。

六大的精神及其議決案之意義，沒有能真正運用和執行六大所決定的路線，甚至認為是李立三個人的誤解和錯誤。其實由我們平心靜氣的看來，現在的中央確是「忠實」地執行了六次大會的路線，中央的一切指導確是根據六次大會的「精神」及其議決案而來的。至於李立三呢（他是現在中央的靈魂，恰如他所自詡的「現在黨的理論政治中心」），他不但是「忠實」執行六大議決案之忠臣孝子，而且還大賣其氣力，大展其「天才」，充分發揮了六大的「精神」；一年來中央所以能夠繼承過去機會主義與盲動主義之遺緒，并能光大發揮到如此之成績者（如說「南京政府是封建勢力佔優勢」、「鄉村經濟支配城市經濟」、「鄉村自給」、「富農是能夠革命的」……以及最近對於「革命成熟」之確定與證實，特別是實際行動上之能夠勾結改組派將軍，不斷示威，以至於最近江蘇省代表大會所決定之農村游擊暴動與城市政治同盟罷工等策略），都是我們的「理論政治中心」李立三一人之功績。正因為有以上這些情形，我們對於六次大會所決定之如此荒謬絕倫的政治路線，過去沒有加以詳細的審查與公開的批評（雖有亦只是部分的），已經是我們的罪過；若我們現在仍默而不言，那簡直是放棄革命，背叛無產階級的利益了。

現在我們的黨毫無疑義的已走到了一個異常嚴重的危機，黨已完全脫離無產階級的立場并脫離其群眾，黨的本身已呈分離破碎之象，黨正日在走向滅亡的道路，可是黨的領導機關還是死守着過去斷送大革命之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和官僚主義的組織路線，換言之，即黨正在「忠實」執行已經被歷史事實宣告破產的六次大會的議決案，以加促黨滅亡的速度。所以我們現在要想從根本上挽救黨的危機，救黨於滅亡，使黨重新走向布爾什維克的道路，那就必須從批評六大議決案始，那就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來裁判六大的一切議決案，在群眾面前宣佈其死刑。只有如此，我們的黨才能重新開步前進。

二、從「五大」到「六大」

第六次大會乃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極關重要的大會，因為六大所處的歷史時期是中國革命史上的一個重要的關鍵，雖然它的開幕是在革命完全失敗之後，但正因為如此，它有其特殊的異常重大的歷史任務。但是我們如果要想正確瞭解六次大會的歷史任務，那對於六大以前之五次大會及「八七」會議所鑄成的歷史錯誤便必須加一番追究。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是於一九二七年四月末至五月初在武漢舉行的。這次大會所處的歷史時期之嚴重，實不亞於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一九一七年之四月臨時會議（自然形勢是各異的）。五次大會時的革命形勢乃是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大革命當中之唯一重要的生死關頭：那時正是「上海事變」之後，正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蔣介石剛纔在上海和廣州大舉屠殺工人，公開背叛革命（自然不是背叛他的階級利益，而是背叛我們的幻想）之後，即是上海工人暴動大受打擊之後；另一方面兩湖江西等地的農民運動正在深入於土地革命（自動沒收土地，驅逐并槍殺豪紳地主等）的怒潮中。同時代表所謂「左派」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武漢「左派」國民黨及國民政府，正在動搖而趨於反動。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潮流的極高峯是在武漢工人奪取租界與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動之間。自上海工人暴動失敗和廣州工人被屠殺之後，就一般說來，因我黨過去機會主義政策之錯誤，革命已遭受了嚴重的打擊，即革命潮流已遭受了巨大的波折。此時只有我黨迅速地根本地改變政策，才能挽回革命的局勢。所以五次大會在此種形勢之下，它的歷史任務就在於：正確地認識此種革命形勢，追尋上海事變之根源及由此事變而產生的政治危機，正確地估計革命發展之可能的前途（不斷革命的前途），分析武漢「左派」國民黨及武漢政府的階級性與其趨勢；換言之，即應根據過去一切事變

的教訓，特別是上海事變的教訓與當時的實際狀況，重新審查我黨過去之一切根本策略，特別是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對中國問題所定之策略（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是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開的，那時正是北伐軍佔領了武漢，中國革命高潮開始進入最高峯的時期，那時客觀上提出來的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蘇維埃問題與土地問題，但第七次擴大會議對於中國問題的議決案，乃是否認建立蘇維埃，而對土地問題，則只「沒收屬於反動軍閥的寺院地產，及對國民政府作戰的買辦，地主，劣紳等之土地」，並且堅決地，要中共留在國民黨內，至對於當時中國情況的觀察，階級分化和轉變的分析，革命前途的估計，都完全是依據斯大林布哈林之孟什維克主義的觀點而來的），定出正確的中國『四月大綱』（一九一七年俄國布爾什維克四月臨時會議上所通過的列寧起草之有名的『四月大綱』，這個大綱就是布爾什維克準備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十月革命』的根本路線）。上海事變，很明顯地已暴露我黨過去根本策略之完全破產。從上海事變中，很明顯的表示出我黨過去對於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之估量是完全錯誤的；與民族資產階級之聯合戰線，即加入國民黨及後來沒有及時退出國民黨，更是根本錯誤；在革命高潮中（如北伐初的廣東湖南湖北江西及三次暴動前的上海……）沒有組織蘇維埃、武裝工農，沒有推動土地革命，尤其是錯誤中之錯誤。從武漢『左派』國民黨及其政府的動搖趨於反動的傾向中，顯然可以看出中國革命的責任已完全落在領導城市及鄉村下層勞苦群眾的無產階級的肩上，即共產黨的肩上了，所謂『左派』國民黨差不多是俄國一九一七年六七月後的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之化身，武漢政府直是一個克倫斯基政府而已。五次大會所應當解決的問題，首先就要從根本上拋棄過去一切機會主義的策略，撕毀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對於中國問題的議決案：立即宣告退出國民黨，共產黨完全獨立起來；共產黨獨立地勇猛地領導工農運動向前進，立即

組織蘇維埃，武裝工農，準備奪取政權。然而五次大會所採取的策略恰恰與此完全相反：五次大會看上海事變彷彿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大會完全沒有討論并避免討論上海事變的問題），對蔣介石的叛變也彷彿只是個人的變節，對於已經開始由動搖而趨向反動的武漢「左派」國民黨則還認為是與我黨共同解決土地問題走到非資本主義前途之同盟者（實際上已經是蔣介石的同盟者），對武漢政府則直認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民主獨裁政權」（實際是資產階級過渡時期獨裁政權）。因此，我黨的根本策略自然一概仍舊：留在國民黨仍舊，不組織蘇維埃仍舊，不武裝工農仍舊，……所改變的只是從擁護蔣介石轉變為擁護唐生智馮玉祥汪精衛而已；至於準備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更是夢想不到；但在對武漢政府為工農小資產階級民主獨裁政權的認識之下，却無條件的決定了兩個共產黨員（譚平山和蘇兆徵）加入武漢國民黨的政府，替它在群眾面前去掩飾其反動性，并直接代資產階級去鎮壓工農的「過火」運動，因而重演了路易布蘭和阿永伯爾在一八四八年所演的滑稽悲劇。總而言之，五次大會對於當時上海所發生的事變，及由此事變而產生的中國整個社會政治關係之轉變，即革命的轉變，完全沒有估量到，而只是機械地接收了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之最模範的孟什維克的議決案，將此議決案在大會上反覆追述和把玩而已，大嚷幾聲「非資本主義之前途」，或「爭得列寧主義與孫中山主義之非資本主義之前途」（大會上用紅綢白字所貼出來的標語，是瞿秋白蔡和森最得意的發明），及「擁護工農小資產階級民主獨裁」等口號而已。

五次大會既是如此！後來整個武漢時期所表演的機會主義之奇形怪狀：如馬夜事變的臨陣脫逃，決定譚平山去湖南制止農民「過火」行動（雖然實際上沒有去，但是由國際代表【鮑羅庭】決定了，我黨贊成了的，并且所以不去者，不是由於我們自己，而是由於許克祥武裝拒絕了），自動解除工人糾察隊的武裝，我

黨工農兩部發通告制止工農運動「過火」，國際代表請馮玉祥執行土地革命，請汪精衛武裝工農和共產黨員（魯易以國際令中共武裝五萬工農和兩萬共產黨員的電報給汪精衛看，意在要求同意執行，但結果汪竟因此以最後決裂答覆了）……以及七月中央臨時會議上對國民黨最後表示投降之十條決定，一直到最後的所謂「七月事變」——這些難道都是偶然的嗎？我們可以說，這完全是五次大會所產生出來的必然不可避免的結果啊！假使五次大會能正確地估量當時的客觀情形，能撕毀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對中國問題的議決案，能決定像「四月大綱」一類的布爾什維克的策略，那我們相信「四一二」事變後中國革命的危機還有挽回之可能；並且有走向「十月革命」的勝利之可能；即令失敗，也絕對不至於像在武漢時期所表現之種種可恥的機會主義之空前破產，更沒有後來的盲動冒險主義。我們相信，中國現在的局勢完全是另一種局勢。

五次大會因為沒有能解決其歷史的任務，終於使中國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走到最後的失敗，即繼上海事變而起的整個的武漢的失敗（整個國民黨最後決定公開屠殺工農階級及共產黨員）。由武漢失敗（七月事變）後而產生的客觀情形是：我們的黨因為過去空前的機會主義政策之徹底執行，在政治上已走到山窮水盡，表示完全破產；在組織上亦已呈嚴重的解體現象，已經再不能領導群眾；城市的工人階級因每次失敗，又沒有先鋒隊的領導與政治出路，而已開始退出政治鬥爭的舞台，工人群眾的組織（職工會等）日趨崩壞；在農民方面，雖然有些地方走入武裝鬥爭，但一般是處在資產階級地主武裝的嚴重進攻之下，農民協會的領導者因執行機會主義政策而禁止農民「過火」舉動，已在群眾面前失了威信，不能領導，故農民群眾的組織亦已由飄搖而趨於散漫；至於資產階級呢，他們已出乎意外的取得了勝利，雖然他們各派之間正在爭分勝利的果實而自起鬥毆，但因鎮壓工

農階級的反攻，亦已由內鬪而趨於聯合；小資產階級的上層分子則完全倒在資產階級的懷裏去了；而帝國主義者則正在興高彩烈地聯繫一切資產階級的反動勢力來毀滅工農——以上這些情形已顯然指示出來：中國整個革命的潮流已是低落了，革命是失敗了，工農階級被打散了，革命的果實已被資產階級掠奪去了，資產階級勝利了（自然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是失敗了的）。這就是「八七」會議前夜之客觀形勢。這種形勢是由五次大會所決定的孟什維克主義之戰術與策略所形成的，「八七」會議的歷史任務就在於正確瞭解此種客觀形勢及其所以形成的歷史根因和將來必然不可避免的趨勢。換言之，「八七」會議應當正確和詳細瞭解武漢時期以至以前時期所有革命失敗的錯誤和教訓，公開的向工農群眾宣佈并解釋我黨過去的政策與策略之錯誤，公開的承認因錯誤政策而引起的革命失敗及革命潮流之低落，我們的黨應當從戰場中暫時退出去，即採取退守和防禦的戰略，迅速地去整理黨的隊伍以及行將潰散之工農群眾的組織，同時亦必須加緊準備武裝工農，使能在短的時間，在某種條件之下可以轉守為攻。但是必須明白說明：當時的形勢絕不是直接進攻的形勢，而是退守和防禦的形勢。自然農民的自發鬥爭是必須領導的。

可是「八七」會議的精神與議決案與此是完全相反的。它對於過去革命的教訓，斷送革命之機會主義政策的錯誤，全無正確的瞭解，而且盡量地隱藏起來（自然是受國際的指示，因為「八七」會議完全是根據國際的「七月訓令」，并由國際代表羅名那茲一手所包辦的），只是摘取由機會主義政策產生出來的一些無關重要的枝枝節節的事實或語句當作機會主義去反對，并且只注意於（自然是別有作用）幾個個人，將偉大的付了重價的歷史教訓輕輕變成某幾個人的責任問題；同時不但沒有認識革命潮流的低落，而且反認為是繼續高漲，認為是直接暴動奪取政權的形勢；因此一方面保留了機會主義的根本路線，不退出「左派」(!!!)

國民黨，不放棄孫中山主義的『革命』(!!!) 旗幟，因而自從南昌暴動一直到佔領汕頭，還是在染遍了工農血腥的國民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舉行的；另一方面便採取了無條件的暴動政策，極端的盲動冒險主義的政策，因而產生不合時機的毫無準備的命定要失敗的南昌暴動，兩湖秋收暴動，廣州暴動，甚至到六次大會之前日還有湘鄂贛總暴動之計劃，致以前由大革命時代所遺留下來的一點遺產，完全被揮霍殆盡。

第五次大會鑄定了整個中國革命的失敗，『八七』會議更徹底的完成這個失敗。

三、六次大會怎樣解決了問題？

中國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經過五次大會的斷送，更經過八七會議的摧殘，到廣州暴動失敗之後已是完全結束了，革命算是徹頭徹尾的失敗了！從廣州暴動以後，整個的中國局勢更明顯的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即由革命的階段轉到反革命的階段。第六次大會乃是在革命階段已經結束與反革命階段已經開始時所舉行的。很明顯的，六次大會的基本任務，即它的歷史任務，就是：正確的估計一九二五——二七年整個革命失敗的教訓，特別是上海、武漢、廣州三次失敗的教訓；正確的估計將來中國第三次大革命之前途（革命的性質）；更應當徹底瞭解由過去革命之悲慘失敗而產生的現階段之新形勢，由此定出目前正確的政治路線。

但是六次大會怎樣地解決了它的歷史任務呢？它簡直如同五次大會與『八七』會議一樣，不但沒有解決它的任務，而且造成了新的錯誤，新的危機。列寧同志說：「我們如果不瞭解昨日的錯誤，我們今日便無從前進」。托洛斯基同志說：「中國共產黨員假如不去正確的估計機會主義領導如何引起了三次的失敗（上

海——武漢——廣州），假如不去徹底瞭解這些失敗在中國國內及國際整個社會政治狀況發生了些甚麼廣大深劇的變化，他們在今日便不能前進一步。」所以正確瞭解過去革命的教訓，不但是將來革命勝利之保證，而且是我黨目前從失敗的一切困難中能夠重新開步往前走之前提。

但是六次大會怎樣地瞭解了過去中國革命的教訓呢？它對於武漢時期及以前時期之機會主義領導的錯誤，又恰同「八七」會議一樣，認為只是某一些單個舉動上的錯誤，或應付手腕上的錯誤（如布哈林所說的，中共沒有應付事變的政治手腕），甚至認為是客觀的錯誤（如政治議決案所指出的四種客觀條件——對於這些，我們將在批評六大政治議決案中詳細指駁），對於機會主義的根本所在，不惟沒有明顯指示出來，反而被其盡量掩藏了。我們以為過去機會主義的根本所在，決不是枝枝節節的某種舉動的錯誤或缺乏手腕的問題，而是根本上離開了或修改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的問題，即根本離開了無產階級的階級立場，根本背叛了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而直接投降了資產階級或擁護了資產階級利益的問題。譬如我們（從國際到中共）始終認為資產階級是能革命的，能與無產階級一同奮鬥到底的，因而我們的黨加入了資產階級的政黨（國民黨），無論如何不退出這個政黨，結果變成了資產階級的附屬物，變成了資產階級欺騙工農或甚至壓制工農的工具。所以在革命過程中我們的黨領導工農群眾無條件的擁護了資產階級（始而擁護蔣介石，繼而擁護馮玉祥、唐生智、汪精衛，直到所有資產階級拋棄我們并以機關槍來掃射我們為止），為資產階級的利益而爭鬥；當工農群眾自動地為自己階級利益而起來爭鬥，起來反對資產階級時，我們的黨不惟不去獨立地勇敢地領導他們，反而站在資產階級的利益一方面去緩和他們，甚至鎮壓他們，一直到使他們服從資產階級的利益以至於被資產階級屠殺打敗為止。在革命的高潮中，客觀上工農群眾已

經需要組織蘇維埃，需要武裝，要求反對并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武漢政府）而組織自己的政權時，我們却以階段論自限（斯大林所發明的）認為已經開始反動的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政黨（所謂左派的武漢國民黨）還是革命的（斯大林），可以代替蘇維埃（布哈林），硬不許組織蘇維埃，武裝工農，去推翻克倫斯基的政權，不許無產階級跨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完全不理解中國革命之不斷革命的性質，放棄了『十月革命』之可能的前途。總而言之，六次大會對於過去機會主義的教訓，只是將八七會議的觀點重覆一遍，稍加以狡猾的有系統的掩飾與說明而已。六次大會對於『八七』以後的盲動冒險主義的教訓也是同對機會主義一樣，也完全沒有從根本上去瞭解，只是抓住一些盲動的枝節現象咀咒一番，笑罵一番而已，而對於真正的冒險舉動（南昌暴動，廣州暴動等），却反而稱讚歌頌不置。其實所謂『八七』以後的盲動冒險主義并不是指枝枝節節的問題，而是指那時我們的黨（從國際到中央）完全沒有瞭解當時革命潮流低落的客觀形勢階級勢力轉變的形勢，而只是憑着主觀上的願望，認革命潮流低落為高漲，認退守防禦的形勢為直接進攻奪取政權的形勢，更進一步說起來，就是完全沒有瞭解過去機會主義的錯誤，而且領導機關（國際）有意掩藏其錯誤，故突而從機會主義的右端推到盲動主義的左端，這便是盲動冒險主義之根源。而六次大會對於這一點恰恰忘記了，或者有意隱藏了。

最重要的是：六次大會完全沒有注意到一九二五到二七年革命中之階級鬥爭日趨劇烈與深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之政權的移轉，階級勢力之轉換結合與階級相互關係之劇烈轉變，即由此而形成之革命性質的轉變。自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蔣介石在上海公開反革命之後，代表小資產階級的上層分子汪精衛由動搖而趨於反動之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已經完全落到無產階級的身上了，這就是說民主革命的時期已經過去，要完成中國民

主革命的任務祇有無產階級獨立領導千百萬城市貧民與鄉村貧苦農民去取得政權才有可能。後來的廣州暴動（雖然是過時的冒險的，但始終是依照不可避免的歷史規律而進行的）便是這一推論之活的實驗，從實驗中已經證實了這一推論之正確。在廣州暴動中不但沒有任何大資產階級參加，並且也沒有任何小資產階級的政治派別參加，暴動完全是共產黨領導的。暴動不但宣佈了沒收地主的土地，而且宣佈了工人監督生產，并沒收大工廠、交通機關、銀行等為國有，沒收大資產階級的房屋供工人使用。以上這些表現，難道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嗎？很顯然的，這已經是未來中國第三次大革命之預演啊。但是六次大會完全沒有瞭解這一點，所以還認定「現在階段」（其實現在階段是反革命的階段）的革命（即將來的第三次革命）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其實這完全是企圖將歷史的車輪拉往後退，完全是反動。這不過是說明第六次大會嫌第二次革命的失敗還不夠，還要預約第三次革命之失敗。

至於由過去革命之悲慘失敗而產生的現階段之新形勢，六次大會更是絲毫沒有認識。我們已說過，自可恥的機會主義領導引起武漢失敗之後，革命潮流已經低落，革命已經失敗；再加上盲動冒險主義創造成的廣州暴動，使得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愈加容易擊破無產階級的力量，即使得革命的失敗愈加慘酷，愈加深刻；這樣，使得中國革命的前途不僅增加許多困難，而且使中國第三次革命陷入於不可捉摸的將來，換言之，也就是使兩個革命的過渡期的困難加多與時間延長。但在這個過渡期間，即反革命的期間，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必然能得到相當的穩定（不管這個「穩定」如何可憐，如何動搖，但就一般說來，就對鎮壓無產階級說來，却始終是穩定的，是與革命時期不同的），而這種政治的穩定又是經濟穩定之前提。在這個前提之下，中國的經濟生活有走向復興之可能，即工商業在某種條件（如外國資本的幫助）之下有發

展之可能，雖然這種發展是很有限度而且還是奴隸性的。中國經濟復興的結果乃是第三次革命的信號與基礎。自然我們不可將這一原則看得太機械，走到極端，也許因資產階級軍閥內部的衝突或世界某種變動（戰爭）而阻碍中國此種經濟復興的可能前途，但就一般的歷史規律（凡是大革命之後，經濟常有一度復興，隨着經濟復興而發生恐慌，而轉入革命時期）看來，這一前途始終是可能的。我們應當抓住這個一般的可能前途，決不應抹殺它。

在政治穩定與經濟相當恢復之下，必然要產生階級的新分合及各階級的新要求。首先就是有一部分資產階級（較進步的，如胡適之即其代表之一）必然要感覺到同時在大革命中為它們爭奪利益打擊無產階級的軍事勢力（軍閥）和政黨（國民黨）漸漸不能適合他們的新要求（如爭關稅自主，裁兵，裁厘，減捐減稅，限制軍人橫蠻等），而要求制裁他們，而要求他們自身的權利，而要求直接參加政權，就是要求他們自階級內的德謨克拉西，於是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立憲運動便要重新抬頭走入政治舞台。再加上千百萬小資產階級群眾因革命失敗而對資產階級軍事專政之厭惡，於是小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更要活動起來而助長此種運動。所以托洛茨基同志說：『中國的「立憲」發展，至少在最近階段，是與國民黨發展有密切關係的』。『但如果沒有新的事變爆發，則中國國家制度問題，即立憲問題，將成爲最近時期社會注意之中心。』

以上所說資產階級之政治的相當穩定，經濟生活的相當恢復，因此而引起的立憲問題，即德謨克拉西運動問題，乃是革命大失敗之後不可避免的現象，亦就是新階段之特徵。我們無產階級的黨必須深刻認識此種特徵，我們對於這一階段的德謨克拉西運動絕不能採取消極抵制態度，我們必須積極提出徹底的德謨克拉西口號，即普通，平等，直接，不記名投票選舉的『國民會議』口號，并以之與『八小時工作』，『沒收土地』『民族獨立』等口

號聯繫起來，去影響和團聚廣大的下層群眾於無產階級的周圍，重新走向政治舞台。在這一鬥爭中，如能善於運用我們的口號與力量，不僅能團聚群眾，減弱資產階級的軍事獨裁，並且能從事實的教訓中打破小資產階級下層群眾以至於落後工人對小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之幻想，縮短反革命階段的過程，重新走入武裝暴動，建立蘇維埃的無產階級專政時期。但是六次大會對於此種前途是完全沒有估量到的。六次大會雖勉強承認過去的革命已經失敗，但同時認定『新的高潮的象徵已經可以看見』，『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來』（六大政治決議案十一與二十兩節），這不僅沒有認識兩個革命間的過渡期，即反革命時期的本質與特徵，而且根本否認了這一個時期的存在。因之六次大會重新繼續盲動主義的觀點，陷黨於完全沒有出路——只有不動或盲動兩條死路，不能前進，只有倒退。

總而言之，六次大會對於過去的教訓不惟沒有正確的瞭解，而且加以新的紊亂，仍然因襲機會主義與盲動主義的觀點，一方面盡量地掩飾舊機會主義與盲動主義的錯誤，另一方面則又造成新的錯誤的危機，將已死滅的反動的工農民主專政口號，又重新提出於無產階級面前，準備作為葬送第三次革命之新棺材；對目前反動期的新階段則視若無睹，企圖以一紙官樣的議決案來跳過它，實際上是陷黨於絕路，將黨交給資產階級去任意宰割。六次大會只得到相反的結果，繼五次大會繼「八七」會議在中國共產黨史上深刻着不可磨滅的污痕而已。

四、六次大會與共產國際的領導

大家知道，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是在莫斯科舉行的，就是在共產國際直接指導之下舉行的，大會似乎應該得到國際的幫助與指導，得到圓滿的結果。但是事實恰好相反！六次大會正因為

是在莫斯科舉行，正因為是在國際直接指導之下，所以如同中國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一樣，也就徹頭徹尾的失敗了！

並且我們知道，參加六次大會的代表們雖然不是由群眾直接選舉出來的（大都是由中央和各省委指派的），但是其中最大部份確是在革命的火中參加過實際爭鬥的，並且多是由機會主義與盲動主義所造成的死海中僥倖脫逃出來的；他們在大會上確曾相當地反映了群眾的情緒與意識，他們痛恨致使革命失敗之機會主義與盲動主義直同蛇蝎；他們舉出了關於機會主義與盲動主義所造成之許多悲慘的事實，這是一些付了無限重價的最可寶貴的事實；他們好像天真爛漫的小孩一般，抱着無限的希望到莫斯科去，到六次大會上去，希望在那裏能解決一切問題，特別希望國際作主，因為他們自己雖有許多直覺，許多經驗，知道許多事實，但還理不出一個頭緒來。這是因為中國黨的一般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水平線太低，從來沒有經過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上的鍛鍊；且又長期的在國際機會主義領導之下，不僅一般黨員，就是負重責的幹部分子，他們過去的工作差不多完全是聽上級機關的命令，對於中國革命的一切根本問題絕少獨立思考過的；所以一直到失敗，失敗的事實已經充分證明過去的錯誤，但他們還只知道一些事實，甚至他們以為那些事實就是機會主義與盲動主義，至對於機會主義之真正根本所在，他們還是不瞭解的，因此很希望國際指示（？）他們。如果那時的國際真是列寧主義所領導的國際，那就只要根據六次大會的這些代表們的直接經驗也可以得出圓滿的結論來，可以解決六次大會所應該解決的歷史問題。何況在六次大會之前，甚至在以前革命的過程中，對於中國革命的教訓與將來革命之前途已經有托洛茨基同志所領導的反對派盡量指出來了呢。但也就正因為有托洛茨基同志的預先指出，所以六次大會也就成了反「托洛茨基主義」的犧牲品了。

自從列寧死後，在聯共黨內就產生了一種官僚機會主義，這種主義的代表就是斯大林。斯大林乘着列寧還在病中就陰圖壟斷聯共黨權與蘇聯政權。因此斯大林不惜籠絡季諾維也夫、加米聶夫和布哈林等在黨內組織小組，拉攏一班官僚腐化分子，甚至於著名的一向反對列寧主義的孟什維克（馬丁洛夫等）作為他們的爪牙，佈滿要津，把持權位。他第一步就是進行根本破壞黨內的德謨克拉西，改民主集中制為官僚集中制，以箝制黨員群眾之口；其次就是站在官僚主義的保守立場上阻止為無產階級專政基礎之工業計劃的進行，修改列寧主義對農民問題的原則，與富農妥協，抑制貧農（斯大林斥貧農為流氓）；更進一步就發明所謂「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了。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乃是一種反動的保守的狹隘的民族主義的理論，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際主義完全相反的，並且是根本違反了「十月革命」的精神。列寧說：「十月革命乃是世界革命之開幕典禮」，十月革命必須不斷的向前開展才能保證它的勝利，若幻想在一個國家內和平建設社會主義，那一定要毀壞「十月革命」。斯大林站在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此種保守理論上，於是他不僅在蘇聯削弱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勢力（如盡量的打擊列寧主義者反對派），助長了資產階級（富農與新經濟人）的勢力，造成了德爾米多的危機，並且在國際上斷送了各國的工人運動與革命運動。他在一九二三年斷送了德國的「十月革命」和同年保加利亞的革命，在一九二六年斷送了英國的大罷工，二七年又斷送了奧大利的革命運動，而中國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大革命之失敗，不過是斯大林的官僚機會主義之最圓滿的收成而已。但是同時與斯大林此種官僚機會主義作劇烈鬥爭的就是代表列寧主義的托洛茨基所領導的反對派。托洛茨基同志不僅關於聯共黨內一切根本問題都根據列寧主義的觀點堅決地與斯大林主義抗爭，並且在國際的策略上，特別是關於中國革命的策略上，在每一個重要關頭都指出斯大

林布哈林機會主義領導的錯誤與危險，提出列寧主義的正確策略（見托洛茨基《中國革命問題》，無產者社出版），但一概為斯大林布哈林拒絕了，致使托洛茨基同志所提出的可以挽救并領導中國革命達到勝利的許多實際策略，成了歷史的預言！正因為如此，斯大林為維持其官僚的統治計，為挽回其官僚機會主義領導之破產計，便不惜更無恥地兇惡地打擊反對派（專為中國問題就有好幾千人被開除黨籍、充軍、監禁）。在此種情形之下，你想斯大林布哈林能夠來正確地解決六次大會的歷史任務嗎？斯大林布哈林乃是有意斷送中國革命之直接的劊子手，即中國革命失敗之直接的負責者，如果六次大會真要徹底檢查過去革命的教訓，勢必要接受托洛茨基反對派的意見，勢必要牽涉到聯共黨內的問題，牽涉到改造聯共和國際領導機關的問題，換言之，六次大會真是執行其歷史任務，勢必至於要用中國革命失敗的事實去審判斯大林與布哈林機會主義的領導，你想這是斯大林布哈林的官僚統治所能允許的嗎？顯然的，六次大會的歷史任務，與斯大林布哈林的官僚領導是根本不能相容的。所以當中共六次大會決定在莫斯科舉行，即在國際（斯大林布哈林所壟斷的國際）直接指導之下舉行時，客觀上便已經註定了六次大會的命運，註定了六次大會只能是斯大林布哈林對中國革命之機會主義領導簽一次事後認可和保證的押，即只能替斯大林主義的統治加一層保障，好去反對列寧主義的反對派，在世界革命運動史上留着永遠的污點而已。

因此，六次大會代表的反機會主義與盲動主義的情緒和意識，經過布哈林江湖術士手術幾番玩弄之後，反而變成了擁護斯大林與布哈林機會主義領導之一種合法的保障。再加上斯大林布哈林的黨徒米夫們在大會上之威嚇與利誘（阻止某些代表發言，允許某些人將來作執監委員等），更造成了極惡劣的影響，使許多代表轉入到官僚政客化的漩渦中，而喪失了原有的革命精神。

在六大以前，人們（六大代表在內）還是極端迷信國際，但經過六大之後，國際的黑幕揭穿了，幻想被打破了（至少有部份純潔的革命的代價是如此），所以單由中共六大所得的教訓，我們已覺得非改造國際的領導不可，非根本推翻斯大林主義不可。但現在中共黨內還有大部分群眾以為現在的中央領導雖然錯誤，但可由七次大會來解決，不必根本反對它，特別是項英所領導的調和派更是大宣傳其召集七次大會解決黨內根本問題，勸黨員群眾不要走到極端（反對派）。其實這不過是緩和黨內反機會主義的鬥爭而已，阻止列寧主義的反對派運動而已。我們可以預言，如果斯大林官僚機會主義的領導不徹底推翻，還留在聯共與國際的領導機關裏面，中共第七次大會即令立刻召集，仍然是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在一個條件之下：就是六次大會的議決案已經為中共最大多數的黨員群眾所厭棄，最大多數的黨員群眾已經徹底認識斯大林官僚機會主義在全世界無產階級中所造成之罪惡與危機，此外還要中國的斯大林主義者離開中共的領導機關。不然，第七次大會將不過成為對現在領導機關壓迫列寧主義者反對派為合法之一種追認會議而已。

我們在這裏祇提到六次大會總的方面，對代表『六大』真實內容的『政治議決案』與『土地問題議決案』還待下次繼續詳為分析。但由上面的分析研究之後，我們已經很有權利號召全體黨員同志起來審判六次大會的議決案，給它宣佈死刑！使它與中國無產階級的運動永遠斷絕關係！

附 錄：

我們的政治意見書 * 陳獨秀等八十一人

一、中國過去革命失敗的原因 ——國際機會主義的領導

自從列寧同志患病和逝世，在季諾維也夫斯大林布哈林主持之下的共產國際及聯共領導機關，發生了機會主義的絕大危機，即是在政治上，以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保守理論代替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以蘇聯的官僚外交策略代替了各國革命的階級鬥爭，以和上層領袖謀妥協結合的策略代替了推動下層革命群眾鬥爭的策略，以聯合並擁護資產階級之門雪維克的策略代替了無產階級獨立領導農民革命之布爾什維克的策略，以門雪維克的機械的階段論代替了不斷革命論；在組織上以官僚威權的形式主義代替了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主義，因此消滅了無產階級戰士政治自覺的積極活動。在這種根本錯誤的政治路線組織路線之下，先後斷送了一九二三年的德國革命和保加利亞的革命，斷送了英國的革命工人運動，使英國的改良派在工人群眾中的統治意外鞏固，並且造成了蘇俄的大危機。在斯大林布哈林機會主義的領導之下，失敗最慘的，要算是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

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革命失敗之總的原因，是由於對資產階級革命性和國民黨的階級性認識之根本錯誤，有了根本錯誤的認識，遂發生了錯誤的策略，主要的就是幫助並且擁護資產階

* 這份文件原由陳獨秀、彭述之和尹寬三人共同起草，是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早期的重要基本文獻。

級，不使中國無產階級有它自己的真正獨立政黨領導革命到底。

中國國民黨，無論在其行動的歷史上，在其三民主義的政綱上，在其建設中國實業計劃上，在其上層領導成分上，都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而且自始即帶有不少的反動性（如希求帝國主義的幫助及不主張沒收土地及大貧小貧論）；至於其中的下層群眾含有不少的工農份子，在歐洲各國資產階級的政黨中不乏此例，決不能因此改變其黨的資產階級性；無論其如何口頭上主張世界革命、擁護工農利益、和聯合蘇俄，凡在一個革命運動高潮中，羽毛還未豐滿的資產階級往往採用一部分迎合無產階級的口號，甚至於拿出社會主義的幌子，以獵取無產階級的同情與擁護，這是資產階級的常態，是在歐洲革命運動史中所常見的。無產階級在沒有獨立的政黨時，常常受了資產階級的欺騙，常常的是簡單的替資產階級服務，無條件的為資產階級去推翻封建的統治，而馬上即被資產階級踐踏。中國的無產階級不幸也在共產國際及中共錯誤的幻想的政策領導之下，不自覺的做了中國資產階級國民黨簡單的工具，以苦力的資格替牠們推翻了代表官僚買辦資本的北洋派的統治，以與帝國主義妥協。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剛一抬頭即以空前的白色恐怖摧殘它們的昨日的擁護者——無產階級。我們加入國民黨和長期留在國民黨的結果是：在無產階級群眾面前掩飾了國民黨之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性，鬆懈了工農群眾對國民黨的戒備，提高了國民黨的政治地位，組織和強固了資產階級反對工農的統治，終致國民黨對工農不斷的大批屠殺和它的政權意外鞏固。

我們在國民黨的政策，因為希望留在國民黨內，保持長期的階級聯盟，所以不惜不斷的讓步：一九二四年國民黨的中央全會，國際代表及中共中央代表允許國民黨組織國際聯絡委員會，監

督我們與第三國際的關係，凡國際所給中共的政策和命令須先交該委員會看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蔣介石政變，圍繳省港罷工委員會及蘇俄顧問和蘇俄視察團的衛隊槍械，逮捕大批共產黨黨員後，復以國民黨黨務整理議決案的形式，令共產黨及青年團將加入國民黨的黨員團員名單繳存國民黨，禁止我們批評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令我們同志退出軍事學校或退出共產黨；這些事實已經是資產階級公開的強迫無產階級服從它的領導與指揮，而不是什麼聯盟。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國際的政策不但不因資產階級進攻使無產階級自己更加獨立起來，反而採用了最可恥的投降政策，嚴厲的阻止中共退出國民黨，連準備退出都不許，繼續極力武裝蔣介石，國際代表還極力主張我們應將所有的力量幫助並擁護蔣介石的軍事獨裁，從此無產階級更進一步完全投降了資產階級，不啻自己正式宣告為資產階級的附屬品。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開始大屠殺，國際對國民黨的政策，仍然是繼續擁護擁汪，說馮玉祥是工人出身，說汪精衛是土地革命的領袖，反對中共退出國民黨，反對組織蘇維埃。並且在蔣介石叛變以前，曾命令我們以勞資仲裁代替罷工鬥爭，命令我們避免與蔣介石的軍隊衝突；在蔣介石叛變以後，曾命令我們在土地革命中不得侵犯軍官們的土地，命令我們以黨部的力量制止工農的「過火」行動，最後，全部國民黨已公然反革命，還命令我們退出國民政府而不退出國民黨，直到南昌暴動，還是在左派國民黨旗幟之下舉行的。這樣的政策，分明是使中共撕碎了自己的旗幟，服從國民黨的領導，變成了國民黨約束工農的工具；這樣的政策，分明是自始至終從頭到尾一貫的空前未有最可恥的機會主義，分明是出賣階級的政策，完全不是一九〇五年布爾什維克堅決的反對與資產階級妥協，獨立的領導農民，準備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實現工農民

主專政的政策。關於階級聯盟問題，列寧常常引用巴爾夫斯的話說：『我們無論何時都不應忘記的條件是：共同奮鬥，分別走路，不混合組織，看同盟者猶如看敵人一樣』。國際既強制中共混合在國民黨組織之內，復大喊『推倒國民黨的領導是超越階級的危險』。事後却責備中共不應喪失其組織上及政治上的獨立；其實使中共加入國民黨，根本已毀壞其獨立使不能執行其獨立政策。中共要執行國際這些機會主義的政策，則步步投降資產階級，毀滅中共組織上政治上的獨立，乃必然的邏輯，難道除了這些實際問題外，還有懸在空中的獨立嗎？！

共產國際對國民黨這樣破產的政策，是根據他們對殖民地的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關係之根本錯誤的認識。他們以為殖民地的資產階級因受帝國主義的壓迫需要革命，因此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迫，可以團結中國國內進步的各階級，形成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綫。這種聯合戰綫的方式便是國民黨，國際稱它為『各階級聯盟』或『四個階級的聯盟』。這分明是組織上的階級混合，而不是在某一時期某一運動中兩個獨立政黨行動上的聯盟。他們不懂得帝國主義對中國商品與資本侵略之深入，使中國的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政治上非依賴帝國主義不能生存，這種依賴外力而生存的幼稚的中國資產階級，必須靠更殘酷的剝削工農，才能勉強抵制住和資本技術更高的帝國主義國家工商業競爭，才能夠維持自己的生存發展，因此使中國的資產階級和工農的衝突更為不可調和，更易於爆發階級戰爭。資產階級最初參加民族革命，乃是企圖利用能夠在它們控制條件（過去國際的政策正是對資產階級担保這種條件）下的工農群眾聲勢，向帝國主義做買賣，好取得有利於它們自己階級的那幾種利益，一看到工農群眾根據其本身利益，侵犯資產階級的利益領導革命時，資產階級便馬上感覺到工農革命比

帝國主義對它更是根本的危險，所以中國的資產階級很快的反對革命，乃是其階級性之必然。由此我們可以得到的結論，就是帝國主義的壓迫，只有使國內的階級鬥爭加緊，決不能因此促成階級聯合、和緩階級鬥爭。國民黨是一種資產階級欺騙、利用民衆的工具，用抽象的「國民革命」的口號（在我們不進行對資產階級鬥爭的狀況之下）麻醉住工農群衆意識，不組織自己的獨立的武裝，而只是無條件的爲資產階級奪取江山，資產階級獨享勝利之果，而且馬上回過頭來屠殺工農群衆，這是一件白日經天的事實，誰都不能否認。

我們加入及留在國民黨的另一理由，便是要經過國民黨去爭取小資產階級的群衆而與它聯盟，這也是機會主義的模範的表現之一。無產階級之最可靠的同盟者，只是下層小資產階級群衆即城市及鄉村的貧民。固然，無產階級隨着革命發展之現實的環境，要團聚一切革命勢力，但無論如何我們的着眼是在群衆，尤其是下層勞苦群衆，而不是在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上層所領導的民主政黨。我們要團結廣大的勞苦群衆到自己方面來，首要的就是無產階級自己要有獨立的政治地位與鮮明的旗幟。有時可以甚且必須在一定的明確的行動綱領上與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建立聯盟；但這個聯盟之根本作用，是在以自己獨立的政治立場，去揭破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妥協與欺騙，以奪取廣大勞苦群衆在自己的政治影响方面來，而不在掩藏自己的政治面目，遷就資產階級的民主派，更不可在組織上與它混合起來，以「集中革命勢力」！從前第二國際即主張俄國的社會民主黨應與小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黨合併，他們常說：不懂得在落後的俄國爲什麼多數派少數派和社會革命黨分而爲三。列寧則堅持只能和社會革命黨有政治上的聯盟，而不能在組織上和它混合。德國一八四八年革命後，小資產

階級的民主黨，尚保持和勞動者同盟對封建黨及大資產階級的黨作革命的反抗；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三月以中央委員會名義致共產主義同盟的信，嚴厲的指出這一同盟者的危險性，指出他們號召一切民主派聯成一大反對黨之欺騙，極力主張無產階級要有自己的獨立政黨。他說：『即為對付共同敵人，亦不必有特殊的共同組織，對敵直接鬥爭時，兩黨利害一時一致的，自然而然有一時的結合。』過去共產國際對國民黨的政策，完全拋棄了馬克思列寧的遺教，而是採取了從前第二國際的意見，特意把國民黨裝成一個獅子燈，我們都鑽在裏面去舞。像這樣混合組織的聯盟，則遇事掣肘和混亂了我們自己的政治面目，不但不能經過他們爭取其下層群眾，並且要喪失我們自己階級的群眾。

在革命高潮中，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下層群眾即城市鄉村的貧民聯合之最好的形式，便是蘇維埃，即是由工農貧民兵士的廣大群眾選舉代表組織的蘇維埃，牠的任務是武裝群眾及指揮群眾的政治鬥爭奪取政權的機關。共產國際的領導，在革命高潮中，為要跟着大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上層跑，作那種無希望的同盟夢，於是根本拋棄代表城市鄉村貧民的利益，在鬥爭上服從國民黨的政綱，越此便是「過火」，在組織上把農民協會及店員小商人的組織工作通統交給國民黨，不許組織蘇維埃；他們竟至說：『中國的國民黨對現時中國革命的作用與一九〇五年的蘇維埃對俄國革命作用是一樣』，『武漢國民黨為革命運動的中心』，『武漢政府是革命政府』，『若現在即刻建立蘇維埃，拒絕擁護武漢政府，提出二重政權的口號，推翻武漢政府，便是對蔣介石和張作霖予以直接的援助』（斯大林）。『在將來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時候，還可以利用國民黨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組織形式』（布哈林）。他們的錯誤，完全由於迷信門雪維克的階段論

遮住了眼睛，不去觀察國民黨國民政府的內容和當時民衆革命鬥爭急激進展的環境，以至盲目的反對建立蘇維埃；他們完全不認識，不但南京的國民黨已公然反革命，即武漢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也已日漸走向反革命，尤其在馬日事變後，他們和蔣介石張作霖已經沒有區別，此時國民黨資產階級（凡是剝削勞動的大小資產階級都包涵在內）參加民主革命的歷史已經告終；同時從共產國際到中國國民黨一致承認「過火」的工農運動，已經打破了各階級聯盟，超過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圍，開始由民主階段，走向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即革命性質已經開始轉變了。無產階級的政黨，至少在三月二十事變後即應退出國民黨而獨立，在北伐開始時就應該在北伐軍所到的地方組織蘇維埃，至少在四月十二事變後即應建立蘇維埃與國民黨政府對抗，由二重政權進到推翻反革命的國民政府，由無產階級專政，一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一面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共產國際的領導不是這樣，而是始終拘泥民主革命的階段，始終迷信國民黨，始終想用大資產階級及上層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政黨代替了工人與鄉村城市貧民群衆的蘇維埃。中共中央此時未能力爭退出國民黨，建立蘇維埃，推倒國民黨的領導，反而在國際代表所起草的宣言中及農民部通告中，都承認農民有「過火」行動；並且自行取消漢口總工會糾察隊的武裝，以避免和國民黨軍隊衝突；這都是莫大的錯誤。一直到國民黨全部公然反革命，革命運動已經一敗塗地，此時反而突然想起用蘇維埃的口號，作奪取政權的冒險嘗試。

一個革命的政黨，不但要善於進攻，也要善於退守。上海廣州長沙漢口的共產黨黨員及工農群衆相繼被屠殺後，沒有一點有力的反攻，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已完全走到反動營壘，國內外一切反動勢力都已經結合起來，革命分明是失敗了，此時即應馬上採取退守政策以

保存階級的戰鬥力，整理我們的隊伍，積聚我們的力量，做改守爲攻的準備。當時黨的政策恰與此相反。聯共及國際領導者斯大林布哈林此時企圖以無產階級的武裝暴動挽回其機會主義政策之絕望，以抵制反對派的非難，乃特派心腹代表到中國，以國際名義包辦「八七會議」，在此會議中，既未從根本的系統的指出改正機會主義（仍舊說留在國民黨有四大理由，仍舊主張站在國民黨左派青天白日旗幟之下），又加以從莫斯科帶來的「事實」：『中國革命浪潮還在一直高漲』，『中國已經到了直接革命的形勢』，經過翻譯員瞿秋白周恩來李維漢等之手，造成了盲動主義。當時黨的領導者，以爲只有武裝暴動才是布爾什維克的正確路綫，只有自己和與自己同一意見的才是真正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如有同志對於革命高潮及中央政治路綫表示有一點懷疑，對暴動有一點審慎，便要拿『機會主義的殘餘』、『觀念不正確』等罪名加以嚴重的打擊，嚴厲的命令各級黨部改組並實行新的政治路綫即所謂『武裝暴動的總方針』，凡不贊成此新的路綫者即不許其登記，甚至開除已登記的同志。不僅命令黨部，而且命令群眾，命令他們無條件的亂動；以至盲動的情緒和大大小小的暴動普遍了全國所有我們黨有組織的地方。從「八七會議」到「六大」乃是整個的暴動時期，在此時期中，黨的領導機關之唯一的工作，『是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用中央絕對正確的路綫，客觀上幫助國民黨把工農群眾的組織力量打得骨斷肢脫傷殘委地，至今不能立起來從事戰鬥；黨的本身更加潰散，黨的政治地位更加墜落，變成了單純的『殺人放火』之象徵。

機會主義是使中國革命失敗，盲動主義是徹底完成這個失敗，六大以後的路綫是繼續鞏固這個失敗，並爲下次革命準備新的失敗！

二、黨的現狀與危機

——機會主義盲動主義與官僚主義

在共產國際直接指導之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對於機會主義的批評，並未曾把中共中央在革命高潮中所執行的機會主義政策之根本錯誤（沒有及時退出國民黨，服從國民黨的領導，沒有組織蘇維埃等）指摘出來，因為這樣便要侵犯到國際對中國革命政策之本身，而只是指出中國黨三種主要的錯誤（缺乏獨立性與批評性、不能瞭解從一階段到另一階段的轉變、黨沒有成爲廣大群眾革命力量的中心），這不過是說中國黨執行國際的機會主義政策在技術上太不高明，所以共產國際所指示的六次大會所議決的新的政治路線：將來的中國革命仍舊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將來的政權性質應該是工農民主專政；富農還沒有消失革命性，應聯合富農而不應加緊對富農的鬥爭；他們雖然口頭上大喊反對機會主義，而這些實際政策，仍然沒有轉變到另一階段，仍然是十足的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對於盲動主義的批評，雖然口頭大喊反對盲動主義，也同樣因爲要掩護國際自身的盲動主義，未便指出中國黨在革命失敗後，按照當時全國總的形勢採用暴動政策是根本錯誤，而只是指摘中國黨對暴動政策機械的應用，沒有事先組織好，玩弄暴動等等，這也不過是說中國黨執行國際暴動政策在技術上太不高明，所以六次大會政治決議案公開的說：『八七緊急會議，是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定出武裝暴動的總方針……走向革命的大道』。並且更說：『新的革命高潮之象徵已經可以看見』『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來』（六大決議案），『我們的面前是一個大的全國革命的高潮』（國際代表的政治報告），所以第六次大會後中共中央第一個政治通告，開口便說『新

的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最近國際更進一步訓令中國黨說中國革命復興已經成熟。這分明是國際自從『八七會議』一直到現在極力供給中國黨以盲動主義之前提。對於機會主義的錯誤不探本溯源的把整個的機會主義路線指摘出來，便不能得到過去革命失敗的教訓，因此現在黨的政治路線，仍舊沿着機會主義進行；對於盲動主義的前提即革命潮流沒有正確的估量，便不能瞭解目前的革命形勢，因此現在黨的工作路線，仍舊沿着盲動主義進行；政治路線工作路線，事實上日益證明破產，因此現在黨的組織路線，便不得不日益效法聯共的現行黨制厲行官僚主義，藉以箝制黨員群眾的異議，來保持領導機關少數人的威信。這一切一切都不是中國的國貨，都是斯大林布哈林所主持的國際領導機關之所賜。沒有相當時期經過馬克思主義及階級鬥爭鍛鍊的中國黨，自己本沒有發明理論決定政策的能力；過去及現在錯誤的根本政策與理論，自然都來自國際。但過去黨的領導機關對於機會主義沒有一點認識與抗議，忠實的可恥的執行了國際機會主義政策，這是應該負責任的；現在黨的領導機關仍舊繼續執行國際機會主義盲動主義的路線，經反對派明白指出，依然毫無覺悟，而且自覺的掩護錯誤，這簡直是罪惡了！我們對於過去革命之失敗，只簡單的承認錯誤還不夠，重要的是在深刻的瞭解錯誤；徹底的改正錯誤，並且堅決的參加反機會主義及盲動主義的鬥爭，對於革命才有實際意義，這才是我們正當的道路。

現在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所表現的是：國際及中共中央一致主張將來中國革命的性質仍舊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而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將來的政權應該是工農民主政府，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他們的理由是說中國資產階級並未掌握政權，中國還是封建勢力的統治，並且中國還是封建社會或半封建社會，或

封建社會勢力佔優勢。現在的國內戰爭還是資產階級對封建勢力的戰爭。這樣的說法，簡直是和第三黨改組派以至蔣介石都站在一條戰綫，因為他們都正在大喊反封建勢力。第三黨最近發表的政治主張說：『中國社會的性質…是半封建社會，而掌握國家政權的便是封建勢力，支配社會關係的，…最顯明的亦是封建階級的剝削。因此，分明的表現，中國革命還沒有通過民主革命的階段』。『反動統治勢力的政治中心便是下級的封建勢力，構成反動勢力大聯合』。『社會革命的對象是資產階級，而民主革命的對象是封建階級，中國目前的革命運動，如果不針對着封建勢力，可以說絕對收不到集中革命勢力的實效，必歸失敗。』這些話和共產國際的意見及中共六次大會的政治決議案沒有兩樣。

我們以爲：說中國現在還是封建社會和封建勢力的統治，把資產階級的反動性及一切反動行爲都歸到封建，這不但是說夢話，不但是對於資產階級的幻想，簡直是有意的爲資產階級當辯護士！其實，在經濟上，中國封建制度之崩壞，土地權歸了自由地主與自由農民，政權歸了國家，比歐洲任何國家都早。自國際資本主義打破了中國的萬里長城，銀行工廠鐵路電綫輪船電燈電話等所有資本主義社會的形式，都應有盡有，已經形成了官僚買辦的資本主義。到了歐戰前後，更進入了民族的大工業資本時代，商品的生產與消費及貨幣經濟，連窮鄉僻壤都達到了，自然經濟已掃蕩殆盡。並且全國一切形式的經濟之最高統治，都在本國的一萬五千萬元以上銀行資本依賴外國的五十八萬萬元以上銀行資本的支配之下，因此資本主義的作用及其特有的矛盾形態，不但佔領了城市，而且深入了鄉村，鄉村主要部分經濟都直接間接隸屬於市場，因此城市經濟絕對的支配了鄉村，因此一切封建殘餘的政治勢力都不得不力求資本主義化以自存。土地早已是一種個

人私有的資本而不是封建的領地，地主已資本家化，城市及鄉村所遺留一些封建式的剝削，乃是資本主義襲用舊的剝削方法（以前美國的黑奴及現在南洋群島的豬仔，還是封建前奴隸制度）；至於城市鄉村各種落後的現象，乃是生產停滯，農村人口過剩，資本主義落後國共有的現象，也並不是封建產物；若因此認為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在中國不佔絕對優勢地位，則只是常識的判斷，而不是科學的觀察。在政治上資產階級經過兩次革命，已經掌握政權，社會階級勢力之轉變，更是異常明顯。在民衆鬥爭發展上，已經『過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火』；並且廣州上海漢口的工人和兩湖的農民，已經有過相當的二重政權的形式，廣州暴動中且出現過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開始了社會革命的行動；這些都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總之，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已經是將來第三次中國大革命的預演，在第二次革命中各階級的行動與變化，給了我們許多豐富的材料，使我們能預測第三次中國革命的遠景。中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任務（民族獨立與國家統一及土地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城市及鄉村的貧民取得政權，才能徹底完成，換言之，中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之完成，應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國的資產階級，在城市及鄉村中都與帝國主義經濟及現在的土地關係有很密切不可分離的聯繫，它決不能徹底的反對帝國主義和以土地給貧農，而且當革命高潮時必然堅決的反對工農運動『過火』，無產階級沒有與他們合作的可能。其次，在城市中，為推翻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取得政權的第二日即應進行沒收中外銀行及大工廠企業，打破私有財產制。在農村中，因為土地在資本家化的地主之手，富農多兼高利貸與商業剝削者的資格，是貧農與僱農仇視的中心，是農村貧民革命的對象，當然在鄉村中

更無與富農聯合戰綫之可能；我們應該領導貧農，反對富農，使中農中立。當下次革命高潮初起時，我們即應動員群眾為無產階級專政奮鬥，而不是為與小資產階級聯合，站在私有財產基礎之上的民主專政奮鬥。民主專政現在已成了一種反動的口號，成為將來機會主義者與小資產階級政黨聯合，阻碍群眾革命運動發展的理論根據。共產國際及中共中央依據這樣的機會主義的理論根據和政治路綫，已經演了過去可恥的悲慘的失敗，現在又在準備重演將來更可恥更悲慘的失敗。

現在盲動主義的政治路綫和工作路綫所表現的是：不承認資產階級是勝利了，不承認過去的革命是完全失敗了；在『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前提之下，強迫罷工，每個小的經濟鬥爭都要任意強迫擴大到大的政治鬥爭，不斷的命黨員代替群眾上街示威，召集小組或支部會議時，都照例不討論政治問題，不討論日常生活鬥爭的工作方法，只簡單的傳達上級機關命令上街示威，散傳單，貼標語；無處無事不採用盲動政策，無處無事不實行『自己失敗主義』，弄得黨內黨外群眾都感覺沒有一點出路，黨的下級幹部同志都感覺着在中央路綫之下無法工作；黨內工人同志都一天一天感覺著黨的政策和行動絕對不適合工人群眾目前的需要與可能，尤其是盲動的命令逼得他們一批一批的與黨無形脫離，因此各生產機關的支部已凋零不堪，黨員數量及無產階級的基礎已削弱殆盡，像漢口、長沙、廣州，這樣重要的中心都市，連黨的組織都沒有了。黨和無產階級群眾的聯繫，更等於零：鐵路、礦山、紗廠、絲廠、五金等重要產業工人都沒有群眾的組織，就有點組織也都在國民黨領導之下，海員方面也只僅僅有點綫索，在這樣狀況之下，革命高潮怎麼會從天上掉下來！

我們以為：自從機會主義的政策斷送了上次大革命，又加上

盲動主義根本破壞了工農組織，減弱了工人階級之階級鬥爭的力量，形成了沒有革命局勢的現階段。我們在現階段中，應一面採取防禦戰略，反省過去失敗的教訓，溶化過去革命偉大的經驗與教訓，以鍛鍊我們的黨，重新團結離散的隊伍，在日常生活的鬥爭中，恢復和工農群眾的聯繫，恢復群眾的組織，以積聚自己階級的力量；一面重新估量現階段中新的客觀局勢，即因革命失敗後，資產階級政權相當穩定和經濟相當恢復而產生出來的資產階級與其政黨軍人間之衝突，特別是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與資產階級軍事專政間之衝突而開始的民主立憲運動之趨勢，我們應利用這種趨勢，而力爭徹底的民主主義做我們目前過渡時代政治鬥爭形式，重新闖進政治舞台，由現在的政治鬥爭，縮短反革命的現階段，開闢新的革命環境，走向將來的第三次革命。民主要求口號，現時不但小資產階級群眾以至工人群眾還需要，即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自身，也須有相當的政治自由才能夠實現其力量發展所需要的組織上之民主集中制。因此，我們在沒有革命局勢的現階段，應力爭徹底民主的國民會議，即力爭由平等直接普選不記名投票產生的國民會議，並且必須與『國民會議』同時提出『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土地』和『民族獨立』，做我們在過渡時期中四個不可分離的民主要求口號，以充實國民會議的內容，必須如此才能夠動員廣大的勞動群眾，參加公開的現實政治鬥爭，不斷的擴大鬥爭，由要求資產階級的徹底的民主主義，走到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即擁護勞動大眾—全國多數民眾權利的蘇維埃政權。我們對於國民會議的態度，是主張積極的號召及參加，力爭其徹底民主化，而不主張消極的空喊蘇維埃來抵制；因為『蘇維埃政權』必須由『武裝暴動』來產生，在目前只是教育宣傳口號，而不是行動口號。在主觀客觀條件都未成熟時，若發出『武

裝暴動』和『蘇維埃政權』做行動口號，號召工人群眾馬上行動起來，為這些口號奮鬥，不僅得不着群眾的應聲，而且更加擴大黨的盲動情緒，離開群眾，削弱黨的力量。同時，我們更不是主張用國民會議來代替蘇維埃，而是要利用國民會議的鬥爭來發動廣大的下層民衆反對國民黨資產階級的軍事專政，走向『武裝暴動』和『蘇維埃政權』。

現在的中央，一面大喊中國革命復興已經成熟，大喊蘇維埃政權，大罵承認中國革命已經失敗的人，大罵提出國民會議口號的人是取消派或反動派，並且發出『變軍閥戰爭為推翻軍閥的革命戰爭』和『以群眾的革命暴動來消滅軍閥戰爭』的口號；同時一面又聲明：『現在客觀的革命形勢並未高漲起來，所以現在決不能馬上號召群眾暴動，推翻國民黨軍閥統治。』這就是說我們的黨現在沒有號召群眾行動的政治號召，只有盲動，只有繼續長期的離開政治舞台。

最近黨的政策，不但極力發揮國際對於中國現局勢盲動主義的觀察之謬言，絲毫不瞭解民主運動在兩個革命間過渡時期的政治鬥爭上有重大作用，而且是機會主義的軍事投機和盲動主義的不斷示威，雙管齊下，表面上說是採取失敗主義，實際上是命令同志幫助改組派做『反蔣運動』，並且在香港參加各派的反蔣會議。不領導民衆做公開的政治鬥爭，而跟隨改組派將軍們做軍事投機，這不但是離開政治舞台，而且是葬送黨的政治生命！

官僚主義的組織路綫所表現的是：以委派制度與絕對命令主義消滅了黨內德莫克拉西；以誇大的虛偽的報告，從國際直到中國黨各級機關，上下互相欺騙，以欺騙群眾。團結無原則的系統，如周恩來所領導的黃埔系，項英所領導的全總系，擁護個人的勢力，各自庇護私人，互相排擠，任意摧殘有政治自覺的黨員；

以大批開除黨員的手段來解決黨內的政治問題；置領導機關少數人的威信於全黨全階級的利益之上，以藉口『敵人進攻』，『時局緊張』，『秘密工作』，『鐵的紀律』，……等，箝制黨員對於政治問題的討論，變布爾什維克熱烈爭辯的精神為官僚的盲目服從，從支部到國際活像君主專制之下從地保到皇帝一樣，只許說一聲『是！』，否則馬上便有不測之禍，因此所有黨員都不敢說一句心中所想說的話。

現在黨的統治機關的官僚們箝制黨員之最大武器，要算是『鐵的紀律』；黨員也因為迷信這一武器自己束縛了自己，對於官僚們的統治，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我們以為：『鐵的紀律』自然是無產階級政黨領導革命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可是列寧曾告訴我們：鐵的紀律之基礎『第一是無產階級先鋒隊之覺悟及其對於革命之忠誠，能自主，勇敢犧牲；第二是它在某種程度上和無產階級以至半無產階級廣大的勞苦群眾融成一片；第三是極廣大的群眾在自己的經驗中相信它的策略與戰略是正確的，沒有這些條件，一切要創造這個紀律的企圖，都必定變成廢話，矯飾，欺詐。』關於服從組織紀律的限度的問題，列寧又說過：『我們曾經屢次確定對於工人政黨的隊伍中紀律之重要與見解。行動統一，討論和批評的自由，這就是我們的定義。只有這樣的一個紀律，才配稱先進階級的民主政黨。……所以無產階級，若沒有討論和批評的自由，即不承認有任何行動的統一。所以有階級覺悟的工人永不應該忘記有非常嚴重的原則之違犯，竟至逼令我們必須與一切組織的關係決裂。』現在黨的官僚們的所謂『鐵的紀律』，恰恰和列寧的遺教相反，恰恰是群眾在自己的經驗中已經明知黨的策略與戰術是錯誤的，而他們還不顧一切的繼續執行，恰恰是不容許黨員對於他們錯誤的策略與戰術有討論和批評

的自由，恰恰是官僚們用為掩護自己錯誤和維持官僚統治的工具；這樣的『鐵的紀律』，除廢話，矯飾與欺詐而外，沒有別的意義。

我們的黨，始而在機會主義指導之下，未能使全黨黨員群眾參與到黨的政治生活及接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知識，因此黨內一般政治水平綫非常之低；繼而又在盲動主義指導之下，黨的組織弄到殘破不堪；第六次大會後，更是機會主義與盲動主義交互錯雜，不能前進一步。處此情形之下，黨的領導機關要想恢復黨的基礎，形成黨的紀律，必須根本改變政治路綫和組織路綫，以民主集中制代替官僚集中制，實行討論和批評的自由，產生能夠使群眾在自己的經驗中相信是正確的策略與戰術，以接近廣大的勞動群眾；必如此，才可形成真正的行動統一，抵禦敵人的進攻。現在黨的官僚統治機關，反而利用黨內一般政治水平之低落，黨員群眾對於黨的生活之隔閡及黨的組織之殘破，實行任意操縱，欺騙與威嚇，實行以金錢維繫黨員及空洞的工會機關和僱人示威，實行制止黨內的討論和批評，以國際威信和黨的威權強迫黨員強迫群眾相信「中央政治路綫是絕對正確的」，並且胆敢憑藉敵人進攻做護符以恐嚇黨。這樣的領導機關如果聽它們仍舊存在下去，我們的黨，無數同志熱血造成的黨，必然要名存而實亡。一切有政治自覺的分子，都應當及時奮起，從黨內推翻它，才能夠將我們的黨從墮落而危亡的現狀中拯救出來。

三、國際機會主義的根源與蘇聯危機

即從中國問題本身，我們已經可以看出中國革命過去失敗不是關於執行上的部份的問題或偶然的錯誤，而是有一個系統的機會主義的路綫，並且現在還在繼續這個路綫；這個路綫也不是特

別在中國範圍內形成的，而是在世界範圍內由斯大林布哈林所領導的整個的機會主義的國際政策之一部份。

十月革命在全世界實現了一個無產階級國家後，各國無產階級的命運從此更加真實的密切起來。蘇聯實際上成爲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總司令部，聯共成爲第三國際領導的黨。這個黨的政策之正確與否，不是僅僅關係蘇聯一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問題，而是關係全世界無產階級解放鬥爭的運命。同時世界無產階級解放鬥爭之每個勝負，都影响到蘇聯無產階級專政之存在與鞏固的前途。

十月革命到現在，以列寧之病和死分爲前後兩個時期。前一時期是奪取政權，建設並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做軍事的防禦，及採用一些基本的辦法以確定經濟道路的時代。在這個時期，黨的全體都上下一致自覺的做了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也就是在這個自覺的一致中，黨的全體才有它的內部鞏固，在列寧同志正確的政策指導之下，勇猛精進的向資產階級進攻，當時資產階級的潛勢力及其意識，在無產階級專政的蘇俄不能發生什麼作用。後一時期即斯大林繼列寧而執政時期的情形就不同了，它的主要的特徵，就是二元政權的勢力增漲。其客觀的原因是物質生活相當的提高，內部的軍事狀態停止，及世界革命到來的遲緩，群眾需要恢復他們的疲勞，非無產階級的成分及其意識漸有抬頭的機會，於是曾經奪取政權的無產階級至此反而被拋棄放在後面去了；在牠之傍，甚至在它的面前，樹起別的階級成分，別的階級意識大顯其作用，在政權上佔領了一大部份勢力。這些別的成分就是那些一天一天形成一個很大的官僚系統之國家機關，職工會，合作社的職員及其他自由職業者和辦事員等。這些人員們由他們的生活條件，他們的習慣及他們的思想方式，是與無產階級分離的，或一天一天與它分離。這些非無產階級的成分及其意識甚至侵

入聯共黨內，由黨的機關職員，形成一個強有力的官僚系統，濫用國家機關鞏固他們的特權，使黨日趨腐化。到了斯大林為反對托洛茨基同志所領導的反對派，遂拼命拉攏結合這些黨內及國家機關的官僚份子，做他的群眾，無論什麼人，只要他喊一聲反對托洛茨基，至少也要給他一個合作社主席的位置；因此一般投機份子，都蜂擁到斯大林派反托洛茨基的旗幟之下，蜂擁到黨內及國家機關內，更加速了國家機關及黨內官僚主義化的過程。此時黨對國家機關已不能起領導及監督作用，倒轉過來，國家機關反用官僚的系統和勢力來支配黨。蘇維埃政權從它的產生和傳統上，由它的現在勢力來源上，還繼續憑藉在無產階級身上，雖然漸漸少直接的形式。但是由上述的社會成分之溝通，它一天一天墮落在資產階級利益的影响之下。無論蘇聯內部資產階級怎樣弱，它是很自覺地做世界資產階級的支派，並構成世界帝國主義的傳達機。況且資產階級內部的基礎也決不可忽視。農村經濟在市場之個人的基礎上發展，必然要從它的內部新產生許多農村中小資產階級。即已經富或正在求富的舊時貧農也和蘇維埃立法的限制相抵觸，於是表現出法國革命中『本拿巴特主義』（即拿破崙主義）的傾向。以上就是說明政權二重性之社會的來源。

新經濟政策在客觀上自然是包藏這政權二重性的一些可能，因為牠在恢復市場上，新創造一些條件可以使小生產者重新復活並一部分轉為中等資產階級。但這些可能性僅存在於經濟的可能中。牠開展成爲一個真實的力量僅在十月革命的後一期，開始於列寧同志之病和死及斯大林派的小組織集中反『托洛茨基主義』之鬥爭的時候。新經濟政策之實現，是為着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對資產階級一個很大的讓步。這個讓步在當時的環境是必須的，其本身並不一定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損害。暫時的退守是為着後來

的進攻。問題只在掌握政權的無產階級黨是否有正確的政策能夠很快的反守為攻，繼續階級鬥爭，阻止政權二重性之發展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不陷落在這個退守中。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中，基本的生產力都屬於國家所有，國家的指導政策對於經濟是操有必勝之權。但斯大林不懂得列寧的政策，不把讓步當作暫時的退守，而當作經常的路綫。一直繼續讓步，繼續右傾；不特別注意發展國家工業，不發動農村階級鬥爭，而實行對富農寬容，並且造出非馬克思主義的怪理論，說蘇聯農村生產力是由兩極向中間，以圖掩蔽貧富兩極群分化的事實，以便避開階級鬥爭，和平的建設社會主義，實際上是着着助長了富農的發展，助長了政權二重性。他的中心的口號是：『普遍的繁榮』，『大家富起來』，不管這個富是資本主義的富還是社會主義的富，甚至他把資本主義的富當作社會主義的富。因此非無產階級的勢力及其意識益加抬起頭來；因此，十月革命的後期特徵，不僅簡單的表現於城市和鄉村中的小資產階級經濟地位之發展，並表現於無產階級的理論和政策之武裝繼續不斷的被解除。復興的中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隱藏在蘇維埃的保護色之下儘可能的前進，把他們的憑藉表現為整個社會主義建設的部分。斯大林的『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保守的理論就在這個環境中形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基石，十月革命的基本方法，列寧主義戰術之主要的教訓，都被斯大林加以嚴厲的修正，以適應黨內黨外新生的小資產階級的職員之安富尊榮及其畏難苟安避免革命震動的心理。在這種情形之下，『蘇維埃共和國的命運與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發展有不可分離的真實聯繫』之『不斷革命論』，自然首先激怒一切新的社會層，因為他們認定，已經把他們抬到社會上高高地位的革命已經完成它的使命了。因此，以『一個國家建

設社會主義』之保守理論爲出發點的斯大林派乘時得勢，對於以『不斷革命論』爲出發點的托洛茨基派，不斷的加以攻擊與迫害。

很明顯的，列寧始終認十月革命只是世界的社會主義革命之起點，並不是認爲俄國一個國家已具備了經濟條件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包圍中可以獨自建設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是在全世界整個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之部分的突破，是全世界資產階級陣地較弱、無產階級主觀力較強的部分之突破，要維持它鞏固它，主要的是在它不斷的向外發展，即是和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發展成爲真實聯繫，在全世界總的階級戰爭形勢上決定長終勝負，這就是『不斷革命論』的觀點。自然，爲鞏固推動世界革命之策源地蘇聯，必須發展其國家工業即社會主義的工業以加強其無產階級專政的威權。但若是因此便相信『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保守理論是對的，那就等於幻想世界資本主義從此還有很長期的生命。果真是如此，則一個蘇聯的社會主義的經濟，終不免爲全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所戰勝，十月革命一定被破壞，而只存留一些土地改革的遺跡。

斯大林派，根據其『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保守理論，對蘇聯內部政策，要關起門來建設社會主義，就不能不求助於國內富農及城市新興資產階級，因而在國家政策上不肯得罪富農加重他的賦稅，對富農一直讓步到准其出租土地及使用僱工（一九二五年），以致一九二五、二六、二七年富農得到突飛的發展，操縱鄉村一切經濟機關，其結果不但不能建設社會主義，並且增加資本主義發展的危險及使資產階級影响增大，同時又使蘇維埃政權在貧農中失了同情。富農和新興資產階級，居然在去年提出要求廢止對外貿易的國家獨佔權，居然非難無產階級的經濟和政治

勢力有碍農民的發展。因富農抵制政府收買麩包，以致一九二八年秋天全國城市都發生麩包恐慌，對外輸出貿易計劃也被破壞了（一九二六——二七年度穀類輸出總價值爲二〇四、九七〇，一九二七——二八年度減至三四、二二八），這就是富農抬頭、實行對蘇維埃政權抵抗之嚴重的表現。斯大林受了事實的打擊，不得不採用表面左傾的口號，如建立集體農業，向富農強迫募債，發展經濟五年計劃等。因此影響，在黨內亦公布『自我批評』的口號，和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右傾；同時共產國際在國際政策上亦有幾分表面左傾。但是站在官僚勢力基礎上的斯大林派，因爲官僚與民衆間的利益矛盾，他的左傾政策，只能說而不能行。並且斯大林對付富農的政策，只是限於用盲動的非常手段，而不願在根本上取消富農之經濟上的優勢，由此更引出大的危機。所謂左傾政策，『實行』了幾個月便完全垮台。在打擊富農之後，又忽然對富農作絕大的讓步，提高麩包價格，使工人及貧農對富農須多付二萬萬以上盧布。所謂自我批評，變成一半滑稽（批評內容須先得上級機關認可），一面偵查反對派（即托洛茨基派）的把戲。所謂反對右傾，只是反對右派中和斯大林有衝突而且勢力較弱的一些個人，並沒有把右派的危險即其整個的思想和政治路線，要黨員群衆公開討論；因爲如果發動黨員群衆反對右派的路線，必然要走到反對左右動搖不定的中派（即斯大林派）而傾向左派（即托洛茨基派亦即反對派）（斯大林這種左右動搖不定的政策，實際不過是向右的道路上一些曲綫。這種向右的曲綫政策應用到中國，始而主張『不應加緊對富農的鬥爭』，繼而又主張『要堅決的反對富農』。然而他反對富農，仍然因爲它是半封建。那末，對於富農具有資本階級性質的那半面便不應該反對了。這真是使中國黨迷陷在亂山中找不着出路！）

現在蘇聯真實的經濟狀況日益惡化，物價日益增長，工人的實際工資日益下降，去年在七點鐘工作制的口號之下，實行工作強度加速，罷工事件及失業工人日益增加，為十月革命以後所未有的現象。鄉村中中農受富農的煽動，對蘇維埃政府之不滿日益增高，鄉村中時常發生富農有組織的對蘇維埃政府官吏及共產黨黨員青年團團員，加以白色恐怖。紅軍中的上級軍官亦多有富農子弟和受富農影响的。中派斯大林的政權在此時機之左傾右傾，都是受了兩大階級（工人貧農及富農城市新有產階級）的壓迫，他只是聚集這一切矛盾，而不能解決這些矛盾，大鬥爭的爆發即在前面；若沒有從左邊來的工農群眾力量來克服富農新有產階級及官僚的反動，使十月革命復興，使無產階級專政更臻鞏固；則從右邊來的『特爾米多』（THERMIDOR，法國羅拔士比兒歿落的政變）終不免到來，將成立一反革命的獨裁政府，無產階級專政將宣告滅亡，蘇聯回到資產階級的統治和資本主義的發展。斯大林派『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即反對社會主義的理論，在蘇聯內部所造成的危機是如此。其對外政策，也為着要安寧的在蘇聯一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就不能不怕得罪世界帝國主義，因而就不敢積極的援助世界革命，而一味地與帝國主義的外交家做和平運動的周旋。如在一九二五年，英國大罷工中不能予英國工人以積極的幫助；在中國革命高潮及孟買大罷工中，不敢號召英國工人起來反抗英帝國主義；在日本出兵滿洲及佔領山東時，都不敢有所表示；在俄德通商條約中使德國工商業家實際上在一定範圍內可以免除對外貿易壟斷的監視決定，在一九二七年在拉丁美洲開汎美洲大會的地方召集反帝國主義同盟的大會，而延期改在現時已沒有殖民地的國家柏林開會；這些都是怕侵犯帝國主義之露骨的表现。

這種妥協傾向應用在各國革命的戰略和政策上，就是不敢堅決的發動無產階級之階級鬥爭，而企圖用外交政策及拉攏上層妥協的分子。這種政策之模範的表演，就是在英國工人運動中之英俄職工委員會及在中國革命中之國共合作。斯大林派組織英俄職工委員會，企圖與英國工團總會出賣階級的官僚領袖們結成反帝國主義戰爭的聯合戰綫，以抵禦對蘇聯的進攻，並在柏林會議中公開宣佈不干涉英國的工人運動。這種政策實行的結果就是以全部布爾什維克的威信，在英國工人中担保那些賣階級的官僚領袖是與布爾什維克站在一起真能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承認這些賣階級的領袖是英國工人運動中唯一代表，阻止了反對這些官僚領袖的『少數運動』；使俄國無產階級不能直接——因為要經過英俄委員會——援助英國工人運動，如礦工大罷工及全國總罷工；使布爾什維克與這些賣階級的官僚領袖們一同坐視英帝國主義壓迫中國革命及印度罷工；使張伯倫既有大英帝國的政策，又有工團總會的政策以挾制布爾什維克。

這種機會主義政策要以在中國革命中所實行的結果最為悲慘！斯大林派不敢徹底侵犯帝國主義及中國資產階級的利益，唯一的只在消滅（？）『封建殘餘』，因而不要無產階級太露頭角，始終要求中國共產黨屈服在國民黨組織之內，不要退出國民黨而真正獨立起來，直接領導群眾，只要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及其將軍們領頭做革命；因為要讓這些將軍們領頭，就不能不抑制工人的要求以免嚇退資產階級，抑制農民的土地革命以免侵犯所謂『革命軍人』的財產；極力反對托洛茨基同志在中國建立蘇維埃的提議，反對推倒國民黨的領導，以免侵犯資產階級專政。在美國，在日本，都改變共產黨為工農黨，在印度也有同樣的企圖；甚至在日本竟主張以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來代替無產階級的社會

主義革命。斯大林派諸如此類的右傾政策，遂經過聯共中央及國際領導在各國黨中形成了一般的機會主義路線。

四、國際無產階級運動的兩條路線的鬥爭

斯大林派所領導的機會主義的路線，五六年來，不僅使蘇聯內部的危機增加，並且因國際無產階級運動迭次的失敗與挫折，尤其是中國大革命的失敗，使無產階級專政在世界上更加瀕於危險。一切無產階級的覺悟分子要明白這些危險，正是爲着要克服這些危險，救護十月革命。斯大林派之不可恕的罪惡，還不僅在他對蘇聯內部的和世界的資產階級繼續做了許多讓步和投降，更重要的是在他採用官僚壓制和欺騙等方法，阻止真正列寧主義的意見之發展，使蘇維埃及世界工人把嚴重的讓步當作成效，把退步當作進步，把內部困難之增加解作向一個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之勝利的前進，把投降中國資產階級當作中國革命之發展。

在這種情形之下，世界無產階級隊伍中自然要產生反機會主義的反對派之鬥爭，即恢復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之鬥爭。托洛茨基同志就首先擔負了領導這個鬥爭的責任。在十月革命後一期開始時（一九二三年以後），托洛茨基同志即向聯共指出應該注意防止錯誤的經濟政策所達到的結果：工業發展之遲緩會引起所謂「剪刀差問題」，即是工業和農業生產品價格之間的不平衡，足以破壞工農的聯合，並且其結果會連帶農業發展之停滯；因此他在聯共第十三次大會即提出厲行工業化的主張，使有廉價的工業品與農產品交換，以鞏固和中小農民的聯合。可是像斯大林這般瞎子，却罵他是爲着工業的經濟利益去犧牲一切。在十四次大會以後反對派又提出工業化之具體的政策，斯大林布哈林又認爲是

過度的工業化而予以否認。直到十五次大會，斯大林因為過去一個時期經濟的恐慌及許多困難的逼迫，才稍稍注意到工業化的問題；在十五次大會上所提出的發展經濟五年計劃，就是這種注意的具體而微的表現。可是他沒有正確的估計到工業發展之可能和沒有發展工業之決心，因此他認為「將來工業發展的速度也許必然要非常之慢」。反對派則認為，工業發展的速度，決不會是什麼「也許必然要非常之慢」。反對派在經濟計劃的提綱中，提出可能實現的工業速度，並且在提綱中指示出來每年工業各部門速度增加的百分率。到十六次會議時為期不過一年餘，事實證明工業發展的速度，竟超過了斯大林賴可夫所提出五年計劃所規定的限度。關於富農問題，托洛茨基同志在一九二三年及聯共十四次大會前後即主張國家應加重富農的賦稅，並發展集體的農業，以遏制富農發展的危險。斯大林布哈林因此一致罵反對派不要農民，說這是托洛茨基主義的老毛病。同時他又指出黨內腐化官僚化的危險，有實現德莫克拉西化之必要。他反對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保守理論，主張無產階級國家應積極的切實的一一不是用官僚方式而是用階級鬥爭一一援助並發展國際的無產階級運動。對於英俄委員會，他也及時有極正確的批評。最後在中國革命問題中，他的觀察與意見，更自始至終絕對的正確（主要的是他遠在蔣介石叛變以前及蔣介石叛變以後，屢次警告聯共中央及國際依賴國民黨之危險，他主張中共必須退出國民黨真正獨立，建立蘇維埃及武裝工農，徹底的土地革命）。他不僅把中國革命過去的教訓，完全為我們指示出來，並且為我們指出現在及未來的根本政治路線（未來的革命性質及目前國民會議的口號）。假使我們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得到托洛茨基同志政治的指導，我們也許能領導中國革命走上勝利的道路；即使失敗也不至於政

治破產及組織潰散，至少也不至於再發生盲動主義將無產階級的力量徹頭徹尾的破壞乾盡。斯大林派對於托洛茨基同志的真實意見，一切都拒絕公佈，只是在他們的口中捏造一些所謂『托洛茨基主義』的謠言，以蒙蔽全世界無產階級。尤其是將中國無產階級付了嚴重代價的教訓，在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面前用官樣文章隱藏起來，對於中國的同志特別封鎖得嚴緊，誰要接受托洛茨基的意見，便加以反革命的罪名，誰要主張研究討論托洛茨基的意見，便也有反革命的嫌疑，以便使中國黨對於他們的機會主義路線得以很順利的繼續執行。

斯大林派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再加上官僚主義的統治，不但不肯及時採取反對派（即托洛茨基派）的政治意見，不但為維持其官僚的統治不顧一切的錯到底，不但向世界無產階級隱藏真正無產階級的政策，並且在黨內組織他的走狗系統（斯大林在列寧病中即在黨內進行小組織），用種種卑鄙手段使反對派的意見不能達到群眾，企圖以『托洛茨基主義』與列寧主義對抗，混亂群眾的耳目，以攻擊托洛茨基主義為名，實行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背叛。最後更開除反對派同志的黨籍，濫用政府權力監禁、放逐並槍殺他們。許多與列寧共同奮鬥多年的老布爾什維克，許多十月革命的戰士都受斯大林官僚統治的種種虐待。斯大林派為鋤除異己，把黨的德謨克拉西剝削乾淨，一切重要問題都不許公開討論，全黨黨員非斯大林之言不敢言，只有在附和斯大林或被處罰這兩條道路中選擇一條，此外別無道路可走。於是黨內的領導地位及其他一切工作，都由長於逢迎的官僚分子佔領，真正代表無產階級的勇敢而有能力的先鋒份子，多被驅逐在黨外奮鬥。這樣為着對付反對派的鬥爭，斯大林更將從蘇聯的社會來源和經濟基礎上所發生的官僚制度發展並鞏固起來。這種官僚制度竟在斯大

林派的統治之下形成一種特別黨制，並且經過第三國際普遍的發展到各國支部中，形成了斯大林派的系統，把各國黨的領導機關都變成了斯大林派的忠實工具。否則便不能存在。一切我們在中國黨所見到的壓制，欺騙、蒙蔽、籠絡、收買等官僚政客的方法，都是從斯大林學校中學習出來的。

我們據兩年以來各方面事實的觀察，已在實際生活中直覺的感覺到機會主義盲動主義及官僚主義為害之烈，在得到托洛茨基同志所領導的反對派各種重要文件，以之和斯大林派的文件作比較的研究後，我們不但更系統的根本的認識中國革命之失敗是由於斯大林布哈林機會主義政策的指導，並且深切的認識現在整個的第三國際中顯然有兩個根本不同的路綫：一個是斯大林所領導的機會主義官僚主義路綫，即現在共產國際領導機關的路綫；一個是托洛茨基所領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綫，即國際左派反對派的路綫，而不僅僅是關於中國一國的問題。反對派是主張嚴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政策，反對在任何國家任何時期加以修正。斯大林派受了蘇聯內部非無產階級的力量與意識發展之反映，企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對無產階級的政策，無論在資本帝國主義的國家（如美國日本）在殖民地的國家（如中國印度），都加以修正，他們是聯共黨中的中派，實際已站在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之間。這兩派（斯大林派與反對派）的鬥爭，不但不是個人間的鬥爭，並且不只是簡單的派別鬥爭，而是關於決定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命的兩個路綫之鬥爭，現在在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中，也只有這兩派路綫之徹底的鬥爭，斯大林派現在尚想利用舊的機會主義一名詞來轉移全黨同志對目前這兩個路綫爭論注意的視線，完全是徒勞無益的企圖。

五、我們的態度與建議

反對派的責任是在使全體黨員明瞭機會主義的危險，擺脫機會主義的領導，而回轉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綫，在真正民主集中的黨中，黨內政治不同的意見本可由公開討論的方法來解決，不但不會使黨分裂，並且使黨更加鞏固。反過來，官僚主義的壓制與蒙蔽，勢必使黨崩壞與分裂；反對派為擁護真正無產階級的路綫，為實現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的統一，不能不與機會主義的領導有組織的作堅決的鬥爭。機會主義已迭次在中國宣告其可恥的破產，中國無產階級已付了過重的代價，直至近一年來方產生反對派的鬥爭，這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受第三國際長期機會主義的領導與蒙蔽，直到現在才接近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綫。

我們下列簽名的人，認為我們站在恢復列寧主義的國際，鞏固蘇聯無產階級專政，擁護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觀點上，都應該起來根本反對斯大林派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綫和官僚主義的組織路綫，國際的蘇聯的中共的現行政策和黨制，都需要根本改變。我們相信在中國的反對派運動得到黨內多數同志同情時，斯大林也會採用反對派一部分主張和口號或更換一部分領導者，以圖統馭群眾的左傾；但是我們所爭的乃是整個路綫之根本改變，而不僅不是一時策略上的曲折，更不是簡單那幾個人的問題。我們認為中共受斯大林派機會主義官僚主義之害最為酷烈，應當是國際各國黨中站在最前綫勇敢的反對現在國際機會主義官僚主義的領導。因此，我們提出下列建議，希望全黨同志一致堅決的要求並督促中央以中共名義向國際並直接向各國兄弟黨提出；同時我們應

該在國際左派反對派的旗幟之下團結起來，爲下列各項奮鬥到底：

- 一、召回托洛茨基同志等反對派，釋放在監獄中和流放在西伯利亞土耳其士坦等處的聯共及其他各國反對派同志，恢復其黨籍，並恢復托洛茨基同志的領導工作。
- 二、公佈五六年來反對派對聯共及國際政策發表的各種文件，公佈列寧遺囑及其他被斯大林派隱藏着的列寧遺著。
- 三、重新審查五六年來聯共中央及國際領導機關所犯政治上的組織上的錯誤，並重新決定聯共的政策及國際政策。
- 四、恢復中國黨因反對中央機會主義路線而被開除的同志之黨籍，並立即公開的討論根本政治問題。
- 五、重新審查中國革命過去的教訓，並決定新的政治路線。
- 六、改組聯共及國際與各國支部的領導機關。

簽名者：

王阿榮	王永慶	王芝槐	王視民	王 暢	王紹華
王季平	王大昌	尹 寬	左 斌	史文學	江鴻生
江常師	江又容	李果夫	李 季	李 軒	李靜濤
朱崇文	朱繼熹	朱天章	何炳根	何資深	杜 謙
杜發義	杜 琳	汪澤楷	汪復興	汪復盛	林金生
余 偉	吳季嚴	吳若萍	吳琢輔	岑舜鄉	馬玉夫
馬 圖	徐竹林	段 浩	段震亞	孫平州	高語罕
梁筱山	莊季貞	陳 洪	陳碧蘭	陳獨秀	陳其昌

張 虛	張以森	張素秋	張勝秋	張阿寶	屠景山
屠維納	陸 沉	程裕和	湯 正	彭桂生	彭桂秋
彭述之	單直夫	葉祿堂	董江素	劉右山	劉靜真
劉伯莊	劉 毅	劉逢鼎	潘希真	潘伯華	蔡振德
鄭 重	鄭超麟	蔣石甫	錢又萱	薛農山	羅世藩
韓治臣	顧幸釗	顧 滿			

附記：以上是我們簽名者今後的集體意見，以前個人所發表的言論，概由個人負責。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彭述之選集

第一卷

一九八三年六月第一次版

出版：十月出版社

九龍大南街321-323號4樓A座

3·862780

印刷：藍馬柯式印務公司

香港北角屈臣道2-8號屈臣氏大廈B座408室

定價：平裝港幣二十五元